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览

THE CONCETRATION OF WESTERN ECNOMICS WORKS

主编　晏小民　姚开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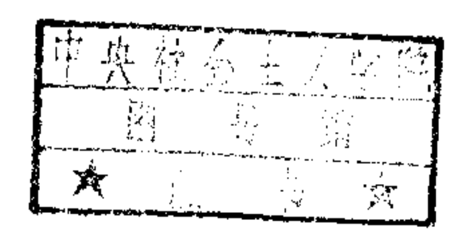
中国物资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览

主编　梁小民　姚开建

（上）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览/梁小民,姚开建主编.-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
ISBN 7 5047 - 0901 - 8

Ⅰ.西… Ⅱ.①梁… ②姚… Ⅲ.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选集 Ⅳ.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833 号

作　者:梁小民　姚开建
出　版:中国物资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县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16 开　787×1092mm
印　张:80
字　数:1000 千字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5047－0901－8/F·0334
定　价:495.00 元(上、下卷)

序　言

一

学了 30 多年经济学，当了近 20 年的经济学教员，感到收获最大的是阅读经济学原著。当大学生时，学过《资本论》、《马列经典著作选读》；当研究生时，又学过《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现在想起来，我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读这些原著的过程中奠定的。

1994 年我到美国进行研究工作，与昔日在北大学习过的学生聊天时，他们都认为，在北大几年中，收获最大的是阅读经济学名著。一位已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在北大时选修了我开的"高级宏观经济分析"课。当时我的讲授方法是让他们读一本英文原版的《宏观经济学》，然后由学生讲解，我进行补充。他告诉我，当时读这本书读得很苦，为了准备课堂发言，经常半夜才睡。但由于真正读懂了这本书，所以，在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顺利通过了宏观经济学这门课。他不无感慨地说，要不是你当初逼我们去读这本原著，现在还不一定能这么顺利地拿到学位。我也去听过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各门课都是以阅读原著为主，两年的基础课上下来，读几十本原著是很正常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研究生基础扎实，远非我们的研究生所能比。

读原著并非学习经济学的"捷径"，但却是必由之路。然而，古今中外经济学名著太多了，即使从亚当·斯密时代算起，要读的名著也不下几百种。尤其是凯恩斯之后，各种名著更是层出不穷。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读遍名著。茫茫书海，到底应该读什么？这是需要有"师傅"领进门的。平时也经常有人请我给他们列出一份"必读书目"，尤其是希望能在阅读之前，了解一点这些书的大概内容。正是出于经济学初学者的这种要求，我曾在自己任副主编

的《经济学文献信息》杂志上开过一个“名著导读”专栏，可惜没有坚持下来。编一本“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的念头多次出现。

正是基于这些想法，当中国物资出版社经济管理编辑部副主任王云龙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姚开建二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主编这本“导读”时，我就很高兴地答应了。应该说，这本书能顺利编写和出版，与他们及其他朋友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二

经济学著作浩如烟海，许多著作都是洋洋几十万言，如何选择书目，如何撰写介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编者们本身的教学与学习经验，本书的编写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选择的范围。经济学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本书选题的范围确定为“广义”的经济学，即经济学的各个分支。所以，本书包括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包括了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重重著作，还包括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我们认为，这样的选择标准也许杂了一些，但它为不同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广泛的选择范围，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第二，选择的书目。对于什么是“名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书是公认的名著，如凯恩斯的《通论》；有些书尽管现在名气不小，但仍未经过时间的检验，是否名著还难以作出结论，如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萨金特的《宏观经济理论》；有些书相当重要，但很难说得上是名著，例如一些流行的教科书。我们在选择书目时是以其重要性为原则的。有些书尽管还不够名著的资格，但由于有其重要性或一定的意义也入选了。例如，我们选了一本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著的《经济学》。这本书是教科书，当然算不上名著，但它力图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代表了当前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且，这本教科书被许多大学采用，所以，我们就介绍了这本书。在选择书目时，我们还重视了一些至今国内仍没有出版过中文版的重要著作。例如，古典的名著有费雪的《货币的购买力》，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等，这些书或在解放前出过中文版或者台湾出过中文版，因为读者很难找到，因此尽管它们都是30年代之前的名著，我们仍然作了介绍。对于近年来的一些重要著作，国内未出

中文版的，我们也作了介绍，如萨金特的《宏观经济理论》等。总之，我们所选的书目并不一定是名著，只要是较为重要的，我们都尽量选入了。但一些非常著名，又年代较早的书，由于大家已相当熟悉，我们并没有选入。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等都没有选。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能介绍一些读者更感兴趣的书。

第三，写作的格式。本书的写作以介绍原著的内容为主。各篇作者按原书的篇章结构介绍各书的基本内容。这样的介绍目的是起到导读的作用，让读者对每本书的结构、内容、特征有所了解，以便进一步阅读与理解原著。各书介绍的详略程度并不完全一样。有些著作进行了有重点的简单介绍，有些著作（尤其是一些没有国内中文版的著作）介绍的详细一些。此外，还对各书的作者作了简单的介绍。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对每本书进行评介。这一来是因为评价比介绍要复杂得多；远非本书的篇幅所能容纳的；二来评价是因人而易的，也许由读者自己评价更合适一些。我们不进行评价，只作介绍，绝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书的观点完全赞同。“述而不作”决不是肯定或推崇的意思，只不过本书的任务在“述”而不在“作”而已。我们相信读者会对这些书的内容与观点作出自己适当的评价。

编这样一本书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一些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以便大家在此基础上了解与分析西方经济学。我们的选题与内容介绍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的。

三

由许多人编写一本书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当我把所有稿件认真重看一次之后，觉得这本书也有一些遗憾。

首先仍然是在选题上。应该说本书包括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范围及重要著作，但仍有不少遗漏。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一些重要著作没有包括在内，尤其是一些国内尚没有中文版的著作。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美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自由的宪章》等，由于篇幅庞大，读之较难，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只好割爱而不收入。尤其是现代的许多重要著作，例如理性学派的一些重要著作，由于找原著不易，找作者也不易，所以也没有收入。也许还有一些著作，也许场并

不十分重要，但考虑到作者既然已经写出，也就收入了。选定书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对哪些著作该收入，哪些可以不收入，各人的看法不同。我们所选的书目并没有权威性，只供读者参考。

其次，各本书的介绍是不同的作者写的。不同的作者对原著的熟悉程度不同，理解的深度不同，表述方式也不同。所以，尽管我们作了不少努力，但各篇介绍内容的文章水平并不同，风格也不同。也许这是许多人共同编书中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应该说，每个作者都是非常认真的，对自己所介绍的著作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研究，所以从整体上所介绍的内容是正确、适当的。当然，各人介绍的重点、方式、风格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很难作到“一刀切”。把这不同风格的文章单独发表出去都很好，但放在一起就有了差异。这一点亦望读者谅解。

当这本书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在不长的时间内，组织这么多作者共同编写这样一本书是非常困难的。其难度远远大于我们开始时的设想。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能为读者研读经济学原著提一种指南和参考。我们也欢迎读者在阅读、使用本书中提出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以便我们进一步修改补充。

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这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诸位主编同仁让我写一篇序言。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这本书能对读者学习经济学起到积极的作用，指引大家去选读自己有兴趣的原著。同时，也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梁小民

1996.8.12

目　　录

［美］阿克利，加纳德
Ackley，Gardner

宏观经济理论
Macroeconomic Theory（1961）

本书是西方微观经济学向宏观经济学过渡中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很大。全书共分四篇二十二章。

下面依次介绍该书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意义

阿克利在第一篇中首先指出，“宏观经济学要探讨这样一些变量，如一个经济社会的总产量及其资源的利用程度，国民收入的大小和‘一般物价水平’。”接着，他阐述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各种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函数关系对于经济研究的意义，着重分析了经济模型的性质和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均衡状态的确认及静止分析、动态分析与均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回答了“宏观经济学会成为有意义的经济学吗?”这一问题。他认为，宏观经济学所有优点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就是：它至少可以作为现实的初步近似情形而富

有意义地存在。

阿克利在他所假定的简单化市场经济中，构造了一个收入循环和消费流量的图示，得出了一公式：国民产品（净额）等于国民收入。然而他认为，经济的实际运行要比这复杂得多。为了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社会帐目有更多的了解，他通过美国的现实资料考察了怎样衡量来自一个现实经济中的企业、政府、家庭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和收入。

他认为，在“实际”国民产品的衡量和评价问题上会发生很多的分歧。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指数问题”。对“实际”国民收入的估计也会遇到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使用美元计算的生产要素的总所得发生变动的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建议的工资率指数，实际上是在慎重地建议依据投入量来衡量产品。然而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步凯恩斯的后尘而摈弃实际产量的概念。实际产量和总就业量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但我们仍然只能运用它来进行经济分析。

阿克利进而分析了短期内就业量与产量的关系。如果生产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已定，产量就是就业的正函数，但却是非线性的。随着就业增加，产量也增加；然后超过某一点后，产量的增长率要小于投入量的增长率。事实上，在西方各国经济中出现了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资本增长率超过劳动人口增长率的情况。这些因素不只抵消了预期劳动报酬随人口增加而递减的情形，还引起了递增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产量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率。但在短期内，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和技术是固定的，因此可以假定递减的劳动报酬。他指出，近年来生产理论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革。人们越来越多的用各种投入量保持固定比例的新假定，来代替所有投入量都能按照一切合宜的或有利的比例随意加以变动的旧假定。事实上，关于就业和产量的资料不曾像宏观经济理论经常假定的那样显示出短期劳动报酬递减，相反，劳动平均产品随着产量增加而保持不变或上升。当然，在短期内产量也许随劳动投入量作等比例甚至更大比例的增长。但是，假设报酬在某一点要开始递减，似乎还是合理的。

二、古典学派宏观经济学

阿克利在本书的第二篇中，首先分析了古典学派中最经典的“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说”。“萨伊定律”在产量和消费之间确定一种极为简单的关系：产量决定消费，或者说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这条原理对物物交换经济来说是不错的。这个原理还暗含着任何产量的扩充都将引起收入和消费的同等的增加量的思想。因此收入和产量总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货币数量说”则假定人们用于购买货物的钱少于他们卖掉货物所获得的款项。但即便如此，只要售价具有弹性，也不会产生供给超过货物需求的一般过剩情形。阿克利认为，“萨伊定律”就它本身来说，是和任何绝对物价水平符合的，“货币数量说”则确定那一个绝对物价水平将会实现，这取决于货币数量以及决定它的流通速度和结构因素。只要每一个经济人的最小货币余额是零，则“萨伊定律”所依据的假定和“货币数量说”就没有矛盾。

进而阿克利分析了古典学派关于工资、物价、就业及生产理论。他认为，古典学派的物价理论意味着就业量和生产量起初不是决定于物价水平，而是决定于物价的内部结构。凯恩斯关于物价和工资的见解的错误，是忽视了“货币数量说”。工资可以从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两方面去衡量。实际工资以及就业和产量水平只决定于“实际的”因素：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边际负效用（或构成供给基础的其它“实际”因素），货币工资与物价只决定于货币因素。“实际”方面的变化可以影响工资和物价，而货币方面的变化却对“实际”量没有影响。他指出，古典学派分析工具有一些缺点，使它们不能完全适用于政府政策，然而它们在逻辑上的圆满性和一致性却是没有疑问的。

阿克利认为，“货币数量说”的假定不适合于整个经济，

汉森所谓“数量说”的主要困难在于不考虑储蓄过程。事实上，储蓄者可将没有花掉的投入购买证券。阿克利设想，如果利率可以自由波动并停止在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的水平，那么储蓄行为就不需要对当作一种总需求理论的“数量说”加任何限制。然而事实上，在任何一特定时间里，不同的借款人也许要支付不同的利率，而且若引入证券市场的话，就会发现，证券价格和市场利率是描述同样一系列事实的两种方法。进一步，若有人产生了“窖藏”的愿望，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跌和减少投资。货物总需求的下降有产生失业的危险，从而导致货币工资和物价的紧缩。如果有某种原因导致“反窖藏”，那么就会使这个过程倒过来。

阿克利认为，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分为三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就业理论和实际工资；物价水平；利率及储蓄和投资数量。这些都可以用方程式表示出来，他指出，如果把威克塞尔的“细致的货币数量说”在证明货币、利率和物价水平的相互关系方面的贡献引入上述理论的话，那么就要再增加两个方程，然而结果会是一致的。他认为，古典学派模型是一个充分就业模型。假定货币工资定得太高并拒绝下降，就会造成失业，这是古典学派体系中失业唯一可能的原因。事实上，古典学派未曾提出用人为的方法保持货币工资将会产生多少失业的理论。

三、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阿克利在第三篇中，对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评述。认为它“依然是宏观经济理论中最有用的出发点”。

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提出了古典学派模型的一些限制，这是建立他的模型的基础。第一种限制是“灵活偏好”或“货币的投机需求”。凯恩斯认为，投机需求是利率的函数，投机是货币需求对利息有弹性的一个原因。若利率的调

整受到投机的限制，则储蓄或投资曲线的移动将会影响到货币总需求。假使工资和物价有弹性，这就导致通货膨胀或紧缩；假使它们是刚性的，这就导致产量与就业的增加或减少。阿克利指出，只要对古典学派作一修正，增添凯恩斯的货币投机需求，那就无需修改古典学派的大多数结论。第二种限制是储蓄和投资“不一致”的可能性。凯恩斯认为，虽然投资曲线富于弹性，但并不具有无限弹性，投资率可能大大低于利率为零时的储蓄率。他认为，如果投资与储蓄的“不一致”是普遍的，那么充分就业也许变为不可能的，显然，上述的两种限制将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负担推给了工资—物价弹性。然而，阿克利却认为，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把工资—物价弹性作为稳定收入与产量（在充分就业水平）的手段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认为经济社会的自动反应会防止失业的发展或迅速予以纠正的概念已经被摧毁。因而必须把就业与生产水平作为主要变量。

阿克利在假定利率完全没有弹性，货币工资和物价是绝对刚性的前提下，分析消费函数与就业的关系。他认为，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里，消费函数不能是线性的、非比例性的和长期稳定的。在对影响消费支出的各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的分析之后，阿克利认为，今天谁都不会假定人们可以指望消费自动朝着相反方向而和投资发生同一数量的变化，以提供一种稳定的总需求。然而尽管这样，凯恩斯指出的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可以试验性地和有条件地接受消费是收入的稳定函数这一假设。

凯恩斯认为，当几乎达到充分就业的时候，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和劳动供给状况改变而使工资水平倾向上涨；当着普遍发生失业情形时，货币工资率倾向于下跌，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货币工资水平多少是一个“自发”决定的问题。然而，阿克利却认为，当引进真正弹性货币工资时，凯恩斯模型中就增添了一个新的均衡条件即劳动供求是相等的，也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对

失业来说，工资弹性并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还有其它达到充分就业的路线。

阿克利指出，尽管凯恩斯模型与古典学派模型之间存在着其他区别，但消费函数理论则是区别的主要之点。无论强调失业的原因是工资刚性、投机，还是由于不协调，失业程度以及国民收入与产量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消费函数的斜度。他认为，同古典学派模型相比，凯恩斯模型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改进。阿克利指出，假如没有二次大战及后来的“冷战”，那么凯恩斯所预测的西欧和北美的成熟经济会继续遭受失业和“停滞”的威胁也许是正确的。当然，就模型本身来说，凯恩斯认为边际储蓄倾向比平均储蓄倾向高得多的见解大概是不对的。所以最好把凯恩斯模型看成是他的前辈的宏观经济思想的扩充和改进，而不是一种替代。

四、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些扩充

阿克利在第四篇中阐述了宏观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理论、投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阿克利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过程，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在分别评述了需求膨胀、成本膨胀、加价膨胀的产生、控制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后，他认为，虽然需求膨胀容易发生在投资非常旺盛的时期，但需求膨胀肯定是政府支出（尤其是同战争或战备相联系的政府支出）造成的。他指出，人们曾建立了种种模型用来说明一个发生过多需求的经济社会的动态行为，但这些模型中没有一个是特别适用的。关于成本膨胀，他认为，把它说成是因工会为工资率施加压力而产生是片面的。上涨中的工资率不完全是劳动需求过多的产物。关于加价膨胀，他认为若所有商业企业和工人对他们的货物服务和生活费用都实行加价的话，就会遇到一种规模非常庞大和持续时间非常长久的螺旋形发展过程。劳动生产率提高也许会制止这一

发展，但所需的条件是，不能以扩大加价幅度来攫取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他指出，加价膨胀的分析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经济有些萧条或总需求增加时，都会发生通货膨胀甚至严重起来。

阿克利指出，几乎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中投资都占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但大部分理论都是形式主义和缺乏经验内容的。许多经济学家把资本理论和投资理论混为一谈。事实上，前者是要说明一家厂商和一个社会的最适度资本量，后者则说明当资本量没有达到最适度状态时，投资要按什么速度进行。他认为，实际投资数量和最适度资本量之间相对轻微的不均衡可能引起资本物工业相当长时期的紧张活动或停滞。凯恩斯的消费函数补充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加深繁荣或萧条的因素，但他的投资理论却抹煞了当前收入最适度资本量的“反馈”。萨缪尔森的加速理论则抹煞了资本物生产率的任何限制。他认为，或许在投资理论中我们不曾试图调和的真正矛盾，是着重资本“深化”的理论与着重资本“宽化”的理论。凯恩斯和他的古典学派的前辈实质上强调前者，现代理论则由于关心经济的增长而着重后者。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应该区别开两种增长，第一种“增长”是涉及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变动，第二种是已经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和高度发展的经济制度的经济社会的增长。阿克利分别评述了古典学派的模型、凯恩斯和停滞论者的模型、多马的增长模型、哈罗德的增长模型和杜森伯里的增长模型。他认为，凯恩斯、哈罗德和杜森伯里都是探讨现代经济社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足够大的总需求，容许经济继续不断的增长，但对于资本积累可能妨害增长的威胁的严重性，却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凯恩斯没有清楚地理解到需求和产量的增长会创造资本“宽化”的投资机会，并且对资本“深化”可能达到的程度持悲观态度，哈罗德模型实质上也是悲观性质的，只有杜森伯里对于增长抱有真正的乐观看法。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不单是取决于资本数量

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非比例性的存量积累的大小”。对“非比例性的存量积累”，阿克利考察了两个问题：一是劳动人口的增长和充分利用，一是和生产能力扩大相联系的私人要求权及与之没有联系的政府要求权，这种要求权的数额构成变化和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

最后，作为本书的总结，阿克利进一步研究了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有用程度取决于宏观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衡量性，而这就要运用微观经济理论来加以说明。可以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取决于微观经济的价格与收入分配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它需要进一步的“非总合化”，或在另一个基础上进行“非总合化”。世界上各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在相当短期内，保持产量与物价的稳定和经济不断迅速增长，应用宏观经济模型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据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61 年版。中文本陈彪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 晓光 撰

作者介绍

阿克利，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大学和密执安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贡献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首创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提出了宏观经济原理的严密公式。在通货膨胀理论、收入政策和工资——价格管制的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在 1947—1965 年对意大利经济问题与发展以及欧洲、北美与日本的稳定政策的分析也作出了相当大的理论贡献。主要著述有：《管理价格和通货膨胀过程》（1959）、《宏观经济理论》（1961）、《制止世界性通货膨胀》（1971）、《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政策》（1978）等。

[法] 阿莱，莫里斯
Allais, Maurice

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Inflation

本书是阿莱先生几篇英文版的重要论文汇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书名《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取之于本书中一篇论文的题目。书中涉及到阿莱先生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货币数量理论，以及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等，基本上包括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第二章为“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第三章为“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第四章为“对米切尔·达比评论的答复”，第五章为“一般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其中第一、二章主要涉及阿莱先生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四章主要涉及货币数量理论，第五章主要涉及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本章通过对1700—1913年期间英国经济的经验研究和对固定价格增长率对实际消费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影响的理论

分析，得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一般性结论：1. 经验研究表明，在生产和长期价格变动之间不存在明显可见的直接相关性。与此相反，在生产资料生产指数趋势的偏差的移动平均数和生活费用指数的移动平均数前十年的平均变化率之间显然存在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性在整个工业生产指数或是消费品生活指数的情形中却并不存在。2. 理论分析表明，在一个动态的均衡过程中，若价格和实际国民收入按固定的速率上升，实际收入水平是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关的，最大化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为9%。但是，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却与名义收入的增长率不相关。可见，对于一个给定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我们有可能推导出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和价格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3. 然而，上述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的结论是存在差别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地是因为在所选取的经验时期内价格和生产资料增长率资料的可用性不尽人意，部分地是因为理论结论的预见性小。4. 假如上述理论是正确的，同时也考虑到问题的社会学方面，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当价格平均地以生产率上升的相同速度下降的时候，就可以看作达到了集体最优。最优的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大约是5%。但是，从一种经验的观点来看，本章的研究没有提出确切性的结论。

二、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本章的内容从总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为一国经济构架中的货币和价格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技术分析，并对三种主要货币制度——即金本位制、完全可变的汇率制和布雷顿森林协议提出的金汇兑本位制——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比较评价。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为采取何种国内政策才能促进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以及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作者认为，要保持持

久的无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必须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改革：1. 禁止银行和有关的金融机构给予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如果这些信贷不能被至少同样长时期的借款所冲销的话。2. 政府依照法律每年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其数值比前一年期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1%。3. 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对应的追加收入必须计入预算资源，新投放的货币应通过公共支出的中介投入流通；同时税收适当减少，减少的数量等于货币创造的总量。作者还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认为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协定条款进行修改，以达到国际货币改革的目标。这些目标主要是：1. 使每个国家都能够把自己的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致力于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2. 尽最大可能拆除关税壁垒，消除数量限制以及其它贸易障碍，使所有国家都能够自由贸易，同时又不会受到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困扰。3. 努力排除在货币问题上人为造成的困难，从而在政治上促进国际合作。

三、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

本章在叙述了1953—1954年间卡根和阿莱探寻而得的同样的货币数量论的可运算的公式之后，提出了一个能计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公式：具有继承性、相对性和逻辑性的货币需求公式（简称H. R. L. 公式）。并通过对两个公式的对比分析，指出了新公式的意义和重要性。作者认为，H. R. L. 公式的提出，为把所有已知事实融进一个理论框架提供了一把钥匙；它可能重建了新的、可运算的货币数量论，它把迄今为止完全相反的观点综合了起来，使货币数量论理论家的观点——价格和货币数量之间有一比例关系——得到了证实。此外，作者还指出，H. R. L. 公式虽然乍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它经受了经验数据的验证，可以被认为符合事物的

本质；它不仅能应用于其它许多领域，而且彻底地建立起了可观测量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四、对米切尔·达比评论的答复

本章是一篇带有驳论性的论文。作者通过对米切尔·达比所提出的疑问和评论的答复，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论点。并由此指出，达比批评的特定形式是错误翻译了阿莱的理论，或是基于很成问题的先验假设，但对他的批评修改一下是很有前途的。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本章还附上了米切尔·达比的《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的评论》一文，从而以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章的内容。

五、一般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

本章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 把瓦尔拉一元主义的单市场经济模型的不现实性，和埃奇渥斯那里发展而来的、多元主义的多市场经济模型的现实性进行了比较。2. 分析了选择域和生产域普遍凸性假设的非现实性；指出如果要使一种理论具有一般性，那就必须放弃这一假设。3. 以分散地寻找可实现的剩余为基础的现实动态方法，与基于一般经济均衡考虑的非现实的静态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4. 根据以上分析，重新构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均衡的途径理论及最大效率理论。作者在本章中，还提出了建立模型的两条准则。他认为，根据这两条准则，人们应该放弃一元主义的单市场经济模型和以普遍凸性假设为基础的均衡和最大效率的新理论，并放弃使用十分严密复杂的微积分。人们应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理论，建立便于分析且不要求严

格假设的新模型。

由于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因此各章之间都独立成篇，没有直接的上下文关系。读者既可逐章全部阅读，也可仅选择感兴趣的篇章阅读。

（据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译者何完玉、姜忠孝）　戎家军撰

作者介绍

莫里斯·阿莱，法国经济学家和工程师。1911 年生于法国巴黎。1944 年被聘为法国高等矿业学校经济分析教授。从 1947 年到 1968 年，他一直担任法国巴黎统计研究所经济学教授，并从 1954 年起任经济分析中心主任。他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一般均衡理论和效率最大化理论的重构及发展一些新的理论，特别是在与资本和消费者选择理论有关的理论。他在 198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于同申）

[英]艾伦，罗伊·乔治·道格拉斯
Allen, Roy George Douglas

数理经济学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数量经济学》一书英文原版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6年初版，1959年再版。全书内容极为丰富，而叙述则由浅入深。全书除序言、导言和附录外，共20章。下面按顺序作一简要介绍。

第1章“蛛网及其他简单动态模型”，主要讨论单一商品市场条件下商品价格与供求数量之间规律性的循环变动。作者在对商品的供求及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说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运动，反映在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构成的图上呈现蛛网形状，由此导致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弹性等于供给弹性时，蛛网既不收敛也不扩展，引起价格和产量的经常性有规律的波动；二是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结果形成一个向外扩张（即发散）的蛛网；三是供给弹性由于需求弹性，此时形成一个向内收敛的蛛网，最后形成均衡状态。蛛网模型表明，均衡不一定具有稳定性。

第2章“凯恩斯与正统经济学派：乘数原理”，主要讨论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倍增作用。之后，在第3章“加速原理”，作者论述了国民收入（或产量和消费）的变动是怎样引起投资变动的加速原理。作者在对自发投资和引致

投资作了区分后，指出，“乘数与加速因子相互配合后可以获得一些相当不错的数学模型。”接着，艾伦还详细分析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菲利普斯的乘数和加速因子模型、萨缪尔森—希克斯模型中乘数作用与加速原理的结合，及其对产量、投资、长期均衡的影响。

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阐述了进行动态经济分析所需要的数学方法和工具。在第4章“复数”中，作者指出，讨论收入、生产及其他变量的函数关系时，常常必须应用复数的运算方法。在第5章“线性微分方程式”中，作者认为，讨论经济变量连续变动并以微量趋近于极限的过程时，可以使用微分方程。作者在第6章“线性差分方程式”中指出，当经济变量不是连续变动，而是以相等空间级数的离散形式出现时，则产生了差分方程的应用范围。

在第7章“经济周期理论”中，作者试图说明，乘数与加速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导致经济（产量）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艾伦认为，如果对乘数和加速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后，即可将之作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据此，他重点评论了萨缪尔森——希克斯模型，并分析了存货循环、自发性投资的波动、峰度投资、分配投资等问题。

第8章“古德温、卡莱斯基和菲利普斯”，主要考察了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及动态模型，并分别进行了评价。

第9章“闭合回路控制系统”，作者引用了工程理论中的术语，说明经济生活中反馈结构自动调整更正的程序。作者指出，经济学家要想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模型，就必须认识到滞后及其他关系的重要性；必须有节制地引入非线性元素；必须将研究重点从一般化转向特殊化。

在第10章“一般经济均衡”中，作者以由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所发展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成果为依据，分析了交换的均衡，具有固定生产系数的均衡、一般市场均衡、市场均衡的稳定性以及比较静态的若干问题等。并考察了反映厂商生产技术可能性的生产函数。作者在本章的最后强调，在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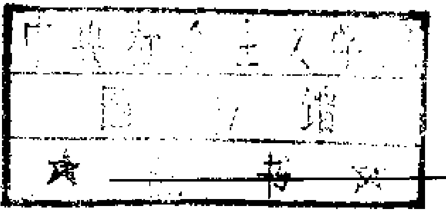
究一般经济均衡时，最好是两种方法，即边际数值方法和绝对数值方法都采用。

在11章“部门间关系”中，作者指出，一般市场均衡体系过于详细，不能作为实际应用的基础。在本章中，代替这一体系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分析，这种分析考察的是部门，而不是厂商。作者认为，由里昂惕夫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这种用部门表示的一般均衡的方程具有重要的实际内容并且适合于直接的实际应用。作者指出，投入产出法的基本结构是一张包括整个经济的复式平衡表或交易矩阵，既可以用数量表示，又可以用货币值表示。作者在详细论述交易矩阵、里昂惕夫的开放体系和投入系数矩阵后，具体求解了里昂惕夫三个部门模型。此外，作者还考察了里昂惕夫的动态体系，并给出了两个部门情况下的动态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作者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专门论述了矩阵代数。在第12章“数学分析：矢量和矩阵”中，作者在说明了数量和矢量的区别后，较系统地论述了矢量代数。接着论述了矩阵的概念、几种重要的矩阵以及矢量和矩阵的关系。最后介绍了求和号、内积和行列式等记号和概念。第13章“数学分析：矩阵代数”，则重点论述了矩阵代数的基本内容。包括矩阵的乘法、矩阵的转置、矢量和矩阵的乘法，矩阵的逆、矩阵的等价和秩等。

在第14章“矢量和矩阵代数的应用”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矢量和矩阵的概念来讨论线性方程组的解；二是利用已建立的有关数学理论进一步讨论市场均衡的有关问题和投入产出分析的有关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均衡的稳定性、里昂惕夫的静态体系和里昂惕夫的动态体系。

作者在第15章“对策论初步”中，对于对策论，主要是零和对策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作者指出，在许多经济问题中，解表现为在问题的条件所产生的某些约束下的最大位置的决定。但是，在其他的经济情况中，问题的解就不是简单地求极大值或极小值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活动参与者采取的策略这种更为复杂的问题。对策论研究这类数学问题。作者



重点分析了两人零和对策。具体地说，就是在一场仅有两个人参加的竞争中，双方都有一定的策略可供选择，且双方具有相互矛盾的利益：一人所得即为对方所失。论述的内容主要有：对策期望；纯粹策略与固定策略、极小化极大化、鞍点和对策的解、2×2 阶的支付矩阵的解、2×n 支付矩阵的图解、两人零和对策的一般情况、特殊对策的解等。

第 16 章“线性规划”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引入线性规划这一工具来求解对策问题，其主要结果是一般线性规划与两人零和对策的等价。这一结果的意义在于，解对策（零和）的方法也可用来解线性规划，反之，解线性规划的方法也用来解对策。二是通过论述这一数学方法，为后面的论述做必要的数学准备。

第 17 章是“活动规划与资源配置”，这是探讨资源和产品在不同的消费者或生产者之间，或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最优配置，从而是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类问题已不能单靠局部均衡分析，而必须运用一般经济均衡分析方法。艾伦在这里集中讨论了线性瓦尔拉斯体系和里昂惕夫体系，其中线性规划这一数学工具在分析中起了基本的作用。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还论述了冯·诺依曼增长模型。

在第 18 章“厂商理论”中，作者认为，本书前面所论述的数学工具对详细地分析厂商的生产是有用的。在对厂商的概念作出定义后，作者用边际分析法考察了厂商生产要素的替代、联合生产问题、厂商的技术。作者重点论述了线性规划对厂商问题的应用。

第 19 章是“价值理论”。作者从序数效用的观点出发，分析了消费者的需求、收入和替代效应。讨论了效用的可衡量性、消费活动和线性规划、技术—爱好的线性规划等问题。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第 20 章“加总问题”中，作者指出，从微观关系到相应的宏观关系，必须有一个经过加总的明确的转换方法。加总的方法无论在经济观点方面或与可用数据有关的统计含义方面都十分重要。为此，作者分别考察了对单个消费者的加总和对商品的加总，并论述了微观关系

与宏观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本章的最后反映加总问题同福利经济学中的有关问题联系起来。

全书各节之后多附有习题，以帮助读者理解，并启发进一步的思考。而且在每章后面都附有参考书目，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全书系统性较强，特别是在数学方法的编排上。因此，有简单数学基础的读者，只要耐下心来循序渐近地读，还是不难读懂的。

（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6 年版。
中文本吴易风、刘天芬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汉洪撰

作者介绍

艾伦，英国经济学家。1952 年当选 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艾伦的主要贡献在于，促进了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发展。此外，在效用价值理论、指数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收支的结构与贸易收入的计量方法、国际经济统计学体系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艾伦的主要著作有：《家庭支出》、（与他人合著，1935 年）、《经济学家的数学分析》（1938 年）、《经济学家的统计》（1949 年）、《国际贸易统计》（与他人合著，1953 年）、《数理经济学》（1956 年）、《宏观经济理论》（1967 年）、《理论与实践中的指数》（1975 年）、《国民经济统计学导论》（1980 年）等。

［埃］阿明，萨米尔
Amin, Samir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本书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以依附论观点讨论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代表作。本书不仅剖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讨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与“外围”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本书除导言外，共分 5 章。第一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第二章阐述中心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第三章阐述外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第四章讨论依附的机制并阐明“不发达的发展”的过程，第 5 章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当前形态。

一、资本主义的起源

生产方式可分为五种：原始公社方式、纳贡生产方式、

奴隶制生产方式、简单小商品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社会形态也有五种：公社社会形态、纳贡社会形态（包括封建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简单商品生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除了第一种社会形态外，其他社会形态都有既对立又联合的一对阶级。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远距离贸易和封建关系解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前者形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后者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出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三方面特点：整个社会生产采取商品生产形式；劳动力本身成为一种商品；生产资料成了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受到了限制。

资本积累的理论模式是：剩余价值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表现为经济活动与失业的同时波动。当剩余价值率增加到超越客观的必要水平时，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就必定导致危机。这种制度不向外扩张的积累即为自主中心式积累。这种积累使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排他性，并是利润率下降倾向得以表现的必要条件。而货币体系造成的信用集中化，则是这种积累的一个重要条件。

资本主义的这种自主中心式积累采取周期形式，经常造成危机形势。周期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固有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形式，通过它，储蓄与投资之间经常发生的不平衡就能加以克服。

三、从专业化到依附

国际交换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各国的有机构成和自然禀赋差异所造成的生产率不平等引起的。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倾向和不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进一步强化了国际交换的不平等。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减少了，而中心地区内部的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则增加了，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专业化程度也提高了。但同时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也恶化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不断扩大市场的倾向，这种扩张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但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中心地区扩大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造成国际专业化和交换的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总是构成中心国家的原始积累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使外围地区的不发达永久化并加剧。同时，这种“不发达的发展”表现为外围状态所特有的国内矛盾的加剧。在每一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主义都表现出其扩张主义倾向：第一阶段是商业扩张主义，然后是帝国主义，现在是后帝国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外贸起着重要作用，是实现自主中心积累的一种手段，即是说，自主中心经济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了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这种外向性积累模式在外围国家导致若干贫困化的机制，造成了它们对中心的技术依附和受跨国公司的控制。

四、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

不发达经济社会具有外向性，即出口部门凌架于整个经

济结构之上，外围地区向出口活动畸形发展，这是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在外围地区发展方向上的重要表现之一。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外向性的历史根源在于殖民地贸易、外国投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这种外向性是不发达的根源之一。

外围地区不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心国家的价格结构向外围国家的转移。这种转移造成了外围国家各部门之间生产率的不平衡。为了提高生产率，外围地区应选择先进技术或最重型的技术，不应选择轻型技术。

外围地区不发达还导源于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这种膨胀具体表现在外围国家第三产业份额比第二产业大得多，劳动力比例也比第二产业大得多。这就造成了外围地区随城市的发展而失业呈绝对或相对增加的趋势，尤其是隐蔽失业特别严重，这是外围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贫困化进程的结果。

外围对中心的依附不仅造成了，而且加剧了外围的不发达。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有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三种形式。这种依附造成了中心对外围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引起国际关系的不对称。中心国家在贸易活动中将专业化的特定形式强加于外围国家，迫使外围国家的出口服从于中心所要求的专业化形式。外围的这种商业依附又为其金融依附所加强；从而造成了外围国家的货币混乱和通货膨胀，加剧了外围的不发达。

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是在来自中心的竞争结构以内进行的，这种竞争造成了外围地区经济活动的畸形发展，这意味着乘数机制从外围转移到中心而使中心的积累不断累积地进行。这种转移导致不发达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增长受阻。在外围国家，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只是“不发达的发展”。

五、外围地区的当代社会形态

外围地区所采取的历史形态，一方面取决于受到进攻的

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外部进攻所采取的形式。当代外围地区所采取的前资本主义形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东方的和非洲的形态，主要是纳贡制方式；二是美洲形态，农业资本主义处于主导地位。

所有的外围形态都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居主导地位；第二，存在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第三，外围地区是有向本国官僚机构发展的趋势；第四，具有不完全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趋势。

外围国家面临两种前景：向依附性发展，或者向自主中心发展。外围国家必须大大修改资源配置的资本主义模式，并反对追逐利润的原则。外围在全世界范围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决为开端。在资本主义已具有全球性并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故这种过渡将包括社会主义目标与过渡结构之间的一系列具体矛盾。但是，只有在成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觉悟的目标在任何阶段都不为经济进步目标做出牺牲的情况下，这种战略才可被称为一种过渡战略。目标应当是把现代化设施同立即改善贫困人口的状况相结合，把现代化技术用于立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的境况。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上。

（据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6 年版，中文本高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出版） 邹正方撰

帝国主义与不平等交换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Exchange

一

第一编“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第1—3章，是经济发展问题历史背景的分析。

第一章“微观经济学批判”。这里所说的“微观经济学”是指建立在微观工程技术分析（社会项目评估）基础上的发展计划理论。非洲经济发展和计划协会（IDEP）曾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并通过非洲实例研究而直接将之付诸实践。阿明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了批判：一是由微观经济分析决定的“发展计划”是否可行？二是能否由社会项目评估分析来决定经济发展战略？他认为，发展项目的可行性值得怀疑，项目评估分析决定论教条必须批判。进一步具体地讲，（1）技术选择不可能脱离竞争性的现实社会关系，技术研究和技术发展实际上都受制于大型垄断企业；（2）技术经济考虑的合理性只是短期的，而社会发展则需要作较长期的统盘考虑；(3) 欠发达国家微观企业的经济选择只能在外围国地位上作出，而且这些选择还会必然地再生产出不平等的劳动国际分工结构；（4）经济决策与经济实施并不是同一回事，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企业经济选择看作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要素。阿明的结论性意见是：“微观经济学的合理性优点几乎微乎甚微。这种合理性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它完全取决于阶级关系、劳动剥削率、资本与土地所有的关系、不同资本家间的内部竞争关系、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最后取决于体现

在国家政策中的社会斗争和社会联合关系的全部总和。"

第二章"资本主义与地租"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阿明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无视历史背景和传统基础谈什么抽象的资本主义模式，所以应该把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引入资本主义构成分析之中。一般来说，工业化过程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重商主义时期，农业活动首次转换，封建生产关系相应变化；二是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三是农业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在战前欠发达国家（如拉美、阿拉伯中东和亚洲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是外国资本和本国大地主的阶级联合，他们一方面维持采矿业和种植业劳动的廉价，食物和劳务的廉价（既能降低资本部门劳动力的价值，又能提高特权集团奢侈消费的实际价值）；另一方面为新资本提供国内市场（尤其是奢侈消费品市场）。战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浪潮，使对食物生产的需求上升，但是农业因受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而一直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结果导致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第三世界反而成为中心国粮食的进口者。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外国资本与本国大地主的联盟瓦解了，代之以新的外国资本与本地城市资产阶级和富农的联合，他们构成了后来绿色革命的社会基础。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兴起"，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根据阿明的观点，文化是使用价值（效用）的组织方式。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基于对没有交换价值作中间媒介的使用价值的真实理解，结果所有使用价值既被认为是直接满足需要的手段，又被认为是宗教异化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是使用价值的否定，从而也是文化的否定、多样性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交换价值，这就使人们丧失了对使用价值的直接理解，他们以更高的生产率产生的利润——交换价值为目标，而忽视了使用价值和社会生活。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的社会，它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人们对使用价值的直接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将不是宗教的，而是经济学的。

二

第二编“帝国主义与欠发达”，包括第四～七章，论述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掠夺。

第四章“总体和文化方面”是分析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阿明认为，向社会主义转换可以架起一座从过去到未来的桥梁，但前资本主义意识不可能完全被摈弃，过渡问题研究也不可能不考虑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西欧资本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埃及的宗教、中国的儒教、印度和沙米尔的宗教、伊斯兰教等等。

第五章“帝国主义的危机”，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扩张主义。阿明指出：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将帝国主义理论与不发展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民族主义者强调的依附理论，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相应理论。这些都涉及到对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和对扩张主义的认识。他认为，帝国主义经历了二个扩张阶段和一个危机阶段：（1）与第一次扩张阶段（1880—1914）有关的因素有：反映不同剥削率的不平等交换；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古典式国际分工；外围国农业从属于殖民贸易体系；帝国主义的阶段联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受剥削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统治的政治形式和列强之间的“均衡”。（2）30年的斗争危机（1914—1945）使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3）在帝国主义复苏扩张的第二阶段（1945—1970），进口替代工业化使外围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体系一体化，这样就改变了反帝国主义战略的性质。同时，帝国主义中心国从外围国获取的大量能源和廉价原料在其复苏和扩张过程中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

第六章“国际贸易与帝国主义”，分析了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正是发展中国家

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

阿明在论述不平等的国际交换时，强调中心问题已从严格意义上的交换转变成了不平等国际专业化的交换。也就是说，由“不平等的剥削条件”取代了“不平等的交换”。他分析道，外围国现代企业中雇佣工人受剥削程度甚于中心国同类企业的工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外围国设备落后企业中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率却低于中心国。如果后类企业雇佣工人远远超过前者，以及前类现代企业广泛使用资本节约型技术时，这个国家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及平均利润率）就低于工业化中心国。这里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外围国的不同部门或不同企业之间劳动力的剥削率非常地不平等，其差异程度大于中心国；第二，尽管外围国的平均剥削率可能低于中心国，但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部门的剥削率却较高。换句话说，外围国的资本的利润产出率（即剥削率）高于中心国。这是中心国资本输出的原因，也是外围国资产阶级愿意实行工业化的原因。从全球角度来看，对劳动力的不平等剥削率正在逐渐地提高，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已与全球性阶段斗争联系在一起。

第七章“‘环境’问题”，论述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浪费问题。在世界的不同部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程度大不相同。阿明以非洲为例，从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工农业和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成本、人力资源和“人类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浪费机制，并且揭示了中心国如何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这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财富增长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第三编“过渡问题及社会主义的建立”，包括第八—十章，论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几个具体问题。

第八章“柬埔寨的教训”，说明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展

经济是错误的，柬埔寨就是例证。阿明强调，以开展农村阶级斗争为手段的发展战略已归于失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组织农民大军，团结那些被旧王朝和帝国主义分化的人，并通过工人、城镇中受压迫的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来削弱共同的敌人。吸取柬埔寨教训无疑对大多数非洲社会有益。

第九章“教育、意识形态和技术”，论述了社会再生产中的教育、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意识形态和技术等问题。最后指出现代世界的危机表现为：第一个矛盾是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工作技能的逐渐退化；由此产生第二个矛盾，在民主压力和影响下教育制度趋向于普及，于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造成了大多数市民寻找工作的困难；第三个矛盾是人性的危机，即资本集团的发展取代了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教育的人性特质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训练。

第十章技术转换主要研究了如何减少技术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换的成本。

四

第四编“争论的终结”，包括第十一章，评述经济学界围绕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的争论，对全书作了总结。

阿明指出，争论主要涉及到“不平等交换”和“国际贸易理论”问题。现在有必要考虑伊曼纽尔的两个有关基本论点：(1) 当今世界上，货物和资本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劳动则具有相对小的流动性。商品最初就是世界范围的商品，具有国际价值；(2) 劳动力的直接出卖（在资本企业中）或间接出卖（在外围国非资本企业中），也是一个基本问题。不注意到劳动力出卖的特征和影响，就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及其真实的根基。据此，可以展开以下分析：

第一，有关不平等交换的争论，伊曼纽尔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批判是重要的。他奠定了实证理论的基础，最先用资本、劳动和商品的移动性来勾画出现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基

本特征。然而他在现实问题（国际价值）面前却止步不前了。阿明认为，理论混乱主要来自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价值分析的不充分。伊曼纽尔把工资看作是独立变数，这是错误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资依赖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依赖一词否定了主客体间的辩证关系，而且生产力水平一词也分不清究竟是指企业的、部分的、国家的、还是世界性的。

第二，伊曼纽尔的贡献。根据他的论证，国际间生产活动都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支配。由于资本具有流动性，因而趋向于形成平均利润率；劳动力不能移动出国界，因而劳动补偿根据各国社会历史经济条件而不同。所以，商品的国际价值转移为国际价格就意味着部分价值从某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转移。这样，伊曼纽尔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平等交换：其一是由于各国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其二是由于劳动的不流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工资不同。后者是影响欠发达地区经济的真实原因。

第三，工资不是一个“独定变数”。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劳动力价值理论。

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决定工资的主客观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里所说的主观条件是指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率及实际小时工资，客观条件指的是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及生产率的变化。伊曼纽尔把工资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分离，而将之看作独立的变数，那是错误的。

第六，劳动的报酬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第七，不平等交换是不平等发展的根据。有关发展研究已证明，外围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低工资和现代技术双重因素，这是外围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和不平等交换的结果。由于外围国现代工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较高，国际资本因有利可图而蜂涌而至。致使外围生产方式既以扭曲的经济形式，又以特殊阶级联合的政治形式再生产出它自身。这一事实否认了罗斯托提出的外围国资本主义能成为通向成熟资本主义的阶段的论断。

第八，价值向价格的转换问题。

第九，利润率趋于下降及其自我调整的问题。

第十，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阶段划分。

《帝国主义与不平等交换》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发展经济学中激进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

（据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7 年版） 吴 名撰

世界范围的积累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4)

阿明在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是：当今世界是个包括了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无空隙的网，在这中间经济增长是个非常不平稳的过程，一些国家的停滞成为另外一些国家发展的条件，由此产生了发达和不发达状况并存的结果。就象本书副标题“对不发达理论的批判”所示，阿明在书中还对西方经济学关于不发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本书共5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资本主义的形成；外围的货币机制与世界货币体系；世界危机中外围的作用；外围的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整。以下分三方面对全书内容作一介绍。

一、世界范围的积累和外围资本主义的形成

阿明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是个“中心——外围”体系，它由两个有明显区别、但又紧密联系的国家集团构成。“从整体上讲，‘中心’组织了这个体系，并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原料生产和输出国以其自然资源与‘中心’产生联系。广大和复杂的‘外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加入到这个体系中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之所以扩展到全世界，那是因

为：由于生产垄断的形成，促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19世纪末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利益率呈急剧下降的趋势，从而迫使资本流向利润高的外围国家。

阿明指出，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外围”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而是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的过程。所以，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并非是同质经济成份的统一体，而是不同质经济成份的一体化。“外围”的前资本主义成份并没有随着外部资本主义成份的侵入而彻底分化掉。一般来说，“外围”的前资本主义是多种方式的混合体，它包括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旦它被“中心”的资本主义并入世界市场，其基本结构没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其存在意义改变了，成为“外围资本主义”。

所以，“外围资本主义”不仅包括外围国家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面向出口的现代化经济成分，而且也包括被并入世界市场的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经济成份。阿明认为，只要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经济成分从属于“中心”的资本积累而进行生产，那它就不仅应当属于“外围资本主义”，而且恰恰是“外围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外围”从未统一于某种生产方式，却统一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是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产物。“外围资本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而这个体系的基本特点就是：“外围”服从于“中心”的资本积累。

二、外围的不发达

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尽管缓和了“中心”国家由于国内利润率的下降而引起的生产矛盾，加快了资本的增殖，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导致了“外围”国家的不发达。也就是说，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一极是“中心”国家的高度发展，另

一极是“外围”国家的长期落后。

第一，从商品输入来看。阿明认为，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与“中心”的根本不同，由此使发展进程不同。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是，进行资本投资建立民族工业；而外围不发达经济的起点是，国外产品的入侵。

在“中心”国家，民族工业的建立吸收了大量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资本雇佣的人数逐渐超过破产的人数，社会总需求大大增加，加速了民族市场的形成。而在“外围”国家，一方面，由于廉价的外国商品输入而使传统手工业迅速崩溃，导致农业失去了传统的出路，同时又把本来用以满足当地消费的农业生产推向生产各种满足“中心”积累需要的原料；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工业尚未建立，破产的手工业者无处安身，只得重返土地，这既阻碍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又为压低工资水平创造了条件。所以，从表面上看，“外围”国家通过与“中心”国家的贸易联系，使经济恢复了平衡，但实际上，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已使内部总需求急剧降低，农民把原来用以同手工业者交换的产品卖给了外国人，这阻碍了健全的民族市场的形成，而不断增长的外部需求使“外围”国家经济畸形发展，使其在国际分工中沦为农业国。“外围”国家通过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使经济恢复平衡，这是“依附性”发展和“不发达”的开始，从此打断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二，从资本输入来看。阿明认为，资本输入是紧接着商品输入之后发生的。在商品输入已经瓦解了手工业，并使传统的经济结构并入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外围”国家有限的社会需求，使面向国内市场经济部门的投资无利可图，所以外资就进入了出口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生产的产品同国内需求无关，完全服从和依赖于“中心”国家的需求。同时，“中心”国家为避免国内利润率的下降，也必然要到国外去投资。尽管外资的进入对“外围”国家的资本形成有促进作用，但也限制了当地资本的投资范围。外资的进入不是取代商业交

换，而是加速商业交换，进口商品的竞争使实力较弱的当地资本不可能顺利建立起面向国内市场的民族经济，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依附性”和“外向性”的经济结构。总之，商品输入是通过贸易关系促成了外围依附性的经济结构，资本输入则使之固定化、持久化。

西方流行的不发达理论通常把不发达等同于贫困（其表现形式为：文盲多、营养少、死亡率高和人均收入低等），把不发达类比为发达国家的早期阶段。阿明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样的认识不能揭示不发达经济的本质特征，特别是不能说明不发达与世界范围积累之间的关系。贫困固然是不发达的重要表现，但不发达并非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毫不相容。不发达本身不是落后现象的表现，而应当理解为世界范围积累的一个方面。

阿明在本书中将不发达的特征归结为三个方面：(1)经济结构的非同质性，即属于不同经济时代的经济部门共同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要素而存在。这种非同质性表现为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不平衡。(2)经济体系的脱节。由于经济结构的非同质性，不同部门之间必然缺乏有机联系的机制。不发达经济本身各部门之间只能进行勉强的交换。它们的交换从根本上看依赖于外部市场，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缺乏正常机制。这种经济脱节使得任何一个部门的发展都不可能对其它部门产生启动性的作用，产品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效应均不起作用。一个经济部门因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不是通过正常的经济机制为各部门所共享，而是通过世界范围积累的机制转移到中心去了。(3)依赖于外部世界。不发达经济内部体系的脱节决定了对贸易在其中处于特殊重要地位。不发达经济对外贸易的显著特征是，出口由初级产品构成，进口由工业品构成，而且这些贸易的80%主要同工业发达国家进行。但发达国家贸易的80%却是在它们自己之间进行，同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只占20%。所以，不发达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超过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依赖。

阿明认为，只要这三个特征没有消除，“外围”的发展只

能是畸形的和受限制的。首先，外资的输入对国内经济部门的发展没有启动性的作用，利润外流破坏了资本积累的来源；其次，由于中心的强大竞争，使外围的资本转入非生产性投资，造成第三产业的畸形发展，生产性资本积累受到削弱；再次，外围资本建立起来的民族工业一方面由于旧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彻底分化而缺乏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逐渐脱离基本需求，而去适应富裕的农村剥削阶级和城市上层资产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这种过度消费影响了资本积累。阿明指出，这种"外围"所特有的资本积累模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中心"资本积累的产物。

三、"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

世界范围的积累引起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实现机制是什么？阿明认为是"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

他详细分析道，在相同的生产率下，如果 A 国的工资仅是 B 国的 20%，A 国较高的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两国交换所依据的平均利润水平。在一定的平均利润水平下，同样的劳动总量，A 国在国际交换中的所得要比 B 国少。例如在 1966 年，第三世界出口总额的 75%是由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产业部分（如石油、矿产和现代化种植业）所提供的，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并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在该年这些产业部门中，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价值达 80 亿美元，其原因就在于工资存在差异。

阿明认为，不能脱离资本积累过程来分析工资差异。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工资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中心"和"外围"两种不同的积累模式决定的。在"中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是有联系的，如果工资下跌到某一水平，生产能力就会超过消费能力，随之，生产就会收缩。所以，"中心"的实际工资将随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增长。而在"外围"，大部分现代化部门的产品不在国内实现，其积累的实现不依赖于内部的需求水平，因而面向出口的部门生产

力水平提高，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无客观联系。何况“外围”国家还存在着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劳动力持久地廉价化。所以，“外围”的积累模式排除了“外围”实际工资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要消除不平等交换，就必须打破“外围”的积累模式。

此外，阿明认为，生产率的不同还会引起交换的不平等。具体有两种情况：(1)生产率不同，剩余价值率也不同，由于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造成剩余价值在国际上的再分配。在这一再分配过程中，不发达国家不得不失去一部分价值，从而使它们的国民收入少于投入的国民劳动，发生了国民收入份额的国际转移，使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均受到影响。(2)生产率不同，但利润率平均化机制未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商品以本国的生产价格进入世界市场，但它们要受到世界市场价格的支配，而世界市场价格不外乎就是发达国家的生产价格，这样，不发达国家就无法实现其商品的价值，总收入就会少于投入的总劳动。这种情况下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先进部门与不发达国家的传统部门之间。尽管不发达国家的传统部门本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的，但只要它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活动，它的产品就必然同国际上的相同产品或替代产品的价格保持一致，它就必须适应在世界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中心的价格结构。总之，在国际价值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包含着“外围”向中心的价格转移。

(据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4 年版)　　肖　生撰

作者介绍

阿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是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其理论深受拉丁美洲“依附学派”的影响，力图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来揭示不发达经济的实质，全面论述不发达问题。阿明著述甚丰，主要是：《不平等的发展》(1973)、《世界范围的积累》(1974)、《帝国主义与不平等发展》(1976)等。

[美] 阿罗，肯尼思·约瑟夫
Arrow, Kenneth Joseph

信息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信息经济学》一书是英国贝色尔·布拉克威尔出版公司收集阿罗的18篇论文编辑而成的。全书328页，按顺序简要介绍如下。

第1篇论文“序列化决策问题的贝叶斯解和最小最大解”是一篇技术性很强的文章。作者首先叙述了沃尔德对统计决策问题形式化及表述和相应的贝叶斯解的概念，然后讨论了贝叶斯解的构造、有限多值决策问题的贝叶斯解和线性成本函数时二分情况的最优序列化程序。作者将多值决策与对策论联系起来，作者指出，有限的多值决策问题可以看成统计学家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一场博奕。这场博奕中的支付函数就是风险函数。从对策论的观点看，多值决策过程中最优序列化程序的存在意味着：对“自然”的每一个混合策略(先验的分布)，统计学家都有一个最优的纯策略来对付它。作者引述了沃尔德对决策问题的看法，即统计学家应该选择一个决策程序，能把最大风险最小化。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给出了序列化概率比检验的一个最优性质，并讨论了最优检验风险函数的连续性。

在第2篇论文“凸集的容许点”中，作者指出，统计过

程容许性的概念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很明显，容许过程和某些先验分布的最优贝叶斯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对凸集来说，这种关系在数学里实质上等价于最优资源配置和支持价格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二元性并不完备。为此，作者通过与几位学者私下讨论，得出了一个改进的特性（定理），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还给出了一个例子，并讨论了定理的应用和统计学和经济学含义。

第3篇论文名为“统计和经济政策”。作者指出，任何决策都可以看做有四个部分的问题：（1）一个目标函数；（2）一系列政策选择，或手段；（3）模型；（4）计算方法。作者认为，最后一部分已经成了决策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阿罗看来，象几乎任何一个现实的决策问题一样，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是连续的，也是不确定的。阿罗指出，一个决策问题即使它在形式上看来是可以设法解决的，但在计算上通常都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人们用一个一段时间的决策问题（阿罗称为近似的决策问题），去替代一个真正的连续决策问题。在阿罗看来，考察政府经济政策的性质还可以采用一个略微不同的方式。即最优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时间以三种不同方式纳入考虑之中。这三类时间是连续性时间、计算时间和累积时间。与这三类时间相对应的是三类信息。阿罗依次讨论了连续信息、计算信息和累积信息。阿罗认为，这些讨论为解决相机决策和自动规则之间的争端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阿罗在第4篇论文中，非技术性地论述了运筹学在决策理论中的作用。阿罗感到，在大量的实际运用中，运筹学的基本优点是迫使人们对所面对的情形进行反思，而且很可能，其收益中应归于被迫进行的新分析所揭示的新知识的部分，与归于最优化过程中的正规步骤的部分一样大，或者更大。阿罗还评价了建立理论模型的价值，即，建立模型超出了现实的计算能力或资料可用性。首先，一个表述清楚但目前却无法解答的模型常常将使人们能够看清其中的联系，认识到它的含义，并能够区分目前情形的哪些结果将对未来产生影

响；其次，简化的理论模型在解出之后仍然能使我们对其中的变量将对未来产生的影响有一个数量化的认识。阿罗还强调，在许多情况下，运筹学带来的成效的提高，主要地不应归因于规范的最优化程序，而应归功于这样的事实：提醒人们注重收集充足的资料（信息）。

在第5篇论文中，阿罗针对决策论的迅速发展对统计实践的影响不大这一现象，讨论了决策论和检验显著水平的选择，试图提供一个当样本量增加时反映人们的信息变化的合理的客观程序，并为说明推理本身的可信度提供一个信号。

在第6篇文章中，阿罗从理论上讨论了保险、风险和资源配置问题。阿罗认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是保险理论和实践，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阿罗在考察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后，又探讨了保险业务在一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主要包括保险范围上的限制和数量上的限制以及保险对投保人施加的限制等。在第7篇论文中，阿罗以希腊经济为具体考察对象，讨论了一些加强资料收集的一般性原则。第8篇论文是阿罗针对一位名叫保利的学者写的一篇论文而对保险中道德危机的进一步考察。阿罗在第9篇论文中论述了信息价值和信息需求，主要包括不确定性下的行为模型、信息量和信息价值以及信息需求等。在第10篇论文中，阿罗概括地描述了关于较高教育水平的经济作用的一个模型，它与人力资本的正统观念有很大差异。在阿罗的模型中，与社会化的假设与人力资本理论中获得认识技能的假设所意味着的，教育提供了能够带来更高生产率的技能的论点不同，阿罗模型强调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对于获得更好的经济成就绝无助益，它既不增加认知能力，也不增强社会化程度。相反，它作为一种甄别手段发挥作用，在其中可以把具有不同能力的个人加以分类，从而向劳动（力）的购买者传递信息。阿罗的这一理论被称为较高教育水平的过滤器理论。在第11篇论文“信息和经济行为”一文中，阿罗论述了信息和经济行为的关系。阿罗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或

是其他方面，对人们来说，可得到的机会以及人们决策的后果，都是不完全确知的。不确定性是许多决策过程的一个特征。当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时候，通常都存在着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信息的存在，信号的存在以及未来信号的预期，都意味着实际经济行为部分地是由非价格变量支配的。在阿罗看来，经济行为者愿意为信息、为信号支付成本。阿罗在第 12 篇论文中，指出，对于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为了更好地理解不确定性，必须重新确定理论的方向，为此，他对把不确定性和信息引入经济学的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概括和透视。在第 13 篇论文中，阿罗从信息的角度考察了组织的议事日程问题。阿罗首先探讨了信息成本的特征，即，（1）对个人来讲，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是不断增加的，因为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投入品；（2）它涉及到较大数量的不可逆的资本投入；（3）它们在不同的方面也是不同的。然后，阿罗依次考察了个体的议事日程和组织的议事日程。在第 14 篇论文中，阿罗从不确定性和信息出发讨论了垂直一体化问题。主要强调了上游企业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的作用，以及下游厂商对信息的需要。主要内容有，无垂直一体化的竞争均衡、早期垂直一体化的动力、有许多个企业的竞争均衡与垂直一体化和无垄断力量的垄断均衡等。第 15 篇论文的题目为“风险配置和信息：最新理论进展”。阿罗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市场经济中风险配置理论的一些最新进展。为了找到可以进行风险贸易的市场，作者首先定义了意外商品。所谓一单位的意外商品是这样一种协定，即只有当特定的事件发生后，提供一个单位的特定商品或支付一个单位的货币。然后作者通过研究 7 种不同信息假定下，探讨信息对意外商品市场产生的某些影响。在第 16 篇论文中，阿罗讨论了产权原理和不完备信息下的需求显示。他从市场外部性的论述开始，通过引述产权学派的观点，最后批发焦点集中在寻找激励结构的保护性策略上，继而和需求显示问题联系起来。阿罗试图提出一个需求显示的不同方式，它既是有效的，又避免了激励支付时的资源浪费。作者首先提出

议价过程的一种可能的形式，当行为者互相了解效用函数时，该议价过程会导致有效率的配置；然后说明当不具备这种知识时，如何达不到效率性，接着作者讨论信息不完备时需求显示的一般方法，最后说明如何应用这种方法开发一种需求显示对策。在第17篇论文中，阿罗考察了大团队中的资源配置。这里所谓的团队理论是引入了一种考察集中化—分散化选择的新方法。一方面，它假定固定的信息和通讯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更加依赖于有关生产可能性信息的先验结构。阿罗在这篇论文中严格地证明了如下结论：在厂商数目很多的情况下，“信息全部交换”（即向每个行为者提供每个过程的生产参数）及“有中枢的完全信息交换”（即每个过程管理者都把生产参数提供给资源管理者，但过程管理者之间没有信息交流）中的追加信息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在第18篇论文中，阿罗从理论上讨论了用二元型问题划分样本来取代搜集观测值的问题。

纵观阿罗的这本论文集，它具有时间跨度长、论题广泛、数学语言涵盖面广等特点，这足已表明了把信息作为一种商品去构造它的一般理论的困难。客观地说，读懂阿罗这本论文集中的所有文章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需要有坚实的数学基础，而且也需要有广博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可能从阿罗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作者的一些研究问题的思路和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对于理解阿罗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基本思想以及洞察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基本文献是很有帮助的。

（据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版，何宝玉译）　吴汉洪撰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英文第一版 1951 年由美国威利父子公司出版，第二版于 1963 年出版。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最后一章。全书共八章，本文分四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导论”，分析了民主制度下寻找能进行社会选择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必要性。

在一个理性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由于价值观不同，不同个人对社会状态的偏好不同，对社会状态的排序也不相同，从而社会排序与个人排序可能不一致。可以用投票悖论来说明这一点。假定有 1、2、3 三个人，x、y、z 三种备选对象，各人的选择如图所示：

	1	2	3
第一选择	x	y	z
第二选择	y	z	x
第三选择	z	x	y

大多数人（1、3）认为 X 优于 Y，又有大多数人（1、2）认为 Y 优于 Z，从而推导出大多数人认为 X 优于 Z，但实际上

又有大多数人（2、3）认为 Z 优于 Y。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法并不能保证个人排序与社会排序一致。这种矛盾被称为“阿罗悖论”。同时，社会效用函数和补偿原则都不能作为社会选择的方法。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一组已知的个人偏好出发，是否可能形式化地建立一个推导社会选择模式的程序，使该程序满足某些自然的条件?”。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 2—4 章，提出社会选择应满足的两个公理，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的五个条件，并证明了社会效用函数和补偿原则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条件。

第二章“偏好与选择的本质”，说明了个人偏好与社会选择的本质是排序。排序应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这两点是理性的体现，也是公理。完备性是指个人或社会在面对所有备选对象中任意两种（x、y）时，总能作出 x 优于或无差异于 y 或 y 优于或无差异于 x 的选择。传递性是指个人或社会认为 x 优于或无差异于 y，y 优于或无差异于 z 时，必定认为 x 优于或无差异于 z。社会选择应满足这两个公理。

第三“社会福利函数”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的五个条件，并证明了作为社会效用之和形式的社会效用函数不能满足所有的条件。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的条件是：第一、广泛条件，即民主社会应允许个人有任意的价值观，从而有任意的个人排序，这是自由的体现。第二、社会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的正向联系，即社会排序应正向地反映个人排序的变化。对 x、y 两种社会状态，假定社会原来根据个人排序得出 x 优于 y，现在由于个人价值观变化，x 经某些人或所有人排序中的位置都提前了，那么，社会仍应认为 x 优于 y。第三、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即社会对某些给定社会状态的排序应该与这些社会状态外的某一状态无关。假定社会状态 x、y、z 的排序已定，那么，在社会状态 x、y、z、w 时，x、y、z 的排序仍不变。第四、公民主权条件，又称非强加条件，

指民主制度下社会排序与个人排序相关，而不应按习惯法排序。第五、非独裁条件，即民主的社会排序不能是独裁的。任何用来判断社会状态优劣的方法都应满足这两个公理和五个条件。个人价值观是个人用来评价自己满足程度的根本依据，给效用赋予一定值完全取决于个人价值观，只有在相同的个人价值观时效用值构成的社会效用函数才有意义。但第一个条件使社会效用函数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运用个人效用不能进行社会选择，即使假设个人效用之和的社会效用函数有意义，这种函数仍不能作出社会选择。假定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效用赋予一定值，且所有的人对最好、最差社会状态分别赋予一和零。三个人三种社会状态的赋值情况及用个体效用值之和构成的社会效用值情况如图：

	1	2	3	社会效用值
x	1	1	0.5	2.5
y	0.9	0.9	2.8	2.8
z	0	0	0	0

这时，社会认为 y 优于 x，但在去掉 z 之后，赋值情况变为：

	1	2	3	社会效用值
x	1	1	0	2
y	0	0	1	1

这时社会认为 x 优于 y，无法满足第三个条件。所以，社会效用函数不能用来进行社会选择。

第四章“补偿原则”论证了补偿原则也不能满足全部条件，从而不能用于进行社会选择。补偿原则认为，在假设补偿下可对任意两种社会状态进行比较。阿罗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卡尔多原则不能满足第三个条件，西托夫斯基原则不能

满足第二公理，所以，补偿原则不能作为社会选择方法。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5—7章，用反证法证明了，在五个条件和某些改进的条件下都找不到社会福利函数。

第五章“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可能性定理”，证明了民主制度下社会福利函数存在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民主制下没有一种方法能体现民主。结论是：如果社会中各成员至少能自由地对三个备选对象以任何方式进行排序，那么满足第二与第三个条件，且能得出满足两个公理的社会排序的任何一种社会福利函数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或者说，如果消费者的价值观能由相当广泛的个体排序表示出，那么，公民主权学说与集体理性学说就是矛盾的。阿罗用集合论方法进行了这种证明。

第六章“个人主义的假设”，证明了在个人主义假设下仍不存在满足两个公理和五个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个条件假设个人可以按自己的价值观排序。个人主义假设是指个人在其价值观体系中更看重其消费—闲暇—积蓄局面，即个人仅以他在不同状态下的消费——闲暇——积蓄作为排序的依据。这一假说是大大简化了的第一个条件。但个人主义假设并不能保证个人排序相同。即使在一个人两种社会状态下，只考虑消费情况，一种社会状态给个人带来的某种商品量比另一种社会状态多，而后一种社会状态给个人带来的另一种商品量又比前一种社会状态多，这样，按个人主义假设就是一个人也无法对这两种社会状态作出比较。在多人两种社会状态下，一种社会状态给某人所带来的消费—闲暇—积蓄局面比另一种社会状态多，但这种社会状态给另一个人所带来的消费—闲暇—积蓄局面可能正好比第二种社会状态要少。这样，不同个人仍有不同个人排序。实际上，个人主义假设下的排序与第一个条件同样复杂，因此，个人主义假设下如果存在不止一种商品，而且每一组满足个人主义假设的个体

排序都是可以的，那么，每一个满足第二与第三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阿罗仍用集合论方法进行了证明。

第七章“作为社会福利判断基础的类似性”，论述了只有在个人排序相同时，也就是在个人有相同的价值观时，才能作出社会福利判断，但相同价值观的取得又存在许多困难。阿罗用单峰偏好原理来说明这一点。单峰偏好原理假定存在某一种社会状态的排序，在这种排序下，社会任意个人的效用函数值必定在前几种状态下单调递增，而在后几种状态下单调递减。在这种情况下能作出社会选择。但单峰偏好原理要求所有个人首先按相同的价值观给社会状态排序，从而得出某一种社会状态的排序。这就需要探讨个人价值观相同的可能性。所有个人生物性的和文化性的需要相同，即社会的根本目的相同，但由于缺乏知识，发现事实真相并将之公布的困难，所有人并不能认识到社会根本目的的一致，从而导致对社会问题的不同意见。这样就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福利函数不可能存在。

四

第四部分是第二版补写的第八章“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注记——一九六三年”，补充了第一版的疏漏，并评论了这一领域中的某些进展。

这一章包括了五个内容，第一是对社会选择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第二是对以前若干论述的新证明，包括帕累托原则与社会福利函数条件的证明、一般可能性定理的证明、平等原则与中立性原则的论述等。第三是驳斥了一些对阿罗观点的误解，包括帕格森提出的福利判断问题，里特尔关于社会决策与福利的区分，帕格森与里特尔把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分开的提法。第四是对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与人际间强度的比较。第五是集体理性问题。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对福利经济学和民主制等重大问

题进行了独特的研究，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尤其是阿罗悖论，受到广泛重视，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

（据美国威利父子公司 1963 年版。中文本陈志武、崔之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梁小民撰

在确定状态与不确定状态下的个人选择

Individual Choice under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1984)

《阿罗文集》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贝尔柯纳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自1980年以来，已陆续出版了7本，本书为其中的第3本。1984年出版。全书共273页。

阿罗曾长期致力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一般均衡理论要解决的是个体优化与整体优化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同样，社会福利目标的选择与个人的选择也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阿罗由研究社会选择入手而转入考虑个人的选择机制与规律，正反映了这种总体与个体的一致性。“个人选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它涉及到信息学，心理学与决策理论等多方面知识。本书中主要研究了在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心理两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个人选择的规律性现象。阿罗以集合论为主要工具，建立了以经济风险环境中个人选择的数学模型。本书共汇集了13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风险环境下选择理论中的选择方法》、《风险反感理论》、《心理学与经济学的风险感知》、《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理论》等，主要讨论了以下主题：确定与不确定状态下的个人选择；风险尝试与风险反感。简单介绍如下：

一、选择理论的发展历史和意义

阿罗在前言中写道："作为经济均衡理论的基本要素，个人选择已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自从1870年新古典主义革命以来，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先驱者，通过引入一系列假设条件，把个人对商品的需求问题转化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个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进行选择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研究的主要还只是确定条件下的个人选择。"他同时指出，尽管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选择的研究沉寂多年，"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有关思想，早在1738年丹尼尔、贝努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如今经过对原有的思想赋以新的正规形式(即指数理形式)，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有很大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主体人，他在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当机遇来临时，应如何处置？通常的情况是，一方面他对外界并不能做到充分了解，他本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范围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选择的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不十分有把握。于是，个人的选择，从行动到结果，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个人所能作的，只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尽量选取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行动。

从广义上来说，个人的几乎每一个行动都具有选择的意义，个人随时希望扩大自己的选择范围；而外部环境又随时约束着个人这种欲望的扩张。在选择理论中，上述现象可以用集合的概念来表达。所谓行动集，就是包罗了所有备选对象组成的集合。个人选择就是从中进行一次抉择的行为。因此，这是一种自映射关系。阿罗指出，选择理论的原始范畴很广，个人的经济选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他象投票选举则是在有限范围内对备选对象进行选择的另一个例子。前者以货币作为选票，后者则以选票来表示个人的态度。从

选择或决策的角度来看，两者并无根本差别。

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个人的偏好是客观稳定的。对于市场存在的各种商品组合，个人能够依据偏好对其进行准确的排序，选择行动就相当于一种函数的映照关系：一旦从备选行动集中确定了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与行动本身具有一一对应。这是一种确定性的选择理论。

古典理论的缺陷在于，选择赖以为根据的商品排序是由个人偏好决定的，偏好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产物。对偏好形成机制的研究表明，偏好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经济环境中风险的存在，使得在同一环境中采取同一行动，因环境的变异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在贸易、股市、风险投资中寻常可见的现象，是古典选择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承认与不承认不确定性是个人选择中的关键因素，区分了“个人选择理论”的两大分支。

二、确定状态下的个人选择

本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尝试用效用的序数理论取代效用的基数理论，以便在无法直接对“效用”进行数值测度的情况下，运用排序的方法体现个人的判断结果。帕累托这样做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它有助于说明个人在不同情况下作出表面上千差万别的选择是有着内在规律的。在他所作的合理选择模型中，首先定义了偏好序：

设对于任何一可能的结果 A 和 B，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偏好对它们进行比较，确定或者 A 优于 B，或者 B 优于 A，或者 A、B 无差别，三者必居其一。这种有序关系还满足传递性，即若 A 优于 B，B 优于 C，则必 A 优于 C。传递性同样适用于无差别关系。对所有可能的结果，个人在头脑中依上述关系排列成序。按照假定，在确定状态下进行选择，结果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选择作为一种行动

与结果组成的二元关系，一切符合上述有序逻辑关系的选择，形成一个二元排序。除非发生突变（指外界的或心理上引起对偏好的改变），个人选择就是指在预算或其他约束之下，在这一二元有序排列中由高到低进行的择优选择。这里指出约束的作用，是因为有时候个人不可能只把处于序列中最优地位的结果作为自己的选择，他还必须考虑到个人的支付能力等因素。这样，他就不得不取处于次优地位的结果作为自己的选择。

上述选择模型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在运用其来解释具体情况时，由于“偏好”的不易度量，不得不加上许多条件，以保证选择在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最常见的在消费理论中，为确定商品组合的有序排列，通常假定排序仅依据各商品组合中所含商品数量的多少来定，而与价格变化无关。对两组商品组合，它们除一种商品外，其余的从质到量完全相等，那么，这种商品量大的那组排序在前，量少的则在后。

事实上，仅仅根据商品数量的多少难以作出明确的排序，因为忽视商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和预算约束导致的对商品总体关系的考虑，而仅考虑单独一项项地比较商品的数量关系，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阿罗写道：“每个人作出的任一选择，事实上都是在其全部生活和经验背景上作出的。”但是，从目前来说，要想建立这样一种全面的选择理论是不现实的。为此，通常通过把研究对象分解为不同部分，割断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以使在每一部分中选择可独立地进行。对各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可忽略不计，阿罗在“效用、态度与选择”一文中，回顾了确定状态下选择理论的发展过程后指出，建立在有序偏好基础上的“合理选择模型”在生活的局部领域中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上述理论的确无法解释个人选择受到的种族、政治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不能转换成数量概念，这自然不利于作出排序。其次，社会或政治的备选对象是离散状态的，这与商品组合中的连续性假设条件不符，因此在经济问题中有效的选择理论，在社会和政治的选择范围内未

必适用。

阿罗特别强调了把经济科学与行为科学结合起来考察选择的行为机制。研究表明，个人选择具有“实际选择”和“潜在可能选择”两个层次。观察发现，个人的实际抉择与其内心的意向性抉择相比，要保守得多。为研究这两类选择之间的影响与转换，阿罗提出了要重视对“态度”问题的研究。他引用心理学中的成果说：经济学中很少被注意的偏好类型的转变，可以用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来解释。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决定态度结构的是一些少量的随机变量。这使得有可能用随机数学的工具来剖析个人选择的行为机制。

三、不确定状态下的个人选择

确定状态下对个人选择难以解决问题如此之多，使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转到了不确定状态下个人选择上来。

这方面最初的理论可以从1738年丹尼尔·伯努利的著作中找到。伯努利把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以取得效用的数学期望极大化的论点，在解释现实时显得过于空洞。近半个世纪来，数理统计学的发展促进了不确定状态下个人的行为原则进行公理化处理，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1）如果关于外部状态的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的形式来表达的话，即由个人对每一个不同状态派定发生的概率。这样在概率公理体系下 Aij 就可用实数来表示；个人根据行动能达到的期望效用极大化原则来选择自己的行动。（2）也有人认为，外部状态发生的概率完全是主观的产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对不同的状态分配不同的发生概率，并据此从中作出自己的行动选择以达到期望效用的极大化。（3）奈特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反驳了概率不确定性的普遍意义，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可归结为概率问题。

阿罗发现，在不确定状态下，与行动相对应的结果，因

受到外部状态变化的影响，每一阶段的选择，其作用会延续到下一阶段中去，而成为影响下一阶段选择的因素。这种“选择的超阶段效应”，使得个人的选择问题与其说是一种运动——结果的对应关系，还不如说是一个在时间坐标上随目标、环境状态的变迁而不断调整的选择过程更符合客观实际。阿罗还指出，问题的不确定性质还由于个人选择相互间的影响（即不具备独立性）而趋复杂。在这里，博奕论中的“n—人对策”提供的“最大最小策略”理论可以成为解释多人多重选择问题的有用工具。1947年，纽曼和摩根斯顿用公理化方式在概率空间中处理选择问题，创立了博奕理论。稍后，曼·帕松教授用现代统计推断理论分析了不确定状态下个人合理行为的一些情况。这样，以数理统计为主要工具研究不确定条件下个人行为，才正式展开。R·希克斯（1931年）和阿尔伯特·哈特（1942年）先后把“不确定性理论”用于分析企业行为，重点分析了流量，资本存货和生产的弹性等问题。

阿罗在“效用、态度和选择”一文中对不确定状态下个人选择的模型作了如下概述：

现实中存在着一系列可能会出现的外部状态，和一系列可供采取的行动。就目前而言，个人不可能完全明确哪一种状态才是目前的真实状态，而行动的后果取决于外部状态的真实性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全部符合约束条件的可取行动中，如何进行抉择。一般假定，行动的后果只决定于两个因素：行动本身和外部状态；同时，与确定状态下一样，行动的后果也具有“有序性”。

在假定外部状态和可能采取的行动都是属于有限集的条件下，定义Aij为在第j种状态下采取第i项行动所得的结果。根据假设，Aij构成的空间是有序的，则Aij可被认为即等于效用。这样，对个人在不确定状态下作出合理选择的行为就可进行公理化处理。

几乎所有的选择模型，都承认下面“阿基米德定理”(archimedean)的合理性，定理说：“若A、B、C为三个被选对象，其中A优于B，B优于C，则必有A、C之间某个非B

的B′，B′是A、C的某种随机组合物。但是，阿罗指出，事实上，若A与B、C相比，并不在数量可比性上占优势的话，上述定理是错误的。著名的帕斯卡赌博悖论表明，当B优于C，取任意从C到A的概率的A、C组合都将优于B。因此，造成选择的不确定性的原因和描述方式要比设想的复杂得多。无疑，在对外部状态和对结果的描述方面、（包括概率分配和优、劣判定）目前问题提高还不很清楚，个人的主观价值取向和信念的产生机制和影响方式，都还不曾有过严密的研究。阿罗同意说，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种衡量标准，来衡量什么才是不确定状态下的合理行为。他提出有必要结合心理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讨论个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样，个人选择理论就将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理论。

四、风险与风险反感

本书的第2篇论文“风险状态下选择理论中的选择方法”，专门讨论了一种特定的不确定状态——风险投机中个人选择的规律。第9篇“风险反感理论”则讨论了风险状态下个人选择的另一个方面。第13篇“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风险观”，则把心理实验学中获得的结论与“合理预期理论”联系起来解释个人在风险环境中的行为特征。

统计数据表明，赌博意味着参赌者利益平均水平的一种损失，那么，人们为何还乐此不疲呢。用概率的语言来描述：赌博反映了个人对“小概率、大收益”的一种偏好。为此，风险投资、投机行为成为经济中有普遍意义的选择行为。相反，“保险业”则反映了个人对“大概率小损失”的一种偏好，希望通过累积小损失来避免大的灾难。在经济风险环境中，这两种差别很大的选择，往往会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对这种必然性的研究成了个人选择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弗里德曼认为，个人常常有选择地对一部分风险有反感，而对

另一些却情愿冒险，这两者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两种可协调的行为。当外界风险过大时，风险反感起着主要作用。对赌徒来说，他们是凭藉主观概率来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参加赌博。如果从主观意义上来理解风险的话，风险反感与赌博之间也存在着可以转换的一致方面。

阿罗不愿停留在对风险理论只作质的方面的讨论，他希望能有进一步取得数量研究的进展，因此在“风险反感理论”一文中试图对“风险反感”进行数值测度，他以贝努利的“期望效用”假设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随机型的风险环境下的选择模型，并提出了两种对“风险反感”进行测度的公式。进而他把上述模型用于分析投资，企业规模扩大，库存量的适度选择，保险事业等与风险状态有关的选择行为和选择条件。阿罗同意部分学者的意见，认为人可能自发地对风险承受感到厌倦，但是对利益的追逐又不得不使个人被驱赶着去承担风险的压力。“利润是对冒险的一种还报”，他说：“我们经济制度的许多特征可用存在风险来描述”。所以，弄清个人在风险环境中的选择行为是重要的。

阿罗的这本著作包括了他近年来在个人选择理论方面的主要思想。近年来，数理经济学家已开始认识到在不确定状态下个人选择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用以处理不确定性的较成熟的数学工具只有概率与数理统计，而真实情况下不可能用它们来对付所有的不确定状态。这方面的突破恐怕还得要取决于新的方法论的引入。

（据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坷纳普出版社出版的《阿罗文集》1984年版。）徐 坚 撰

数理经济学手册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982, 1984, 1986)

本书由肯尼恩·阿罗和迈克尔·英粹里格特（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共同编撰。荷兰阿姆斯特丹依尔斯维埃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1 卷，共 378 页；1984 年出版第 2 卷，共 692 页；1986 年出版第 3 卷，共 445 页。

数理经济学是一个包含着大量数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的庞大学科，这门学科在近几十年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它在经济实践和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阿罗等认为，目前有必要对这门学科进行整理、总结并推进其新发展。为此，他们邀集了全世界数十名有名望的数理经济学专家学者，合作写成了这本被称为“当代数理经济学百科全书”的原著。

本书共计 29 章，每章各以一个数理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为中心。全书可分为 5 个部分：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含 8 章）；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数理方法（含 6 章）；竞争均衡理论及其灵敏数理方法（含 7 章）；经济的组织与计划理论及其数理工具（含 3 章）；福利经济学及数理方法。本书注意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编排内容的前后，这样易于给人一个明确的整体发展意识，理解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在此，我们根据作者所撰写的“历史的介绍”一文，对本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学派时期(1838—1947 年)

早斯的数量经济学最初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借鉴了物理学及其有关的数学方法论，以微积分为基础建立起了一门用数学形式表达经济内容的理论。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数学工具有各种导数、偏导数、拉格朗日乘数法等，这些工具有助于解决各类极大值问题。可以说，现代消费，生产、垄断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石就是在那时奠定的。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发展有：

(1) 古诺的开创性的理论。古诺在数理形式下建立起了两个理论：一是厂商之间交互作用的理论；二是单个市场上的消费行为理论。古诺以“追求利润极大化是厂商行为的基本准则”为基点，研究了完全竞争与垄断现象；他提出在完全竞争下达到供需平衡的最初步的数学理论模型，对后来 20 世纪初期“博奕论”的建立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古诺是最早有意识地对古典经济理论系统地赋以数理表达形式的经济学家，因此他被誉为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则成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经典著作至今，他关于垄断现象的“古诺解”，仍然是研究垄断问题的一个标准方法。本书第 11 章由弗里德曼对“垄断理论”进行介绍。

(2) 厂商理论。19 世纪末期，根据古诺提出的“利润极大化”思想，瓦尔拉斯、威克斯第德、克拉克、霍特林等人经过共同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投资需求 产品供应的厂商理论。本书第 10 章由纳第瑞对此作专题介绍。

(3) 消费理论。在收入约束下谋求效用极大化的消费理论，最先是由戈森提出的，后来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对此作了补充，最后由马歇尔予以完善的。关于在效用极大化下需求函数形式的数学推导则是由希克斯、艾伦、霍特林等人完

成的。弗瑞希等人用效用序数理论取代了原来的效用基数理论，并完成了这一理论的公理化研究。而萨缪尔森则为揭示偏好与效用的关系做了杰出的工作。在本书第 9 章中由巴顿和博恩专文介绍这一消费理论。

（4）一般均衡理论。揭示市场供求矛盾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运用数学中的方程组进行分析而提出。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实现均衡所要具备的条件。希克斯和萨缪尔森则对均衡的稳定性问题进行了严密的数理论证；最后由阿罗、哈恩、德布鲁等人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本书第 16 章中，哈恩专题撰文介绍了均衡的稳定性。

（5）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在大量私人企业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描绘和定义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首先由帕累托提这个题目，并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关于最优及次优状态下的资源配置的讨论，已成为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目前这方面进展迅速，已从静态研究进入到研究动态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6）一般契约理论。1881 年埃奇沃斯第一个研究了经济契约问题，把它从单纯的价格体系拓广到一切商品与社会范围，由此形成“经济核”新理论。第 18 章由希尔登布兰德对此作专题介绍。

（7）暂态均衡理论。希克斯在边际学派以微积分为工具研究均衡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暂态均衡理论新概念，对人们的预期作用，市场的非价格数量分配等影响竞争竞衡的因素都作了考察，他广泛应用集合论等新工具，把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第 19 章由格兰德蒙特和萨缪尔森共同介绍这个专题。

二、集合论与线性模型时期（1948—1960 年）

二次大战以后，以集合论为工具和方法论基础的数理经

济学，取代了以微积分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的盟主地位，从而得以用更多的技术手段来推进这门学科更深入的发展。集合论方法的主要工具包括泛函分析，凸分析与拓扑学等近代数学的新分支，这些工具的使用使得能够大为放宽原来严格的假设前题，从而得到更为一般化的结论。本书第 1 章中格林和赫勒对这种方法论与工具进行了概述。

纽曼早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就采用了新的数学方法。阿罗则由于社会选择理论的公理化研究的需要，而采用集合论作为研究工具，并进一步运用到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中去。本书的第 22 章介绍了社会选择理论，而竞争均衡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则分述于第 15—21 六章中。应该指出，阿罗和德布鲁所做的工作是迄今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们用凸集理论与集合论的方法证明了竞争均衡在资源配置上的最优性质，这些内容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本书第 22—26 章做了专题介绍。

德布鲁在 1959 年发表的那本著作具有经典意义。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研究不确定状态下的均衡现象。阿罗与哈恩在 1971 年著书对此项论题进行了概括。本书的第 20 章中由拉德纳对此进行了介绍。

1948—1960 年也是线性经济模型大发展的时期，这方面的进展，极大地推动了数理经济研究进入应用领域。1941—1966 年里昂惕夫的线性投入产出法渐趋成熟。库普曼斯发展起了一种相关活动分析模型。在苏联，康托罗维奇独创了线性规划的雏型。纽曼在 1937 年提出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也十分引人注目，摩根斯顿和汤姆森等都加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这一模型无论在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都起着启迪作用。同一时期还是线性规划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丹齐克独立创建的这一数学分支，因为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的努力，在经济应用领域取得异常的成绩。1958 年，萨缪尔森、多夫曼和索洛提出了“大道定理”的理论原型；1963 年由南德纳和尼凯多等人从数字上加以证明。英粹里格特在本书的第 2 章中介绍了运筹理论、增长理论等，“大道定理”则

在26章中由麦肯齐作出了介绍。冯·纽曼、摩根斯顿和纳什建立的“博奕论”，也是一个对数理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分支。本书在第7章由舒比克予以专题介绍。

三、当代综合时期（1961— ）

从1961年至今的当代时期是一个以综合多种方法技术以经济研究服务为特征的时期。微积分、集合论与线性模型结合在一起，向几乎所有传统的经济研究领域进行拓展，同时也开辟了不少崭新的研究领域。下列11个大课题可以代表这一时期发展的主流与特点：

(1) 不确定性与信息。包括风险研究，不确定状态下的均衡，保险问题，探索性行为，市场讯号等分课题。本书第6章由利普曼和麦考尔著文谈经济不确定性。第23章由阿罗介绍信息经济学。默顿在第13章中介绍不确定状态下的投资分析。第20章中由拉德纳撰文谈不确定状态下的均衡。

(2) 全球分析。包括微积分到拓朴学的数学工具被应用于研究随经济状态变化而变化的各种经济均衡的性质。第8章由斯迈尔教授谈全球分析。迪科在第17章中介绍这一分析方法在经济中的应用。

(3) 对偶理论。对偶球论是数理经济中的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它可以大大减少研究的繁复性。在对具有对偶特性的一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只要透彻了解其中的一个问题，利用对偶原理，就可以推及到另一个问题。霍特林，萨缪尔森等人都曾涉足其间。第12章中迪沃特专文介绍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对偶原理。

(4) 总量需求函数。消费理论表明，由个人效用极大化推导出的需求函灵敏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而索南斯肯在1973年指出：总量需求函数可不受个人需求函数的限制条件的束缚。德布鲁对此亦有研究。第14章由谢弗和索尼斯肯

进行介绍。

(5) 经济核与带有贸易连续性的市场。“大贸易”的概念基础一是假设有无限多的贸易者，二是假设贸易在时间的流向上是连续的。这一理论中包含了博奕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测度论。第 18 章中由希尔德布兰德介绍经济核。科曼则于第 5 章谈测度论。

(6) 暂态均衡。希克斯首次于 1939 年提出了这个概念。他指出贸易者应在过去与现在状态的基础上判断未来的可能性。暂态均衡下市场价格的变化有快速传递的特征，以利于作出数量上的合理配置。第 19 章中格兰德蒙特专门介绍了暂态均衡问题。

(7) 均衡价格的计算。这是利用不动点原理进行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典型例子。以往的一般均衡理论仅在纯理论研究的水平上。可计算一般均衡价格使这一研究成为一个具有操作性质的实用方法。目前许多国家以此作为调整价格变动的参照价格。斯卡夫教授在第 21 章著文谈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8) 社会选择理论。阿罗构筑了这一研究的理论框架。社会选择涉及到个人对社会选择的意愿作为一个社会总现象时的特性。根据阿罗的理论，当只有两种社会选择时，选择定理表明，存在满足选择公理的选择规则。如果存在三个以上的选择可能时，将不存在满足选择公理的任何选择规则。本书第 22 章由森专题介绍。

(9) 最优化税收。本书第 24 章中米里利斯把最优化税收作为次优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介绍。第 25 章中谢钦斯基专题谈次优理论。

(10) 最优增长理论。萨缪尔森、索洛、库普曼斯、谢尔等人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从最佳储蓄开始的这一研究，由于引入了更先进的数学工具，以多重向量增长模型的形式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第 26 章中由麦克肯兹介绍了增长理论与“大道定理”。其中所用到的数学知识有动态系统和控制论，前者由瓦里安在第 3 章中介绍，后者由肯德里克在第 4 章专

文介绍。

（11）组织与计划理论。这一研究包括了排队论、区域分工，激励机制、计划的制订与调整等范围广泛的理论问题。本书第27、28、29章分别介绍了组织设计，主权分散化与激励机制概念，计划理论三部分内容。由马恰克，赫维茨和希尔分别撰文予以介绍。

《数量经济学手册》，内容丰富，论述多出自于专家之手，融汇了当代数理经济学的最新成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当然，由于近代数理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数学方法越来越复杂，这对不具备这些知识的读者来说，会给阅读这些内容的专著造成困难。为此，本书在第一册中主要安排对各种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以方便读者在以后的阅读中具备应有的方法知识。本书荟萃了全世界数理经济学界精英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学科的发展演进，无论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是一本高水平的著作。

（据荷兰阿姆斯特丹埃尔斯维尔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徐　[illegible]

作者介绍

阿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阿罗的重要贡献是他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阿罗用数学工具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内容及其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阿罗的主要著作有：《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年）、《存货和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与他人合著，1958年）、《公共投资、利润率和最优财政政策》（与他人合著，1970年）、《承担风险的理论文集》（1971年）、《组织的限度》（1971年）等。

［英］阿什顿，托马斯·索思克利夫
Ashton, Thomas Southcliffe

产业革命：1760—1830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

《产业革命：1760—1830》英文版194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和1969年先后出版了平装本。全书共六章，本文分三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介绍英国产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产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不是偶然的。它发生的条件可以概括为三个。

首先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产业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农业方面，自从十三世纪就已开始的圈地运动在政府法令的保护下，发展甚为迅速。从事圈地的多是经营贸易和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人，或是追求与土地占有相关的权势的人。圈地使土地逐渐集中到大土地占有者手中，小农不断破产。圈地运动的结果是土地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业技术有重大创新，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同时，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工业方面，纺织业发展迅速、成

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产业。这就表现在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由家庭手工业向手工工场过渡等方面，在政府扶植下，到十八世纪，毛纺业已有了固定中心。采煤与冶金工业也发展迅速。采煤业出现了几百人的大工场，冶金业解决了原料问题，并在伯明翰形成了金属加工业中心。在贸易方面，不仅以水运为主的国内贸易发展迅速，而且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对外贸易中出现了许多联合股份公司。进口多为初级产品，出口为工业制成品。贸易对象有欧洲各国和海外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使英国获得了大量财富。这种经济发展为产业革命准备了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资本市场的变化。由于公债和储蓄提高，资本供给急剧增加。储蓄增加来源于由于消费者收入普遍上升和社会政治条件稳定所引起的储蓄倾向提高，以及贫富分化加剧。当然，储蓄本身并不创造资本，因为资本的创造不仅需要有储蓄意愿，而且还要有高效率地利用储蓄的意愿。从 18 世纪起，人们就开始利用储蓄获利，他们投资于更遥远、更具投机性的事业，资本的需求也增加了。当时，资本的需求增加小于供给的增加，因此，利率下降。利率降低使投资有利，这就刺激了经济发展，各产业部门与企业的扩大为工业革命积聚了力量。

最后是其他条件，包括劳动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垂直流动性增大，科学的发展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对教育的贡献。他们是中产阶级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一部分。他们热衷于教育事业，使苏格兰的正规学校教育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先进。学校着重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实践方法，讲授各门学科，培养出大批杰出学生，为技术创新准备了各类专门知识人才。

由于行政、黄金管制和其他技术原因，18 世纪英国的工业仍主要分布在乡村，运输对海洋和河流的依赖性和工业用水的局限性使人口主要分布于沿海和沿河地区。大城市（如伦敦、格拉斯哥）是作为贸易中心而不是作为生产中心发展

起来的。这时的工业结构十分灵活，大多数资本表现为原材料存货，资源可以轻易地从工业转到贸易中或由贸易转到工业中。生产过程简单，无需专门技术，劳动力可以自由在各行业间转移，资本与劳动之间替代性强。这些就是工业革命前英国经济的特点。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十八世纪中期才发生是一个时机问题。发明创造的出现、观念的变革都需要时间。十八世纪初不成熟的思想、原料的缺乏、工人技术低下、保守势力对变革的抵制，多数产业中的瓶颈现象都使早期的工业创新失败。只有当这些因素被克服，充裕的资本和旺盛的需求刺激了经济高涨时，产业革命才真正拉开序幕。这时就是十八世纪中期了。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是以历史事实来描述产业革命的进程。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阿什顿按产业来描述产业革命的进程。

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业中。以 1764 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为契机，相继出现了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克隆普敦发明的骡机、卡德莱特发明的动力织布机等创新。这些发明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棉纺业的产量迅速上升。随后在毛纺业、印染业等纺织业中相继发生了技术革命。

采煤业中，戴维、克兰尼和史蒂文森先后发明了安全灯。蒸汽抽水机和蒸汽凿井机等先后在生产中得到运用。这些大大提高了煤产量。

冶铁业于 1790 年开始使用蒸汽压力鼓风，降低了燃料消耗。1784 年，科特发明了搅铁和辗压法，解决了燃料不足的困难，降低了成本，减少了从波罗的海各国的生铁进口。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以南威尔士为主的冶铁业中心。

产业革命中最重要的是瓦特于 1776 年发明单动式蒸汽

机，1782年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创新相结合，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条件。“这种新形式的动力，成为工业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

与工业相适应，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18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开运河的热潮。这就降低了运输与生产成本，把偏远的农业地区纳入了市场范围。这又增加了就业，刺激了经济。同时，出现了铁路。1814年史蒂文森发明火车机车，1825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

从产业革命的进程中可以看出几个特点。首先，技术创新是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地进行的。有时仅仅是一种模仿，有时某行业的发展是另一行业发展的前提。往往是两个或更多行业同时发展，互为条件。这说明技术创新在各行业的关联性。其次，创新的特点受现实的制约。在十八世纪30—40年代资本充裕、劳动缺乏时，创新集中于节约劳动的发明，到60—70年代，人口增加对资源形成压力时，重点又转移到资本节约型。最后是发明创新与运用之间存在着时滞。因为发明的运用要受到原材料、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制约。技术创新是劳动节约型还是资本节约型对各阶层的财富分配也有重大的影响。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4—6章，是分析产业革命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部分是全书的重点。

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在第四、五、六章中论述。

第四章论述了产业革命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从资本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早期的资本供给来源于勤勉、节俭和诚实，远远满足不了资本需求。资本市场是有限的、地区性的。产业革命后，经济扩张和投资预期收益的上升使商人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商业资本转向工业固定资本，从而增加了长期资本。同时，产业革命增加了对用于原料、工资、库

存等的短期流动资本的需求。适应这一需要，私人银行应运而生了。银行按一定的贴现率购买厂商开出的票据支付现金。部分企业也建立自己的银行。由于众多小银行资金有限，借贷混乱，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有联合银行，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活跃。这样，统一的国内资本市场建立起来了。这时银行对企业的作用增加了，但主要是在于企业扩大而不是企业创建。当时企业倒闭率高，银行政策保守，不直接持有企业股票，而是持有风险较小的抵押证券和债券。银行未参与企业经营，只是企业的债权人。它的作用是组织短期资金，并实现资金流动。此外，到十八世纪末，英国成为国际借贷中心，向国外输出大量资本并进行直接投资。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资本已在国内外具有高度流动性。

从劳动市场来看，产业革命前，英国的劳动力缺乏流动性。技术创新推动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工人向产业中心转移。劳动力流向劳动短缺、工资上升的地区。尤其是爱尔兰人流入英格兰、苏格兰，为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1815年以后，英国劳动力出现过剩，政府废止了禁止工人出境与机器出口的法令，劳动与资本都实现了自由流动。由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在1830年，英国形成了一个工资劳动者阶层，他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样，一个统一、完善的劳动市场就形成了。

第五章分析产业革命所引起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放任。在产业革命中人们变的以自我为中心，日益贪婪和反社会。这时社会行为的主要特征是俱乐部广泛存在。这里各种利益、传统和野心都以合作的方式得到体现。企业合伙经营，与其他企业保持密切关系。一些行业中出现了合并。合并后的企业通过控制价格、工资或信贷条件来减弱竞争、分割市场。劳动者的合作形式则是工会。

产业革命是自由放任的时代。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大大减少。这与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密切相关。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经济人与自由竞争的论述对当时经济起

了巨大指导作用。尽管政府仍在维护立法、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起作用，也还控制着国际贸易与航海，并有一些经济实体，但整个经济是自由放任的。这是历史上经济自由程度最高的时代。

第六章分析产业革命对就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可以从这样几方面分析这一问题：第一，投资对就业与经济周期影响很大。当利率低、投资收益率高，投资行为冲动时，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加，经济高涨；反之亦反之。第二，产业革命使英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增大，进出口同时增加。相当一部分工人的就业取决于海外市场状态。出口增加伴之以国内经济高涨和就业增加；反之亦反之。第三，农业状况仍有影响。收成不好，农产品价格上升，工业产品成本增加，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出口产品价值下降，进口品价值上升，从而汇率下降，信贷收缩，生产停滞、失业增加，经济衰退。第四，政治因素也影响就业与经济周期。政局稳定时，公共工程的实施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扩大就业机会。战争也会刺激国内造船、冶金、化工等工业的发展，导致经济的畸形繁荣。

价格水平的涨落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也有关系。1750—1814 年是英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价格水平随经济的扩张而上升。1814—1830 年是英国经济的危机与衰退时期。政府、企业、银行同时收缩，价格下降。

产业革命的另一种社会影响是工人成为真正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社会分为企业家和工人两大阶级。

总之，产业革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它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席卷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各国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人口增加、科学在工业中的运用、资本广泛而密集的使用、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以及新社会阶级的形成。一般归之于产业革命的种种弊端并不是产业革命的产物。然其实质而言，产业革命是进步的。

《工业革命：1760—1830》一书是经济史学名著。作者把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产业革

命，既有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又有理论分析，是研究产业革命史的一次突破，至今仍受重视。

（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1964 年版） 吴 名

作者介绍

阿什顿（1889—1968）英国经济史学家。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曾长期任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兼任伦敦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名誉主席。对英国产业革命有独到的研究。代表作有：《产业革命中的钢铁》、《18 世纪的煤炭工业》、《十八世纪经济史》、《英国的经济波动：1700—1800》、《产业革命：1760—1830》等。

[美] 巴兰，保罗·亚历山大 (Baran, Paul Alexander)

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

本文是发展经济学中最早提出“依附”理论的代表作品之一，发表于英国《曼彻斯特学报》1952年1月号。后为人们广为引证，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论文集都将此文收录在内。下面予以介绍。

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影响

巴兰在本文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物质、文化进步，无论在时间顺序上，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是不平衡的。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进步，仅局限于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和美国、加拿大等国。而东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拉丁美洲、亚洲（更不用说非洲了）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则处在社会落后、经济停滞、生活贫困和精神痛苦的阴影笼罩下，经济不发达国家生产率始终很低，人口增长却很迅速，生活水平自然也就每况愈下。因此，资本主义的发

展并没能改善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不发达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根据巴兰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一旦传到了不发达国家，就会有效地破坏残存的“封建内聚力”。市场契约关系替代了世代相传的封建宗法关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走向市场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渐同世界市场连在一起了。因此从理论上来讲，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虽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社会制度的实际转变过程中受到了“双重剥削”，即不仅封建领主的剥削没有减弱，而且还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

除此之外，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不发达国家还会产生另一方面的影响，那就是，改变了不发达国家人们的传统看法，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激发起他们的生活希望、社会抱负和奋斗理想。他们被先进的工业化大生产和高度的物质文明所吸引，因而不辞劳苦地离开祖国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旅行和学习，力图回国后有所作为，在不发达的国土上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二、不发达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那么，在不发达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呢？巴兰对此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

从内部因素来看，最希望在不发达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是为数不多的中等阶层。然而，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使他们本身也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政治、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价值观，这无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或英国的中等阶层则很早就有了一套同中世纪蒙昧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观。他们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不发达国家的中等阶层却只能顺应现存的资本主

义秩序。他们既要同国内封建领主，又要同外国投资者打交道，因而在不发达国家就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劣点的政治经济混合体，结果阻碍了经济增长。

从外部因素来看，在国际劳工运动的影响下，不发达国家人民革命运动的目标远远超出中等阶层的目标。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由于担心他们与地主阶级之间的争吵会被激进的人民革命运动所利用，于是就放弃了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进步态度；由于担心他们同封建教会和反动军方的冲突会削弱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威，于是就背离了和平主义的潮流；由于担心失去外国的支持，于是就抛弃了反帝的民族主义纲领。激进的革命思潮的增长将中等阶层推向与反动势力结盟，而这个联盟又将民众进一步推向激进主义和暴力造反的道路。中等阶层力图采取中间立场，这样做也许会使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有所松动，但是历史不能等待渐变，因为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总之，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存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三、不发达国家的投资问题

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唯一能支持经济增长并使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的办法是使总产量持续增长。这就碰到了投资问题，但是在不发达国家的储蓄和投资都相当缺乏。那是因为，第一，由于国民收入总额极小，分配又极不平均，少数人占有国民财富中的极大一部分，“消费需求”很高，因而储蓄不会多。何况，少数高收入者已垄断了整个国内市场，不愿意再花费精力去进行新的投资。第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非常低，货币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衣、食、住等方面的必需品上。由于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低廉，市场有效需求也不足，这就使得生产

利润也不会不大，结果导致投资的吸引力和机会不足。第三，由于缺乏可供投资的资金，不发达国家被迫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资本品，以此来促进国内投资的进行。但是，初级产品（如石油、金属及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既要维持低廉的成本，又要保证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那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大量投资，又超过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供给能力。相反，外国投资者由于其资金雄厚和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结果就有可能逐渐地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初级产品生产企业。第四，不发达国家的投资缺乏"外部经济"，只有在公路、供水、发电、铁路和住房等基础设施先发展起来后，企业家才会感到进行新的工业生产性投资是有利可图的，才会去建立工厂。然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规模计划，远远超过了不发达国家现有的财力和智力。总之，在任何受市场的和利润原则支配的经济中都存在的社会合理性与个人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不发达国家尤为突出。

那么，能否充分使用土地这种天然的生产要素，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总产量增长呢？巴兰认为，这仍然是行不通的。那是因为，工业投资遇到的障碍在农业投资中仍然存在。更何况，发展农业只有通过发展工业才能完成，只有提高工业生产率，才能使农业生产者得到农业机器、化肥和水电供应；只有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工资。

总之，在不发达国家，人们对长期发展丧失信心和热情，不愿意进行投资。他们的座右铭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计划问题

一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计划在迅速提高总产量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方面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税收手段，使非必需消费转为强制性储蓄并纳入生产性投资范围；兴建通讯、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对

工人进行就业培训。也可以通过物价管制来制止稀缺商品的投机倒把；用配给制保证对必需品的供应和分配；对外汇实行严格管理，防止资本外流，等等。

巴兰认为，上述这些政府计划实际上很难在不发达国家有效地实施，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将会使发展计划成为泡影。那是因为，掌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政府权力的是有产者的联盟，他们不可能制订和执行一套违反其切身利益的措施，不可能制止生产经营中的浪费现象，不可能制止寡头势力的垄断活动、牟取暴利、资金外流和奢侈生活，也不可能减少或放弃用于军队和警察方面的巨额拨款。所以，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保卫现存的财产权和种种特权，不可能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

五、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

巴兰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不发达国家必须在社会和政治秩序方面作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若不发达国家依靠外国的军事支持来维持现存的政治权力，虽然可以暂时堵住火山的喷发，却无法制止地下不断积聚的爆发力；依靠外国的经济援助，虽然有利于采取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却不能代替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国内变革。巴兰认为，旧制度的卫道士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建设者，所以，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必须打破。在不发达国家里，必须由人民群众、开明政府和外国无私援助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象法国、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如果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不发达国家没有承担起责任，如果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变得软弱无力，那么，不发达国家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据英国《曼彻斯特学报》1952年1月号）彭　城撰

垄断资本
——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Monopoly Capital——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Order (1966)

本书是激进经济学的代表作，这个学派以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面目出现，自称用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一个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的社会”，作者巴兰和斯威齐就是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现根据本书的内在逻辑，概要介绍作者的基本理论观点。

一、本书的写作意图及其背景

作者在本书的“导言”中着重叙述了创作本书的理论背景和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他们所具有的学识与所获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矛盾。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刻的原因在于“观点和方法的内在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部分地是由过去承袭而来，部分地是由环境造成的。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经放弃了它的全部责任”。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虽注重于社会秩序的考察，但由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过分满足于重复人所熟知的表述，结果使他们的理论不能说明重大的事态发展，有时甚至不能辨

认它们的存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停留在竞争经济这个假设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试图去研究以大企业和垄断的盛行为特征的制度。恩格斯对19世纪末垄断的迅速增长有所评论，但他不曾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中。列宁受到希法亭分析的强烈影响，把帝国主义理论直接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统治的基础上。无论是列宁还是他的信仰者，都不曾企图探究垄断的运转原理和运动规律所造成的后果。作者认为，"纠正这种情势并且以明白的和根本的方式来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本书的意图，在于以最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开始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有系统的分析"。他们指出，不能满足于对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的竞争模型进行补缀和修改，而必须把垄断放在分析的中心，并且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这里的经济剩余被界定为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们的成本之间的差额。

他们之所以采用"剩余"这个概念，而不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概念，是因为术语的转换将有助于实现理论见解的必要的转换。

二、巨型公司和经济剩余的增长

作者认为，在现代巨型公司中，权力存在于它的内部而不是存在于它的外部，这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的利益集团概念过时了。较大的公司逐渐从银行家和股东那里赢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因而使它们的政策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适应于它们各自的政策，而不是服从于一个集团的利益。

经理阶层是有产阶级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部分。他们的

作用是充当所有大规模财产的保护人和发言人，构成有产阶级的领导阶层。公司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力量、发展速度和规模，这同时也是公司经理们的个人目标。利润成了公司政策的直接的、唯一的数量指标，是公司成功的尺度。与此同时，公司中的个人还在追求他们的薪金和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它的成员的心理，而不是相反。

作者认为，与个人资本家相比，巨型公司具有更长的时间视野，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者和资本积累者。在公司内部，真正的计划占着统治地位，命令是自上而下的，责任是自下而上的。大公司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同消费者、劳工和较小的商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市场。由于市场关系实质上是价格关系，所以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必须从价格机构开始。

作者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巨型公司价格政策和成本政策的性质，有一种强大的和规则的趋势，即剩余在绝对数上和作为总产品的份额均在增长"。这是因为，竞争资本主义之下的个人企业家是"价格的接受者"，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大公司则是"价格的决定者"。巨型公司能够选定它们产品的价格。公司在索取价格时首先要避免的就是以前曾发生过的几个垄断者之间因竞相降价而导致相互毁灭的价格战，务必使整个集团的利润达到最大限度，这是确定一般大公司的价格政策和策略的决定性因素。典型的寡头垄断工业所倾向的准则是心照不宣的串通，这在所谓的"价格领导"过程中达到了它的最发达的形式。这个事实使得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般价格水平具有明显的上升偏向。当然，并不能因此说价格竞争已经被完全排除或不起作用了。在一个新的工业部门中特别容易发生价格竞争，此外，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天然"的垄断组织，这种情况的存在，决定了马克思时代认为的"现代国家的政权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的论断仍是适用的。

作者进而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强加在它们成员身上的成本纪律，同样是严厉的，放弃价格竞争并不意味着一切竞争

的终结，事实上，竞争采取新的形式并以日益增长的强度激烈地进行着。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产生了新的和强大的从事技术革新的推动力。所以，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下生产成本下降的趋势不可能有任何怀疑。降低成本的动力是增加利润，而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使得公司能够直接以更大利润的形式把生产能力增长的成果的最大份额占为己有。如果假设利润同经济剩余相等，就可以把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绝对地或相对地增长的倾向表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作者认为，之所以用剩余增长的规律去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一代替是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的最本质东西的理论表现。

三、剩余吸收的各种途径

作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所提供的投资出路，不足以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份额。一旦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部分超过了现有的投资出路，那么经济扩张即将终止。当“内源”的投资（投资导向从这个制度的内部机构产生）是现有的唯一出路，垄断资本主义就会陷入永久的萧条状态中，剩余增长的趋势会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失业。然而，事实上还有“外源”的投资（不随这个制度的正常运转所产生的需求因素为转移的全部投资），例如，（1）用于满足人口差所产生的需要的投资；（2）用于新生产方法和新产品的投资；（3）国外投资。作者指出，人的增长本身确能创造某种投资出路，但没有巨大的重要性。任何技术变革的加速必定会开辟新的投资出路并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的理论也不再适用。因为只有在用新设备可以获得的利润同用旧设备实际获得的利润之差，大于采用任何其它可供利用的投资方法所能获得的利润时资本家才去采用新设备。最后，由于利息和股息的回流不久就

会超过原有投资的许多倍。因而，国外投资也远远不是国内形成的剩余的出路，相反，它是把海外形成的剩余转移到投资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国外投资使剩余吸收的问题更为严重。可见，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可以说，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那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作者认为，由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由于剩余利用的正常方式显然不能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那么剩余利用的其它方式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销售努力”。销售努力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发展到成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神精中枢之一。在竞争激烈残酷而竞争者为数甚少以致不适用削价的一种经济制度中，广告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变成了竞争的主要武器，它成为公司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政策的组成部分，同时用作保障垄断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城垣。进一步说，销售努力又和生产努力彼此相互渗透。他们指出，由寡头垄断公司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政策所决定的产品的数量和组成，既不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不会使人类付出的辛苦和忍受的代价为最小。

其次是“政府的民用支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常的状况是“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全部支出总额的变动，对剩余吸收的过程施展了它的最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府吸收的是在私人剩余以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之中扣除的。只是在政府的吸收甚至达到充分利用以后仍在继续增长时，私人剩余才会受到侵蚀。实际上，由于大规模政府支出使经济的运转能更接近于全部生产能力，对私人剩余数量的最后影响不但是积极的，而且是很大的。可以说，不但整个制度的生存依存于这个趋势的继续，而且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福利也同样依存于这种趋势的继续。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而是在于这种支出用在什么方面。他们指出，商品和劳务的非国防采

购的增长，对剩余吸收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而转移支付的增长无疑是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最后是“政府的军事支出”。作者认为，30年代的停滞和50年代的相对繁荣的差别，完全是由于50年代的大量军事支出造成的。他们指出，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出现的骚动，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对长期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构成的严重挑战，使美国变成了全世界反共、反俄的警察。同进，军队对于私人商业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顾客。当然，作为经济控制工具的军事支出，也会遇到限制，这是“从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新武器性质产生的”。

四、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

作者在第8—11章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垄断的成长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剩余增长趋势，而同时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吸收剩余的机构。然而，不会被吸收的剩余也就是不会被生产的剩余，这只是潜在的剩余，“它在统计上留下的痕迹，不是在关于利润和投资的数字中，而是在关于失业和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的数字中”。作者认为，有两种强大的外部刺激，抵销了上述这种萧条效果。其一是“划时代的发明”，其二是战争及其后果。因此，作者概括地指出，垄断资本主义能生产出比它所能吸收的更多的剩余的趋势，可以由主要的外部刺激予以中和，甚至加以克服，但这种刺激减弱或消失时，它又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作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尽管造成了它所有的全部生产力和财富，却没有能够为社会提供这样一种基础：这种社会能够使它的成员得到健康的和幸福的发展。

他们指出，等价交换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几乎是绝对的。只有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比较合理的

利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中心成就。然而，等价交换的合理性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到了某一发展阶段，它就同作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适应了。可以说，即使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期间，等价交换作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原则也垮台了，等价交换原则已经转化为合理经济组织的促进物的对立物，变成了潜在的丰富中维持稀少的一种公式。

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没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辩护不用采取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形式，而是日益集中于否定社会主义和摈弃革命，因为它们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的代替物和完成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手段。然而作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观念——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产业工人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只是少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同这个制度结合成一体。从内部去推翻这个制度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作者把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受世界革命影响，会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结构，导致在国内发生社会革命。

（据商务印书馆 1977 版，中文本，南开大学经济系译）晓光撰

作者介绍

巴兰，美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代表人物。在西方，巴兰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经济学家。由于他的研究与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经济与第三世界不发达经济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也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中激进学派及"依附"理论的创始人。巴兰的主要著述有：《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1952)、《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1962、1968)、《垄断资本》(与斯威齐合著，1966) 和《更长远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集》(1969) 等。

[美] 鲍莫尔，威廉
(Baumol, William)

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1952)

这本书是鲍莫尔1949年春天提交给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他不仅在方法上把"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产量理论用无差异曲线给以新的修饰和发展，而且在内容上又推进了凯恩斯等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由于鲍莫尔是用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序数论来分析问题的，所以他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成员。

下面根据原书的结构和叙述顺序，介绍一下作者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外部经济论的推广

鲍莫尔在这部分设了9章：引论、早期的某些讨论、理想产量问题（两章）、积极追求利润、作为准则的竞争、失业均衡及其有关问题、有关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和论点的推广：两种应用的说明，主要用以研究理想产量和外部经济所造成

的对理想产量的偏离。

他首先简要地回顾了斯密、瓦尔拉、威克塞尔、马歇尔等有关福利经济的论述，并指出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接着便依据卡尔多和希克斯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开始了理想产量的分析。他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基本假定后，给出理想产量的定义，即“除此产量外，没有其他可以通过在各工业部门间重新配置经济资源而取得的产量会使社会比以前更好些”，也就是说，“对于生产理想产量所使用的资源，作了任何重新配置以后，将会使这个经济的各成员受到这样的影响：那些因这种变革而境况转好的人们，并不能在补偿了那些因这种变革而境况转坏的人们之后，自己还有净利可得。”

通过各种状态下的无差异曲线的分析，鲍莫尔得出结论认为，理想产量的标准不是唯一的，而且对于各种偏离理想产量的情况也是不容易分辨的；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偏离的方向和大小，就能采用奖励和赋税的方法来加以校正，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放弃市场机制的运用，因为“用任何中央计划机构或其他组织代替自动的市场机构来作为淘汰配置的决策者，以消除理想产量的偏离，其效果不见得会比市场调节更好些，要是对消费者的需求估计错了，那就不仅会抵消这种计划的好影响，还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继而，鲍莫尔指出，垄断和垄断因素的存在，可能就是造成偏离理想产量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转入对垄断因素的分析。他论述了垄断性企业家由于积极追求利润，在购买生产要素、降低成本、提高售价和用广告影响消费偏好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指出正是这些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上的错用，从而造成了对理想产量的偏离。

鉴于以上的情况，鲍莫尔又回过头来，重新评价了完全竞争的经济准则，从消费者的偏好变动和集体需求等方面，论述了竞争准则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尤其当外部经济问题出现时，这些不完善之处便显得更加明显。

在此基础上，他把正规的外部经济论扩大到福利理论的几个问题上，首先是失业均衡，他说，在失业严重时，人们

会希望政府以增加消费来制止危机；在通货膨胀时，也会要求政府采取课税、冻结工资、紧缩开支等办法来制止膨胀性的活动。其次是国际关系，对抗性的军备竞争和各种“以邻为壑”的外贸政策都将带来资源配置的严重错用和对理想产量的偏离，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保证办法就是走各以强大的国际权威为后盾的国际协定和政府干预。

通过以上的分析，鲍莫尔已经一步步把自己的学说由自由主义引向国家理论。

二、走向国家的一种经济学说

这一部分包括5章：关于理想的含义、理想与非理想情况的稳定、经济理论与国家学说、论见闻不全、结束语：福利经济学毁了吗？在这一部分，鲍莫尔着重阐述了国家干预思想。他提出一旦偏离了社会上最大集体福利的思想，国家就应该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政府的任务主要应当帮助社会成员用最大的效率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统驭市场——但不是取消市场——的决策就是政策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作。

鲍莫尔在这里又一次运用效用曲线分析，比较了帕累托、柏格森、卡尔多和席托夫斯基的关于最大集体福利的差别标准，并将帕累托标准作为进一步论述的主要论点，接着论述了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的理想与非理想情况的稳定以及消除对理想的偏离；但他随即指出，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强制，常常会遇到来自个人或一部分人的阻力——因为他或他们的行动产生的坏影响广阔地分散于社会时，没有一个人能以利诱来使他改变。于是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政府的职能，建立一种国家的经济理论。鲍莫尔回顾了配第、斯密、萨伊、巴师夏、穆勒、李斯特、西克威克等人关于国家经济学说和政府职能的论述，指出这些理论中，只要消去专断意味，就很合于福利经济学的框架。而政府在经济上的任务应该包括：第

一，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全；第二，进行公共事业的建设；第三，通过立法限制个人或企业对最大社会福利的破坏行为；第四，通过不同手段促成有利于社会福利的联合；等等。总之，应当帮助社会成员用最大的效率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由此就构成了国家干预下的市场制度，从而也使其学说完全走向了国家经济理论。

最后，鲍莫尔指出了由于"外部经济"因素而使福利经济学所面临的现实与理想的二难困境。"因为我们不了解外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怎样在有关的不同范围内影响到通常的结论，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假设这些偏离平均起来会相互抵消，因为假设未知数有相等的可能性是谬误的"，而且，"除非在特殊的场合我们可以指出外部经济是微不足道的，不然的话，我们作为实证主义的经济学者是完全无权说话的"。

尽管如此，鲍莫尔还是宣称，"第一，我并不认为由于我们的分析结构太不完全，我们就不能尽到经济理论家的责任；……第二，我真诚地相信这样的福利理论尽管不太高明，也能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在批驳虚假的论点和轻率的谬见上最为有用，这种有益的作用是应该永远欢迎的"。

（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 1952 年版，中文本　郭永麟等人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谢　岩撰

作者介绍

鲍莫尔，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以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设而闻名。第一个提出了工业结构内部决定的完整理论，发展了不同经济部门中生产率增长不平衡的模型，有助于解释不同经济部门技术进步的不均等与城市、教育、文艺组织的关系。提供了除利润最大化以外还包含其他目标的厂商行为的第一分析模型。对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同时还是把神秘的管理科学和运行研究转化为经济学语言的探索者。鲍莫尔的主要著述有：《动态经济学概念》（1951）、《对现金的交易需求》

(1952)、《经济作用与经济政策》(1954)、《商业行为：价值和增长》(1959)、《经济理论及其运行的分析》(1961)、《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1952)、《表演艺术：经济的困境》(与鲍恩合著1966)、《不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剖析》(1967)、《数理经济学先驱者论文集》(1968)、《根据边际成本订价的最优偏差》(与布雷德福合作，1970)、《环境政策理论》(与奥茨合作，1975)、《竞争性市场和工业结构理论》(1982)等。

[美] 加里·贝克尔
(Becker, G·S)

家　庭　论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家庭论》英文版1981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本版书名改为《家庭经济分析》，由彭松建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书除“前言”与“导论”外，分为十一章。该书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法分析各种家庭行为。本文分四部分进行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序言”、“导言”和第一、二章，是全书分析的理论准备。

“前言”说明本书“试图用研究人类行为物质方面工具和结构去分析结婚、生育、离婚、居民户内的分工、声望和其他非物质方面”。或者说是“用有关行为最大化，稳定的偏好，或隐或显的市场均衡假设，对家庭进行一种系统的分析”。“导言”是对全书内容的概述。

第一章“单个人居民户”，介绍了本书分析的理论基础：家庭生产消费均衡和人力资本理论。家庭投入时间和商品生产出效用，根据各种投入（家庭能力、人力资本等）的影子

价格和效用（孩子、声望和尊严、健康等）可以列出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条件。以外，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由于工资率由人力资本存量决定，在时间价值较廉的青少年阶段，投资较多，最佳人力资本存量以一种递减比率上升，并达到最高。这种投资还会随年龄下降，因为在老年时，余下来接受收益的年限少了。这些是本书分析的出发点。

第二章"居民户和家庭内的劳动分工"，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投资效率。如果家庭内各个不同成员供给的商品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就会产生专业化。一般而言，男性在市场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女性在家庭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这种区别不仅成为市场工资率差别、家庭内分工的基础，也成为婚姻产生的基础。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 3—4 章，是对婚姻问题的经济分析。

第三章"婚姻市场上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论述了分析婚姻状况的市场模型，说明在自由竞争和自愿交换下各种婚姻形式的相对收益是市场均衡的唯一标准。假如进入婚姻市场的男女是同质的，而且只考虑一夫一妻的情况，则制约妇女婚姻供给的因素是妇女的婚姻收入，制约对妇女的婚姻需求的是男人的婚姻收入。这样，婚姻市场的均衡将取决于男人与女人的数量。如果男人人数少于妇女人数，所有妇女的收入均等，则男性得到了已婚妇女产出和单身妇女收入之间的差额。相反的分析亦成立。如果允许一夫多妻制存在，对妻子的需求是一条向下递减的曲线。每个已婚妇女或单身妇女的收入是相同的，但整个婚姻市场的状况随妇女收入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放弃男人同质性假设，设定有 A、B 两类男人，由于妇女总是得到同样收入，所以男人的婚姻状况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向妻子提供这样的收入。如果 A 型男人向他的第二个妻子提供的边际收入高于 B 型男人能向他的第一个妻子提供的收入，则 A 型男人有两个妻子，B 型男人独

身。一夫多妻制的发生和男人与妇女对家庭生产的边际贡献相关。当男人边际贡献提高时，一夫多妻会减少。在一夫多妻的市场上，能力低的男子不能结婚，因为他们妻子的边际产品将很低。

第四章“婚姻市场上的相称婚配”，分析婚姻市场上的相称婚配。如果男女的异性仅体现为数量特征，而且男女的能力在家庭生产消费中是互补的，则相称婚姻：能力相当的男女婚配，是最佳的。从现实来看，由于在配偶的智力、男人的市场能力和女人的家庭能力这些主要方面，男女的能力是互补的，所以，相称婚配在婚烟中占了更大的比重。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 5—7 章，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孩子的生养问题。

第五章“对孩子的需求”，分析决定生养孩子数量的因素。对人类而言，对孩子数量的决定主要是文化经济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对孩子的需求主要由养育孩子的成本及收益决定的。在落后经济中，对孩子的需求主要是数量的。由于孩子很小就干农活，并较早成为一个近乎标准的劳动力，养育孩子的净成本是低的。随着经济发展，数量考虑让位于质量考虑。这时生产和哺育孩子的成本上升，从而生产率下降。主要因素是：高质量的孩子要求进行高额的人力资本投资，生孩子的时间的价值随收入和妇女劳动市场工资率上升而提高等。养育孩子质量的提高必然给数量以负的效应。生育率的变化产生于经济因素而不是“避孕革命”。

第六章“家庭背景和孩子的机会”，说明孩子前途与家庭背景的关系。父母的效用由他们的消费及孩子成年后的财产决定，孩子的财产由在他们身上的投资、他们的资财捐赠及资本盈利决定。资财捐赠是孩子接受由其家庭、家庭姻亲和声望决定的资本捐赠物，即由一种特殊的家庭文化获得的学问、技术和目标。由于这一因素，孩子的前途受家庭背景的

影响。孩子的获得和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假定由父母筹措全部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是相同的，则父母是否在非人力资本上投资取决于父母的偏好和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如果父母的收入超过某一界线，孩子将继承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如果父母的收入低于这一界线，孩子仅继承人力资本。界线的确定取决于以上的两个因素。从美国的经验证据来看，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当孩子不继承非人力资本时，他们的教育和继承非人力资本相比，更加依赖于父母的收入。父母对各个孩子的不同态度表明，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于某一孩子，不是因为情感因素，而且因为能力大的孩子其人力资本收益率较高。但如果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投资，那么，所有孩子的边际收益是相同的，都等于非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所有孩子的收入也是一样的。中立的父母会充分补助他们较不幸的孩子。平等与效率之争只在较贫穷的家庭中存在。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的投资方式有不同特点：在把非人力资本贡献给所有孩子的富裕家庭里，人力资本投资量只取决于一个孩子自己的特征，与其兄弟数量及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在贫穷家庭中，人力资本的投资量取决于兄弟的能力，因为父母要在投资效率与平等之间作出选择。

第七章“不平等和世代之间的变动”，分析各代家庭之间收入的变动。根据资产捐赠概念，任何一代人某个家庭的收入只用该代人和该家庭所有以前各代人的运气概念来表达，而且市场运气对不平等的影响由于父母对预期负担的作用而变小，也就是说，在某一代人的资产决定中，捐赠运气的系数大于市场运气的系数。除非投资偏好接近于一，否则世代之间的变动将是巨大的。根据上述理论，一种累进所得税不仅由于不鼓励投资而降低效率，而且会扩大实际收入的不平等。鼓励贫穷家庭把财产投放资本市场以筹措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减少不平等。

四

第四部分包括第8—11章,分析有关家庭的其他问题。

第八章"家庭里的利己主义",分析家庭行为中的利他主义。每一个受益者,无论他如何自私,都要使受益者的家庭收入最大化,这就使他的行为对其他受益者的影响内在化。根据这个理论,在家庭中如果存在一个利他主义的家长,一个自私者的行为假如损害了整个家庭的利益,家长将通过减少其利益的方法来对付损失,从而使该人受害,这样他就不会采取有损家庭收入的行为。家庭内的利他主义可以提高家庭收入,并使一个自私的家庭成员也自动地为家庭的福利着想。正如市场上利己主义有高效率一样,家庭内的利他主义也有高效率。这就是两种不同态度在两类不同场合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第九章"人类以外的动物群体的家庭",用以前发展的分析框架分析动物家庭行为,这种分析成立的基础是遗传基因复制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之间相互匹配的特点。

第十章"信息不完全、结婚和离婚",分析离婚的原因。信息不完全是婚姻市场的固有特征,并且也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从离婚中获得的收益是可以重新开始一次或许能有更高产出的婚姻,但其成本随着孩子问题和离婚所蒙受的耻辱而制约这种收益。

第十一章"家庭的演变",分析家庭的发展与变化。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亲属集团就是一个很有效力的"保险公司"。在这个集团内,通行利他主义,而且通过制约与文化的潜移默化而使每个人接受这种态度。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声望的作用明显下降,个人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个人同社会提供的能力和人力资本的证明。家庭重要性的降低成为家庭形式变革的原因。

《家庭论》作为家庭经济行为分析的代表作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

(据哈佛大学出版1981年版,中文本 彭松建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李 星撰

作者介绍

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1930－　），美国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长期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主任。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理论，如时间经济学、歧视经济学、家庭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等，被称为是二战后微观经济学的新突破。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在当代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贝克尔由于在这方面开创性的贡献而被称为“人力资本主义”。代表作有：《歧视经济学》、《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论》等。

[美] 贝尔，丹尼尔
Bell, Danniel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The Coming of Post - 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是50年代开始出现的有关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方面的一部名著。全书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

“导论”是全书的总纲。在“导论”中，贝尔说明全书所要探讨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他首先区分了预测和预报。他认为，预报通常着重于对有关事件作出决断，这种决断不可能公式化，即不可能使其受一些规则的支配；预报的职能主要是，通过长期熟悉情况而取得详细的内部知识和判断。而预测则要对规律性的发展，重复出现的现象、持续发展的趋势等进行推测。预测不能预先报告出结果，而且推断的时间越远，误差程度越大，但它能说明政策决定发挥效用的限度和范围。贝尔简述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包括技术预测、人口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他把经济预测又分为三类型：简单的市场调查、最标准化的预测（制定宏观变数的时间序列，如批发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量、农业生产率、

失业率等，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对经济状况预测）、数理经济模型。此外，他还提出三种社会预测：推测社会趋向、鉴别促成社会的历史“关键”、预测主要社会体制内的变化。他认为，要鉴别历史“关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变化方面，后工业社会作为此书的主题，正是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是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分类而成。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它们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作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例如，以财产为中心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加以理解：1.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 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 中轴原理：理论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 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 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贝尔在“导论”中还简述了后工业社会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全书的结构。

在第 1 章中，贝尔论述了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两种社会发展的图式：第一种是来源于《资本论》第 1 卷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扩张所消灭，或者从属于它。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垄断之间的矛盾最终会使资本主义“外壳”炸毁，社会主义来临。第二种是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 3 卷中对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的论述，在这种模式中，新的信用银行制度、股份公司、白领工人等出现和扩大，社会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不过，马克思认为第一种图式具决定性作用，所以新倾向在马克思那里打了折扣。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同马克思的不同图式的“对话”，他列举了松巴特、韦伯、熊彼特、阿伦等人的理论。他认为，在几十年里，工业社会发生了工业企业变化（经理成为组织控制者）、职业结构组织变化（技术专业阶层扩大）和政治制度变化（官僚政治发展、政治专家官员兴起），这些变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俄国共产主义社会都在进行，但共产党理论家回避社会结构变革的含义。最后，贝尔把工业社会模式作为共同结构，概述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区别，以此作为对社会结构进行对此分析的基础。他列出了以不同角度表明三种社会的“社会变化的总图式”表。后工业社会在以后各章被进一步展开说明。

在第2章中，贝尔在美国的结构范围内探讨了后工业社会五个方面中的两个：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以及职业比例曲线的变化。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随工业发展，必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使销售和金融、不动产、保险等传统白领就业中心活动增加；人们生活面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发展，使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迅速发展。他援引了美国1870年到1968年的各种统计资料，以及到1980年的预测，说明了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情况和百分比变化，并指出专业与技术人员是职业类别中增长最快的，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集团。贝尔还探讨了后工业社会的某些劳工问题。他也指出了这方面变化的一些限制，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的限制、通货膨胀的限制、美国制造业产品定价过高从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下降的限制等。

贝尔在第3章中集中讨论知识和技术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社会的结构。他首先指出，社会的变化正在加速发展，社会的各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二者是讨论知识和技术时的关键概念。然后，他依次分析了知识、技术和知

识社会的结构。他把知识定义为："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195 页）分析了知识增长的形式（指数率加观点）、增长的限度（从渐近极小值开始增长，迅速倍增，然后趋向渐近极大值，再通过弯曲点下降的∽形曲线论）和知识的分解（学科分支增加）。他认为，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以多种方式促成社会发展。技术的变化决定了经济的革新和变革，技术变化基本上是"组织方面的"，即包括了较好的方法和组织，从而改善了新、老资本的效率。几十年中，科学和发明开始系统地结合了起来，而且，技术预测新技术的出现，将展现出发展的未来领域，使人们可以系统地计划未来。在知识、技术发展下，形成了知识社会结构。贝尔用美国资料，主要分析了专业和技术人员的数量、比重、入学、攻读学位的人数、比重，按学科分类的学位分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分布，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专业和技术人才。他还分析了教育的体制结构和美国的资源分配（即用于研究与发展所作的努力）。

在第 4 章中，贝尔主要分析工业社会的基本企业形式——公司。他叙述了公司的发展，并提出公司所具有的经济化方式和社会学化方式两种模式。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所掌握的秘密就是生产率，经济生活可以不同时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竞争，每个人最终都可以成为胜利者。现代工业生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称之为经济化。经济化是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的资源的科学。经济化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求特点的流动的价格体系。但是经济化方式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它只衡量经济商品；第二，形成"外部成本"，或带来社会成本（例如污染）；第三，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间出现不平衡。与经济化方式对照，还有一种社会学化方式，即以某种明确的"公共利益"观念判断社会需求。公司作一种统一体，一端是经济化（在其中，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一心一意地变为实现生产和利润目标的工具），另一端是社会化（在其中，所有的工人都得到终身就业的保障，而使劳动力感到满

意成了资源的主要消耗。在近几十年发展中，公司正不断走向社会化的一端。贝尔指出，现代公司已失去许多传统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公司的“含义”，或者说公司为谁所有已有些模糊不清。今天的美国人正在脱离以私人企业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走向政治上以明确规定的“目标”和“重点”来作出最重大的经济决策的社会。

贝尔在第 5 章中考察了已有的理论概念工具，围绕社会选择和社会计划评价这些概念工具及方法的适应性。他认为，理性和个人选择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是 18 世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代议制和利益的概念则是 19 世纪政治学所增加的内容。但对于 20 世纪后半叶来说，由于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的“未来方向”以及“技术”决策日益增加等三个因素，它们已过时了。现代社会是大规模社会，许多问题已不能由地方解决，必须交由全国性的社会，因此，必须考察政治结构的适应性、集中化和分散化、“公”和“私”之间的区别、公私官僚阶层结构的最佳规模等问题。也因此，社会选择、社会计划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贝尔继而评述了社会结算系统（包括国民收入和产业结算、货币流量结算、全国产业间结算、国民财富结算等）、社会指标（如健康指数、犯罪指数、环境问题指数、社会地位升迁等）等。

贝尔认为，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中心问题。因此，在第 6 章中，他主要探讨了科技治国论决策和政治性决策之间的关系。贝尔把 1945～1950 年看作后工业社会象征性的“出生年代”，考察了科技治国思想的发展，评述了物支配人、军人支配物的现象。他列出了“阶层划分和权力”表，分别从资源、社会活动场所、统治人物、权力手段、阶级基础、取得权力的途径等方面，对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后工业社会里，专业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是科学家。但是，在一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中，更多的决策必须通过政治和计划来制定，因此，政治决策仍是社会的主要决策，知识对于权力来说仍是一个从属的因素。

在“结语”部分，贝尔分析了后工业社会将出现的主要问题。他首先说明现代社会主要问题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经济职能不受管束的性质。当代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化，一是经济职能从属于政治秩序，二是社会职能与财产相分离。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阶级兴起，形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411 页）。然后他主要分析了两类问题，第一类是科学与政治或政府的关系，第二类是实行能者统治原则所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最尖锐的紧张关系是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中轴方向是反体制的，而后者则按经济化模式和科技治国论模式确定的。这种紧张关系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根本问题。

（据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 1973 年版，高　铦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姚开建撰

作者介绍

贝尔，美国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出生于美国纽约，1940 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后当新闻记者。曾任《新领袖》、《公共利益》杂志主编，《幸福》、《美国学者》杂志编委，60～70 年代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担任过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展委员会”委员、美国文理科学院“2000 年委员会”主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顾问委员会“国际未来计划”的美方代表、美国总统“80 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1959 年在奥地利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名词，以后发表了有关专著，“后工业社会”遂成为影响较大的理论之一。主要代表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52）、《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走向 2000 年》（196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1979～1980）、《曲折道路》（1980）。

[法] 贝纳西，让·帕斯卡尔
Benassy, Jean Pascal

市场非均衡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isequilibrium

《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是贝纳西在七十年代以来发表的许多有关非均衡理论的论文（包括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本书综合了六七十年代非均衡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系统和完整地论述了非均衡理论。它从揭示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矛盾开始，由浅入深，逐步建立起不同假定条件下的非均衡模型。它的体系安排有点类似于一般的教科书，使初次接触非均衡理论的人能够读懂它，但是，它又是层层深入，不断引进更为现实的假定，使论述的内容渐趋充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且，贝纳西还运用数学形式严格证明他所建立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如果说非均衡理论的开拓者提出了卓越的非均衡思想，那么贝纳西则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使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本书的内容涉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把微观经济学中获得的非均衡理论应用于不同宏观非均衡现象的分析，是迄今为止西方一部较为完备的非均衡理论专著。

在本书中，贝纳西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非均衡理论：

第一，贝纳西考察了市场非均衡条件下的实际交换过程。当市场供求不相平衡时，供求双方中总有一方受到数量约束。

根据早期非均衡理论提出的短边原则，处于市场短边（即供大于求时的需求一方或求大于供时的供给一方）的交换者必定受到配给的限制，不能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望交易量，因此，市场的实际交换同特定的配给方式相联系。贝纳西在本书中考察了不同的配给系统，从而描述了市场非均衡情况下的实际交换过程。

第二，贝纳西在他的模型中引进了存量变量，拓广了数量信号空间。在一个“纯流量”模型里，预期数量约束是厂商的主要数量信号，在一个存量流量模型里，不管有没有受到约束，交换是存量变化的结果，投入存量和产出存量成了主要的数量信号。另外，贝纳西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其他数量信号也进行了分析。

第三，贝纳西移去价格刚性的假定，建立了价格由交换者制定的非均衡模型。在一般均衡模型里，所有交换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但是，在瓦尔拉均衡之外，交换者不再面临着一条无限弹性的需求曲线。在非均衡条件下，受到数量约束的交换者往往会通过价格变化去突破他的数量约束，以期多供给一点或多购买一点。因而在一个非均衡模型里，考察内生价格决过程是更为现实的。这是贝纳西对非均衡理论的一大贡献。

第四，贝纳西还把他确立的非均衡方法用来考察宏观上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为宏观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宏观上的古典失业、凯恩斯失业和抑制性通货膨胀都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关于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还是成本推进型的争论，也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从体系上看，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为市场非均衡的基础微观经济学，非瓦尔拉均衡概念的研究以及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全书的阐述在技术方面有意保持在低水平上。一些增添的细节被集中在17个简短的附录中，因为把它们放在正文里会中断说明的连续性，并且它们都具有较高的技术性。

第一篇在单个市场和行为人的基础上论述市场非均衡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简单回顾了马歇尔和瓦尔拉的均衡理论，论证它们不可能用简单的方式发展到容纳市场非均衡情形的程度。然后对下面分析中所假定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行了描述。在第二章描述了当供求不相平衡时市场上的交换怎样发生以及在交易过程中数量信号怎样产生。第三章考察了在单一市场上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形成，并把标准分析一般化，将其推广到出现数量约束的情况。第四章在多个市场背景下，结合“溢出效应”来考察上述问题。最后，第五章研究了价格的形成。

第二篇专门研究种种不同的非瓦尔拉均衡概念。第六章引入了所有这些概念都共同适用的标记和基本理论框架。第七章研究固定价格的均衡。第八章明确地分析种种预期类型——特别是数量预期——对当前均衡的影响。第九章研究那些某些价格由行为人决定的非瓦尔拉均衡，并引进价格的易变性。第十章研究所考察的不同均衡的效率性质。

第三篇把第一、二篇研究的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第十一章对各种失业理论作了综合论述。第十二章指出在确定当前失业的性质时预期的作用。这两章都是在一个工资和价格水平给定的短期模型的框架里进行讨论的。第十三章使用同样的基本模型，引进价格的易变性。相应均衡的动态展开在第十四章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关于成本型通货膨胀和需求型通货膨胀的综合模型。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 1 月版，袁志刚等译）
成家军　范国英撰

作者介绍

让·帕斯卡尔·贝纳西，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出生于 1948 年，现任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贝纳

西的主要著作有《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2 年）和《宏观经济学与非均衡理论》（1984 年），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货币经济中的新凯恩斯非均衡理论》和《垄断价格制定的非均衡方法和一般垄断均衡》（1975 年、1976 年）。贝纳西是西方非均衡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论文和论著中系统地论述了非均衡理论。从揭示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矛盾开始，建立起不同假定条件下的非均衡模型。贝纳西的工作为该理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使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还把非均衡理论用于宏观非均衡现象的分析，这在西方还是第一次，同时还对早期理论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美] 贝利，阿道夫
(Berle, Adolf)

没有财产的权力
Power Without Property (1959)

本书原为英文版，1959 年由纽约 Harcourt, Braceand Company 出版。中译本由江清译出，商务印书馆 1962 年出版，全书 169 页。

本书是贝利的代表作，是他长期对财产权和管理权研究的一个总结。它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新变化，财产权已经开始由占有者手中过渡到经营者手中。他在本书前言中写道："无论如何，随着受'一致公论'的抑制并向其负责的集中了的经济权力的出现，也确实显现出了一个民主经济的轮廓。这就在下列两种势力之间确立起一股很好的缓冲力量：可以称为'民主的'势力，以及其权柄不是得自公众的委托而是得自有历史背景的产权势力。"正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作者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作为本书的副标题。

全书除前言和导论外共分 5 章：资本的各种习性及其影响；财产权的分裂；经济权力的哲学；经济共和国；人民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展望。

一、资本的习性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曾告诉人们，“资本”是储蓄的成果，储蓄可以说是减少消费以后的剩余，再把剩余投入永久性的生产设备。这就是说，资本和储蓄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表明，“储蓄者”正在一步一步地退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就在储蓄者后退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真正主题——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走上了最显著的地位，不知不觉地引起一场革命”。

贝利考察了1919—1947年这29年间的资本投入情况。结果表明，美国在7700亿元的投资总额中，34%（2620亿元）的资金来自企业所保留的利润累积；40%（3100亿元）资金来自银行信贷；26%（1780亿元）资金来自个人投资。这就是说，企业资金来源的绝大部分已不是公司内部的积累，而是来自公司外部。显然，财产权不再集中在原来的企业主手里，而是分散给众多的投资者。贝利由此得出结论说：“财产权，按照它的最后意义来说，已经分散了。权力因素与财产分离了，并且已经集中在比较少数人的手上。这种情况的结合不仅是证券的转移，比起单纯股权的更改要重要得多。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它的影响实质上是政治性的。”贝利在这里所说的权力集中，指的是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公司控制权”；所说的权力分散，指的是财产占有分解为众多的股份，即“法团权力”。

二、财产权的分裂

贝利沿袭了传统的说法，认为财产权本质上就是个人和

有形的或无形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实际上或在法律上，财产的标准形式都被认为是能够被占有的“物”，也就是说，能够归所有者控制的“物”。

公司制度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两三个人使他们的企业“成为法人组织”，因为规模很小，仍然能被占有，这两三个人是股东，但同时也是董事和经理。这时公司就有了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而作为经理，他又实际占有公司的财产。只要企业和公司很小，股东就大体上决定了公司产权保有人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但是，这时已经孕育着财产权分裂的因素。公司的扩大，财产权表面上的分裂就代表着一种确实无疑的分离。

在比较大的公司里，被称为公司的法律上的实体，作为财产所有人而出现了，所有者对物的关系必须通过人来处理。这些人就成了公司的董事会、高级职员和雇员，但不是公司的股东。占有权原来是一个所有者的凭证，现在转移到经理们身上了。

早在 19 世纪末叶，许多公司已经发生了财产权的分裂。最高经理人员虽然对公司有实际占有权，但并不能控制一切，副经理、地方单位负责人、工厂管理人员等等掌握了大批公司所经营的东西的实际占有权。虽然他们要服从董事会的领导，但是我们马上会发现他们在使用不同的语言。

贝利就此认为：“对于财产有发号施令的权能是一回事；占有它却是另一回事。‘占有’的意义不知怎么已经冲淡了。”在公司制度下。财产权已不再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这另一个人的部下具有对物的实际控制权，从而使原来意义上的财产权走向分裂。

三、经济权力的哲学

在贝利看来，权力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即

中心集团对组织之内的个人所运用的权力；二是外部的，亦即虽非组织内部成员但事务却受该组织活动的影响的各部分社会人士。

内部权力涉及其中的个人。主要是以雇佣或被解雇以及决定雇佣条件等权能来行使的。至于劳工的权力，现在已经分散，并且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那种权力已经移交给有组织的劳工了。

外部权力包括六个方面：（1）业务活动的权能；（2）购买劳务、供应品或原料的权能；（3）决定产品的权能；（4）规定并实施其价格的权能；（5）发放或不发放股息的权能；（6）捐赠慈善事业的权能。

一般说来，权力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当权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同时也就出现了对权力的限制。

对权力的限制的措施包括：（1）竞争的多元化，即对抗组织竞争对权力产生的抵消力量；（2）对利润的控制，即必须在利润制度的一般范围内活动；（3）“一致的公论”，即社会普遍抱有的一套见解；（4）政治上的干预，即超经济的强制行动。

四、经济共和国

贝利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开始构制美国经济结构的蓝图。这个社会既有私人的权力和责任的中心的市场经济组织，又有为数颇多的国家控制机构防止某些滥用权力的弊端。贝利设计的经济组织，政府调节居于主导地位。他把自己的设计称为“经济共和国”。

任何共和国都不是完全的共和国。贝利认为，经济共和国只不过是一种经济组织，并且是政治组织的基础。这种结构意味着政治思想的一种新的应用。他认为“煤铁联营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共同市场”都是经济共和国。它

们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从概念、名称和假设上说却是“经济政府”。这些组织都有由各国首脑组成的决定政策的自治会议，都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或管理小组，都有其裁断争议的法院。它们的任务都是保证有组织地、适当地、不断地改造原来所规定的经济职能。

经济共和国必须满足公众的下列要求：（1）提高其国家总产量的增长率；（2）实现持续性充分就业；（3）使任何人自始至终都能立刻通过工作而参加国家经济生活。满足了以上条件，就可以使经济共和国成为经济计划的工具。

五、人民资本主义

贝利指出，现代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分裂将导致“人民资本主义”。他通过对比分析指出，苏联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都是权力的制度，但苏联的权力制度是完全的，美国的权力制度则是局部的。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看出，美国的制度并不象它表面那样多元化，苏联的制度也并非一元化的。即使在社会结构方面，这种差别也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阶级结构也很近似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结构的某些特点。

通过两种制度的相似性，贝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种制度虽然有所不同，可是在经济组织上，它们并没有天渊之别，以致仅仅由于这类组织上或纯粹经济上的不同之点，就必须打得你死我活。”两种制度应该合作，而不是互相冲突。

社会主义也可能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它能比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提供更高的个人主义内容。坚持私有财产、利润动机理论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也可能是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可能把计划的好处和个人选择的价值结合在一起。由于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某些方

面的凑拢，因此加强了彼此进行合作的基础。

贝利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演变成人民资本主义，权力的分散已为不同制度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两种制度之间发生斗争，并不在于它们在结构上不能两立，而是由于各自的领袖们关于人的重要意义和们自由选择生活的重要性的基本概念有所不同。归根到底，一切社会几乎不可能避免地都需要把权力组织起来，使其足以实现潜在的经济力量。社会制度的差别并不妨碍这种一致性。

作者在本书导论中写道："我并不认为本书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确定不移的。……可是我确信，无论是谁，只要认真面对这里所提出和阐释的作为论据的事实，就会觉得他对于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过程和制度的看法，将不断加以改变。本书所研究的，是成为不断进行的美国社会革命组成部分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经济连锁反应，这一革命受着使它活动的推动力的鼓舞，有力地影响着我们全体生活。在将来的岁月里，这种影响可能更为显著、更为深远。"

（据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江清译）　芦　潮撰

作者介绍

贝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利是凡勃伦的追随者，是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之一。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贝利就系统阐发过"管理"和"所有权"分离的思想，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的集团"。1933 年，他和米塞斯合著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全面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贝利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很大。贝利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3）；《政治力量的自然选择》（1936）；《20 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41）；《没有财产权的权力》（1959）。

［美］布劳格，马克
Blaug, Mark

经济学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1980)

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科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曾进行了四次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和争论。最近的一次出现在8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史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托马斯·哈奇森和马克·布劳格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1980年，布劳格教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经济学方法论》，就该书的理论容量与其篇幅相比较而言，它看起来只是一本带有概论性质的著作，然而它对将近半个世纪中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诸多成果作了系统而深层次的总结，并且就一系列方法论阐发了自己独到见解，加之全书体系完整、内容全面、视野宽广，自然不失为一部经济学方法论的力作。

这本书在我国先后有两个中译本。第一本是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版本的翻译者是黎明星、陈一民、季勇三位同志，该书中有“中译本前言”。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版本，该书由石士钧译，马清槐校。

本书主要有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又分四编十五章，其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简述如下：

序言中主要阐述了三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经济

学方法论的定义和范围。作者明确指出，它就是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应用。第二，全书体系结构的安排和任务。第三，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以及其应用的教训。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实行自己所鼓吹的方法论。

第一编是对现代科学哲学成果的简要考察。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公认的观点”开始讲起，一直论述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将它当作科学哲学新旧观点的分水岭。第二章则围绕关于证伪主义的争论，先后评述了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费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方法论一元论等学说，这些学说实际上已程度不等地成为许多西方学者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二编概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共三章。第三章中作者提出，真正的经济学方法论原理首先产生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著作中，而19世纪的英国方法论家以及罗宾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都是证实主义者，主张经济学是一门把真实的正确的前提或假说作为基础的科学，书中称之为西尼尔——穆勒——凯恩斯传统。这是本章的主要论题，并且较为详尽的论述了穆勒，分别提到了他在不同著作中的相异观点以及同其遵循的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在第四章讨论了证伪主义对现代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作者对托·哈奇森首先将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一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论述了操作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制度主义等方法论的特征及其与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关系，同时认为先验主义和实在论一类老的方法论观点在这几十年里仍有一定市场。其结论是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很少这样去作。然后，紧密联系福利经济学家的逻辑地位来探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分，构成了第五章的主要内容。在该章，作者抓住如何看待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能否摆脱它的问题，阐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见解，并具体评判了帕累托福利经济学实证性的争论。他的基本思想是，事实和估价在社会科学中的相互作用十分强大；要实现科学进步，必须努力增加事实的作用和减少估价的作用；因此，经济学的进步必须绝对优先考虑

那些可证伪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检验工作。

第三编，作者选取了九个案例来具体运用前面所讲的理论结论，它们是新古典研究纲领（主流的正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这些实例的目的在于阐明一些方法论教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透视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劣之处，从而作出更准确的综合评价。

第六章讨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不过着重论述的是需求规律。本章较详细地考察了需求理论的演进过程，从马歇尔阐述的需求规律一直讲到最新的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第七章厂商理论，主要是对传统理论与拉特西斯的新学说作方法论上的比较。第八章简要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作用和实践意义，看来作者对此给予了较低的评价。第九章涉及到了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传统的分配理论是一种要素定价理论，它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经验内容的一般命题。第十章作者站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一边，直接评述了两个剑桥之争。第十一章则评述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谢尔——奥林——萨缪尔森定理，认为该理论缺乏经验有效性，是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第十二章对长达20年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作了别具一格的评说。第十三章和十四章分别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家庭经济学。作者认为，人力资本研究纲领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但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它现在已表现出一些退步或“危机”的征兆。

第四篇只有一章，即第十五章，这是本书的概括性的理论总结。作者认为经济学的中心是预测而不只是解释。经济学方法论能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纲领的准则，以便帮助人们分清良莠，不过它无法确定那些相互抗衡的研究纲领究竟哪一个在未来最有用。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陷于危机，其关键性弱点在于不愿产生一种内容能明确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想使其理论内容与现实相一致。具体而言，激进学派、现代奥地利学派、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用漂亮的借口来轻视证伪主义方法论，唯独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强调

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未能严格按此行事。可以看出，本书作者不仅有较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而且还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拥护者。

为了使初读者，特别是对科学哲学了解很少的读者能较顺利地阅读本书，本书译者建议读者可以先搞清楚如下重要的理论内容，以便尽快掌握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重要论点：关于现代科学哲学，“证伪主义”、“范式”、“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元论”等术语的含义。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译者认为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它的主要演进过程，二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和相互作用。本书译者认为了解上述知识对于正确、深入地理解本书是很重要的。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黎明星等人译）成家军　范国英撰

作者介绍

马克·布劳格（1927—），著名的经济学史家、经济学方法论家和教育经济学家。毕业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任教，还较长时间担任了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育经济学教授，现为伦敦大学名誉教授和白金汉大学顾问。马克·布劳格因对经济学史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西方经济学界极负盛名。特别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1962 年）一书，篇幅浩大，阐述精到，被视为一部经典式的经济学史著作。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方法论家，《经济学方法论》（1980 年）一书是其代表作，人们公认其为战后少见的经济学方法论佳作。布劳格先生著作颇丰，除发表了大量颇具见地的学术论文外，还出版过许多影响较大的著作或辞典，如：《教育经济学导论》（1972 年）；《李嘉图经济学》（1973 年）；《剑桥革命：成功抑或失败?》；《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评价》（1980 年）；《重要经济学家辞典》（1983 年）；《凯恩斯之前的伟大经济学家》（1984 年）；《凯恩斯以来的伟大经济学家》（1985 年）等。

[美] 伯恩汉，詹姆斯
Burnham, James

经 理 革 命
(Managerial Revolution)

《经理革命》英文版 1941 年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1960 年曾重印。全书分十七章，共 285 页。本文根据英文版分五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 1—2 章，分析了二战后社会的特征及社会革命问题。

第一章“问题”分析社会革命这一概念的含义。二战被人们称为一场社会革命，但它的质、内容和发展方向却模糊不清。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指，社会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正在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新型社会过渡。发生社会革命的三要素是：(1) 在财产关系制度、生产实现方式等最重要的社会领域中发生巨变；(2) 在文化制度中、在关于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普遍看法上也相应地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3) 统治者的更换。基于以上假定，同时承认目前正发生着一场变革的话，那么就可以引出“经理革命的理论”了，这一理论对上述过渡作

出解释，并对未来社会的种类予以预测，而这正是这本书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

第二章，“我们生存的世界”。主要描述了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大特征。(一) 经济特征：(1) 商品生产；(2) 货币的作用至关重要；(3) 货币同时具有两种经济职能，即作为交换的媒介与充当资本；(4) 为利润而生产；(5)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6) 整个生产受国内与国际市场的调节；(7) 全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二) 政治特征：(1) 出现了许多大型的民族国家；(2) 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世界意义的社会，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 与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构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4) 政治权威与统治权不是抽象的，它一定要具体到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身上；(5) 国家政权活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但这并不一定说明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6) 由国家建立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持该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在这个结构中制定准则并保证它的实行。(三) 意识形态特征：(1) 个人主义至高无上；(2) 为个人谋利的动机；(3) “天赋人权”；(4) 对世界历史的神学的和超自然的解释被进步的科学观点所取代。(四) 最根本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3—5章，重点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前景的两种不同看法。

第三章，“资本主义永存的理论”。作者否定了这一理论，理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1) 存在大量失业的现象，各种对策亦均失效；(2)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3) 债务已经超出控制范围；(4) 资本主义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相对自由的货币交换机制，但这一机制正在日渐消失；(5) 一次大战后不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持续的农业萧条；(6) 投资资金将由于失业而大量闲置；(7) 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

依赖于大国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大国已经无力控制上述地区的发展；(8)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法充分利用它本身的技术能力；(9)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日益失去民心。

在第四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第五章“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作者否定了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社会有三个特征：无阶级、完全的民主与国际性。但事实上，号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却并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而且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结果来看，他们或者没能成功，或者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代现实，已被新的自然科学方法所取代。以上情况表明，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形态，作为现阶段历史过渡结晶的将是第三种社会——经理社会。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 6—13 章，介绍了经理革命理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第六章，“经理革命的理论”。作者认为，向经理社会的过渡大约从一次大战时开始，历经五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经理革命的理论”指出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连同它的社会信仰和意识形态，在经过一段社会变革之后，将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以及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取代。在这个新型社会中，经理将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通过控制国家而间接地占有了。经理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自几个方面，如列宁—斯大林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新政主义”、“技术主义”等等，它们目前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在第七章“经理们是谁”和第八章“经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中，作者指出：就功能而论，不论生产过程形式的所有权如何，“经理”都是指那些当代社会中在技术上管

理着实际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人，他们是现代技术与劳动高度分工的产物。现代社会中，特别是重要的工业部门里，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与产品的优先分配权日益分离，这是经理革命的重要阶段。经理阶层正在取代资本家，这与资本家当初取代封建地主的过程非常相似。

第九章，“经理社会的经济”。作者认为，经理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是国家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它是一种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这里，“剥削”指的是某一阶层在收入分配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它与价值判断和心理动机无关。资本主义社会是私人剥削，经理社会则是集团剥削。经理社会的经济特征是：（一）生产不再是利润至上，货币的作用也大为削弱。（二）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选择雇主和工资谈判的自由在经理社会中不复存在，因为只有国家这一个雇主。（三）经理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是技术危机和政治危机。（四）生产的调节者不再是市场，而是由有关机构自觉地进行。实践表明，经理社会可以解决资本主义下的失业、资源闲置与无计划性等问题，因此，它能为大众提供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十章，“经理改变了权力重心。”一战以来，议会已经逐渐失势，官僚机构取而代之，前者是作用有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机构，后者是作用无限的经理国家的权力机构。权力重心的改变是基本社会关系改变的象征。

第十一章，“极权主义与经理社会”。作者指出，在俄、德、意这三个最接近经理社会的国家中都出现了极权。极权主义存在的前提是高度发达的技术与快速的交通和通讯，否则，无论多么专制的政府都会鞭长莫及。有两个问题：（一）未来出现的将是官僚社会还是经理社会？回答是后者。因为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将溶为一体，经理就代表了国家，而政治官僚只有与经理阶层联合才能存在。（二）极权主义的发展趋势终将是民主的到来。因为，（1）与以往的大变革时期一样，经理也面临三方面的夺权斗争——与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以及相互之间的争斗。这时比较容易出现专制。但变

革之后，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复存在，与民众的斗争也日趋缓和，这有利于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2) 经理社会中，要制订集中性计划，就需了解民众的意愿，这只有在民主的环境中才能实现。(3) 一定的民主可以为民众提供发泄不满的渠道，以免酿成革命。当然，经理社会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不利于实现充分的民主，但民主终将到来。

第十二章，“经理的世界政策”。工业发达的美、德、日很可能作为未来的“超级大国”来瓜分世界。一次大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一战，也是向经理社会过渡的开始，而二次大战则是经理社会的第一战。未来的争斗主要在几个大国之间进行。

第十三章，“经理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经理社会不再谈个人，而是强调国家、人民、种族；不再谈金钱，而是劳动、工作；没有私有企业，有的是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不再谈自由与为私利的动机，而是计划；更少谈权利与天赋人权，更多谈责任、秩序与纪律；更少谈机会，更多谈工作。此外，还拣起了资本主义早期曾使用过的命运、未来、牺牲、权力等等，“自由”这个词也在被作了重新解释之后加以引进。

四

第四部分包括第14—16章，以俄、德、美、三国的事实说明了向经理社会过渡的具体实践。

第十四章，“俄国的方式”。其方式如下：(1) 快速削弱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并击退了国外资产阶级的进攻；(2) 在几年的时间内征服了民众；(3) 与正在兴起的其它几个经理社会抗争。实践中，工人控制了生产资料，却不能成功地管理它，这一权利自然就落到经理手中，俄国革命的实质是一场经理革命，其意识形态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俄国在经理革命的路上走得最远，但它还没能实现一个基础牢固的经理社会。

第十五章，“德国的方式”。与俄国相比，德国的经理社会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成份，它的优势是：工业技术基础雄厚，新兴的经理阶层力量强大、训练有素。其方式是：（1）迅速征服民众；（2）逐渐削弱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对国外资产阶级发起猛攻；（3）经理之间的竞争。这种方式给了资产阶级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十六章，“美国的未来”。作者认为，美国的“新政”在意识形态上和制度上都标志着它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经理社会的过渡，其坚定的代表者不是罗斯福等人，而是经理们。美国的文化、技术与经理阶层的情况与德国相近，因此，其方式也与德国相似，且不可逆转。与德国的不同之处在于：（1）在美国，进入经理社会的前两项任务将以更缓慢的方式进行；（2）德国在战前爆发危机，而美国则是在战争中期爆发危机，因此，它的几个阶段可能会同时进行。

五

第五部分就是第十七章，批评了各种反对意见。

在最后一章“反对意见”中，作者列举了几条与上述理论不同的意见，对它们逐个进行了分析和批驳，然后指出，这些反对意见都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立足于现实。历史的经验与当代的现实都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一种新型社会所取代，经理社会正在到来。

《经理革命》一书被认为是制度学派由凡勃伦旧传统向加尔布雷思新传统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这种书中论述的经理革命对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这本书至今仍受到重视。

（据印第安大学出版社 1941 年版）　吴　名撰

作者介绍

詹姆斯·伯恩汉（James Burnham，1905—），美国经济学家。曾在纽约大学任教，并一度参加工人运动，追随托落茨基的第四国际。在经济思想中属于制度学派，是从旧制度学派到新制度学派过渡中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批判的哲学导论》、《经理革命》、《共产主义走向失败》等。

［美］布坎南，詹姆斯·麦吉尔
Buchanann, James Mcgill

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的政治遗产
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

《赤字中的民主》一书是布坎南与理查德·瓦格纳合著而成的，是作者运用他所建立的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的名篇。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本世纪廿十年代凯恩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的上升。作者在书中遵循其公共选择理论的的一贯逻辑，对凯恩斯主义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以政治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和后凯恩斯公共债务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论述了政治结构对经济理论的影响和经济政策的决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本书出版于1977年，由刘廷安和罗光两位同志译成中文后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发行。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三篇十二章，第一篇包括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二篇包括第六章到第九章；第三篇包括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现将全书内容按篇章顺序介绍如下。

一

第一篇，标题为“发生了什么事”，阐述了作者对凯恩斯

赤字财政政策的看法，他们认为凯恩斯的政策模式和政治民主体制融合在一起，会使得经济秩序越来越脆弱。

在第一章里，作者以“凯恩斯做了些什么”为标题，提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所引发的问题，那就是经济从兴盛走向衰落，并介绍了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回答和解决办法而安排的本书的篇章结构。

在第二章“古典的财政教义”中，作者回忆了古典财政原理，即平衡预算原理，古典财政原理坚持公共预算即使没有盈余，也必须平衡，政府不应该为了给人们带来暂时的短期利益而在公共支出中推行赤字财政。但是“凯恩斯革命”推翻了这一传统观念、强调赤字财政的中心作用，这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寻找到了一个手段使得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有了保证，但也意味着政治家面临的约束日益松驰。

第三章：“第一步　学者”中，作者回顾了“凯恩斯革命”在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功。凯恩斯以一种全新的思想冲击了传统观念统治下的学术界，他使经济学家认识到自己的职能不仅仅是如何在微观领域内搞利益的分配来使效率最大化，而是可以在宏观层次上使整个国民收入得到增加，凯恩斯主义诞生了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家因为受到鼓舞而转变为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并认为为了国民经济的繁荣，传统的财政教条应当被抛弃。

第四章题为“新教条的传播”，作者在这一章里描述了凯恩斯主义在国家的大众意识中的传播，凯恩斯主义“脱胎”于学生课程，尽管开始时在政治家那里遇到障碍，但是经过四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的成功改造，其变种“后凯恩斯主义”的原则已使政治家的思想发生转变，并深入大众的观念中，人们渐渐以功能财政与假想的预算平衡代替了传统的平衡预算观念。

在第五章“功与过的评价”中，作者认为不能否认凯恩斯理论对重建经济秩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非完全都是建设性的，它至少造成对社会的一个方面的损害，那就是财政赤字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除了会

扭曲它所产生的各种盈利机会以外，还会改变经济的基本生产结构，扰乱市场功能，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进而改变资源利用的模式，还给正在运转中的市场结构带来不确定或错误的信息。

二

第二篇的标题为“出了什么错”。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分析了凯恩斯主义财政制度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创造出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恶果的。

第六章“哈维·罗德的设想”中，作者认为凯恩斯的设想要求有一个严格的假定，那就是政策要由一群开明的有识之士做出，后世的凯恩斯主义者既没有批判性地分析他的模型的逻辑一致性和经验有效性，也没有仔细地检验这些原则在其他情况下的适用性，因而为以后政策实施的恶果埋下了隐患。

第七章题为“民主政治中的凯恩斯经济学”。作者在这一章里告诉人们，凯恩斯关于精英政治的假设并不成立，相反，政治家们为了博得选民的支持，往往在财政制度上做不负责任的选择，这就导致了赤字中的民主。

在第八章“货币平衡的赤字和政治民主”中，作者进一步分析，在实际情况中，“乐善好施的而又独立”的货币当局同样受着类似政治选举的影响，使得政府的偿债行为与货币创造联系在一起，赤字财政得不到应有的约束。

在第九章“制度的限制和政治选择”中，作者指出，公众是不具备完全信息的，在作政治选择时，人们凭借的是对收益和成本分析的直觉，而这种直觉是依赖于选择环境中的制度的，这样，人们的理性选择能力就受到了限制，而这样的制度中产生的政治家的错误则得不到控制。

三

第三篇题为“能做什么事”。作者在其中发表了对预算原

则的看法。

第十章“可选择的预算原则”中，作者认为在凯恩斯式的功能财政和传统的平衡预算原则之间，存在着几种折衷的原则，如全周期预算预算平衡、充分就业条件下的预算平衡等等。

在第十一章“充分就业代表着什么”中，作者为纠正凯恩斯以后世人因重视失业问题而引起通货膨胀问题的偏差，提出自己对失业问题的看法：经济恢复后的失业状况很可能是由于自然率规律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造成的，并不来源于总需求的不足，因此纠正失业只能意味着加剧通货膨胀。

最后，在第十二章“财政原则的复归”中，作者指出，在凯恩斯式的财政制度弊端日益暴露出之后，人们日益需要一个在财政——货币稳定的体制下运行的自由经济，它会使得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而这一切都要求平稳预算原则的复归。

《赤字中的民度》这本书是布坎南及合作者关于公共选择理论应用的一本专著。由于是专著，它不具备教科书的条理性和简明易懂的特点，在阅读和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如何来读这本书呢？

首先应当注意它的写作背景，本书的副标题是“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一望而知，布坎南的意见是有感而发的，而针对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政策。我们又看到本书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引发滞胀现象的产生，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它发起责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本世纪三十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适时而生，挽救资本主义经济于危难之中，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政治界甚至平民百姓都奉凯恩斯主义为至尊法宝、救世良方，而凯恩斯主义又似乎真的将资本主义各国从衰退引向繁荣，所以战后的二三十年间，凯恩斯主义都高居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七十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又面临着新的危机——滞胀，这个双面怪物使凯恩斯主义斟酌执行

的经济政策束手无策，人们对它失望了。而各非主流经济学派就从它的政策无效性入手，对它发起了攻击。首先行动的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也有本书的作者所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他们虽然主要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但不能不说，他们的观点和方法为以后的理性预期学派重创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本身提供了帮助。

因为这些非主流经济学派都以自由经济、非干预主义为教条，所以统称为新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

布坎南的理论特点正在于他所推行的对古典主义的复兴。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亚当·斯密有共同点。最根本的是他也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应当是理性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是有充分的自由来作出选择的。他认为一个事情的结果的好坏，与它怎样产生有关，而与它本身无关。如果它的产生是由个人自由选择决定的，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它的产生不是由个人自由选择决定的，那么它就是坏的。个人在社会中通过交换来增加福利。当然个人的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人们需要通过契约来确认各自的财产权力，这是交换完成的必要条件，而契约需要有法律的保证，布坎南一直致力于寻找适当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各种契约的实现。

《赤字中的民主》一书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自由主义特点。他的基本观点是：成本、收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不同等的个人对于任何一种活动的价值和成本都有着非常不同的评价，因此，这些主观评价是外在的观察者所无法预测的，这是贯穿于本书始终的一系原则。他认为凯恩斯主义制造了一个“政府万能”的神话，以为一个由“开明的有识之士”组成的政府可以替代个人做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的政府是由个人民主选举出来。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个人的具体需要，是外人无法感知的。这样，他认为“严格地说从现代意义上看，凯恩斯不是民主主义者”，他所倡导的无所不能的政府的盲目尊大，已经损害了个人的自由，是一件不好的事了。它的害处最终将在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就是平衡预算的衰落和赤字财政的膨胀，

预算赤字是符合政治家的利益的，这使他们可以赢得选民支持，同时表明他们对大规模预算的偏好。但是这种花费所伴随的通货膨胀以及对经济联系造成的机能失调性影响，对于整个经济是灾难性的。布坎南直率地宣称："如果进行严肃的评价，那就必须指出，从政治上说，凯恩斯主义是一种严重的病症，在长时期中，它将表明对民主具有致命的威胁"，也就是说，布坎南以自由主义者的眼光观察问题，对凯恩斯主义很不以为然，他还是希望人与人之间通过恰当的契约建立起经济秩序，排斥一个庞大的政府的过多干预。换句话说，他想要的是无政府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有政府而无秩序的社会。

理解本书的关键还在于要理解它的思辩哲学的特点，它是对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反思、民主选举的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布坎南却在怀疑它的前提条件——开明政府的存在。他将民主本身看作是由制度决定的，而不是超然物外的，所以不合理的制度派生的民主选举的政府亦能给民主本身带来危害。这一点在当时对于盲目崇拜凯恩斯主义的人们来说是一记警钟，而且对于我们亦有教育意义，可以使我们从作者的角度理解民主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而不是绝对的。从这一点来看，虽然布坎南不赞成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的方法却恰好是唯物主义的。

（据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刘廷安、罗光两译）

自由、市场和国家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自由、市场和国家》中文版根据 Harrester 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译者吴良健、桑伍、曾获，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自由、市场和国家》是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布坎南自选的文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二十四章。第一部分“几种选择的观点”（第 1～6 章），第二部分“秩序的出现”（第 7～11 章），第三部分“正义理论的探究”（第 12～16 章），第四部分“负债和赤字的政治经济学”（第 17～20 章），第五部分“个人与国家”（第 21～24 章）。中译本还作为“附录”收入了美国《对话》季刊 1987 年第二期刊载的文章《布坎南与公共经济学》，其中介绍了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背景、实质内容、贡献，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把政府看作市场制度的合理调节者和干预者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府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但同时，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理论，其目的正在于揭示“政府失灵”并试图克服政府干预经济的缺陷。在第一部分中，布坎南以“几种选择观点”为议题，描述和解释了他自己的见解，并评述了与他看法不同的其他人的见解。在第 1 章“自由、市场和国家”中，布坎南把自己归为从社会主义者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并把社会主义区分为“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以视自由本身

为首要价值为特点）和“反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以支持集体对人们生活和自由的控制为特点）两类，从而对二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他过去曾是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而真正的反个人主义者是很难改变为市场秩序的拥护者的。在第2章“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中，布坎南介绍了他在这一段时期中思想的转变和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用他自己话说，论述带有明显自传体的模样。在第3～6章（标题分别为“公共选择的观点”、“既相关又有区别的经济学‘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科学’”、“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中暴政的潜在可能性”、“反对宪法改革的根源”）中，布坎南用公共选择观点重新解释了“经济学”等概念。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一般化的交换科学，使用扩大交换经济学的方法，就能按交换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它与政治作为交换范例相结合时，“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才能从绝望中走出来；进行预测的“经济学科学”同估价、重新设计和改革“规则”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象分析市场范围内的人一样，在政治领域中，“公仆”也是以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财富的人，他们的行为可以约束在互利的限度之内；如果政治学被解释为类似科学事业的话，就有出现暴政的潜在可能性。

布坎南在第二部分中讨论了与“秩序”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第二部分共五章（标题依次是“在秩序出现过程中说明秩序”、“文化发展和制度改革”、“论作为过程的政治”、“权利、效率和交换：交易费用的不相干”、“道德社会、道德秩序或道德无政府状态”）。布坎南说明，市场的“秩序”只有在参加的个人自愿交易的过程中出现。“秩序”本身被认为是产生秩序的过程的结果，最理想的无所不知的设计者也复制不出这样的结果。分配的结果也不可能独立于交易过程。他引述并评价了哈耶克等人的文化进化理论，并指出，要把市场相互作用类比为自然选择，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人类很早就超越动物勉强维持生命的水平，依靠才能、智力和适应能力来改造环境。人们“发明”了相互交往

的规则，并要求大家遵守。文化上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成为人们行动能力的永远存在的限制，并制约着对现实具体制度的选择，而宪法是不能在自发协调的过程中出现的。布坎南还提出了三种抽象模式：道德社会、道德秩序和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凡团体中的个人认为与团体一致，而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人时，道德社会就存在于这样一批人中间。当个人以彼此对等的道德相待时，道德秩序就出现了，这时的个人不必共同对一个团体表示忠诚。当个人不考虑他人在他们的道德社会中，又不接受道德秩序所需的行为的最低要求时，道德无政府状态就出现了。布坎南认为，在道德秩序规则下，真正自主的个人有可能成为能生存的实体，没有道德秩序，个人只能处于道德社会的结构中，而道德无政府状态是对二者的否定。在道德无政府下，个人求得社会安定的代价是强制性的国家政府；在道德秩序下，社会安定对治理的需要降至最小程度，个人的自由达到最大程度。在现实环境中，即大多数人遵循道德秩序时，政府就仅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道德社会的分析相对复杂一些，因为有许多可能的道德社区（包括个人主义—社会公有主义系列、国家化—地方化系列）可能同时存在于单一社会之中。政府行动的范围和规模在道德秩序的社会中要比在道德社会中有限得多。布坎南还根据这种分类对美国与日本进行了分析。

布坎南在第三部分中讨论正义问题。这部分共五章（标题依次为“公正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正义和平等对待”、“分配和再分配的准则：为澄清问题而作的注释”、“税收的伦理限度”、“舍弃福利国家”），各章间并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布坎南分别从“正义”、“公平”等概念分析，“符合‘平等对待’标准的一个正式模式”分析，税收的伦理限度探讨，以及舍弃福利国家的政策建议等方面表述了他关于正义问题的一些观点。布坎南强调，在讨论正义时，应注意权利和要求的分配是先于市场过程本身的，因此他重视经济竞争活动“比赛”的公平规则，分析了“选择”、“运气”、“努力”和“出身”等因素，比较了市场前的不同地

位和市场后分配结果间的联系。他认为传统规范税收理论未提税收的绝对水平，因而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介绍了罗尔斯在《公正的理论》中提出的两个公正的基本原则：最大的同等自由；初级商品分配的差别原则。他指出，税收的绝对水平的限度包含在最大的同等自由之中，而差别原则只有在这些限度内才成为合适的。在布坎南看来，现代福利国家象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错误，应该舍弃掉，在这部分中，他提出了如何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

第四部分的四章（标题依次为“负债财政的道德方面”、“公债和资本形成”、“公债、民众和福利国家”、“经济学家论赤字”）专门论述赤字财政。布坎南把赤字财政同伦理道德相连，认为经济分析家了解道德如何影响选择，了解道德信条受到侵蚀会怎样改变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既定机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理财道德是一套行为准则，要求严格的预算平衡，坚持有限制的赋税水平和自我抑制货币制度。而凯恩斯破坏了这种节约原则，消费而不是节约能使社会受益的说法盛行起来。在布坎南看来，债务是一种日后支付的义务，债权人从契约中得到的是从资产中源源获取的预期纯利润的权利，这种权利必然降低资产的现值，现值降低的幅度取决于贴现率。这是一种基本的逻辑。根据这种逻辑，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大多用于公共消费，必然使资本价值愈益减少。政府很可能公开或隐蔽地拖欠债务，或利用通货膨胀破坏债券持有者的资本价值，从而造成重大的危害。布坎南还通过分析指出，由于立法机关决策几乎必然具有短期观点特色，因而负债对于民主政府更具危险性。布坎南主张舍弃福利国家，改变赤字财政政策，支持联邦政府保持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

第五部分四章（标题依次为“私人、代理人和集体在决策时的个人选择”、“契约论和民主”、“宪法民主、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讨论了个人在充当不同角色或处在不同地位时的选择，以及民主、自由等问题。布坎南分析了三种人的选择：私人、代理人、集体决策

中的个人。他认为，在理想的私人选择（市场）中，一个人代表他自己行动，这个人不对其他人产生直接影响；代理人负责行动的选择，但不负责选择后果的直接影响，因而需要提供制约代理人选择的规则；集体决策中的个人既不负担决策和行动的责任，也不承担行动后果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的福利依赖他人（在整体中）在投票时的行动，但同时，就每个个人来说，任何个人的行动又根本不会对结果产生作用。布坎南把集体行动分为三个层次：执行现行法律的行动；法律范围内集体的行动；改变法律及规定的行动。他要求寻找出在宪法允许内的集体行动和改变法律的集体行动间的受人尊重的界限，使政治—法律制度合乎“契约论”的准则，从而为宪法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他认为，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在分散的个人价值间会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应可以通过结构设计使之减少或消除；作为允许分散的个人价值在选择中可以平等表达的过程的“民主”，在规模和范围上可能受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政治上“成功”的标记，因而，民主应是“宪法民主”。他还指出，因为提出了“政府—政治失败理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宪法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北京经济学院 1988 年版，吴良健等人译）姚开建撰

作者介绍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19 年生于美国的田纳西州，1940 年毕业于田纳西中部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41 年在田纳西大学获硕士学位。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五年，战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并于 1948 年取得博士学位。1949 年后在田纳西大学任教，开始其学术生涯。1955 年以研究学者身份赴意大利进修，对于政治决策问题有了新的兴趣和看法，为他以后的政治决策分析奠定了基础，1956 年至 1968 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领导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1968 年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1969 年与戈登、塔洛克在弗吉

尼亚理工学院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中心，并任该校教授，1982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任该校经济学教授。布坎南致力于研究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法制基础近四十年，因而成为公共选择理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的奠基者，他运用经济学方法去分析政治决策过程，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为了奖励他对政治决策以及公共经济学理论做出的贡献，布坎南于198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布坎南的著述很多，其中著名的有：《“赞同”的计算》、《公共选择理论》，《赤字中的民主》。

[美]钱纳里，霍利斯·伯利
Chenery, Hollis Burley

产业关联经济学
Interindustry Economics

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荷利斯·钱纳里与保罗·克拉克合著的，运用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方法分析经济结构变迁的产业经济学著作。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产业关联方法及其在实证上的运用，注重对政策问题的分析以及利用现有统计资料和理论模型。全书除前言和符号摘要外，包括绪论和2篇12章。绪论介绍了产业关联经济学发展的过程、模型，部门分析、产业关联分析与宏观分析方法、产业关联经济学的运用。第1篇（第2—6章）由最简单的投入产出模型出发，并逐步深入地建立了较复杂的体系，介绍产业关联理论。第2篇（第7—13章）讨论产业关联分析的主要应用方式，每一种应用都以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的产业关联经验的实例来说明。

一、结构相互依存模型

产业关联分析的基本理论基础是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

模型。投入—产出核算体系是对经济中各不同部门间的经常投入与经常产出的流量提供一个衡量的框架。产业关联核算的主要功能是显示商品和劳务从某一生产部门至另一生产部门的流通过程。该体系将产出的中间使用与最终使用，被生产的投入与原始投入分开，产生了千种方式的交易，这千种交易由 4 个象限表示。而投入—产出模型就是以每一部门的生产水平来表示产业关联流量的大小。在一系列的假定下，可建立投入—产出的基本模型，这种模型决定了自发性需求与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此种模型的应用范围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扩展。一方面是讨论在“模型外”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由于产业关联体系而间接有关系。这种扩展方式的实例为进口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第二种扩展关系是假定一个或多个事先由生产水平以某些方式决定的自发性因素将“模型封闭”。第二种方式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包括加入可以解释最终需求各因素的行为方程式。第二种可能性涉及到将整个经济体系分成数个区域的问题，每一个区域都有其自身结构的特征。第三种可能性是用时期分析以加速原理的形式来说明某一时期的投资为下期需求与生产的函数。将这三种基本模型的扩展形式加以合并，即可得到开放的一般动态产业关联模型，该模型可显示结构相互依存的效果。

以投入—产出模型及其扩展形式为出发点，可以展开产业关联的线性规划模型。产业关联模型考虑到了生产商品与满足需求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且经济体系中某一方面的选择可能取决于其他方面的选择。在最终需求中允许加以选择的情况下，运用列昂节夫方法建立的线性规划模型可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系统方法。在引入了技术及其供给方面的选择后，可建立较为一般的产业关联分析的线性规划模型。

就基本的投入—产出表而言，涉及许多统计问题，如设计和编制过程中的部门分类问题、资料处理问题、一些技术概念问题。投入系数的导出问题、矩阵的伸缩性问题。就产业关联模型而言，还要涉及许多经济关系，如消费函数与其他最终需求、资本与其他初始投入的系数、输出与输入的需

求弹性、各种互相替代的生产方法等，这些都要进行实证研究，故必涉及许多计量经济学的问题。

上述的投入—产出分析是以一系列假定为基础的，其基本假定为投入系数不变。实证检验表明，这种假定虽然存在一些矛盾，但它是最接近现实世界的较复杂的生产函数。

二、产业关联分析应用

在美国、挪威、丹麦、荷兰、意大利、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等国家或地区，产业关联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产业关联分析已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各国的分析结果是试验性的，各国的分析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美国、日本、挪威和意大利的生产结构的比较结果显示，由于在基本原料、原料加工技术、构成产业的商品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相互依存性，尽管个别投入—产出系数存在较大的差异。

产业关联分析在各国的实际应用，主要是结构分析方法、经济结构的预测和经济计划方法。结构分析作为产业关联分析的一种具体应用，在逻辑上包含各种研究矩阵的方法，令人满意的结构分析必须根据产业关联之解。各国通常进行的结构分析包括研究各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还包括最终需求结构、初始因素结构、价格结构的研究。

全面经济预测是产业关联分析的另一种重要应用。经济预测主要分析政府的重要政策或计划，预测的可靠性往往影响政策或计划的可行性。意大利、哥伦比亚、阿根廷、美国的实例表明，只有遵循此一指导原则，经济结构预测才是可行的。

在落后国家（地区），产业关联分析的具体应用形式为发

展计划。几乎所有落后国家（地区）都制订了发展计划，发展计划的目的是寻求可使未来收入增加的最大投资、技术和制度的变化以及其他措施的配合。落后国家广泛存在结构失衡问题，配置稀缺的资本和外汇资源是其发展计划的主要特征。为有效实施发展计划，许多落后国家都建立了计划委员会或其他特殊机构。

线性规划方法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计划制定中具有重要的贡献。线性规划不仅用于研究单一产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且用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方面。

各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是产业关联分析方法的又一应用领域。区域分析模型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模型、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区域间线性规划模型。国际贸易模型主要说明各国间的贸易水平。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旨在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之间贸易与生产的相互关系。区域间线性规划模型主要决定资源在各区域之间的最优配置问题。区域分析只能用于特殊目的，而不能用于一般目的。

由于产业关联分析的历史较短，且人们主要致力于收集投入—产出统计资料，故虽然产业关联的分析的方法与实证基础已大为改进，但产业关联分析的实证应用却较少受到注意。产业关联分析在今后将有较大的发展。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 1959 年，中文版由台湾的张温波等翻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 邹正方撰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本书是H．钱纳里与S．鲁宾逊和M．赛尔奎因合著的论述发展中国家（地区）工业化发展经验的一部著作。本书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试图通过一系列准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比较研究，阐明工业化在发展中的作用。

全书除引言外，还包括4篇11章，分别讨论结构转变的一般问题、准工业化国家（地区）工业化经验、生产率和结构转变的关系、发展战略。

一、结构转变的一般问题

对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分析表明，需求和贸易变化可以象要素供给变化一样影响经济增长，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进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合理的。增长和结构转变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在：收入增长引起国内需求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提高投资率以及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源又会推动总量经济增长。

多国多部门模拟模型表明，经济结构的变化取决于总需求（收入）水平和要素供给结构的演化。供给条件不同是发

展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结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这三个阶段同初级产品生产和制造业生产对增长的相对贡献的变化相对应。不同贸易模式对结构转变各阶段的变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就大国模式而言，工业化起步较早是由于普遍实行了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就初级产品出口小国模式而言，制成品进口的替代过程则要慢得多。制成品出口小国模式在其发展初期外资流入的水平较高，以后轻工业出口迅速增长，又逐步取代了作为外汇来源的外资流入。

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准工业国家所实行的发展战略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外向型初级产品生产导向的国家，这类国家具有特别强烈的初级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但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二是内向型国家，这些国家信奉保护政策，制成品出口水平较低；三是中间型国家，这类国家具有贸易的平均水平和平均模式、中等的保护水平；四是外向型的工业生产导向国家（地区），这种战略是外向型战略和初级产品出口缺乏比较优势这两种现象相结合的产物。发展战略与效率、要素使用、增长的部门因素密切相关，一般地说，越开放的经济，效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越大，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发展战略也影响结构转变的时间、顺序、速度，外向型工业生产导向战略趋于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增长，从而引起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

二、工业化的经验

贸易战略的差异是影响各国（地区）经济实绩差异的重要因素。一般地说，外向型的国家（地区），其经济增长也较快，内向型国家（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不仅如此，进出口部门结构也影响经济实绩，制成品出口份额较大的国家（地区）的经济实绩较好，初级产品出口份额较大的国家（地

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内向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发展战略之间有时间顺序的先后。一般地说，重要的出口扩张阶段几乎总是以剧烈的进口替代阶段为先导的。

工业化过程是与结构转变密切相联的，工业化决不限于制造业在总产出中比重的简单增加。最终需求结构、中间技术投入和贸易的规模与结构都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作用。虽然一些基本的长期力量是所有国家共有的，但初始条件的差异和发展战略选择的不同，也影响这三个部分相互作用的方式及结构转变的速度。这些共有力量是需求结构的变化和技术变化。有利于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变化是工业化的一种强大力量，技术变化会导致一个更为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经济。

国际贸易对准工业国家相当重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比实行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有更高的增长率和结构转换率。外向型发展战略得益于生产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之间联系的分离。一些国家可采取两种专业化形式：部门之间的和部门内部的。

制造业增长对贸易平衡的最后作用是双重的。在大部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对收支平衡的净作用是消极的，只是在后期阶段才具有积极作用。

在外向型发展战略中，出口状况、外资流入、进口和总增长相互作用。一个外向型发展战略要取得成功，需要协调好这些因素的关系。

三、生产率和结构转变

多国结构转变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和总附加价值的增长率在较高的收入水平上减慢之前，显示出一个最初的加速。这种加速主要是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结果。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是趋于稳定甚至下降的，因资本弹性是趋于下降的。由于要素生产率是提高的，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

献是趋于增大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各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工业部门比非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出口部门比非出口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的转移可以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各国制造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其所实行的发展战略存在密切的关系。外向型发展战略通过规模经济或竞争刺激、放松外汇管制和便利资本品及中间产品的进口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而内向型发展战略则通过削弱竞争对降低成本的刺激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四、发展战略的选择

准工业国家（地区）的发展战略有三种选择：

(1) 出口扩张战略。这种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反出口刺激偏好大幅度降低，大量外资流入使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时期得以存在。

(2) 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关税保护和外汇配给限制进口，保持高估的实际汇率以加剧反出口刺激的倾向，较低的资本流入。

(3) 平稳战略。这种选择要求对进口、出口、资本流入进行平稳调整，资本流入分阶段进行。

三种发展战略都以下列因素为特征：典型的外部要素、维持外部平衡的政策规则、其他政策选择。出口扩张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代表了两种极端情况，它们是相互排斥的。出口扩张战略会导致自由贸易的巨大发展，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上升，资本流入减少，经济增长水平提高。进口替代战略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封闭，经济效率下降，经济增长减

缓。平衡战略在促进出口增长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并使经济以略低于出口扩张战略下的增长速度实现增长。

发展战略的主要政策要素是贸易偏好、开放程度和资本流入。它们相互作用，决定每种战略的增长模式。各国应谨慎选择发展战略。

（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吴奇、王松宝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年版） 邹正方撰

发展的型式：1950—1970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 – 1970

本书是一部集体论述经济发展过程和形式的著作，是在世界银行主持下所取得的一项研究成果。本书英文版作为世界银行的系列出版物之一于 197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李新华等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做出全面描述，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本书采用截面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选择许多国家的 27 个变量，描述了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的 10 个基本过程，揭示了实行不同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发展类型上的差别。全书除前言、序言、技术附录、统计附录外，共分 6 章，分别讨论比较分析的基础、积累和资源配置过程、人口与分配过程、其他发展形式、时间序列和截面型式、结论。

一、比较分析的基础

本书的分析是要对三种主要的发展形式进行区别。这三种形式是：资源均衡配置的大国、初级产品专业化的小国、工业专业化的小国。为此，采用了库兹涅茨识别和衡量发展形式的归纳法，并通过对一些发展形式赖以形成的某些基本增长过程的研究，使上述分析形式得到了发展。发展理论是比较分析的可靠起点。

作者选择了能反映所有国家经济发展本质特点的、可归为3大类的10个基本发展过程：第一大类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教育；第二大类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第三大类是人口和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过渡、收入分配。这10个过程加在一起描述了一个穷国向富国进行全面结构转变的不同方面。从目前发达国家的这些变量来看，几乎所有变量的长期时间序列通常都显示出一个相当快速的变化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减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相反的变化。在近50年里经历巨大增长的欠发达国家中，常常可以找出一段变化率加速的时期，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几乎没有结构变化。结构转变的主要特征是呈S型曲线变化。本书的分析期间是1950—1970年。分析中所含模型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单位和所用变量主要是根据联合国的统一核算体系决定的。

二、积累和资源配置过程

积累过程是主要发展现象，是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积累过程包括储蓄和投资。研究表明，随收入的增加，储蓄也

会显著增加，但各国的储蓄率随时间推移而上升的幅度不一致。不仅如此，一定类型的收入者具有相对固定的储蓄份额，即所有收入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收入者的构成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理论也适用于政府收入和发展支出。税收总份额的较大幅度增加可能是计税基准的构成不断变化的结果。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税收基准的限制变得不重要了，政府收入份额更多地受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受公共需求的影响。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最大部分，且可能占人力资本投资的一半以上，但究竟应以国内生产总额的多大份额用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尚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50—1970年间教育投资低于最优水平。

对1950—1970年间的统计分析表明：第一，教育支出、总投资、税收收入、学生注册人数都增加了；第二，国家规模和资本与大多数积累过程有重要关系，资本流入随国家规模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资本流入部分地抵销了储蓄和政府收入中的变化。第三，各个过程完成时间不一样。

资源配置过程在国内需求、国际贸易和生产部门构成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系统的变化。配置形式的变化是由于收入水平上升后的需求影响和要素比例及技术上的变化引起的供给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对资源配置形式的变化应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去解释。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理论为分析资源配置过程提供了一个起点。

理论研究表明，收入提高对资源配置具有直接影响：非食品消费的上升；由实物和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口增长引起的要素比例变化；出口构成也会发生变化。统计分析表明：第一，伴随人均收入的变化，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了一倍，而投资份额从而工业品需求份额提高了一倍。第二，出口构成的变化通常发生在发展的较晚期并受政策影响很大，这种变化表现为初级产品出口下降，而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增加，反映了国内需求和国内资源供给的变化。各国需求结构的变化最一致，贸易结构的变化最不一致。

三、人口和分配过程

收入分配受下列因素的影响：教育水平、生产结构、用于再分配的政府收入的可获性、死亡率、出生率、城市化等。这些因素又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劳动力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影响，通常趋势是随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部门的就业减少，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增加。经济发展不仅影响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而且会使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转移受预期收入、就业、政府支出的分配、生产结构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劳动力转移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城市化与发展水平、生产和贸易类型有密切的关系。

经济发展通常也伴随人口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收入水平对出生率具有间接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婴儿死亡率降低都与低出生率密切相关。

四、其他发展形式

以贸易结构为依据，可将各国发展形式分为三类：大国、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小国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小国。

大国形式具有规模效应。最明显的规模效应反映在贸易额上。大国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一般实行内向型发展政策，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较低，能较早实现工业化，储蓄和投资水平较高，城市化程度较高，工业劳动力较多，教育水平较高，但政治和管理的困难也较大。故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无明显的优势。

小国形式具有资源效应。小国形式较多地受到国外市场和资本流动的较大影响，几乎没有几个小国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满意的增长率。当收入水平提高时，小国的出口急剧增长，通常工业品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更快，但具有不同贸易形式小国的出口结构的变化在时间上存在很大差异。

据出口水平和构成、资本流入水平和生产部门结构，上述发展形式可归为 4 种类型：初级产品生产专业化型，平衡的生产和贸易型，进口替代型，工业专业化型。这种分类是发展战略比较研究的基础。

五、时间序列与截面形式

时间序列方程反映一种长期内平均的或近似变化趋势，截面分析在许多方面与之不同。时间序列型与截面型式的比较有助于澄清在几个领域里出现的相互矛盾的假设。就储蓄而言，根据储蓄行为的绝对收入和长期收入的假设提出的预言，部分地得到证实。所得出的边际储蓄率大大高于平均比率，这说明储蓄对收入的比例在上升，但短期储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超过长期储蓄倾向。在外资流入问题上，分析表明，外资对储蓄存在负效应，发展政策应考虑外资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至于政府收入，短期收入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与长期并无很大的不同，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就配置形式而言，生产结构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型式十分相似，两种时间趋势都呈现出由初级产品生产转向服务业的外生位移。两种分析也表明，总的趋势是出口份额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两种分析还表明，资本流入与出口的关系同其与储蓄的关系十分类似。外部资本流入可以弥补出口的减少，还能以同样的比例提供额外的进口，不过，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且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资本还有助于扩大出口。

六、结　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1950—1970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特点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并将这些分析作为讨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的依据。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套衡量发展进程的方法。

本书对结构转变的系统描述有助于对各国的储蓄率、工业化和贸易形式的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本书对发展特征的统计分析可以用于检验发展理论，并服务于发展政策的制定。

（据牛津大学1975年版，李新华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邹正方撰

作者介绍

钱纳里，荷利斯·B.（Chenery，Hollis B.）美国经济学家。1918年生于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195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0—1965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任助理解政官员，1965—1970年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经济学教授，1970—1972年任世界银行行长顾问，1972—1982年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政策的副行长，之后一直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钱纳里是发展经济学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从发展政策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两缺口模型"。钱纳里的主要著作有：《产业关联经济学》（与P. 克拉克合著，1959）、《工业化进程》（1969）、《发展计划研究》（1971）、《随增长的再分配》（与M. S. 阿卢瓦利亚合著，1974）、《发展型式：1950—1970》（与M. 赛尔奎因合著，1975）、《结构变迁与发展政策》（1979）、《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与S. 鲁宾逊、M. 赛尔奎因合著，1986）等。

［英］克拉克，西蒙
Clarke, Simon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与国家的危机
(Keynesism, Monetarism and Cricies of State)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与国家的危机》英文版1988年由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书共十二章。本文分三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介绍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的货币与国家理论，并以英国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国家演变的过程。

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货币是一种交易手段，是保证市场实现自行调节与正常运转的中介。在调节生产与劳动分工方面，货币比国家更有效，因此，应当实行市场自由化，使资本得以合理配置，社会分工不断发展，从而实现各阶层与国家共同富裕的目标。

国家的职能只有三个：（1）保护领土不受侵犯；（2）保证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3）组建公共性工程，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除此以外，国家不必越俎代庖，因为它有

自身利益，对经济体系的运转不能确切掌握，而且，它的支出往往也是低效率的，因此，干预市场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为保证一切特殊利益都服从于全民的利益，国家应当独立于整个社会之上。但是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要服从经济规律与法律制度，这是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从他对其货币理论的批判开始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不仅是流通的手段，而且还以其进化形式成为价值的独立形态，从而支配社会生产，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个别资本家千方百计在竞争中取胜，有的以发明、革新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另一些则靠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来替代之，从而使阶级矛盾深化。上述情况造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信贷危机造成的通货膨胀更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危机。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对货币与国家的演变过程及相互间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十八世纪的国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后来由于贸易的发展，新兴的资本家和金融家才得以逐渐掌握大权。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很重视贸易盈余，认为要保证这点必须靠国家的军事实力。在这一现实支配下，英国等开始远征近伐，推行殖民统治。十九世纪初，政府干预经济以维持其繁荣的企图已不能维持其政治与财政的稳固地位。这时，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致力建立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以便引导之按理性行事，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有授予财产的权力，而是保证它的实施。这一变化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国家形式的演变，从而意味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

当马克思论及的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阶级斗争也日趋尖锐。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将工人的经济要求政治要求区分开来，在政权许可的范围内改善其生活条件（此谓凯恩斯的福利国家），从而瓦解工会组织，使政权稳固。但是，资本

的过度积累使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使政府在生活上满足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难。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另一方面，资本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造成帝国主义抬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后，各国政府以国家干预经济、并辅以自由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来取代金本位等手段促进经济恢复，在国内保障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国家的民族形式要求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意识形态角度，民族利益都应高于一切。否则，劳动阶级的反抗呼声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满足了劳动者，又会与资本家的利益相冲突。

各种政策调控失效，市场运行的不如人意，使人们终于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产生怀疑，从而开始转向凯恩斯主义。

二

第二部分内容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衰落以及货币主义的兴盛及其原因。

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中就对古典学派的货币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古典理论中的货币基本上仍然是物物交换的形式。只有当价值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时，货币体系才会有重大发展。所有发达的经济中，货币都是国家货币，即货币是价值的象征，而不是它的独立形态。由于信贷资本体系的发展，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作用已大为减少。《通论》认为，货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对经济体系的无知和不确定预期，它的数量受利率影响，金融当局可以通过买卖债券来影响利率，从而影响货币的供求平衡。萧条时，可以负利率来刺激投资，或以赤字财政代替，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税收也会相应增加。这样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又可以收入的一部分来弥补萧条时期的亏空。但是，凯恩斯并不主张通货膨胀，他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生存的最大威胁，货币政策应重在维持国家的价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凯恩斯针对战后萧条经济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理论疗方，及时适应了各国的重建需要，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运用上都存在一些局限性。

凯恩斯的扩张性政策运用到实践中时，引起了通货膨胀，继而是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最终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国际收支恶化。另一方面，扩张政策使效益好的资本在自身能够发展的同时，吞并因之破产的效益差的资本，从而加剧了资本的过度积累与不平衡发展。国家在如此内外交困之下，只好放弃凯恩斯的扩张政策，转向紧缩，但这又使失业上升；削减福利开支尽管可以使公共性支出部分减少，但是，在抵抗工资下降的呼声中，通货膨胀仍无法控制。结果，本为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工资增长、人民福利不断改善而施行的政策却最终造成了“滞胀”：物价上升、失业增加、工资停滞、政府开支减少。

由于凯恩斯政策的种种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七十年代初便逐渐调整政策重点，慢慢转向以市场调节为主。实践上的需要使得主张以市场作用为主的货币主义脱颖而出，近年来更为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所用，成为继凯恩斯之后的“总统经济学”。货币主义主张维持通货稳定以保证市场的顺利运行，实现充分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干预不仅使个人无法自由地决定如何充分支配属于他们的资源，而且使货币主义的效率与活力赖以存在的动机受到打击，结果，就是那些政府补贴的得益者也终将受经济滑坡之苦。市场总是奖勤罚懒，而政府调节却往往奖懒惩勤。通过税收、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途径，政府按照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向其让步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配置与重新分配资源。当政府借助通货膨胀性的财政政策解决经济问题时，就会破坏货币的整体性，从而也破坏了货币调节功能。为实现民主与国家繁荣考虑，应使国家和全民都遵从市场规则。对货币主义者来说，国家的经济职能就是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从而把积累限制在市场范围内。一项恰到好处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同时实现。象古典学派一样，货币主义强烈反对政府有制订货币政策的权力，因为这样很容易使它制订出通货膨胀性的政策，来保证其短期内的政治利益。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很自然地引导出货币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自商品出现就已存在，但它在当代的表现却是资本渗入生产，使社会生产服从货币规律，并不断瓦解当权者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当资本主义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危机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个新型国家中，国家与民众社会分离，货币的社会力量与国家的政治力量分离，这是一个自由形式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危机，它反映了全球性过度累积的危机，也说明了政治矛盾的不断尖锐。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基础是包括产业关系、社会管理与选举权在内的一套系统的机构，但是它更深刻的基础是二战后工人组织力量的壮大，其政权稳固的条件是战后的繁荣。凯恩斯主义认为：为了克服自由国家的矛盾，可以用提高工资与公共开支来维持繁荣，并实行阶级合作，从而使货币的力量屈从于国家的力量。然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但不能克服资本过度积累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反而加速了这一危机的进程。

货币主义并没有抛弃凯恩斯福利国家的一套机构，因而不是一场改变政权或意识形态的革命，但它却使福利国家的政治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货币的力量重新占了上风。这一变革说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失败，也揭示着选举权与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将被逐渐削弱。

三

第三部分分析了社会民主化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

作者在对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作了较详细的剖析之后指出：随着资本的大规模集中、生产社会化的日益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日趋成熟。同时，随着阶级矛盾的愈益尖锐，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也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但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遭到破坏，凯恩斯主义也为货币主义所取代，这不仅反映了国家的危机，也反映了社会

主义的危机。

回顾历史，可得几条经验教训：第一、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是社会化大生产。只有将社会生产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才能克服导致了贫困、阶级斗争、危机与战争的资本积累的矛盾。第二，社会主义必须是国际主义的。第三，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得受资本主义原有的民主形式的制约，实践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使国家将工人阶级的民主运动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

要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依赖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社会主义意味着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相互协调，从而形成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与国家的危机》一书虽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它从历史、哲学、经济，以及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理论与现实，有其独到见解。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重视。

（据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有限公司 1988 年版） 梁 君撰

作者介绍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英国经济学家，现任英国沃威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

[意] 奇波拉，卡洛
Cipolla, Carlo

欧洲经济史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972)

一

《欧洲经济史》是部集体撰述的著作。它篇幅巨大、史料丰富。特别是它及时采用了新公布的文献史料和有关问题的科研成果，因此可以说是代表了西方在欧洲经济史方面的主要学术成就。

为填补史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欧洲经济史》于本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用奇波拉教授的话说“在目前阶段还没有一套令人满意的欧洲经济史——既要包含整个欧洲，又要详细叙述各个国家——也就是说，既要足够简明便于应用，又要相当完备地包括个别和详尽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这一套书就是为填补这个空白而设计的。”

著作的中文译本是根据威廉·科林斯出版公司在70年代出版的各卷陆续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

奇波拉教授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内容包括从中世纪后

期以至当代（900—1970）一千多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全书分为如下六卷：（1）中世纪，（2）十六、七世纪，（3）工业革命，（4）工业社会的出现，（5）二十世纪和（6）当代各国经济，共六十一章。

奇波拉教授声称，这部《欧洲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说明近代工业世界的兴起”。“工业革命”的源起、进程及影响在全书起到主线作用。“工业革命”是这部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专指欧、美、日本18至20世纪先后出现的巨大剧烈社会经济变革而言。在书中工业革命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也就是从生产技术变革、单纯的经济意义上来看的工业革命，是指“一个社会对于非人力的广阔能源加以控制的过程”；广义的工业革命则是一次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社会文化上的全面伟大变革。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意义的革命。奇波拉推崇它是新石器农业革命以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伟大的变革，认为它突然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使得人类社会从此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从技术和经济的狭义观点来看，英国工业革命历程不过是1780—1850年的三代人时间；但如果从社会——文化革命的广义观点来看，它的历程却长达9个世纪之久，早在11至13世纪间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比利时等地城市公社兴起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些地区城市中心的兴起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势力对于欧洲传统的土地——封建统治秩序的冲击。这个文明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历史渊源，它经过短短几个世纪就席卷了西欧，这就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现实，资本主义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进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从中世纪后期至当代这一千多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史被分为四个时期，其主要内容（或线索）结合卷别概述如下。

（一）第一卷，即中世纪时期。

这卷书的内容从公元8、9世纪贫困的欧洲开始。当时人烟稀少。经济活动处于极低水平和原始形式。此时是寺院制

度的黄金时代。庄园是主要的经济单位，其特点是自给自足，与外界相对隔绝。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是在7世纪和10世纪之间被采用的——如重犁的出现、三圃轮种制、换马的新方法和农业与畜牧业的进一步结合。这促使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从贸易方面来看，当时的市场是不可靠的，不能保证经常地供应必需的物品。贸易关系不管距离远近，都是不规则的，不可预测的，因此贸易在社会经济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教士和军阀统治着社会，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这两部分人的文化特性决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引导社会的行为。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是农奴。在少数的手艺工匠中，有一些是流动的工人（但大多数是工匠兼农奴）。当时也有流动的商人，尽管这群人中情况各异，但他们与工人、农奴一样在社会地位上是低下的。

1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欧洲人口普遍增长，从长期看，在经济制度上没有出现什么梗塞的地方。土地是充足的，为发展所必须的资金虽然不无困难，却渐渐地在产生。每一部门的生产都在增长。贸易和手工业的增长，使参与某种贸易或参与某种手工业的人数到处在迅速增加，同时他们的财富也在增加。在北方，这些人常常群集在城堡或大修道院四周，只要那里的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交通往来和交换。在南方，自然集贸地点是那些古代罗马遗留下来的城镇。在他们这些人来到之后，各种各样的人大批拥向这些日益兴盛的城市中心。新城市中心的兴起和成长代表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革命的转折点——它给予西方历史独一无二的特性。一切后来的发展，包括工业革命和它的产物，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的城市发展。

（二）第二卷，即16和17世纪。

到15世纪末，欧洲已毫无疑问成了在世界上享有最先进技术的地区，而且他的相对优势仍继续得到空前迅速的增长。16世纪开创了一个变化显著的时代，或至少是上几个世纪开始萌发出的一些基础发展在这个时代有了突飞猛进。在本卷，

读者将上要看到一些在技术与经济领域中产生的特殊发展的例证。掌握了最先进技术的国家最终势必要通过种种途径称霸世界。16 世纪与 17 世纪欧洲几个强国大力向海外扩张。这些扩张附带造成的后果中至少下列一些需要加以注意：

1. 新产品输入欧洲，例如咖啡、巧克力、瓷器、茶叶、土豆、西红柿、玉米等。

2. 从美洲输入了大量的银，这极大地增进了国际间的流通，而且还导致了：

3. 国际贸易的大量增加。

4. 造船工业与金属制造工业的显著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及银行与交换的各种手段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商业革命”，至少这个术语适用于 1550—1700 年间的荷兰与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它使财富大量积累起来，它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它刺激了扩张与需求的多样化，它培育了一个与传统及保守的学派相对抗的企业家经营的学源，其思想方式与价值标准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这一时期不象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具有革命性的特征，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连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座桥梁：这两个世纪也是一个“重商的”时期，商业资本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到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三）第三、四卷，即工业化时期（1700—1914）。

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特征的突变时期。其中《工业革命》一卷（第 3 卷）在全书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1700 至 1914 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论述的。第三卷为专题研究，分为人口、需求、技术、银行、国家和工业革命等章节进行论述。第四卷再回过头来从各个民族国家的角度论述。国家终究不是纯一的实体、因而着力分析地区性的发展可能更为准确和有意义。

从 1780 年至 1850 年，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一场史无前例、意义深远的革命改变了英格兰面貌。从那时起，世

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除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外，没有哪一次革命象工业革命这样大大地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在表面看来，技术和生产组织的突如其来变革，带来了生产能力的空前膨胀，大量物质财富被魔幻般地创造出来；人口激增并纷纷涌向城市，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诸如此类，人们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了。

实际上这些突变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系列事件逐步积累的结果。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必须把产业革命放在一个巨大的框架中，才能对它加以有效的认识。尽管工业革命首先表现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变革，但事实上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光有煤不能创造机器，也不能使机器运转，还需要能采煤的人，需要能够设计、制造和操纵蒸汽机的人，需要能够组织各种生产因素，并能承担企业的风险和责任的人。工业革命所以在英国开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在16至17世纪中这里已经形成了有利于工业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心理状态和价值尺度。在英国之后相继工业化的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士、美国乃至日本，都是文盲比例较少和具有与英国比较近似的文化传统的国家。

（四）第五、六卷，即20世纪（1920—1970）。

这两卷在论述方法上与三、四卷一样。第五卷为专题研究，分为需求、劳动、组织、技术等章节进行论述。第六卷则是从各个民族国家角度来论述。

第五、六卷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历史。选择1920年作为大致开始日期，以颇为微妙的方法暗示了这两卷不是前面各卷的简单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历史引人注目的中断。接着一种新的趋势明显地出现了。

本世纪历史的中心论题是欧洲丧失了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在1900年欧洲的领导地位是无人争辩的；到1970年它已消失不见。欧洲的文化传统及其社会和政治结构已从内部表现出受压的危险迹象。它很富裕同时又很贫穷。它很发达而又很不安定。它已向前发展而又向后倒退。所有这些，

仅经济因素及其变化都不能加以解释。另一方面，要理解这个时期的经济史，必须考虑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方面——从精神上到生物学上的，从个人到社会——发生的变化。

须指出的是，前几卷的作者都是历史学家，而这两卷的大部分作者不是历史学家。由于作者中包含有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因而这两卷在研究方法上与前四卷相比略有差异，它加深并扩大对可利用的丰富的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

《欧洲经济史》作者人数虽多，全书的基本观点，却是大致一贯的。这也是主编奇波拉在全书导言中强调的两点。

首先，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研究。他认为“生活中没有界限，有的只是历史。我们称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东西，只有在我们充分看到了诸如思想意识、社会心理、教育、科技、医药、战事等划分开来的学科专史的成果以后才能理解”。因此，全书对工业社会及其兴起的研究，是放在整体的社会——文化框架中进行的。奇波拉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专门方法研究经济史。在有关治史方法的论点上，他甚至有些回到中外很早就有的那种认为历史只能是艺术而不能是科学的观念上去了。

其次，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多元论观点。奇波拉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描绘史实，主要更在于说明史实，说明历史上事物之间的关系。

书中的若干思想观点，大概都是可以争议的。全书各卷每章每节的内容，一般也只是一时一地的历史经验，不具有四海皆准的普遍意义。但这恐怕是任何历史著作在价值上都难免要打的折扣。而历史科学的作用，并不在于提供某种规律，而在于提供可资借鉴参考的往事实例。在这种意义上，这部经济史所叙述的除了英、法、德、俄四国的历史之外，还包括了东南北欧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在内，这样通过时间上和地区上的比较分析，就既能说明欧洲地区经济增长过程的大致脉络和基本原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先进而有的国家落后；既能令人看出历史事物之间上下古今的纵向联系，也能使人认识经济发展因素之间四面八方、直接间接的横向

联系及其机制。

整部《欧洲经济史》史料相当丰富。因此在阅读时不要简单地接受作者的观点或结论，而是要多提出疑问，积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新历史学派的理论框架，对书中的某些史实进行重新研究，这样一定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书的缺点是各卷章节的内容范畴和详略程度每有殊异，有的内容与全书主题关系不大，文字格调也不尽一致。这些大概都是集体撰述的多卷本著作所难以避免的毛病，不是什么大庇。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孟　氧撰

作者介绍

主编卡洛·M·奇波拉教授，曾任教于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并兼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货币、物价和文明》（1956）、《世界人口经济史》（1962）、《枪炮、帆船和欧洲初期向外扩张》（1965）、《文化教育和西方的发展》（1969）以及《工业革命之前》（1976、1981）等等。奇波拉教授的史学观大体上与法国“史料学派”的基本观点相近，他对“新”经济史学派的治史方法并不支持。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西方近年来颇负盛名的经济史学家。

[美] 康芒斯，约翰
Commons, John

制度经济学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934)

本书是康芒斯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制度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和制度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康芒斯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不同的是，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变化所起的作用，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在论述方法上，本书也有自己的特色，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仿效自然科学教科书。书中所列入的每一种观念都追溯到它的创始人，然后陈述这种观念的逐步修正和变化，并且将各观念早期的双重的或三重的意义分开，直到使每种观念作为单一的意义和我理想中的政治经济科学里的其他观念结合起来为止。”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和思想。

一、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关系”

康芒斯是以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关系”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本点的。他继承了凡勃伦开创的批判分析传统，认为正统派经济学家们混同了财富的两种意义：既说财富是一种

物质的东西，又说它是那种东西的所有权。它们的矛盾在于，所有权意味着限制数量以便维持价格的权力，而“物质的东西”却产生于利用生产甚至生产过剩的效率来增加其数量。在对财富的两种意义上作了上述区别之后，康芒斯发现“物质和所有权的相互关系，不是在洛克的‘劳动’那种化身里，而是在一种经济活动的单位——‘交易’里，以及那种对有利的交易的预期里”。

他进一步解释道，正统经济理论无法对财富的两种意义作出区别，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关系仅仅理解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政治经济学的题材不仅是个人和自然的势力，而是人类通过财产权的互相转移，彼此赖以维持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向法律和伦理中寻找这种人类活动的重要的转折点。”法律处理人类的活动或纠纷，依据的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人对自然物的所有权——即“利益的冲突”。

康芒斯认为，仅仅有“冲突”是不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冲突又互相依赖的关系，在冲突与依存的相互作用中还必须建立一种对未来的“可靠的预期”机制，康芒斯把这叫做“秩序”，“冲突、依存和秩序”构成人类所有活动的三项基本原则，能够同时体现这三项原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交易关系”。“交易”构成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小单位”。

二、“交易”和“交换”

“交易”不同于“交换”，在“老派经济学家”那里，“交换关系”的含义是指商品的实际移交，而“交易关系”，则是作为法律上的所有权转移的一种制度上的含义。规定价格和决定竞争的是所有权，决定竞争公平与否的是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实物的交换。但是，二者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康芒斯举例说，如果一个小商贩，携带他的货物或钱到市场上去，实际地拿它们和别人交换，那么他同时是在完成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一种是实际交货和实际收货劳动活动，一种是让与和取得所有权的活动，前者是交换，后者是交易。二者共存于同一过程之中。既然“交易”不是实际交货意义上的物品的交换，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那么决定交易能否进行的前提也就不是“劳动”等等，而是——按康芒斯的说法——“业务规则”，即伦理学上的“行为准则”和法律上的“合理程序”。因此，所有权的转移，必须按照社会的业务规则先在有关方面之间“谈判”然后劳动者才能生产，或者消费者才能消费，或者商品才会实际交给其他的人。

交易作为所有权的转移，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主要有三种类型，康芒斯分别把它们命名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其中买卖的交易是发生在法律上经济上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所有权转移关系，而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在管理的交易中，上级是一个个人或是一种少数个人的特权组织，他们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如工头对个人、州长对市民等，而在限额的交易中，上级是一个集体的上级或它的正式代表人，如立法机关，法院，公司董事会、工会、专制政府等等，限额的交易的作用是分派财富创造或生产的利益和负担，依靠“强制或暴力”作为其“谈判”手段；管理的交易作用在于财富的生产，其“谈判”手段是“命令或服从”；买卖的交易作用在于财富的分配，其手段是“劝诱或强迫”，取决于机会、竞争和讨价还价的能力。

三、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康芒斯认为，上述三种类型的交易合在一起成为经济研

究中的一个“较大的单位”，即“制度”或“运行中的机构”。这种运行中的机构是靠“业务规则”也就是“秩序”来推动其运转的，它们包括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至国家本身。康芒斯对制度范畴的特征作了概括的描述：凡是“动的”而不是“静的”东西，或是讲“程序”不讲商品、讲活动不讲感觉、讲管理不讲平衡、讲控制不讲放任的东西均属于“制度”范畴或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康芒斯阐述道：“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通的原则，适用于一切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非常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康芒斯认为集体运动在习俗中的表现更为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一个运行中的机构只是一种习俗，法律就是习俗“精确化”、“命令化”的表现。“业务规则”是表示一切集体行动所共有的一种普遍原则，它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一种秩序，“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做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由此可见，集体行动又不仅仅是对个体行动的控制，它通过控制的行为，首先是一种个体行动的解放，使其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不公平的竞争；其次它还是一种对个体意志的扩张。一个大公司的首脑发出命令，“在天涯海角执行他的意志”。因而，可以说“业务规则”又是被集体行动所控制、解放和扩张的个人行动。

从集体行动通过各种不同的制裁手段控制个体行动这种普遍原则中，产生了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这些法律上的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上的关系，康芒斯把这些关系归结为安全和服从，自由和暴露四种。“服从”是指在债务或义务的一面对集体行动的业务规则的服从状态，“安全”则是由于对上述服从的预期而产生的安全状态；若集体控制采取一种禁例的方式，这个禁例给那个因此可以免以受害的人造成一种经济上的“自由”状态，但一个人的自由可以给另一个有关的人带来未来的利益或损失，造成一种“暴露”的经济状态，即“暴露于对方的自由”，如雇主暴露于雇员有工作或离去的自由，雇员暴露于雇主有雇佣或解雇的自由，除此，象商业信誉、营业特许权、注册商标等等“无形的”财产也体

现了这种“暴露——自由”关系。以上四种经济关系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基本“交易”关系。

四、法律居先于经济

康芒斯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得出“法律居先于经济”的论断，也就是作为所有权的转移的“交易关系”先于作为“物质的移交”的交换关系而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应首先归功于法院，是法院保证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廓清了道路。康芒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共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的资本主义”（“合理的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离不开法制的作用，是国家法律制度加强了对于私人企业活动的干预的结果。他还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同它的过去有很大的差异，它能够更好地免除自身的缺点和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赖于法律的完善和发展。他说美国的法律制度已使资本的所有权趋于分散，“这种所有权的扩大，可以称为投资者的好感的扩大，它使千百万美国人对于保存资本主义感到兴趣……美国已由‘个人主义’变成公司主义，私人财产变成法人财产”。

（据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34 年版。中文版于树声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于会江撰

作者介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动力作用，特别是

法律制度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从而提出了“法制居先于经济”的重要论断。康芒斯的主要著作有：《财富的根本》（1893）；《美国产业社会史料》（1910）；《美国劳工史》（1918）；《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1934）。

[美] 德布鲁，杰拉德
(Debreu, Gerard)

价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
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1959)

一般均衡理论作为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之一，可以远溯到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即一个经济中许许多多经济活动者各自做出独立决策，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最优状态。为回答这一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刺激了对许多基本问题的研究，例如，资源配置的效率、决策分散化、决策的动力等。本书综述了当时的所有成果，建立了“抽象经济”的严格公理化体系。西方经济学界公认，本书是“本世纪经济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德布鲁认为，本书研究的两个中心理论问题是：（1）解释商品价格的含义，商品价格是私有制经济下经济主体人在市场上相互作用形成的；（2）解释最优经济状态中价格所起的作用。全书就是围绕定义在商品空间上的价值函数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的。本书共含 7 章，下面分章进行介绍。

一、基本数学工具与概念

第 1 章主要介绍理解全书所需要的数学材料。德布鲁写道："本章介绍后面要用到的全部数学概念和结论。原则上，阅读它不需要另外的数学知识"。在这章中，德布鲁首先引入了元素的集合概念，然后通过定义的方式，逐步引入了复杂性增加的概念，有关的数学结论也同样引入。前 3 节分别讨论了集合、函数、对应和偏序四个概念。第 5 节引入了实数概念。为准备这些定义，节中分别给出了二元运算和最小上界的概念。从实数集出发，建立起了 m 维欧氏空间 R^m。第 6 节集中介绍了 R^m 中点的收敛序列的概念。第 7、8 节给出了函数和对应的连续概念。第 9 节则介绍了 R^m 中的向量运算定义。最后导出了一个对应的不动点概念。

德布鲁作为布尔巴基数学学派活跃的一员，他选择的表述方法同现代数学的发展相一致，对阐述解决经济问题很有帮助。本章中所用的名词和记号，至今仍为经济学家学习现代数学知识的标准范本所采用。

二、商品和价格

商品和价格是经济学的两个中心概念，德布鲁在本书的第 2 章引进了这两个对偶概念。他在这里定义的商品与价格概念有特定含义：商品由其物质属性，可供的时间和地点加以描述的；而每一种商品对应一个实数，即价格。通常的商品价格是指在某时获得商品而付出的货币量，德布鲁引入的概念中没有涉及货币。经济是在"没有作为交易中介的货物的帮助下运转。"这两个抽象概念中包含着很多具体形式。德

布鲁在这里把商品细分为货物式服务；价格则可理解为利息率、工资、汇率等。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形成了区位理论、资本理论、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及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统一框架。这样的抽象分析确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

一旦选定了测度单位，这两个概念就有了唯一的数量形式。这大有利于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德布鲁这样来构建其经济理论的数学基础：考虑一个具有有限商品的经济，一位经济主体人的行为可通过列举他的对各种商品的投入产出来描述。一旦采用正负号来区别投入与产出，经济主体人的行为就可以用商品空间（最初指一个有限维的实向量空间）中的一个点来表示。一个消费者的行为，可用 m 维向量 $X=(x_1,\cdots\cdots x_m)'$ 表示，其中 x_i 表示他消费的第 i 种商品的数量。一个生产者的行为也可用 n 维向量 $Y=(y_1\cdots\cdots y_n)'$ 表示，其中当分量 $y_i>0$ 时，表示第 i 种商品的产出量，$y_i<0$ 表示第 i 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同样，一个经济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可用价格空间中一个点来表示。德布鲁说："商品数量 L 是一个给定的正整数。经济主体人的一项活动 a 是商品空间 R' 中的一类。价格系统 P 是 R' 中的一点。活动 a 相对价格系统 P 的价值是其内积 $P\cdot a$。

商品空间与价格空间的丰富的数字结构，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正如德布鲁说："商品空间具有实向量空间结构这一事实，是经济理论数学化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生产理论

在本书中，经济是由一定的经济主体人构成的，一个经济主体人由其选择的限制以及选择准则构成。第 3 章中德布鲁研究了第一类经济主体人——生产者。生产者的生产计划属于一给定集合，主要表示生产者有限的生产知识。在此集

合中，对给定的价格，生产者选择生产计划使利润极大化。研究顺序由此得出：首先，从理论和解释观点出发，准确给出生产者、生产计划、生产可能性集合等概念。“生产者的数量 n 是一定的正整数。每个生产者由指标 $i=1, \cdots\cdots, n$ 表示。在商品空间 R^{ℓ} 的一个给定的非空子空间即第 i 个生产者的生产集合 y_i 上，第 i 个生产者选择一点，即他的生产和供给 y_i。称 $y=\sum_{i=1}^{n} y_i$ 是总生产或总供给；称 Y 组成的集合是总生产集合。”然后按照“渐降的合理性”，讨论了集合 y_i 的全部假设，包括：连续性，不活动的可能性、免费生产的不可能性、不可逆性、可加性、凸性、规模收益不变、自由支配等。第 4 节考虑了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这自然导致利润函数、供应对应、个体厂商最大化及总利润最大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讨论。最后以利润最大化的比较静态和供给对应的连续性的一般总结作为结束。

四、消费者行为理论

第 4 章讨论了消费者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计划，可以用选择限制以及选择准则来描述。首先可从理论和释义的角度说明如下概念：“消费者的数目 m 是一个给定的正整数，每个消费者由指标 $i=1, \cdots\cdots, m$ 表示。第 i 个消费者在商品空间 R 的非空子集 x_i，即他的消费集中选择一点，即选择其消费或需求 x_i，对每个消费者给定的消费 x_i，$X=\sum_{i=1}^{m} x_1$ 称为总消费式总需求，集合 $X=\sum_{i=1}^{m} x_i$ 称为总需求集。”

第 3 节讨论了消费集的有关假设，包括连续性、下界性、连通性和凸性等。然后讨论消费可能性计划里偏好的概念。

下面三节讨论了关于偏好预次序的全部假设，即不满足性、连续性以及凸性等。第 6 节严格证明连续效用函数的存

在性。消费者的选择限制有两类：消费计划必须满足预先给定的约束；其次，给定消费者的价格和财富，其消费计划的支出不能超过其财富。接下来的 9 节讨论了在这种约束下的满意偏好。最后还讨论了最佳消费计划对价格和财富的依赖关系。

五、经济均衡的存在性

本书的核心在第 5 章，是关于经济均衡存在性的说明，把前两章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联系起来考虑。为了说明经济这一中心概念，先引入总资源概念，把经济定义为 m 个消费者、n 个生产者（分别由偏好及生产集刻画）和总资源。一个经济状态就是对每个主体人行动的一个说明；若每个经济主体人的行动对各自说来是可达的，并且这（m+n）个行动与总资源不矛盾，则称此经济状态是可达的。第 4 节用定理的形式对可达状态的集合进行了表达。然后考虑了消费者拥有资源并控制生产者的私有制经济。对一定的价格系统，每个生产者使其利润极大化。利润要分给消费者——股东。这便确定了后者的财富，并在财富约束下，他们满足其偏好。作为该过程的结果，每个主体人选择一个行动。这（m+n）个行动并不必然与总资源相容。如何找到使它们相容的价格系统呢？第 7 节通过定理的形式，对此给出了答案。在此之前，德布鲁在第 6 节给出了存在性定理有关的数学结论——不动点定理。这一后来称为基本引理的结论，非常适合于德布鲁在《价值理论》一书中采用的证明均衡存在性的新方法所谓“超需求函数方法”。这章最后是关于存在性证明的详细讨论，它照例是精采之作。定理证明的中心思想：随着商品价格的增长，对应的超额需求呈减小趋势，它促使人们在设法减少正值超额需求时，把价格系统的重量放在超额需求最大的那些商品上。本章的注释中还概述了主要定理的不同扩展。

六、福利经济学与不确定状态下的经济运行

本书第 6 章叙述并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在前一章证明均衡的存在性之后，再证明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更符合逻辑严格性。

在第 7 章中，作者推广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经济运行状态的早期讨论。这一章把分析扩展到由不确定事件确定消费集、生产集、经济资源配置时的情况。现在，关于商品转让的合同，除了要指定商品的物质属性、商品所处时间和地点之外，还要指定转让视之而定的发生的事件。利用这个关于商品的新定义，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不受任何概率概念的影响，并且形式上与前面几篇发展起来的确定性理论是等同的。

（据美国威利出版公司 1959 年版。中文版由刘勇等根据 1959 年英文版本译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刘 勇撰

作者介绍

德布鲁，法裔美国经济学家，198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数学教授。德布鲁的主要理论贡献有：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度量，概括帕累托的最优理论（福利经济学）、具有相关商品的均衡存在性（一般竞争均衡理论）、用效用函数表示偏好次序关系、总量超需求函数（效用和需求理论）、经济核的收敛定理等。50 年代初，他与合作者通过建立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拓朴学集合论基础，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场革命。此外，德布鲁首倡的一般均衡分析领域，已成为大部分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的统一构架。他使用的公理化方法已成为西方经济分析的标准形式。70 年代以来的资本理论、区位理论、金融理论、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理论等，均从他的一般均衡理论概念、思想和新加入的工具中获益匪浅。德布鲁的主要著述有：《价值理论》（1959）、《数理经济学——德布鲁论文 20 篇》（1983）等。

[美] 丹尼森，爱德华·富尔顿
Denison, Edward Fulton

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与我们面临的选择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 (1962)

本书为英文本，1962年由经济发展委员会出版。

本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率远远落后于西欧（除英国外）、苏联和日本，这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丹尼森从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资料入手，分析研究了增长的各种因素，提出了一些独树一帜的见解。本书是丹尼森关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一系列著作的开篇之作，着重分析了190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丹尼森在本书中把对增长发生影响的因素归为7种：就业人数及其年龄—性别构成；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多少；资源的再配置；规模经济；知识进步。这7种因素又可分为2类：前4种属于要素投入量；后3种属于要素生产率。以下分两部分对全书主要内容作一简介。

一、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因素

丹尼森认为，要素投入量的组成一方面是劳动投入量，另一方面是资本（包括土地）投入量。

1. 劳动投入量

劳动投入量的数量就是就业人数。据丹尼森估计，1929—1947年美国就业人数增加870万人，增长21.2%，年均增长1.07%；1947—1969年增加1300万人，增长26%，年均增长1.06%。而劳动投入量的质量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由于劳动时间的缩短而引起的劳动投入量的质量变化。丹尼森认为，在美国，每周工时的缩短通常不会同比例地减少产量，但劳动时间缩减1%将平均减少每个劳动者产量的0.6%。所以，从1929年以后，在美国缩短工作日必然遭受减产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还会逐年增大。因此，在估计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时，要调整或校正由于劳动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偏差，具体方法是在就业量的增长率中减去工时缩减所引起的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降低的百分率。

第二是由于成年工人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引起的劳动投入量的质量变化。丹尼森认为，个人受教育的情况，是能否担任某项工作和熟练掌握特定业务技术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能把高中毕业的工人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等同于只受过初小教育的工人的贡献。因为美国劳动者受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都在迅速提高，从而增长了国民收入。所以，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但成为促进过去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有可能通过教育途径来改变未来的经济增长。丹尼森认为，不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表现在劳动者生产的相对价值或边际产品的差别上，另一方面反映在他们

收入的差别上。不过，这里所说的教育因素，只涉及劳动者所受正规教育的年限（量的方面），而不考虑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质的方面）。

第三是由于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投入量的质量变化。丹尼森认为，总工作小时是由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工人所做工时的总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工作小时中性别和年龄构成，即男工和女工的比例以及各个年龄组别所占的比重，都会发生变化。由于不同的性别和不同的年龄在同一工时所创造的价值不同，因此，当年龄—性别构成发生变化时，就会影响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丹尼森的具体计量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根据每一年龄—性别组的平均收入确定其影响增长的权数；第二步再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工时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对劳动投入量的影响指数。

2. 资本投入量

丹尼森认为，资本投入量有两类：一类是存货的投入量，另一类是非住宅性建筑和设备的投入量。存货包括原料、在制品、成品、零件、谷物和牲畜等。每年存货的价值以期初和期末的平均数表示。而非住宅性建筑和设备的价值则分别计算它的原值和净值。

丹尼森把土地也归在资本投入量内。不过，他认为，美国的领土面积是既定的，因此土地的数量不变。地区的开发是资本投资的增加所带来的交通条件建立的结果，深层矿藏的开采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这些变化都不意味着土地投入量的增加。所以，土地投入量在任何时期内都是不变的。

至此，丹尼森已经分别说明了劳动、存货、非住宅性建筑和设备以及土地这 4 种要素投入量的指数计算方法。那么，如何求得一个总的全部要素投入量的指数呢？他根据生产三要素理论，认为在国民收入中，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由此可求出报告期工资、利润和地租在基期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然后，用这些百分比作为权数乘以报告期内各种要素投入量的指数，乘积加起来被 100

(代表基期国民收入)除得的结果，就是报告期全部要素投入量的指数。该项指数以 1958 年的为 100。

二、经济增长的要素生产率因素

根据丹尼森的计算方法，假定全部要素投入量增加 1%，则产量也将同比例增加 1%。可实际上产量的增加率要大于 1%，产量增加的超出部分，丹尼森称之为“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变化”。他认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决定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变化的增长因素——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往往要大于要素投入量所作出的贡献。经济增长的要素生产率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资源的再配置

丹尼森所谓的资源的再配置，主要是指两种人力资源配置的改善。第一种是指农业上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中去；第二种是指非农业的自我独立经营者和在那些本小利微的小企业中参加劳动但不领取报酬的业主家属，转移到其他企业中去。

丹尼森指出，在美国，农业劳动力占劳动投入量的比重 1929 年为 22.7%，到 1969 年只占 5.1%。这说明以往农业中配置的劳动力过多了，同时也说明，后来农业劳动力配置不当的情况有所改善了。丹尼森以 1963—1964 年美国农业人口转移的实际情况，来说明资源的再配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他通过计算而得出：1963—1964 年由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使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减少了 0.12%，而使非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增加了 0.43%，显然，总共使国民收入增加了 0.31%。

接着，丹尼森又通过具体计算，又得出一个结论：业主家属成员的再配置也会使美国国民收入有所增加，约为 0.06%。

2.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产量增加、成本降低以及企业收益的提高。规模经济可分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但它们都和市场规模的大小有关。因此，丹尼森根据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理论，用市场范围的扩大来表示规模经济。

丹尼森认为，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的扩大就有机会提高各行业和各企业的专一化程度，扩大企业规模，同时也不会减弱能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的竞争压力。所以，规模经济决定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扩大则反映了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国民收入的增长又是前面分析过的各种增长因素所作的贡献。

基于这些分析，丹尼森对规模经济对增长的贡献作了估算，结果表明，当国民收入增加1%时，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约等于国民收入增长额的10%，即这时的国民收入总共增加1.1%。在制造性企业领域里，规模经济效应要更强一些，国民收入增加1%时，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约等于该部门国民收入增长额的12.5%。

3. 知识进步

丹尼森认为，持续长期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和最基本的要素生产率因素是知识进步。知识进步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进步，还包括从国内和国外的有组织的研究、个人研究发明，或者是简单的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知识进步与其他增长因素不同点在于，任何一个地方的知识进步会很快地扩散到所有先进国家。因此，就长时期来看，美国很难指望通过加速知识的进步来取得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据他估算，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知识进步因素，假定其中50%是来自美国国内，也是满打满算了。也就是说，来自美国国内的知识进步因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重要的。

丹尼森明确指出，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无法直接估算的，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剩余”来估算，即从经济增长率中减去所有其他增长因素的贡献后，剩下来的部分就是

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据 1962 年经济发展委员会出版英文本） 肖生译撰

作者介绍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以及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应用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与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增长率为何不同：9 个西方国家战后的经历》(1967)、《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29—1969 年》(1974)、《日本经济是如何高速 增长的?》(1976) 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核算》(1979) 等。

［英］多布，莫里斯·赫伯特
Dobb, Maurice Herbert

经济增长与欠发达国家
Economic Growth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1960）

本书系英文版，1960年由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共64页，分6个部分：增长的事实；不发达国家为什么增长被抑制；苏联的发展；投资中的一些问题；对几个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结论。以下就按这6个部分将本书内容作一些介绍：

一、增长的事实

经济进步或经济增长只是现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人类社会几乎是停滞不前的。伴随着大机器和工厂生产、技术革新、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的到来，人类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得到了改变。在短短的100年的时间内，世界的工业总产量增加了30到40倍；而同期内世界人口仅增加了2倍多。因此，世界人均工业产量增加了15倍到20倍。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是有差

异的。总体上说来，老牌工业国家比新兴工业国慢。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几个主要工业国的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为：英国约2%；法国约3%；德国、意大利、美国约5%；瑞典和俄国约6%。资本主义发展后期阶段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出现减慢的趋向。例如，英国1820—1860年间平均增长率高于3%，而在1860—1880年期间，则勉强维持在2%。又如，在1913—1958年期间，法国降为2%，德国降为2.4%，意大利、瑞典和美国降到3%。然而，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在同样的45年期间平均增长却是5.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增长速度普遍降到一个低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有些国家（特别是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甚至出现了异常的高速度。然而美国的增长却在放慢，1953—1958年增长速度还不及1947—1953年的一半。尽管工业增长速度在放慢，但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也在放慢，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后期，人均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变化并不大。

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情况的差异之后，多布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波动性或间断性，另一个是资本品工业部门的增长快于消费品部门的增长。那是因为，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封建势力和习惯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所以缺乏吸引私人资本家进行工业投资的国内市场；缺乏国家综合的发展计划和将之付之实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国家对工业的投资极不稳定，也无法吸引资本主义企业家。由于丰厚利润的吸引，私人资本大都投资于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和奢侈品进口贸易）、土地买卖、投机和建筑豪华住宅。

二、不发达国家的增长为什么被抑制

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大都是依赖一、二种初级产品，而初

级产品出口的收入弹性低，价格不稳定，发展潜力不大。因此，不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此外，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和就业不足；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难以提供城市发展工业所需要的食物，形成了工业发展的“瓶颈”。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低生产率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了生活水平低下和营养不良，这样又必然引起高死亡率和低工作效率。

多布认为，只有通过工业发展的计划化，不发达国家才有可能摆脱贫困，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发展计划只会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不发达国家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它得到全面的发展，最后彻底摆脱贫困。

三、苏联的发展

苏联建国以后，首先经过了一段经济恢复时期（1917—1927 年），然后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28—1932 年），接着又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 1928—1962 这三十五年期间，尽管经历了使苏联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的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迅速。年均工业增长速度高达 10%，农业生产仅在 1953—1960 年的几年时间内就提高了 60%。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急剧地缩小了。

当然，苏联经济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尽管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但只是零星的和落后的，整个经济仍以十分落后的农业为主。建国后，为了摆脱落后的经济状况，就必须迅速实行工业化。而实行工业化又需要大量的钢铁、电力和机械。若靠进口来解决，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它不得不采取了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政策策略。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外汇需要量，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即使如此，工业发展的初期仍需要进口一些必要的技术设备，于是苏联还得大量出口农产品及其他初级产品，加之工业的发展也同时需要大量的农产品供应，结果，落后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已构成工业生产发展的“瓶颈”。为了大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实行发展个体农民的政策是不可行的，因此就搞了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一方面解决了农产品供应问题，同时也铲除了农村资本主义复苏的危险性。

四、投资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一部分中，多布主要针对投资率、资本系数概念，以及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其全社会资本——产出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投资率是当前投资在总收入或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投资有两个概念，一是净投资，另一是总投资。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包括由于补偿损失的资本的再投资。无论是净投资率或总投资率的变化，都会导致增长率的变化。但投资率无法反映新设备取代旧设备时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化。

(2) 资本系数或资本—产出率。这个概念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一定生产线上所占用的资本价值量与其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产品价值量之间的比率。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时期资本系数往往不相同。某一国家的总资本系数反映了该国的现有资本与产出的总体关系。总资本系数有赖于该国所偏重的产业的资本系数高低。西欧和美国的资本系数大致在3至4之间，亚洲的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分别为4.7、2.3、2.3。

(3) “增长速度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系数”。多布认为这一理论是荒谬的。采用这种方式计算增长速度，只能产生悲

观的结论，即得出只有通过引进外国资本和接受外来援助才能打破落后与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理论的意思是指，不发达国家必须先压缩消费，从而提高投资率，最后才能获得迅速发展。然而问题在于，不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本来就十分低下，不可能继续压缩。而且由于不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度收入不均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度贫困与寄生性、浪费性消费并存，因而一般意义上的压缩消费是不可行的。此外，这一理论是种静态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样，上述论点就站不住脚了。

五、几年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经济学中曾流行着这样一种理论：不发达国家缺乏资本而存在剩余劳动力，因此，应把新投资同剩余劳动力就业结合起来，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由此还可以引伸出，投资不应该用于购置贵重的机器和最新的生产流水线，而应该用于购置最便宜的工具以装备更多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购买少量的拖拉机或收割机，而要经济地配置大量的铁锹，以便在低水平的生产率基础上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一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边际生产力论和比较成本学说，按照这一理论而制定的发展顺序必然是：首先发展需要资本少的初级的即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资本逐渐有所积累，才能开始发展一些技术程度较高一些的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最后加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之中，这时就能生产资本品并进口食物、原材料甚至一部分工业消费品。这一理论是原始的、渐进主义的，也是一种静态的观点。苏联的经济实践实际上有力地否定了这一理论。

六、结　　论

多布认为，发达与不发达是相对的。工业国家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不发达。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没有剩余劳动力；不发达国家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实际上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老牌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发展得越来越慢，其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军费开支的庞大。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陷于停滞不前、落后与贫困的同时，社会主义计划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据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 1960 年版）
马莙华撰

作者介绍

多布，英国经济学家。曾长期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高级讲师。多布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在理论上他对新古典理论持否定态度，而试图建立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框架。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晚年，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他研究的重点。多布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进步》（1925）、《1917 年以来苏维埃经济的发展》（1928、1966）、《经济学家马克思》（1943、1975）、《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经济增长与欠发达国家》（1960）、《经济增长与经济计划论文集》（1960、1969）和《亚当·斯密以后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等。

［美］多马，埃弗赛
Domar，Evsey

经济增长理论论文集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1957）

本书汇集了多马在 1944—1956 年间写的 9 篇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的重要论文。以下逐一进行介绍。

一、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此篇相当于全书的绪论。多马在文章中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和熊彼特等，都曾给予一定的重视。"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往往偏重于生产能力，而把需求假设为既定的；相反，凯恩斯主义者却往往对于生产能力问题不予过多的考虑。多马的观点是，增长问题的研究既不能忽略供给，也不能忽略需求。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需求方面

由投资和消费组成，政府和折旧等其他因素不考虑；供给方面将资本作为创造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等则仅仅被看作是影响资本生产率的因素。

多马认为，“一个在静态体系中是正确的结论，用到一个增长中的体系时就变成错误的了。”例如，关于资本积累必然要降低利润率；国外投资的出超将逐渐被还本付息而产生的入超所代替；以及重置等于折旧等观点。所以，必须从经济增长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只要生产能力的增量与投资有关，总需求的增加与投资增长率有关，那就需要收入和投资的不断增长，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如果进一步发现资本额与产量的关系取决于产量的增长率和储蓄倾向，所以一旦某一收入增长率能保持资本与产量的平衡，那么，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储蓄过度与储蓄不足、利润率下降和投资机会消失等问题均可得到解决。所以，“经济稳定将成为经济增长问题的一个特例。”

二、“债务负担”和国民收入

本书的第 2 篇论文主要从政府赤字预算的角度来研究增长问题。

多马在此不是只比较债务和国民收入的大小，而是力图在作为因变量的债务和作为自变量的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函数关系，即将债务对收入的比例作为收入增长率的函数。

多马认为，借助于税收方法鼓励私人投资和通过各种计划降低储蓄倾向，并不能十分有效地达到充分就业，因此赤字财政政策仍须继续施行。那是因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的上升有倍数作用。如果政府借债开支 100 美元，增加利息负担 2 美元，而使国民收入上升 300 美元的话，那么，债务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

当国民收入保持不变时，困难不在于赤字财政本身，而

在于它能不能够提高国民收入。要提高收入，投资支出就不能保持不变，而必须增加；当国民收入按不变的绝对率增加时，收入上升愈快，税率就上升愈慢。假如失业阻碍了国民收入作较快的上升（如按不变的相对率上升），补救的办法很简单：投资支出应以较快的比率进行；当国民收入按不变的相对率增加时，纵然较迅速上升的收入引起较大绝对量的债务，但收入增长的比率越大则税率将越低。所以，即使政府不断地借债，税率也不会无限制地上升，而是接近一个相当合理的极限；当经济处于战争时期，债务增长很快，而和平时期增长较慢，但它的平均增长率将仍然接近于收入增长率，因此平均税率将仍然接近于一个常数。多马由此惊叹道："收入按不变相对率增长的威力是如此强大，致使我们能每 30 年从事一次 5 年之久的战争，而结果产生出一种比继续和平时还低的税率，只是国民收入按不变的绝对率增长罢了！"

所以，多马认为，债务负担问题是一个收入扩张问题。要使国民收入按一定的比率增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公私货币支出总额按国民收入增长比率增长；第二，支出总额中，应有足够的数量用于生产效率的增长方面，以获得必需的货币支出而物价不上升。总之，收入增加越快，债务负担就越轻。

三、投资和就业

本书的第 3 篇"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和第 4 篇"扩张和就业"，都是围绕投资和就业问题，来研究保持充分就业所要求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问题。其中第 3 篇技术性强些，第 4 篇较通俗些。这两篇是全书的精髓所在。多马在此提出了自己的增长模型。这一模型与哈罗德的增长模型相似，因而被后人合称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多马认为，这两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弥合或缩小由于

凯恩斯对投资的独特处理而在收入和就业理论中留下来的缝隙。根据凯恩斯的分析，在短期中，投资只是通过其倍数作用而创造收入的工具，这样就抹杀了投资对形成生产能力的作用；在长期中，投资的属性仅被归纳为有益于资本总量的扩大，这样又忽略了投资对创造收入的作用。多马认为，“这种认为投资在一具体时期内只有一种属性的奇特看法，使凯恩斯的短期理论保持不必要的静态，而由于过去资本积累使投资机会近于枯竭，他的长期分析又把他推向静态的沙漠中。”

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投资具有二重性：从供给方面看，投资能够增加生产能力；从需求方面看，投资又能创造收入。投资的二重性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方程式提供了供给和需求的两边。方程式的一边代表收入的增加，即需求的增加，数量表现为投资增量除以储蓄倾向，以 $\Delta I^1/\alpha$ 表示，这正符合凯恩斯的投资对创造收入起倍数作用，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投资增量的函数的理论。方程式的另一边代表生产能力的增加，即供给的增加，数量表现为投资存量乘以潜在的社会平均生产率，以 σ 来表示。显然，方程式的两边均有投资，在需求一边，投资通过倍数（$1/\alpha$）的作用而创造收入；在供给另一边，投资增加社会平均生产率（σ）。这就是投资二重性在方程式中的表现。

多马认为，当经济处于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时，供给等于需求，即投资增量除以储蓄倾向等于投资存量乘以潜在的社会平均生产率，方程式表示为等于：$\Delta I/\alpha = I\sigma$。这就是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解出这个等式就可得到我们所需的维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增长率。把等式两边都乘以 α 并除以 I，等式一边就成为 $\Delta I/I$，即投资的年增量除以投资存量，也是投资的年增长率；等式另一边就成为 $\alpha\sigma$，即储蓄倾向乘以潜在的社会平均生产率，由于储蓄倾向和潜在的社会平均率，均可看作常数，所以 $\alpha\sigma$ 是一常数。所以，要保持充分就业，投资增长率必须按一常数（$\alpha\sigma$）增长。这是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政策含义。

由此，多马总结道，按凯恩斯的说法，昨日的储蓄就是今日的投资，这是不够的。今日的投资必须超过昨日的储蓄。同时，还不能没有货币窖藏，货币必须年年有注入，而且这种注入必须绝对地按加速率进行。

最后，多马进一步论述道，假如 α 和 σ 是可变的，经济增长似乎可以通过降低储蓄倾向或加速技术进步来维持，“但必须记住，技术和储蓄都不能保证收入上升。它们所能做的是把取得收入增长的权力和能力置于我们手中。正如任何权力一样，它可以为福也可以为害，这要看对它如何使用，储蓄和技术进步，可以形成挫折和失业，也可以形成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这要看我们的经济政策如何了。”

四、资本积累问题

多马的增长模型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如果货币对经济的注入必须年年增加的话，会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或者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投资机会枯竭呢？本书的第 5 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多马将导致利润率下降，或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投资机会枯竭的资本积累称为“超额资本积累”。他认为，若随着资本的积累，收入也获得增加，而对货物需求的收入弹性一般是正的，这就说明未来的投资机会是存在的。所以，关键是要找到对投资展示机会的收入水平应多高及国民收入增加应多快。多马认为，这样的收入增长率（$\Delta Y/Y$）等于储蓄倾向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乘积（αS）。因为，收入增量（ΔY）等于资本增量乘以资本边际生产率（S），而资本增量等于收入乘以储蓄倾向（$Y\alpha$），所以有：$\Delta Y = Y\alpha S$。因此有：$\Delta Y/Y = \alpha S$。国民收入每年按 αS 的比率增长，就不会有超额资本积累产生。

马多承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S）是不稳定的，若再加

入政府，情况将变得更复杂。所以他说："假如政府的行动可能因害怕赤字而胆怯，同时实业界的预期也因而低落，这样就不会有很多的投资，而大量的赤字事实上即可能成为阻止大量失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政府勇敢地宣布其目的，并伴以实现的决心，即可能因此唤起足够的投资而使赤字成为不必要。"

五、国外投资对收支差额的影响

本书第6篇的逻辑结构和叙述内容类似于第2篇"'债务负担'和国民收入"。

从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结果来看，国外投资与国外赠与相比，前者的作用日益重要。那是因为，国外投资能够弥补美元的长期缺乏，创造就业机会，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但是，贷款和投资都需要还本付息，一段时期以后，就有可能使资金的流入（还本付息）超过资金的流出（国外新投资）。多马认为，国外投资也要求有一个合适的增长率，而且国外投资的增长率在本质上与国内投资所产生的问题是一样的。

多马提出，资金流入（利息和还本）对资金流出（国外新投资）的比例作为极限将逐渐接近于还本率＋利率/还本率＋增长率。从作为分母的增长率看，国外新投资增长得越快，资金流入对流出的比例就越小。资金存在不存在入超的现象完全取决于增长率和利率的相对量。假如增长率超过利率，比例小于1，资金入超不会有；假如增长率低于利率，比例大于1，资金入超不可避免。

因此多马认为，要使国民经济增长，就必须使每年的国外投资继续保持超过还本付息的数量，即国外净投资永远要保持正数，因为国外投资同国内投资一样，也能发动经济，提供就业机会。他认为，每年以国民生产增长比数的1%或2%从事国外投资，就会自动地形成投资流量的不断增长。

六、折旧、重置和增长

本书第7篇从折旧和重置来探讨投资和资本的增长。以前所述的多马模型都是假定折旧已经扣除，而在本篇中，多马则先假定总投资的某个增长率，然后观察它与重置及折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重置是和过去的投资有关的，并带有一个时间间隔；折旧是现有资本额的一部分；现有资本额又代表着过去投资和积累。一般来说，增长率在决定这一切关系的动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经济是增长着，所以，现有资本额大于初始资本额，因此也就有：折旧大于重置。所以，不能再认为折旧与重置是相等的了。传统静态经济分析历来将折旧看作是与重置相等，它没有考虑到经济是增长着的，经济现象看作一种无限的过程，投资又是一个可变的流量。

多马最后认为，经济学中大大忽略了重置和折旧这个题目，相反，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重置和折旧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美国约有50%的投资支出是作为重置之用，在1929—1940年和1947—1951年期间折旧费以几乎接近于1的比例而超过了私人储蓄。对此，政府的公共政策运用的潜在力是十分大的。

七、加速折旧问题

本书的第8篇讨论了加速折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多马认为，要使经济获得增长，就应推动新企业的发展，而政府的租税政策应该以此为目标。简而言之，就是要找到一种能使增长中的企业（尤其是新企业）减轻一部分税赋负担

的办法。当然，对新厂商直接免税是不现实的，而且似乎也无法使税率成为厂商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必须寻找一种间接的途径。他认为，加速折旧可能是解决的办法之一。因为，加速折旧会间接地给与新厂商以减税的好处，降低了投资的危险，鼓励了投资活动。他还认为，有人建议，对于落后地区需要的国外投资，可以在最初的几年内全部给予免税，而加速折旧不需要任何特殊规定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加速折旧的作用要注意应时而宜。当利润高则需要税收优惠的时候，加速折旧会鼓励投资；当萧条期间无利可图时，加速折旧将变得无效，甚至还有害。

八、苏联的增长模型

本书第9篇是全书唯一的使用微分方程体系来说明问题的论文。它以苏联1928年《计划经济》杂志所载菲德尔曼的论文为对象，评述了苏联的经济增长理论。多马认为，菲德尔曼的论文，作为一篇数理经济学论文和一个增长模型，是很动人的，对了解苏联经济发展也挺有用。但是，菲德尔曼把经济分为生产资本品工业和生产消费品工业两大部类，会在理论上产生混乱。尽管菲德尔曼的模型是由一个经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推导出来的，他使用的变量也与多马不同，但只要在他的模型中加入利息一项，得出的结果就很接近多马的论证了。

多马根据菲德尔曼模型提供的材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较高是由于把资本系数定得很低，而把储蓄倾向定得很高。

(据英国牛津大学1957年版，中文本由郭家麟译出，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肖　生　张冀明撰

作者介绍

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奠基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与罗伊·哈罗德的研究成果一起，被人们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多马的主要著作是：《经济增长理论论文集》(1957)。此外还有：“论技术变化的测量”(1961)、“作为生产合作社的苏联集体农庄”(1966)、“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起因：一个假说”(1970)和“论社会主义管理人员的最优补偿”(1974)等论文。

[美] 道格拉斯，霍华德·道格拉斯
Douglas, Howard Douglas

工资理论
(THe Theory of Wages)

《工资理论》是道格拉斯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经典性著作。该书 1934 年由美国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全书共分 20 章，639 页。其基本内容包括 4 个部分。

一

第一部分论述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重点是作为分配理论基础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第一章为“工资及一般分配问题”，论述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分配问题是从生产中发展而来的。在自给自足阶段，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经济中只存在生产问题。到了手工业阶段，除生产之外还存在着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比率问题，从而产生了分配问题。随着分工的发展，各阶层的实际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分配，而且取决于影响生产与价值的因素。在分配问题中，工资、利息与地租的决定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部分取决于其他要素的收入份额。不仅每一种要素的生产率都部分取决于现存的其他生产要素数量，而且每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也部分受其他要素收入份

额的影响。因此，研究工资理论必须同时研究利息理论与地租理论。在研究工资理论时应区分契约工资与工作收益，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以及工资率与收益。

第二章为“生产理论的发展”概述了自斯密以来的生产理论，重点是边际生产率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屠能。他最早抛开地租的影响，研究制造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认为，工资（或利息）率由最后一单位劳动（或资本）所增加的产量决定。在屠能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英国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意大利经济学家巴伦尼等都对边际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发展。但对这一理论贡献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J·B·克拉克。他认为，只有当工资率等于其边际生产力时，劳动的供求才能相等。若工资率高于其边际生产力，则劳动的需求减少，出现失业，失业引起工资率下降；反之，工资率低于其边际生产力，则劳动的供给减少，出现劳动力短缺，这又引起工资率上升。利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这一理论，工资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如果某一主要行业的生产率提高，则全社会的工资增加，这促使人们向效率高的行业流动，直至各行业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在同一社会中边际生产力有趋同的趋势。以后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和J·罗宾逊还提出了相对替代弹性的概念，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更为精确。但是，他们未能考虑到充分就业时弹性的变化以及递减的生产成本和供给弹性的作用，从而使边际生产力概念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运用也较为复杂。

第三章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明显的假设与暗含的假设。明显的假设是静态的社会，即人口、资本、工业技术、工业的现存形式以及需求都不变。克拉克认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只适用于这种静态假设。但道格拉斯认为，这种假设与现实差距太大，事实上，在不那么严格的条件下，这一理论也适用。暗含的假设包括：雇主能够衡量并估计增加劳动对效率产生的影响；雇主在获得劳动时可以进行自由竞争；劳动者知道本身的边际生产力；工人之间存在着自由

竞争；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资本的闲置；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失业；劳资谈判力量相等，劳资谈判决定了劳动市场的状况与工资协议条款。道格拉斯认为，这些假设尽管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第四章为“对递增的生产力及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的归纳性研究”，概述了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及新古典学派在这方面的贡献。其基本内容是，短期内生产要素的数量取决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两者相等时，供求达到均衡，长期内价格的决定取决于供求曲线的相对斜率。

二

第二部分论述著名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检验，包括第5—8章。

第五章为“1899—1922年间美国的劳动与资本对生产的影响以及递减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相关研究”。这一章根据1899—1922年美国的有关资料设计一个公式，以显示劳动与资本对生产间的各种关系的型态，找出该公式所用的常数值，并用实际资料验证。研究表明，如果资本量不变，则美国制造业的劳动量每增加1%，则使工资率下降0.25%，物质产品增加0.75%；反之，如果劳动量不变，则资本量每增加1%，可使利率下降0.75%，物质产品增加0.25%。道格拉斯与数学家科布合作，得出了著名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P'(L\cdot C)=BL^{k}C^{1-k}$$

并计算出b=1.01，k=0.75。根据对实际资料的验证，这一结果是与实际一致的。

第六章到第八章都是根据实际资料来验证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第六章为“根据1890—1926年马萨诸塞州的数据验证的生产理论”。这种验证证明了，在资本量不变时，劳动量每增加1%，可使物质产品增加0.74%；在劳动量不变时，资本量每增加1%，可使物质产品增加0.26%，这一

结果与全国的情况十分接近。第七章为“以新南威尔士的数据为例的生产理论”。这些数据表明，劳动与资本的份额分别为0.65与0.35%，这与前两种研究的结论也大致吻合。第八章“实际分配过程中能反映明显的生产规律吗?”与第九章“生产理论特征的进一步探讨”，又以实际数据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了进一步验证，并引入流动资本和生产进步等因素，使这一函数更加完善。

三

第三部分研究劳动、资本与自然资源的供给曲线，包括第10—19章。

第十章为“相对供给弹性的理论含义”，分析了不同情况下生产要素供给弹性与收益的关系，共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工业效率提高。这时增长幅度最小的要素，单位收益最多；两种要素的供给弹性之差越大，弹性小的要素收益大；当弹性系数为负的要素供给量大于弹性系数为正的要素时，存在一种累积的过程，使前者的收益增加。第二种情况是工业效率下降。这时供给弹性越大的要素损失越小，减少后余下的部分还可以转嫁给另一种要素。从单位收益的角度看，最好的保护措施是大幅度减少供给。由此得出，要保证某种生产要素在繁荣时收益最大，萧条时损失最小，它的供给弹性应在目前的收益点上相当大，在该点之下弹性相当小。第三种情况是劳资谈判力量的改变。这时，供给弹性越小的要素，从谈判力量改善中的获益越大；对方的供给弹性越小，对谈判力量改善的要素就越有利；生产要素的份额与单位收益是否改变，仍要取决于生产函数的形式与性质；谈判力量增强的要素应尽快增加供给，尽慢减少供给。第四种情况是生产要素供给的决定。生产要素的相对供给量变动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供给弹性及其在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综上所述，生产要素在产品中的相对比例不影响最终结果，相对供给弹性决定着供给变动的方向和程度，一定的效率变化也会

影响最终的均衡。

第十一～十六章论述劳动的供给曲线。在第十一与第十二章中分别从雇员的构成与工作时间分析了劳动的短期供给曲线。作者先概述了以往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然后对英美两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实际工资与不同年龄和性别组的雇员所占比例进行了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短期劳动供给曲线向下倾斜，雇员数量对实际收入变化的弹性为－0.16。在相应期间，工作时间与工资率的弹性系数在－0.2～－.16之间。由此得出三个推论。一是小时工资每增加1%，劳动供给将减少0.25～0.33%，反之亦成立。三是如果只考虑工作时间，则收入的需求弹性在－0.9至－0.8之间，若同时考虑到雇员的构成，则该弹性在－0.67～－0.75之间。三是在美国工人增加的工资中，约有$\frac{2}{3}$～$\frac{3}{4}$用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frac{1}{4}$～$\frac{1}{3}$用于增加闲暇。

第十三～十六章研究劳动的长期供给曲线。第十三章为“人口问题研究者眼中的长期劳动供给，论述了影响长期劳动供给的不仅包括影响短期劳动供给的因素，而且包括人口增长的数量与比率。作者介绍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以来的人口学家对人口增长与劳动供给关系的观点。第十四章为“各国人口的长期变动”，运用欧美十个国家的人口变动资料说明了，实际工资提高将导致净生育率下降，劳动的长期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它是时间的函数。第十五章为“劳动长期供给曲线的数量决定法”，对上一章的结论进一步加以论证，并得出三个推论。第一，在工人尚未实行节育的阶段，即使实际工资增加，出生率也没有明显下降，有时反而上升。第二、节育措施推广之后，出生率与人口将增长率都下降。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工资的增加总会伴随着人口净增长率的下降。第十六章为“根据各经济阶层不同出生率与人口净增长率而确定的劳动的长期供给曲线”，论述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根据对欧州城市中各阶层的出生率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中期，各阶层的出生率相差不大，但以不熟练工人阶层最高；十九世纪

末期，这种差距拉大，其原因是上层社会采取了节育措施，而中下层尚未普及；二十世纪初，随着节育措施在各阶层的推广，出生率差距缩小，绝对水平下降。这表明，长期劳动供给相当稳定，且略有上升。

第十七～十九章研究资本与自然资源的供给曲线。第十七章为“经济学家眼中的资本供给曲线”，是对以前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供给曲线论述的概念。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资本供给在短期内相当稳定，每年的变化很小。第二，利率为零时也会有一定的作为资本的储蓄。第三，百分之二以下的利率会鼓励滥用现期资本，这会减少新增储蓄量，从而使资本总供给低于原来的水平。第四，利率与个人储蓄基金成正相关。第五，收入不变时，利率与储蓄率成正相关。第六，公司在既定利率下的储蓄多于个人，因此，资本总供给曲线位于个人供给曲线的右方。第七，收入不平等对储蓄的影响尚不明确。第八，除非利率极低，否则资本总供给将持续增加。第九，利率为2%～6%时，其储蓄弹性小于一。第十八章为“资本供给曲线的数量决定法”，说明了资本的供给表现为存量，并非流量。它的更新与折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不能指望利率变动会立即引起资本供给量的变动，而应通过新增资本的注入对其产生影响。流量变动时，总量将以较小的幅度作同方向变动。对实际资料的研究证明了，利率与资本增长率成负相关，但相关系数非常小。第十九章“土地与自然资源的供给”。在简要介绍了前人有关论述后指出，从长期看，土地供给曲线向上倾斜，弹性远远小于一，从短期看，其弹性趋于零。自然资源的供给与此相似。

四

第二十章“总结与结论”，是对全书的总结。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分配过程紧随着生产过程，它精确地反映了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第二，短期内，资本与土地的供给几乎不变，劳动的供给弹性小于零。第三，劳动的短期供给弹性

与收入的需求弹性之和等于 -1。第四，资本与土地不变时，若生产效率提高 10%，则劳动将减少 2.5% -3.3%。这引起资本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增长更快。生产效率降低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增长更快。生产效率降低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则下降较快。第五，如果劳动的谈判力量增强，则它的供给曲线向左方移动，但土地与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减少。高工资使劳动的储蓄量增加，边际生产力提高，这会进一步推动实际工资的增加。相反的情况也成立。第六，劳动与资本在社会产品分配中获得的相对份额极大地影响着谈判与分配的过程。第七，如果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则它与相应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交点就是均衡点；若向右下方倾斜，则没有价格决定点，属于非均衡的情况。第八，资本增长率将远远大于劳动增长，这使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上升，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因此，一般而言，未来对劳动有利。第九，劳动的需求弹性在 -3 到 -4 之间，这表明，在由于工资率高于其边际生产力而引起的失业中，工资率每下降 1%，就是可增加 3—4%，工人总数增长 2—3%，反之亦成立。

《工资理论》是美国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一本代表作，但其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一生产函数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据美国纽约麦克米兰公司 1934 年版）

李　星　撰

作者介绍

道格拉斯，美国经济学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21 年获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参与政府工作。在经济学中对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分配理论有重大贡献。代表作有《工资与家庭》、《美国 1890—1926 年间的实际工资变动》，《工资理论》等。

[美] 达菲，威廉
Duffy, William

比较经济体制
——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 Decision - Making Approach

全书分为三部分 18 章。第一部分“导论”介绍经济体制研究的方法和总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从决策（DIM）角度进行的对体制的分析”介绍比较经济体制的 DIM 方法。第三部分“DIM 方法在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模式中的应用”介绍和分析了对市场和计划的若干模式、经济体制的分类法和经济体制间的趋同。第四部分“用 DIM 方法进行的对实际经济体制的研究”描述和分析了美苏等 8 个国家的经济体制。

第一部分两章，分别为“导论”和“经济和经济体制——理论框架”。作者指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的传统的方法，是按三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立经济模式。在近五十年中，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可塑性选择，经济模式也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了，资本主义被细分为“竞争的”、“财政的”、“调节的”和“福利的”；社会主义也被细分为“自由的”、“命令的”和“市场的”。另外，研究比较体制的主旨发生了变化，人们有了新的信心，认为社会是可以按模式塑造的，从而是可以预

测和控制的。因而，研究集中于：第一，经济体制选择对经济活动的效率有何影响；第二，经济体制本身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作用；第三，分析各种经济和政治的体制同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新左派运动，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方法更趋完善了。这种方法即是 DIM 方法。作者还认为，经济体制是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它同许多其他变数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主要变数有：（1）总的社会经济环境，它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技术水平、国家规模和位置、居民的口味和偏好、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外部影响、气候与自然灾害等。（2）经济体制，它包括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三组互为补充的社会关系。（3）政府政策。（4）经济活动的结果，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其他经济和非经济的结果。（5）评价经济活动效果的标准。（6）经济活动的质量等。作者指出，研究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是：在一定环境和借以评价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标准是既定的条件下，发现不同体制选择的相对优点。

第二部分共 4 章（第 3 章到第 6 章），分别为“决策方法或 DIM 方法的简述”、“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第 3 章概述了整个 DIM 方法，可以作为 4～6 章的导言，或者，如果读过 4～6 章，也可以不看第 3 章。作者所说的 DIM 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决策理论基础上的方法。DIM 是决策（Decision Making）、信息（Information）、动力（Motivation）的缩写。作者认为，决策方法或 DIM 方法是把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建立的对有关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经济现象作出决策的机制。决策过程包括：决策权的分配（决策结构）、向决策者提供使他们能够作出合理决策的信息（信息结构），以及决策者借以实现其决策的机制（动力结构）。

作者对三种结构的论述如下：

决策结构：决策是在若干可供选择的行动中选择其中之一。基本经济决策可区分为生产决策（如何、何时和何地生产）、同目标有关的决策（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决策权，就最基本的意义说，是一个当事人能作出为他自己目的服务

的决策性决定的可能性。决策权力有四个基本的来源：传统、强制、所有权和信息。在现代西方经济中，生产决策的基础是对稀缺 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工业革命之前，土地所有权曾具有对经济权力的优先权利；在工业革命以后，资本所有权成为生产决策权的主要基础。而对信息的支配，在现代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除这四种外，还有一些派生的权力，比如，许多当事人权力的基础是由委任的官员机构中的职位。在经济体制研究中，决策权的分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在实践中精确地描述它很难。在实践中，决策单位有许多种（如个人、家庭、厂商、国家），决策行为在不同当事人之间又有差别，这种差别使中央集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令人感兴趣的是决策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集权的效率问题。洛伦茨曲线是衡量决策权集中程度的一种方法。根据分析，中央集权的决策结构的优点有：（1）体制的指导者有更大的能力实现他们的目的；（2）有更大的可能迅速实现较大的经济结构的转变；（3）有可能对任何决策在多年期的费用和收益进行估计；（4）存在“把外在的经济情况和非经济情况内在化”的可能性；（5）可以集中取得有关经济的更好的信息；（6）能把稀缺资源集中使用于被认为最重要的领域；（7）能做到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而较大程度的分权的优点有：（1）有助于保护个人的政治的、人身的和经济的自由；（2）经济系统免于受中央当局犯重大错误的损害；（3）具有较大的灵活性；（4）可以更多地根据经济而不是政治考虑作出决策；（5）存在发挥主动性和实行革新的更广阔的天地；（6）信息费用低而质量较高。

信息结构：信息结构是收集、传送、处理、储存、取出和分析经济数据的机制和渠道。它的关键作用是给当事人提供信息，以减少同某种环境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息流分为两种：决策者面临的可选择行动的系列的变化；影响这些行动的可能后果的事件的状况。信息流分为纵向（在等级制的上下级之间）的和横向（在等级制中的平行单位、个人之间）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下，纵向的信息流

量主要的，而横向的信息流是市场体制的本质。经济体系参加者中至少有一人能获得一切其他当事人的全部信息时，信息结构是集中的；否则，信息结构是分散的。中央计划部门和完全竞争市场模式是这样的两个极端。信息结构中信息编译的语言问题是重要的。协调是信息结构保证生产决策之间、目标决策之间以及二者之间一致性的职能，它是“决策结构和信息结构的交叉点”。可以用“完全协调”（当事人完全了解其他人的行动和偏好）、“完全不协调”（当事人没有其他人的任何信息）和“较为协调”（当事人能得到至少同眼前有关决策的其他人的较多较好信息）等来评价信息结构。

动力结构：个人目的在动力问题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方面之一，是经济体系的各个参加者目标的和谐共存。如果决策结构是分散的，取得最大利润就是各厂商的“目标”；如果决策是集中的，决策人的目标是这一组织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整体的目标可能与个别当事人的目标发生分歧，个人目标就被列入经济体系范围，转化为内在的变数。动力结构是当事人能够借以贯彻自己决策的机制，即他们能使其他当事人服从自己愿望的方法。动力因素可分为四种：（1）依据传统和习惯义务；（2）诉诸利己主义的考虑；（3）求助于团结的要求，或个人目标对集体共同目标的自愿服从；（4）强制。动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结构。刺激可以分为正面的和反面的，二者又都可以再分为物质利益的和非物质利益的。而刺激结构要有效，就必须同所要影响的当事人的目标相一致。

第三部分共4章（第7章到第10章），分别为“在研究各种理论模式中的应用：市场和计划”、“计划和市场：奥斯卡·兰格的各种模式”、“在经济体制分类中的应用”、“在研究趋同假设中的应用”。作者详尽地介绍了市场体制、计划体制；分析了兰格的各种理论模式，把他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即兰格模式Ⅰ、Ⅱ、Ⅲ；用三个体制结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作为划分各种类别的主要可变因素，区分出传统体制、市场体制、计划市场体制、计划体制的几大类别；

并评述了其他的一些分类方法，如按所有制关系的分类、意识形态分类法，分析了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所有制的作用；并且对趋同假设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作者在此书中提出的分类方法是决策分类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集中于问题的经济方面，有时谈到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可变因素，也只是限于这些因素侵犯经济运行的地方。从理论上说，三种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结构和这三个结构的任何组合，都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基本类别或细目。把充当协调职能的这种结合作为主要分类标准，提出了四个基本类别，在划分类别细目时，有些使用了动力结构。作者列出的"决策分类法"表如下(108页)。

传统		传统体制
市场		
	分散市场	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见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见第十一章 美国)
	集中市场	兰格模式Ⅰ的体制(见第八章) 市场调整中心(见第十四章 法国)
计划市场		指示性计划体制(见第十四章 法国、第十七章 瑞典、第十八章 日本) 看得见的手的体制(见第十五章 南斯拉夫和第十六章 匈牙利)
计划		
	分散计划	兰格模式Ⅱ
	集中计划	兰格模式Ⅲ 中央命令体制(见第七章以及第十二章 苏联) 中央团结型(见第十三章 中国)

第四部分共8章（第11章到第18章），分别为"美国"、"苏联"、"中国"（中译本略）、"法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典"和"日本"。作者在这一部分中用DIM方法具

体分析了8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同时还相应地描述了经济体制运行的环境，说明了影响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介绍了一些有关的新的分析观念。作者认为，美国最接近纯市场体制；苏联最接近中央计划的命令；法国采取了著名的指示性计划，集中的信息代表法国指示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斯拉夫已发展到基本上是竞争的市场体制，工人自治是南斯拉夫体制的基本特征；匈牙利已转变到精心设计的看得见的手的体制；瑞典是私有制和政府计划的有计划市场体制的典型；日本表现为特有的日本式的指标性计划体制，但它在强烈的市场竞争方面更类似于美国。

（《比较经济体制》中译本根据波士顿、伦敦阿林—培根出版公司1976年英文版译出。荣敬本、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　姚开建　撰

[美] 杜森贝里，詹姆斯

Duesenberry，Jamess.

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

(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是杜森贝里提出的消费函数理论——相对收入假说——的代表作。全书共 7 章。我们分四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导言”，是对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假设的批评，这是杜森贝里消费函数理论的出发点。

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根据效用理论，效用理论依靠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是每个消费者在其预算限制线下寻求效用最大化。第二是效用的满足程度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即边际效用递减。对单个消费者来说，一旦效用函数被确定，消费者就会按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决策，其消费行为也就确定了。任何能改变消费者决策的因素的变化都表现为偏好参数的变化。可以用个体偏好来表示每个个体的心理差别。

这种消费者行为理论有一定的经验根据，对现实生活的实际观察表明：人们确实有一种偏好的顺序排列，消费者对

不同商品及不同价格有一种有序的偏好。但这种理论有一个独立性假设前提，即每个人的偏好相对于其他人是独立的，每个人的消费支出不受其他人消费支出的影响，即在效用函数既定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只受消费者本人收入和商品价格的影响。显然，这个假设不能回答每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杜森贝里否定了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独立性假设，提出了偏好相互依赖理论。偏好相互依赖假设成为他理论分析的基础，也就是他的相对消费函数理论的出发点。

二

第二部分是对相对消费函数理论的论述，是全书的核心，包括第二章“消费者选择理论的经验基础”，第三章“储蓄理论的重要性”和第四章“理论与事实”。

人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身体本身的需求和基于文化习惯而产生的需要。每一种需要都可以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来满足，不同形式的商品和满足的不同方式有优劣之分，社会对此也有普遍公认的标准。从心理上说，提高生活水平在于以更好的方式满足需要。这既包括消费更多的商品，更包括质量更高的商品。旧效用理论着重对商品的数量分析，缺乏对商品质量的考虑，因而才有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结论。对高质量商品的追求是现代消费选择特征。

联系消费者决策的机制不是旧偏好理论所说的计划机制，而是知识和习惯的形成。习惯形成在儿童时代已经开始，并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影响消费者习惯形成的有四个因素：（1）身体本身和基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基本需要；（2）实际的经历；（3）此种经历的结果，尤其指在收入经历一段下降后消费者对以前某些支出的后悔；（4）如果不存在后悔的支出，学习将导致消费形式的改变。

各消费者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起消费习惯和原先消费形式的变化。在对导致高消费的各种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出各消费者之间偏好的相互作用。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处于高

质量商品的包围之中，提高消费的动力来自对高质量商品的接触。为了得到这些高质量的商品，只有放弃一部分储蓄。当一个消费者看到其他人都在使用高质量产品时便会对自己原来的消费形式感到不满。这就导致消费者产生提高消费的冲动，从而增加消费支出。这种情况可以称为“示范效应”。

导致高消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社会自身的特点，即社会把提高生活水平作为社会目标，并把这一目标灌输到每个人心中。这个目标已成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这个目标一定程度的满足成为每个人维护其自尊心的基本因素。自尊通过社会地位表现出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又通过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体现出来。这样，一旦高收入集团的人被作为较高地位的人被社会承认，他们的生活水平就成为衡量其他社会成员是否成功的标准。所以说，社会成员维护自尊的动力转化为对消费水平的追求。

社会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会导致高消费。社会地位的高低是一个连续的序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追求而进入高一级的社会地位。在这种追求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必然出现高消费。

以上情况说明，消费者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每个人都在与他交往的人中进行生活水平的比较。与高社会地位、高消费支出的人的比较会导致消费增加。所以，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本人，而且也取决于其他人的影响。

在不考虑消费者偏好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_i = u_i\ (C_i) \qquad —— (1)$$

u_i 为第 i 个消费者所获得的总效用，C_i 为其消费支出。该式说明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其消费支出。

如果考虑消费者偏好的相互作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_i = u_i\ \left(\frac{C_i}{\sum a_{ij} C_j}\right) \qquad —— (2)$$

C_j 是第 j 个消费者的消费支出，a_{ij} 是第 i 个消费者对第 j 个消费者支出的加权数，$\sum a_{ij} C_j$ 为其他消费支出的加权平均数。它说明一个消费者的效用还取决于其他消费者支出的影

响。

以上是一种静态条件下的分析，说明在收入和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偏好的相互作用如何打破消费习惯。这表明消费者的效用状况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消费支出，而且还取决于他与其他人消费支出的比率。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可以对以上效用函数加以扩充。

在不考虑偏好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消费者个人效用函数取决于现阶段和未来每期的消费和资产：

$$u_i = u_i\ (C_{i1} \cdots C_{in},\ A_{i1} \cdots A_{in} \text{——}\ (3)$$

C_{ik}是第 i 个消费者在 k 期的消费支出，A_{ik}是第 i 个消费者的资产价值（k 为 1…n）。

如果考虑其他人的影响，则对上述变量再除以 $\sum a_{ij}C_j$，即用其他人消费支出的加权平均数通除变量 C_{ik}，A_{ik}，令 $R_i = \sum a_{ij}C_j$，则有：

$$u_i = u_i\ (C_{i1}/R_i \cdots C_{in}/R_i,\ A_{i1}/R_i \cdots A_{in}/R_i) \qquad \text{——}\ (4)$$

这里 R_i 是每个消费者的参数。消费者把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的选择方法是在实际收入、预期收入、利率和资产这些限制条件下寻求效用 u_i 的最大化。对每个消费者来说这将导致一组等式。对于一种类型的资产，一种类型的消费和几个不同的时期将有 αn 个等式。如果该体系有 r 个消费者，则有 αrn 个等式。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可以用对于他来说是客观的变量来表示他的消费支出。这些客观变量包括现期收入、现期资产、预期未来的非利息收入、预期未来利率、其他人的现期消费，因而得到 r 个等式：

$$c_i/R_i = f\ (Y_{i1}/R_i \cdots Y_{in}/R_i,\ A_{ir}/R_i \cdots A_{in}/R_i,\ r_i \cdots r_n) \qquad (5)$$

这里 Y_{ij}是预期收入，r_j 是利率，A_j 是现期资产，方程组有 r 个未知数 C_i 和 r 个方程。因此对每个消费者都有一个均衡值。

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说，这一均衡值是比较稳定的。但采取比较静态分析法，即假设（1）收入分配不变，每个人收入

都提高 k 倍；（2）银行和预期的利率不变；（3）现期收入与未来收入之间的关系不变；（4）上述假设意味着资产也提高 k 倍；（5）人口的年龄分布为一常数的条件下，对每个消费者来说，其收入增加必然会导致消费增加。在其他人收入增加时，由于偏好的相互作用和示范效应，其他人消费支出也增加，即 $C_j/\sum a_{ij}C_j$ 并不发生变化，因此，对（5）式来说，由于 Y 和 A 都提高了 k 倍，$Y_{ij}/\sum a_{ij}$（j），$A_i/a_{ij}C_j$ 因分子分母同时增加 k 倍而值不变。这时，消费者均衡的值不变。因此，消费是收入的一定比例，储蓄独立于收入的绝对水平。

在长期的动态分析中，由于城市化趋势、新产品出现、人口年龄分布、收入分配、收入和人口的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储蓄会有变动。在收入稳定增长的条件下，储蓄率是稳定的，如果收入增长率提高，净储蓄率上升。

作者用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关于 1870—1920 年间每 10 年资本形成与国民收入资料验证这一理论。在这一期间收入状况未变，收入稳定增长，因此总储蓄率一直未变。预算研究的横断面资料也证明各个家庭储蓄率是收入分配的稳定增长函数。这说明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是一致的。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短期中储蓄的波动”，论述相对消费函数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消费的不可逆性及对储蓄波动的影响。

旧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假设是消费是可逆的，从而消费支出随绝对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因为消费习惯有一种“棘轮效应”，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如果现期收入低于前期收入，消费者为了维持过去的消费水平，会减少储蓄。因此，决定个人消费支出的不仅是现期收入，而且还包括前期曾有过的最高收入。当现期收入低于前期收入时，前期收入要影响现期支出。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降低。如果某消费者确定的收入水平

为 Y_0，Y_0 高于前期收入，那么，该消费者有正储蓄，其储蓄为收入的函数：

$$S_0 = f\ (Y_0)$$

如果收入不断提高，这一函数关系成立；如果收入提高后又降到最初的水平 Y_0，那么，该消费者会由于棘轮效应使储蓄减少。

把长期与短期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储蓄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设 Y_t 为 t 期收入，Y_0 为以前达到的最高收入，则储蓄函数为：

$$S_t = f\ (Y_t,\ Y_t/Y_0)$$

由于长期储蓄—消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表明储蓄占总收入中一个大致不变的比率，所以，可以把储蓄率作为经济周期的函数：

$$S_t/Y_t = F\ (Y_t/Y_0)$$

或者回归方程：

$$S_t/Y_t = a\ (Y_t/Y_0)\ + b$$

根据1929—1940年间的统计资料对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算得出：$a = 0.25$，$b = -0.196$，相关系数为0.9，把以上参数代入上式：

$$S_t/Y_t = 0.25\ (Y_t/Y_0)\ - 0.196$$

作者用这一方程向前作了长期估算，向后作了短期预测。长期收入增长为率为3%，$Y_t/Y_0 = 1.03$，代入上式，得出储蓄率为0.06。

在长期和短期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把主要观点概括为：第一，在稳定的收入增长时期，总储蓄率独立于收入。第二，储蓄率要受利率、收入预期、收入分配、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分布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的变化并没有对储蓄率有过重大影响。第三，在经济周期的短期内，储蓄取决于现期收入与过去曾达到的最高收入之比。第四，如果把长期和短期影响结合在一起，总储蓄率的公式为：

$$S_t/Y_t = 0.15Y_t/Y_0 - 0.196$$

四

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章“相依偏好的含义”和第七章“结论”，是对全书的总结与运用。

作者认为他的消费函数理论可以用于其他问题的研究。这包括用偏好相互领事性假设来研究福利经济学，根据同一假设提出新产品的需求增长模型，并用消费的不可逆性解释经济周期。

《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一书在消费函数理论发展中有重要的地位。

（英文版 1949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译者为台湾学者侯家驹，出版者为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被列为“经济学名著翻译丛书”。）　石　乐　撰

作者介绍

杜森贝里（1918—）。美国经济学家，曾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并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66—1968），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董事长。对消费函数理论和货币理论有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货币与信贷》等。

［德］杜能，约翰·海因里希·冯 Thünen, Johann Heinrich von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 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nomie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1826年出版。1842年再版时，把第二版称为第一卷，另行撰写第二卷，第二卷第1章于1850年出版。杜能去世后，其遗稿由德国经济学家海尔曼、舒马赫整理加工，编成第二卷第2章和第三卷，于1863年出版。

杜能的理论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经济理论，另一部分是农业经济理论。杜能的一般经济理论较多受斯密的影响，而农业经济理论较多受阿尔布雷希特·特尔的影响。

《孤立国》第一卷共三章，第1章“孤立国的形成”，第2章“孤立国与实际的比较”，第3章“征税对于农业的作用”。第1章共26节，在其中，杜能使用抽象分析方法，利用大量的农业经营的实际资料，描绘出了一个“孤立国”，从而阐述了他的农作均衡学原理、农业生产集约度和位置配置理论等。他在第一节“假设条件”中假设：在没有自然水流和人工运河、肥力均等的平原中央有一巨大城市，而在平原四周是未开垦的荒野，那里与外界完全隔绝，因而称为孤立国。唯一的城市供应全境一切人工产品，城市食品则仰给于

四周土地。在第二节“任务”中，杜能指出，他将研究离城远近将对农作产生什么影响。以后，他在第三节（“第一圈境自由农作”）、第十九节（“第二圈境 林业”）、第二十节（“再论第一圈境，特别讨论马铃薯的种植”）、第二十一节（“第三圈境 轮栽作物制”）、第二十二节（“第四圈境 轮作休闲制”）、第二十三节（“第五圈境 三区农作制”）、第二十六节（“第六圈境 畜牧”）集中说明孤立国中的六个圈境。他在第四、五、六、二十四、二十五节中，讨论了地租以及谷物价格对地租的影响，在第七节讨论了农作均衡学原理，在十八节以前其他各节中主要讨论了三区农作制和轮作休闲制以及二者的比较，从而详尽论证了孤立国形成的基本原理。

农作均衡学原理是18世纪关于土地肥力与补偿的农业经营学原理。较早提出这一原理的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特尔，杜能继承了特尔的思想，又对这一原理进行了发挥。他提出“相对吸收”、“土地肥力”、“土地作用”、“土地性质”、“土地能力”、“土地收益力”等概念，重视土地作用（土地中植物所需养分有几分之几转为收成，或多少养分被产量吸收）和土地肥力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概念运用到孤立国形成的具体分析之中。

杜能在说明孤立国形成时，是从谷物价格及其对地租的影响方面展开的。他设定，城市是谷物唯一的市场，城市谷物价格就是孤立国的标准，但农村的谷物价格却由于运费因素，是随着与城市距离扩大而逐渐下降的。土地耕种需花费劳动和费用，而且只有能获纯收益才能进行。如果城市黑麦价格为每年1.5塔勒，而离城49.95英里时运费也1.5塔勒，那么，在49.95英里处，种黑麦即使不花费费用，也不会有人耕种。但如果城市谷物需求大大增加，原来生产保健物不能满足城市需要，城市市场上的价格必然大大提高，使谷物价格不仅能补偿以50公里处到城市的谷物运费，而且能补偿生产谷物的劳动和费用，耕种则会扩大到50公里处。他认为，不产生地租的、可耕作平原的边境地带所形成的白银和

谷物的价值比例，是孤立国全境决定谷物价格的基础。一般说来，城市市场的谷物价格是边境地带谷物价格与边境地带到城市市场运费之和。杜能指出，城市谷物价格是一个，但田庄的谷物价值却因离城市远近不同而不同，田庄离市场越远，田庄上谷物的价值越低，这是普遍有效的第一命题。田庄进行生产所需物品要从城市购买，同样由于运费因素，田庄所需物品的价格不都与谷物的价格成比例。这是第二个命题。因此，他把农业支出分为谷物支出和货币支出两部分，工人食物、马匹饲料完全以谷物支出；工人工资在谷价高的地方高些，在谷价低的地方低些，同时以谷物和货币两种方式支付；五金商品与谷物价格无关，只以货币表示。另外，他还提出第三个命题：谷物生产的费用，部分与耕种面积的大小成比例，部分与收获量成比例。也就是说，耕作费用是根据土地量而定，与收成无关，始终不变；收获费用则根据产量成正比增减。杜能还分析了田地与农舍的距离对农作费用的影响。根据以上假设和一些规律的分析，杜能解释了地租的起源，指出一个田庄的地租是由于它的位置和土地比最劣的，但为满足城市需要又不得不从事生产的田庄优越而产生的。纯地租等于毛收益若干谷物，扣除谷物支出和货币支出之后的余额。杜能与李嘉图大体同时得出与李嘉图类似的地租观点，不过，李嘉图侧重从土地肥力等级差别中发现级差地租的规律，杜能则侧重从土地位置差别中发现级差地租及其规律。另外，杜能还识到有绝对地租的存在，这是比李嘉图正确的地方。

杜能用大量篇幅对三区农作制和轮作休闲制进行了比较，说明了农业生产集约化的限界，也依同样原理，他把孤立国以中央城市为圆心设立了六个同心圆的圈境，从最外层逐渐移向圆心，表明生产集约程度逐渐提高，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是随与城市间距离的变动而变动的。从城市向外扩展的六个圈境依次为：自由农作、林业、轮栽作物制、轮作休闲制、三区农作制、畜牧。杜能的老师特尔曾研究农作制度的选择，认为轮栽农作物与休闲制、三区制相比，是集

约性的土地耕作制度，是绝对的最优良的制度。杜能继承了特尔的理论中合理的部分，同时纠正了特尔的错误，他根据大量资料分析，指出轮栽制并非在一切条件下都是能获最大收益或最为经济的，各种农作制度都有各自存在的优越性与合理性，轮栽农作制仅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因此，他所提出的农业生产集约度理论既要说明，在距离市场远近不同的地方，即在农产品价格及其他物价高低不同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生产一种农产品，应当用怎样的集约度才能取得最高限度的纯收益。六圈境的划分反映了杜能的这种分析。在对不同农作制度分析中，杜能还研究了下述问题：在距离市场远近不同的位置上，农业部门应如何配置起来，才能取得最高限度的纯收益，又能以最廉价的农产品供应城市。杜能分析了在各种农作制度间，以及农作制度中，农业与牧畜业、农田与牧场、不同的农作物等应如何以不同比例相配合。他指出，由于距离城市远近不同，不同的农产品应在不同的位置上进行生产，农业生产部门可以也应按一定规律配置起来。杜能认为，从孤立国中可以看到全部农牧业制循序排列，这种情景也就是一个国家在几百年中农业演变的情景。一国财富和人口越增，土地越精耕细作，得益就越多。随世界各国日益富强，精耕细作制在农业中将占统治地位。

第2章共七节（第27～33节）。杜能在第二十节中对前面分析进行了一下简略的回顾，在第二十八节“孤立国和实际的不同之点”中，指出这种不同有四点：1. 实际上不存在土地肥力到处相等、物理性质完全相等的国家。2. 根本不存在不靠河道或不靠通航运河的大城市。3. 幅员广大的国家除巨大首都之外，还有散布于全国的许多小城市。4. 实际很少有象孤立国的这种情况：畜产品的价格如此强烈地受供应畜产品的游牧地区的影响。然后，杜能在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节分别分析了与农业有天然联系的工业及一些农作部门：烧酒业、牧羊业、经济作物种植。他又在第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中，分析了工业布局和自由贸易等问题。杜能指出，在畜牧圈境制造烧酒，可以从事农作而得到好处，在这样的

地段，必定实行三区农作制，因为这种农作制度生产酿酒所需谷物的费用最低。杜能分析了德国牧羊业的历史、特点，羊毛价格变化、细毛迅速发展的过程等。从分析中，他又对第1章中的原理进一步发挥，指出两条具体规律：1. 两种产品，按重量计算，等同面积获得等同的产量，要求生产费用较高的产品，应在离城最远的地方生产。2. 如果生产费用相等，按重量计算，等同面积获得较少产量的产品，应在另一种产品的后面，即在离城更远的地方生产。杜能在分析经济作物种植时，根据第1章的原则（如生产费用相等，承担较高地租的作物，应在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种植），又提出一些经济作物种植次序的原则：1. 如果生产费用和按重量计算的产量相等，吸收土地肥力最强的作物应在离城市最远的地方种植。2. 如果产量和吸收土地肥力相等，要求生产费用最贵的作物应在最远的地方生产。3. 如果吸收土地肥力和生产费用相等，一定面积的土地按重量计算的产量最低的作物应在离城市最远的地方生产。据此，他分析了菜子、烟草、菊苣、苜蓿种子、亚麻等的种植。他指出，在自由贸易下，多数经济作物只能在畜牧圈境种植，而不能在城郊种植，或者说，它们适宜在谷物和地租低的国家（常为穷国）种植。杜能还指出，大部分工厂、工场应设在原料最廉价的地方，所以，孤立国不仅应有一个大城市，而且还应有许多较小城市。又由于富国利率往往比穷国低得多，工厂规模取决于市场和销售量大小，所以，许多工厂不设在原料产地，而设在富国更为有利。杜能反对贸易封锁，他用孤立国分析指出，富国实行限制贸易自由政策，不可避免对穷国是沉重打击，然而富国自己所受的创伤一点也不少于穷国。

第3章共五节（第34～38节）。杜能在这章中主要讨论了征税对农业的作用。一般说来，他认为，与完全不征税相比，征税阻碍国家的强大、人口增长和国民资本的积累。对于具体的各种征税，他的一些观点如下：如果国民很富，足以购买较高价格谷物，因而消费不变，征税的作用就与上述不同；征税对工业品和农业品不同，手工业者和工厂主能以

提价补偿纳税，但征税只会增加谷物的生产费用，却不能提高谷物价格；对非生活必需品征以消费，不会阻碍土地耕作扩大和资本的有益使用，如向必需品征消费税，弊害比人头税还要大得多；征收新税，或改变税制，无异于侵犯财产；地租税不会改变农业经济的形式和范围；如果征税使人们不敢继续革新，那么征税的危害性用是极大的。

第二卷标题为“自然工资及其同利率和地租的关系”。中译本第二卷包括“导言”和第1章“四周为可耕原野的孤立国与工资和利率的关系”（共23节）。杜能在“导言”中对第一卷所应用的方法进行了概述和评论，并指出了各种规律原理在第一卷中被表述的具体章节，还说明了第二卷的写作计划。他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农民的目的是最高纯收益，更清楚地表述了他的边际分析方法，例如，他指出，精心的工作，其限度不允许超过最后为此多费的工作能得到的增产补偿的界线；增加土地肥力必须合理进行，当购买肥料或生产肥料的费用的利息与因此所得的增产相等时即应停止；增产总是耗费资本和劳动得来的，所以必定存在增产的价值与增加的耗费相等之点，这一点也就是纯收益最高之点；增雇工人必须合理，其限度则以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产的价值等于工人所得的工资，等。杜能在第1章主要从工资和利率关系的分析中探讨工资和利率的决定。他认为，单从供求、竞争来决定工资，或单从维持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来决定工资是不够的，因此，他比较详细地评述了斯密关于工资、利率、地租和价格的见解，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勤奋的报酬、营业利润等概念。在他看来，合乎自然的工资规定，取决于对决定利率高低和利率与工资的关系的规律的认识。为了确定工资和利率的关系，他探索了四种不同的方法和观点：1. 研究了劳动生产资本的问题；2. 把资本看作替代劳动；3. 由最后投入的微小部分的资本决定利率；4. 认为最后雇佣的工人所增加的产品是工资的标准。从研究中，他得出了自然工资 $=\sqrt{ap}$ 的公式。杜能的分析使用了边际方法，他的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同资本最后生产力论，构成了要素最后生产力论，这

种理论是 19 世纪末出现的“边际生产力论”的最初形式。

（中译本根据耶拿古斯塔夫·菲舍出版社 1921 年版译出，包括 1842 年再版的第一卷和 1850 年版的第二卷第 1 章，不包括杜能的遗稿。中译本由吴衡康译，谢钟准校，198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姚开建　撰

作者介绍

杜能，（1793～1850）德国经济学家。农业区位理论创始人。出生于奥尔登堡。1799 年继承一份遗产，开始学习经营农业。后来求学于汉堡附近的弗洛特贝克农业学院，师从施陶丁格尔，并与当时著名的英国农业预算专家福格特交往甚密，1803 年，结识德国农业经济学家阿尔布雷希特·特尔，特尔成为除斯密以外他毕生最尊崇的老师。同年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后到梅克伦保的施韦林，购置并经营特洛庄园，并从事学术研究。1826 年出版《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1830 年被罗斯托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848 年当选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主要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后称《孤立国》第一卷）、《孤立国》第二卷第 1 章（1850）、《孤立国》第二卷第 2 章和第三卷（1863）。

[美] 德姆塞茨，哈罗德
Demsetz, Harold

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Dimentions of Competition

该书是作者对产权理论研究的总结，全书共分四章。本文根据中文版分四章介绍。

一

第1章“竞争的假定”是全书的引子，从学说史角度考察了传统的竞争理论，对完全竞争论进行了批判。

传统的观念认为，竞争是一般的，而垄断是特殊的。因此，传统理论抬高竞争的分析意义而贬低垄断的分析意义。尽管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小穆勒）在其巨著中多次提到垄断问题，但专门的讨论却少得可怜。即便提到垄断，也只不过是在政府保护这一特定意义上来论述的。传统理论认为，竞争就是价格竞争并由此将价格体制作为经济学的中心。可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有经济、法律和政治这3方面的内容。所以，完全竞争理论模式说明的是价格体制而不是竞争活动，而新古典理论则忽视了对经济、

法律和政治“摩擦”的各种根源的考察。企业和家庭被认为是纯粹的计算机，其内部是个“黑箱”，市场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用这个假定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一定的理论模式，很难理解竞争的实质。由于知识是特殊的，资产是专门的，竞争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之间必定彼此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可完全竞争模式假定任何个人不能对他人进行自觉的控制，这就剥夺了一个市场参与者对价格、总产量和他人行为的任何影响力。“行动者和制度就象分散的行星，每个行动只不过通过数量调整对很大程度上是非人格化的价格制定者（市场）提供给他的价格信息作出反应。”

由此观之，完全竞争模式的致命弱点是：第一，忽视了竞争过程中时间、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的重要性；第二，轻视了资本主义分散化经济体制起作用的法律和政治背景。既然竞争是多维的，产品质量竞争、契约安排和制度创新以及灵活多变的行动策略等之类的具体竞争活动自然都是有意义的。当然，要分析这些问题，传统理论是无法胜任的，而交易费用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在研究方面的进展为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

第2章“私人部门中的竞争”（是该书的主要理论部分）的讨论从“自由放任”谈起。一般认为，“自由放任”的特征是：受益者付费和人有行为动力。所有经济活动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实现。“自由放任”这种功能发挥的过程就是运用利润手段来选择商业组织，使其优存劣汰。不过这种功能对经济活动组织的生存选择是中性的。尽管可能存在这样两个极端：完全的纵向一体化和完全的市场化，但各种实际解决问题的契约性制度安排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例如，班组生产实际上是通过在生产要素之间达成协议，监督绩效，实现对行为的约束。又如，定向对口式的供销和购买是为解决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不确定性问题，因为要在买卖合同中进

行准确的预测和明确的限定，成本高昂，而不这样做就影响了经济活动的竞争性，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

制度既然在起作用，那么假定信息是有成本的，且边际生产成本不急剧上升，“自由放任”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倾斜。交易费用存在的假定意味着产品伪造和模仿的活动会受到阻碍，这通常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直至出现垄断。垄断不应用简单的“串通合谋”来解释，而应该看作是，专业化分工不仅象“斯密定理”所说的那样提高了生产率，也为不正常的交易创造了机会。这种交易往往带有欺诈性。消费者为了抵制欺诈，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可向法院起诉，还可促使生产者之间进行竞争，当然若可能的话更可进行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但不管怎样，由于信息是有成本的，欺诈和机会主义行为就无法彻底根除。人们自然就更相信大企业，因为在消费者眼里，进行大量广告投资的大企业肯定比“因陋就简”的小企业更少机会主义行为。所以，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对许多规范性的问题，如价格制定与垄断、反托拉斯和外部性问题等，不能简单地下是否、对错的结论。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非市场制度完全能在界定和保护私人行动权利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而在理论上，诸如商业企业及其定价和交换活动以及“纵向”的价格控制等非市场制度安排，完全证明，信息费用和交易费用概念可以包容传统完全竞争模式的初始条件。

三

第3章“公共部门中的竞争”（是《竞争》的又一个主要理论）则进一步将问题引入到公共选择领域中。在这一领域中，相应于有关经济的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区分，亦可将政治活动分为完全的政治民主和不完全的政治民主。“科斯定理”对完全的政治民主的含义就是：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

大的关系。只不过在这里，交易费用变为了投票费用。

但完全的政治民主与完全的经济竞争是不同的，其基本之点在于所有权的性质。在前者，所有权不可以出卖，尽管存在着偷偷地出卖现象，可这是不合法的；而在后者，则可以。政治上，少数得服从多数，这颇带强制性；市场中，一切得通过协议进行，这自然是自愿的。政治结果由全体选民来承担，市场结果仅由协议当事人来承担。完全的政治民主是种理论状态，因为投票费用就象交易费用那样，现实中并不为零。政治民主是不完全的。在一般情况下，投票费用决定了政治民主中竞争的结果，就象交易费用决定了自由放任经济中竞争的结果那样。这当然并不是比照交易费用在完全的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所作的变异或类推。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在量上和质上都有所不同。至少，政治民主中存在着多数人权威，这导致人的行为激励机制的不同。政治产品往往都是公共物品，且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所以，投票者不愿进行政治投票。

尽管这些不同之处很重要，但不能将此夸大。因为，政治上的少数派有时能起作用：一是，就象布坎南和图洛克所证明的，多数派有时会对少数派作出让步；二是，就象施蒂格勒所证明的，当少数票与多数票之间的差额很小时，少数派会有一定的作为。尽管如此，但不能将政治投资的收益与经济投资的收益，等量齐观。即同样的投资量在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的投资领域中，收益是不同的。政治上的往往要小一些。如拥有40％选票的少数派，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有其40％的发言权和分享40％的政治收益。

四

第4章“政府的增长”则运用竞争的交易费用理论框架去剖析历史上政府的增长，即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这一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尽管存在着不少说法（如棘轮效应论、个人力量论、官僚主义行为论和收入分配论），但均不能解释历史

上的一些事实，因此要寻找深层次的原因。《竞争》的解释是：产业革命的爆发进一步实现了生产乃至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分工的专业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从而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增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先后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安排在起作用。以英美为例，1750—1850 年间，英国经济处于“自由放任”时期，市场不断地被重构，人们不再要求政府对产业进行保证。但 1875 年后，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因为对贸易保护政策的需求和供给都在渐长。在需求方面，产业革命的推进使得英国新兴产业遇到了欧洲大陆的竞争，人们要求实行关税壁垒；在供给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者上台，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笼。而在 18、19 两个世纪，美国因“生产自由”，政府部门规模只是英国的一半略多一点。美国政府增长的历史转折点是在 19 世纪末，当时，专业化的利益集团要求政府管制，并以某些私人财产“影响公益”为名而得以实现。“管制是专业化分工与生俱来的附属物。”近 20 年来对收入再分配的强调使政府规模达到了新的顶点。

历史表明，自产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自 1920 年以来，政治竞争的不完全容忍或默许了政府规模在一个大范围内的变动，用官方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10—60%。若考虑到官方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中没有包括地下经济部门，实际变动范围可能要小一些，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25—50%。最终，政府规模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40%左右这个均衡状态。这就是当今政府规模的现实写照。

这一均衡状态的实现是缘于这样两个相对立的、相制约的机制：一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形成反对派，为拢络选民，会要求政府扩大开支；二是人们在政治上有“搭便车”的倾向，反对政府开支的进一步扩大，即使这样做会在选举活动中有所失，不过能由进行地下交易而得到补偿，即通过地下交易来逃税。总之，私人部门中的竞争渗溢到了不完全的政治竞争中，这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扩大，一般会使之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30%，但这时地下交易开始膨胀，使得

政府规模的扩大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45%。

(英文版，1982 年由北荷兰出版公司出版。中文本由陈郁翻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出版。) 吴 名撰

作者介绍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美国经济学家，产权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西北大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任教，并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对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有深入研究，并把这些理论运用于产业组织研究的广泛领域。代表作有论文《论产权理论》和《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以及本书。

[美] 艾克纳，阿尔弗雷德
Eichner, Alfred

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1983)

《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是一本从方法论角度论述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否的论文集。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学界形成众多不同的流派，其中，以萨谬尔逊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长期居主导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面对这些矛盾，特别是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这一理论既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不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纷纷提出质疑。此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本书是由艾克纳主编、由不同经济学家撰写的一本论文集，1983 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1990 年根据这一版本出版了由苏通等翻译的中译书。

全书共收入 11 篇论文，其中，前 3 篇分别为“绪言”、“前言”和“导论”，主要从研究方法角度，说明目前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本书的后 8 篇论文则从不同

的分析角度分别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是非科学的。

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即本书的“绪言”）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撰写的。作者在绪言中明确指出：自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以来，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经济学逐渐成为学术性经济学。许多经济学家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归结为少数几个变量（如资本、劳动、原材料、中间产品、总价格水平等），然后，根据这几个变量建立起简化的数学模型。然而，这些“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都无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一个现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

撰写了本书的“前言”和“导论”部分。他首先在前言中指出：目前的“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经济学就不可能取得进展。”（第7页）他在导论中同样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之中。”在简要介绍了本书的其他论文后，又进一步指出：尽管当前的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但能在将来变为一门科学。为说明这一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唯科学主义与科学。他认为，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不是指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在忽略本质的同时，也不注重科学的形式。……正因为如此，唯科学主义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祸根”。（第15页）相反，“科学是一种理论的逻辑整体。至少有一些实际依据并且设有大量的反例。……经济学当前所缺乏的是经验联系，而不是严密的数学。设有经验联系，就不能指望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第15页）然后，他对经济学本身由于研究人类行为而不能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指出：通过改革来消除在目前经济中存在的破坏科学研究精神和实质的做法，经济学可以变成一门科学。

第四篇论文“从何种意义上谈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由伊雷·埃特伯瑞和罗伯特·J·伯克哈德撰写。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当今正统经济学的非科学性。首先，作者说明了科学的含义与标准。他们认为，“科学”一词可以在两种

完全不同的场合使用。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即科学要经受经验检验；各种尚未被推翻的命题构成逻辑上一致的整体；理论的解释力要不断增长。总之，科学要具有经验性、综合性、可验性和无价值性。另一种是为多数人赞同的托马斯·库恩和伊姆里·拉卡托斯定义的科学，即科学的全部是方法，科学的关键是研究课题与范式；范式必须同时是综合的和开放的；一种范式的标志是所有赞同者具有相同学术地位及受教育水平等；最后，范式（即科学结构或研究框架）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为硬核，主要是科学家已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个为防护带，是当某种假说被验证或反驳时，具有某种伸缩性的那一部分。根据以上对科学的定义，作者指出，无论是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为逐名钓誉而发表的经济学文章，还是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关键性命题，几乎均未经严格验证。现代经济学已变成一种狭隘、停滞和封闭的思想体系，因而是不科学的，应该用科学的新范式来代替它。

第五篇论文"现代经验主义经济学与数量跨跃推理"由詹姆斯·A·斯旺内和罗伯特·普雷缪斯撰写。本文从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角度，说明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反科学的。文章认为，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未在适用的地方（即在开始和关键理论形成阶段）遵循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首先，文章通过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区分了规范科学、前范式（或不成熟的科学）和非规范科学，说明逻辑主义不适用前范式和非规范科学，而只适用规范科学。然后，文章又通过阐述自然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说明在从较低向较高的理论层次发展中，存在着现实与抽象（或简化）之间有意识的相互影响。在做出以上解释后，文章开始说明目前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文章认为，当代经济学家们是在走捷径而非全过程。"经济学中流行的做法是基于偶然的经验、预感而建立不现实的假设和充满公式的理论体系。"（第 49 页）文章通过迁移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两个典型例子的研究表明，经济学中的抽象可以是最贴切地描述为从实际到理论范畴的数量

跨跃，而不是象在自然科学中常出现的一种与现实有限的偏离。

第六篇论文“意识形态、方法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作者彼得·怀尔斯从意识形态与方法论的角度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首先，作者区分了意识形态与方法论。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总的和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它能被强烈地感受到和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予以坚持。它包含某种确定的神圣命题。当意识所依据的神圣命题与实际情况相悖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而非科学的方法论（如重新定义语句等），使神圣命题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在现实中一种方法往往决定一个学科的不同派别，但仍存在着某种正确的、一般的，也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常常是自然科学采用的实践的方法）。在作出以上区分后，他揭示了支配大众经济思想的新古典主义的本质。第一，他指出，尽管新古典主义也有一种世界观，如认为社会由理性的人组成、这些人在市场上独立地竞争、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但这些表述是不充分的，且含义不清。同时，由于道德与自由贸易的利益已被注重资源最佳配置与一般均衡（边际革命）所替代，表明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神圣命题，更主要的是没有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因而，新古典经济理论不是一种思想意识，至多只是一种思潮。第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是独特的、保持性的，也是严格限制的和封闭式的，存在着包括抽象、过度省略、公理及经济决定论在内的“李嘉图恶习”，因而，使经济学成为一种假科学的智力游戏。

第七篇论文“经济学家行为论”，作者为彼得·E·厄尔。本文采用行为科学理论的综合方法分析经济学家的行为，说明为什么一个非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仍被经济学家们不断的接受与传播。首先，作者在导言中说明，一种行为方式或另外某种更现实的、可替代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未被多数经济学家采纳，其原因是，被学术界认可的观点不一定是由于它们内在的价值、而是由于它们作为工具是受欢迎的，这些工具使使用者更容易地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

支配经济学家行为的目标是什么呢？作者摒弃了通常的假定前题，（即经济学家唯一的兴趣是为了解释现象，并能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而采取了行为科学的假设，即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职业和其他个人目标，如科学的抱负、自我设想抱负、生活方式抱负、环境抱负、在寻求知识和收入过程中不花费过多精力的消极抱负和回避新奇抱负等。在现实中，有多种因素使种种抱负不能满足。通过案例，作者表明这些因素是：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的失败；二、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技术性需求；三、发现重要的经验矛盾；四、发现基本的逻辑缺陷；五、发现假设不再现实；六、出版发行的障碍；七、新旧思想体系的斗争等。

第八篇论文"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世界图象、意识形态和理论"，作者为里查德·X·蔡斯。本文通过略述凯恩斯革命主流的基本历程及每一时期理论和隐含于理论中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图象，说明从逻辑上的一致性考察，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也有严格的缺陷。首先，作者说明经济理论中，凯恩斯革命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凯恩斯划分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建立了总量和宏观的基本概念，促进了经济学向更现实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使经济学逻辑上的一致性更为复杂。第一，从静态角度看，由凯恩斯革命发展而来的正统经济学缺乏内在的一致性，表现为经由凯恩斯发展的马歇尔的过程分析与同时决定的一般均衡论不相容。第二，从动态角度看，使静态凯恩斯模型动态化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在刀刃上求平衡的模式，导致了极度的不稳定。第三，在当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观点之间还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最后，作者表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很大缺陷，但因其理论的韧性而仍占统治地位，这在新的科学理论未建立、未被普遍接受时暂时是合理的，同时，这也并不排除主要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在内的新的经济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第九篇论文"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作者为约翰·布拉特。本文认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是无可非议的，但

使用数学方法的不恰当则导致了正统经济学的非科学性。作者首先指出：最优控制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主要表现为：一、最优控制学在纯经济理论中的滥用。作者认为，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方法是一种技巧，而使用这一技巧的应是数学家，这一方法只适用并发空间等领域，对经济却很危险，这种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作为正统经济模型有机部分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函数，它们是否存在还有疑问。作者指出："所有这些根本不是把数学运用于现实的经济问题，相反，是把高度精确复杂的数学运用于完全想象中的、幻想的经济学的美妙的理想国。"（第 149 页）（二）经济学中的数学忽视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二、最优控制论在以上述经济模型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中的滥用。作者认为，最优控制论可以运用于经济政策，但现在使用还为时过早。由于经济模型不成熟，直接导致经济政策带来不良后果。最后，作者又指出，一般数学方法在纯经济理论中的普遍滥用现象，可归咎于所谓数理经济学的"圣经"——萨谬尔逊的《经济学分析基础》。

第十篇论文"制度分析：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发展"，作者 J·罗恩·斯坦费尔德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提出经济学中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作者认为，正统经济学已被保护起来，避免实践检验的破坏，并忽视社会制度与行为分析。在文章中，作者对正统经济学进行经济分析的形式主义理论与科学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主义理论分别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正统经济学强调的中心是理性选择或资源最佳配置，而这是一种经济学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是经济学的特点，它导致了"经济主义谬误"（即把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上升为一般的原则。因而，这种经济学未探讨与一定经济现象相适应的经济行为者的行为特征，也未提出完善的权力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倡导经济分析的实证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所定义的经济学为一种"社会关系中技术关系不断地被制度化的过程或文化上的现存秩序"，强调体现一种社会关系的实际组织。这一理论应采用具有高度归纳性、有机地发展的比较分

析方法。最后，在价值标准化上，这一理论关心一种能充分展现社会再生产和人类生活过程的社会价值，而非强调最多（优）和效率的市场价值。

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仍由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撰写。本文再次提出本书的主题：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于1898年由凡勃仑最早提出）并从不同角度指出当今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仍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作者从科学的认识规律出发，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是不科学的。他认为，科学的认识论应是发现错误的法则，这一法则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从内在结构的逻辑性出发，检验前提与结论的一致性。二、进一步作出由相符性检验、普遍性检验和精炼性检验原则构成的经济检验。根据以上法则，作者指出，目前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的六个理论构件（包括以萨谬尔逊和希克斯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补充的两个理论构件，未能解释实际经济的运行，因而是未经经验检验的不科学的理论。随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范式——后凯恩斯主义。第二，作者说明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经济学职业导致经济学成为一门伪科学，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金字塔型的经济学职业结构使只有处于塔顶的少数人才能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而处于塔底的人为了得到晋升，不得不发表一些符合处于塔顶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并非科学的文章。二、经济学中数学的滥用在理论上将经济学家分为理论经济学家与应用经济学，导致了经济理论与现实的进一步分离，在现实中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学术上受到尊敬，并使数学成为寻求经济学家和评判其功绩的客观标准。第三，作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传统经济学将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可自我调节的机制，它排斥了政府的干预，忽视了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市场缺陷。最后，作者指出，对于目前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每个经济学家都是有责任的。因而，经济学家们应用科学的思想取代经济学中的现行思潮，坚持任何理论只有经过检验证实才是科学的理论。

总之，全书11篇论文针对目前经济学的状况，从不同的

分析角度出发，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即当前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未经经验验证的、滥用数学的、非科学的。因而，应用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代替现有的经济理论。

注：本文所提到的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均指新古典综合派。

（据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3年版，中文本苏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欲晓 撰

作者介绍

艾克纳，美国经济学家，拉特格斯大学经济学教授，从事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观点倾向于英国新剑桥学派。

［德］艾哈德，路德维希
Erhard，Ludwig

来自竞争的繁荣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1957）

本书是一部实证性的经济学著作，通过叙述事实总结出理论的一般通则。正如艾哈德所言，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要把战后十余年西德经济改革的发展情况向德国人民做一个汇报。因此，这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的著作。

一、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到处是一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城镇民房、工厂、铁路、发电站、通讯系统和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基础结构都遭到巨大破坏。面对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政府里的重要人士和一些经济学家都在谋求恢复西德经济的良策。以艾哈德为代表的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围绕着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争论具体表现在战后西德的货币改革过程中。艾哈德认为，要复兴西德的经济必须选择“理念经济模型”的一种形式，即“自由市场经济”，由市

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活动。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型最完美的体现。德国的当务之急必须放松和废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使消费和生产者在政府管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才是复兴西德经济的必经之路。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代言人则认为西德所处的经济凋敝的特殊条件决定了当时只选择“理念经济模型”的另一种形式，即“集中管理经济”，通过政府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理由是多年来的德国经济一直不正常，货币改革也不会创造奇迹，只有政府坚决实行有系统的经济计划和有系统的经济指导，德国才能重新站起来。因此，他们主张实行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否则难以振兴西德经济。

由于两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不同，决定了在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上所应用的方法也不相同。艾哈德认为消除失业应依赖于生产的扩大，而生产的扩大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社会民主党代言人主张采取放松银根的通货膨胀政策，借以消除购买力不足，产品销路呆滞的现象，提高就业率，在艾哈德看来，这种做法只会导致物价上涨和政府干预的加强，对减少失业率无所补救。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容的。

社会市场经济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要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走向富裕。具体地说，它要消灭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艾哈德指出，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另一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实现“全民繁荣”。

全民繁荣目标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劳动生产和产品产量必须大幅度的提高。或者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并且实现了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使产量最大；或者在产量既定的情况下使成本最小。第二，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倘若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增长就违反了物价稳定的原则。因

此，必须消除工资的增加超出生产力发展的现象。第三，实现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没有相应的通货稳定，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不健全的。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物价稍有上涨，存款率立即下降，由此引起投资缩减，生产规模缩小，从而威胁经济增长。可见，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是以消费者为服务对象的，只有消费者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裁判员。只有使消费者从自己不断增大的劳动努力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好处的经济政策，才是"社会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艾哈德所倡导的"三位一体"的具体目标。或者说是经济繁荣的具体表现。

二、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目标的基本途径

从本书的书名，读者可见"全民繁荣"的目标来自于经济竞争，换言之，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基本途径。但是，艾哈德认为，市场经济理论所主张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政策，而是一种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西德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把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出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因此，艾哈德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思想的基本要义是如何以自由经济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这是实现自由市场机制，达到经济繁荣所必须予以遵循的原则。

艾哈德认为，经济自由包括消费自由和生产自由。消费自由指的是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所需要的产品；就生产自由权力而言，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每个厂商有生产的自由、销售的自由、管理企业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其中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不断解放新才能，开辟新道路的一种工具。只有企业间的自由竞争，才能降低商品

成本，改进企业技术，增进企业活力。从而才能保证社会经济体系协调顺利地进行。战后，西德经济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自由竞争所产生和强大威力。因为西德人正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下，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艾哈德强调自由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的辅助作用。为了说明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他援引了西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伯姆·罗布凯所作的足球比赛的比喻。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其职能是使比赛有规则的进行而不是亲自去踢球。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私人企业家以指导和支援，而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私人企业家就象足球比赛中的运动员，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任，政府作为裁判员只能运用一切为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允许使用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政府的这种辅助作用恰恰是自由竞争机制所不具备的。

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辅助作用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反映在国际经济领域。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完全靠自由贸易是很难实现的。它需要有各国政府采取统一的政策和步骤，也就是说国际间的自由贸易离不开各国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

三、反对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垄断

在艾哈德看来，自由竞争的优越性驱使人们必须集中全力反对垄断的存在。垄断之所以应当反对，原因就在于它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回顾人类历史，人们不难看到人类进步史中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自由经济时代的最文明的那一个阶段。在19世纪初，由于生产者有同等机会自由活动、自由竞争，市场成为决定经济利益的焦点。而19世纪末垄断的产生，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同时，引起了社会与政治

的紧张局面。艾哈德强调，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制度。

社会市场经济要求产品的生产者自由竞争，要求商品的生产者根据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变动自由地决定价格。通过这二者使市场调节过程随时随地地进行。并将使供求双方，使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二者，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不断地趋于均衡。而垄断组织恰好是排斥自由竞争，排斥自由定价，同时，每一种垄断形式都隐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可能性，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两者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再者，垄断组织吞食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经济停滞不前。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有意识地鼓励私人垄断，那么这种不良后果就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的反映出来。因此，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必须反对垄断制度。

四、西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

艾哈德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一思想已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国际自由经济政策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整个经济自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经济一体化则是自由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要实现经济自由，要坚持自由贸易。基于这种思想，他坚决反对“双边协定”，认为经济一体化无论对内对外，都应该贯彻经济自由主义，建立欧洲共同体，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步。为了实现欧洲经济的普遍繁荣，不仅要在内部实行经济自由，在对其它经济区域的关系上也应坚持经济自由的原则。

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应该把重心放在自由的区域经济秩序的建立方面，不应当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个组织，而应视它为自由经济合作的“功能”。首先应致力于发展各国间的经

济联系，而不应该不分轻重缓急让政治一体化走在经济一体化前面。否则，欧洲共同体将会变成一个超国家的中央经济管制组织。为了做到这一点，艾哈德提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区域经济体制的具体措施（包括商品和劳动交换自由以及资本和就业自由等等）。

艾哈德在批评社会一致化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欧洲共同体的性质永远是一个经济合作的组织，它决不是各个成员国家在数量上的机械组合，而是立足于广泛的自由和竞争基础上的更高一级水平的经济合作。社会一致化只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各国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的途径而实现。

综上所述，可见艾哈德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这是对西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对当今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德政府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六千万德国人就全面振兴了经济，使西德再次成为欧洲各国最强盛和最有活力的"经济超级大国"。西德的经济复兴奇迹的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自由主义。《来自竞争的繁荣》恰恰是西德走向经济繁荣的真实生动记录。

（本书原为德文版，1952年初版书名为《大众的福利》。英译本改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译本由祝世康等译出，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邢燕霞 撰

作者介绍

艾哈德，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主要贡献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由弗莱堡学派奠基人瓦尔特·欧根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且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全力实践了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哈德本人则被称为"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著述主要有：《德国又重返国际市场》（1953）、《来自竞争的繁荣》（1957）、《德国的经济政策》（1962）。

[美] 费雪，欧文
Fisher，Irving

货币的购买力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货币的购买力》副标题为“它的决定及其与信用、利息和危机的关系”。该书由耶鲁大学当时的经济学讲师哈里·G·布朗（Harry G·Brown）助编，英文版1911年出版第一版，1920年出版修订版，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该书的中文本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本基译，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汉译世界名著中。解放后再没有出过中文本。

《货币的购买力》全书共13章，8个附录分别是第2、3、5、6、7、8、10、12章的数学推导或统计资料。1920年的修订版除个别地方的增改外又增加了一个附录“稳定美元”，共计502页。全书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两部分，第1—8章为基本理论，其中又以第二章为核心，第9—13章是从统计的角度分析历史事实，为以前的理论作证。

在第一版“序言”中，费雪说明了本书的目的。他说“本书的目的是要确定决定货币购买力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运用到研究购买力的历史变化，特别是包括近来引起世界范围内讨论的‘生活费用’的变化”。他把货币购买力作为价格的倒数，认为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五个确定的因素：“（1）流通中的货币量；（2）货币的流通速度；（3）以支票流通的银

行存款量；（4）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以及（5）贸易量”。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要达到这样一些目的：（1）重建货币数量论；（2）讨论指数的最好形式；（3）说明价格水平决定的某些数学方法；（4）估算货币流通速度的实际方法；（5）从统计上确定美国的银行存款；（6）改善贸易量和交易方程中其他内容的统计估算；（7）对货币数量论全面统计证实。本文根据英文 1920 年版，分两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 1—8 章，分析决定货币购买力的因素，以及货币购买力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即形成一种完整而系统的货币数量论。

第 1 章题为“基本定义”，介绍与本书有关的基本经济变量，包括财富、交换、资本、收入等。他指出，经济流量有四种，第一种由资本产生；第二种是情况的改变（如生产与消费）；第三种是地位的改变（如运输与进出口）；第四种是所有权的改变（如物价品转移）。这些经济流量都会产生交易，即与货币对流。因此得出：社会全部交易量乘平均价格应等于此间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量。

第 2 章题为“与交易方程式相关的货币购买力”，虽然仅 25 页，但是全书的核心。作者是依据著名的交易方程式（即费雪方程式）来探讨货币的购买力的。他首先解释了货币的定义：货币是流通媒介，包括金币、纸币与银行活期存款。金币为“基本货币”，纸币与银行活期存款为信用货币。两者构成“流通中的货币”。然后他论述货币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由此得到著名的费雪方程式：

$$MV = PT$$

在这里 M 为货币量，V 为货币流通速度，P 为价格水平，T 为交易总量。由此得出影响物价水平（即货币购买力）的因素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全部交易量。前两者与物价水平同方向，同比例变动，后者与物价水平反

方向、同比例变动。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

第3章题为“存款货币对交易方程式以及货币购买力的影响”，论述银行活期存款对交易方程式和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作者关于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的论述与现代货币银行学中的相同，但他把存款货币与金币联系起来，认为这种货币的创造与消灭都取决于金币。由此就把交易方程式中的货币量分为M与M'，M包括金币、纸币和存款货币，而M'只包括存款货币，M'与M有一种比率关系，再以V'代表存款货币的流通速度，则交易方程式应改为：

$$MV + M'V' = PT$$

从这个公式中就可以看出流通中存款货币量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

第4章题为“在过渡期间交易方程式与货币购买力的干扰”，论述交易方程式与货币购买力可能发生的各种破坏。作者指出，以前讨论的是均衡状态下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果均衡破坏就是“过渡时期”，这时交换方程式就不再适用了。他特别强调利率变动将影响物价，而物价上涨本身又将促使物价进一步上升。因此，如果利率不能随资金供求的变动而变动，就会使整个经济失衡，结果是物价上升，企业获利，存款货币扩大，物价又进一步上升。

第5—7章论述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各种间接因素。第5章题为“间接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因素”，论述影响交易总量（T）与货币流通速度（V）的因素。他认为影响交易总量的因素分为：（1）影响生产者的因素：资源分布、分工、技术知识、资本积累，这些也就是影响供给的因素；（2）影响消费者的因素：人类的欲望范围及其变动，这也是影响需求的因素；（3）同时影响生产者与消费者，即供求的因素：交通、贸易的自由程度、货币银行制度、商业信心。他认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包括：（1）个人习惯，包括节俭与窖藏的习惯、记帐习惯、使用支票的习惯；（2）社会支付制度；包括收支次数、收支规律化程度、收支相距时间与金额之间的联系；（3）一般社会背景，包括人口密度与交通运输等。这些因素

通过对交易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而间接影响货币的购买力。

第6章题为“间接影响（续）”，论述金币的输出输入、铸造销毁，以及货币用黄金的生产与消费对货币量（M）的影响。他认为，对外贸易失衡引起的金币输出或输入，其他商品用黄金的多少，世界黄金存量多少都要影响货币量，从而影响货币购买力。

第7章题为“货币制度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仍然是论述影响货币量的因素，但不是就黄金本身，而是就货币制度来进行分析的。作者以美国、法国、印度等国当时或历史上的货币制度说明货币制度对货币量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根据格莱欣定理分析了复本位使货币流出对国内货币量的不利影响，并用统计资料证实这一观点。

第8章题为“货币量和其他因素对货币购买力及相互之间的影响”，论述交易方程式中各种变量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对以上第5—7章的总结。作者认为，交易方程式所反映的物价水平与货币量的同方向同比例变动关系在过渡时期中并不适用。在这一时期中，货币量增加不仅使物价水平上升，而且使M’对M的比率增大，货币流通速度（V和V’）亦加大。这些因素变化不仅相互有影响，而且影响交易总量（T），而T的变动是否影响物价，要看与MV变动的关系如何。如果两者的变动互相抵消则对物价水平无影响，否则物价水平又会变动。因此，交易方程式中M、V、T等因素的变动要受外生变量的影响。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9—13章，是用统计资料和数学方法验证货币数量论。

第9章与第10章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物价与指数。第9章题为“价格的离中趋势使货币购买力指数成为必要的”。作者在这一章中说明了各种物价的变动并不一致，有些

物品受契约、法律或习惯的限制不易变动，有些物品则受其本身的供求影响有所变动。因此，从统计学的观点来看，物价水平的变动，实际上代表了各种物价消长的平均净变动。第 10 章题为“货币购买力的最好指数”，论述了指数的编制，包括抽样、加权、按基期编制等具体方法，在该章的附录中又对指数编制方法进行了更为详尽具体的说明。

第 11 章和第 12 章以过去的统计资料证实交易方程式中 M、V、T、P 之间的因果关系。第 11 章题为“统计验证：一般历史评论”。作者在这一章中采用时间序列资料和长期趋势曲线，说明近数百年来物价水平与货币量变动的关系。特别利用了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历史资料，证明了人们对纸币与存款货币的信心及其金融危机的联系。他的结论是：在危机前，存款货币及其流通速度增加，物价上升，而在危机后存款货币与流通速度减少，银行准备金增加，流通中货币减少，物价下跌。第 12 章题为“统计验证：近期”。在本章中，作者利用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资料说明影响物价水平上升的原因。

第 13 章题为“使货币购买力更加稳定的问题”。这一章论述物价稳定问题。作者强调了物价稳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稳定物价的最佳方案——建立适当的货币制度，使货币量的调整有助于物价稳定。在 1920 年增加的附录“稳定美元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费雪一直主张物价稳定，在《货币的购买力》出版以后的十几年中（即 1912—1934 年间），他就物价稳定问题发表了论文 161 篇，公开信 37 封，演讲 99 次，在政府机关听取意见作证 9 次。这些论述基本是在第 13 章中观点的进一步发挥或具体化。

《货币的购买力》是原始货币数量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这种理论的经典性著作。尽管现在原始货币数量论已被现代货币数量论所取代，但《货币的购买力》仍是本值得一读的名著。

（据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梁小民　撰

作者介绍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长期任教于耶鲁大学。在货币理论、统计学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他经济学研究的特点在于善于综合前人论述，去粗取精，推广发展，自成体系，以及运用数学分析工具。代表作有：《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资本和收入的性质》、《货币的购买力》、《指数的编制》、《利息理论》等。

[德]弗兰克，安德烈·冈德
Frank, Andre Gunder

欠发达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1966)

本文发表在美国《每月评价》第18卷第4期（1966年9月号）上，是弗兰克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的代表作品。全文共有9部分。在此就以下4方面对该文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一、方　　法

在本文的第1部分里，弗兰克主要论述了应该如何研究欠发达地区，即研究方法问题。

他认为，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欠发达问题。“不首先了解清楚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地区居民过去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如何造成他们现在的欠发达状态，就不能指望为他们制订适当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而至今大多数有关发展的理论所汲取的，完全是来自欧洲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经验。将欠发达地区的过去和现在等同于发达地区的早期历史，是不能反映欠发达地区的情况的。尤其是，对现有的发达研究和欠发达研究，都不重视资本主义宗主国与其经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造成的不平衡的发展，即某些地区是发达的，另一些地区是欠发达的。

弗兰克指出，不发达国家的现在同发达国家的过去并没有任何重大类似之处。目前的发达国家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但是决没有经历过"欠发达状态"。历史研究表明，当代的欠发达状态大部分是欠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关系的历史产物。而且，这些关系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结构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欠发达国家若要寻求发展，并不是依靠国外和国内的资本主义中心的扩散，而是应摆脱这种扩散关系。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批评了关于欠发达国家的"二元社会"论。他认为，"这种论点所导致的政策建议如果加以实行的话，并不会如设想的那样纠正欠发达状态而恰恰只会加深和延长这种欠发达状态。"

二、实　例

在本文的第2—4部分，弗兰克通过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实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弗兰克认为，宗主—卫星关系并不局限在国家之间，在拉丁美洲各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生活中，也存在这种宗主—卫星关系。在这些国家里，首都或首府以及出口区往往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宗主中心的卫星，但对内地来说，则成为全国性的宗主中心。各省的省会本身是本国宗主中心的卫星，也由此成为世界宗主中心的卫星，但它们又是省的宗主中心，周围有着本省的卫星。"因此，宗主中心和卫星的

整个星座系列就是指从欧洲或美国的宗主中心直到拉丁美洲最遥远的边区村落的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这种宗主—卫星结构就是欧洲征服者移植到拉丁美洲的结构性特点。

弗兰克指出：拉丁美洲现在的欠发达状态是几个世纪以来它参加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结果。例如，在智利，欧洲征服者不仅把这个国家完全结合进世界重商主义体系和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之中，而且还把资本主义垄断性的宗主—卫星结构和发展引进智利国内的经济和社会中。这种结构还迅速地渗透和蔓延到智利全国。从那时起一直至今，智利这种“卫星式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特点变得越来越突出。再如，在巴西，从16世纪初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展，东北部、米纳斯吉拉斯腹地、北部和中南部逐渐成为出口经济区，参加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并各自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是，那是一种卫星式的发展，它既不能自生也不能长存。”随着与它们有关的世界市场的衰退，这些地区也就只能成为今天这样的欠发达状态。

对于巴西的圣保罗的崛起，弗兰克认为它也没有突破卫星式的发展模式。从国内情况来看，“圣保罗的工业发展并没有为巴西其它地区带来更多的财富。恰恰相反，它把它们变成了国内的殖民地卫星，进一步榨取它们的资本，而且使它们保持甚至加深欠发达状态。”从国外情况来看，“圣保罗工业的最初发展虽然是比较自主的，而世界资本主义宗主中心却正在使它越来越卫星化，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受到限制。”

弗兰克总结道：“欠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欠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三、假　设

在本文的第 5—8 部分，弗兰克根据历史的考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达与欠发达的假设，这些假设源于这样一种理论设想，即认为在这个宗主—卫星结构的世界之中，宗主中心往往得到发展而卫星往往处于欠发达状态。

(1)“同世界性宗主中心的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国家一级和其它下级宗主中心的发展都由于它们的卫星地位而受到限制。”这个假设已被拉丁美洲的情况证实。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宗主地区和圣保罗宗主地区，在 19 世纪开始发展时基本没受到任何殖民地痕迹的限制，但它们仍然是一种卫星式的发展，主要依附于外国的宗主中心，尤其是依附于英国和美国的宗主中心。

(2)“当卫星同它们的宗主中心的联系处于最微弱状态时期，则是卫星在经济上最为发展的时期。”这个假设与这样一种传统观点相左。传统观点认为，欠发达国家要取得发展，必须最大程度上同发达的宗主国保持联系，并从后者那里得到各方面的扩散影响。这个假设可以由卫星的两种状态得到证实。第一种状态是，由于世界宗主中心发生战争或经济危机，对卫星的影响大大缩小，卫星暂时处于独立状态而取得发展。例如，17 世纪欧洲经济危机时期，拉丁美洲的制造业取得了增长，智利等几个国家变成了制成品出口国。拿破仑战争时期，拉丁美洲爆发了独立运动。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宗主国对卫星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松弛，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才开始了自主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第二种状态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某些地区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相对微弱，有可能取得自力发展。例如，17、18 世纪巴西的圣保罗、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和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及克雷塔罗，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阿根廷的图库曼、门多萨、罗萨里奥和巴拉圭的亚松森。

弗兰克认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不作为卫星参加资本主义体系而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例子。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根本原因是日本在德川幕府和明治时期都没有卫星化，所以它以后的发展结构没有象卫星化的国家那样受到限制。

由第（2）假设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当宗主中心从危机中复苏并重建了那种把卫星完全结合进这个体系的贸易和投资的联系时，或者，当宗主中心扩展到把当前的独立地区结合进世界性体系时，这些地区以前的发展和工业化就受到窒息。"例如：18、19 世纪世界贸易扩大和经济自由主义大发展，窒息了拉丁美洲在 17 世纪的制造业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后，当宗主国得到恢复和扩展，整个拉丁美洲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特别是工业化增长率的上升再度受到挫折，工业变得日益卫星化。

（3）"今天最不发达和看来最封建的地区，是过去与宗主中心联系最密切的地区。"由于发生商业衰退，这些与宗主中心关系密切的地区被宗主中心所抛弃。例如，一度出口蔗糖的西印度群岛、巴西东北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秘鲁高原和玻利维亚过去的矿区，以及墨西哥的瓜纳华托、萨卡特卡斯等地，"过去经历了超卫星化的发展而现在却沦于极端不发达的状态"。这个假设同人们一般认为的一个地区不发达的根源是这个地区的孤立状态和前资本主义体制的观点，是相左的。

通过上述考虑，弗兰克又提出了两个有关大庄园的假设。

（4）大庄园不论今天是否已变成了种植园还是农场，它们过去是以典型的商业性企业而诞生的。它们的存在适应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需求；

（5）今天那些市场需求量下降的大庄园，主要出现在那些出口地区。

弗兰克认为，不能从欧洲封建体制的转变中去寻找拉丁

美洲大庄园和农业体制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经济根源，即拉丁美洲大庄园的盛衰与封建体制的转变和残余无关，而是对外部需求变化的一种商业性反应。

四、结　　论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弗兰克结论性地写道："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统一，它贯穿了整个历史中的垄断性结构和不平衡发展，以及对欠发达世界造成的商业资本主义多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持续影响之中。"弗兰克提醒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宗主中心的那些陈规陋习是不符合卫星的经济现实的，也不会满足他们要求解放的政治需要。"

（据美国《每月评论》1966年9月）

彭　城　撰

作者介绍

弗兰克，德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弗兰克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宗主—卫星"关系理论，揭示了当代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卫星式发展和依附于外国宗主国的特征。这是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的著名"依附"论的最基本内容。弗兰克的主要著述有："欠发达的发展"（1966）、《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欠发达》（1967）《依附积累和欠发达》（1978）等等。

［美］弗里德曼，米尔顿
Friedman, Milton

消费函数理论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消费函数理论》英文版在1957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章。本文分三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介绍了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持久收入假说——的背景与前提。

在第一章中，介绍了过去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以及持久收入假说产生的背景。凯恩斯认为，人们的现期消费支出取决于人们的现期收入水平，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但是，库兹涅茨对于1899年以后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储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该时期美国的储蓄占收入的比重并未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储蓄只占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显然，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与库兹涅茨统计分析的结果相矛盾。在重新探讨消费与收入关系的过程中，杜生贝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章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作者从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

总结出影响消费占收入比重大小的一系列因素。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的最大效用点为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在消费者的收入、各种商品的价格，以及存款与贷款的利息率皆为确定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就取决于财富与利息率——它们确定预算线的位置，和消费者的年龄、偏好等其它因素——它们决定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在未来收入、价格、利息率均为不确定时，消费者持有财富以预防未来收入或支出意外的变化，这样的财富占收入的比重，尤其是非人力财富占收入的比重就成为决定消费占收入比重的重要因素。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 3—8 章，介绍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内容。这一部分是全书的中心。

第三章中阐述了持久收入假说的内容。作者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他过去和未来的长期收入水平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他把影响人们收入的因素分为两种，一种是暂时因素；另一种是影响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的因素（这个时期定为三年以上）。反映暂时因素影响的收入叫一时收入，反映长期因素影响的收入叫持久收入。同样的，消费也有一时消费与持久消费之分。持久收入假说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以下四个方程来概括：

$$C_p = K\ (i、w、u)\ Yp \qquad (1)$$

$$Y = Yp + Yt \qquad (2)$$

$$C = Cp + Ct \qquad (3)$$

$$\rho y_p y_t = \rho c_p c_t = \rho y_t c_t = o \qquad (4)$$

方程（1）表示：持久消费 Cp 是持久收入 Yp 的一部分，二者的比率 k 并不依赖于持久收入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其它一些变量。尤其是消费者存款和借款的利息率 i，财富占收入的比重 w，以及影响消费者现期消费或积累财富的偏好的其它一些因素 u，诸如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消费者的年龄

和他的脾性，种族与民族传统等文化因素的客观标准等等。

方程（2）和方程（3）表示：现期收入 Y 是持久收入 Yp 与一时收入 Yt 之和；现期消费 C 是持久消费 Cp 与一时消费 Ct 之和。方程（2）和方程（3）只是纯粹的定义而已，并没有实体的内容。

方程（4）表示：一时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一时消费与持久消费之间，一时收入与一时消费之间都不存在相关关系。一时收入只是总收入意外、暂时地增加或减少，一时消费只是总消费意外、暂时地增加或减少。收入意外、暂时地增加或减少与收入的其它部分是不相关的；消费意外、暂时地增加或减少与消费的其它部分是不相关的。所以，一时收入与持久收入，一时消费与持久消费的相关系数为零。同时，在一些事例中，一时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一时消费的增加，而在另一些事例中则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正、负相关会相互抵销。因此，收入上的任何暂时变化会导致财产的增加，或使用以前积累的财富，即一时收入的变化反映为储蓄的变化，而不是消费的相应变化。

第四章与第五章是用预算单位资料和时间序列资料来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检验。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的比率 k 取决于利息率 i、财富占收入的比率 w，以及其它因素 u，而与收入水平的高低无关。弗里德曼用预算单位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在 1888—1950 年间，美国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稳定在 0.89—0.92 之间，它没有随收入的变化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但是，由于 i，w，u 等因素的影响，在该时期，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的比率 k 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工资收入者的 k 值在 0.90—0.95％之间，企业家集团的 k 值在 0.8—0.90 之间。这是因为：企业家集团的收入前景是不确定的，为应付意外情况需要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而且企业家集团积累资本能够赚取更高收入，所以企业家集团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与投资。相同的原因也能说明农业家庭与非农业家庭之间、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之间，以及不同

年龄的消费者之间 k 值存在的差异。同时，英美两国相比，由于英国的相对收入地位更加稳定，政府采取了更广泛的安全措施，英国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比美国高。

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如果影响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比率 k 的因素 i、w、u 是相对稳定的，或者是相互抵销的，那么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的比率 k 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这一点弗里德曼运用美国 1897—1949 年的时间序列资料来证明。在该时期，美国 2/3 的年份 k 值稳定在 0.827—0.927 之间。这是由于该时期农业相对重要性下降提高了 k 值、家庭规模的缩小降低了 k 值，二者作用相互抵销的结果。另外 1/3 的年份由于特殊因素的影响 k 值偏离了这一范围。由于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的影响，40 年代的一些年份 k 值低于这一范围；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30 年代的一些年份 k 值高于这一范围。前者是因为战争时期一时收入为正值，而一时消费为负值所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经济萧条一时收入为负值，现期收入低于持久收入的结果。

第六章分析持久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之间的关系。持久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都是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替代物。相对收入假说断言：消费与收入的比率是消费者在收入分配中相对地位的函数。弗里德曼认为，在特定条件下，持久收入假说已经预言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相对收入假说可以看作持久收入假说的特例。在持久收入假说中，假定任何一组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一时收入与一时消费都各自相互抵销，平均值为零，那么等于该组消费者平均收入的消费者现期收入就等于他们的持久收入，平均消费就等于 k 乘以他们的收入。对于现期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收入地位的消费者来说，消费与收入的比率在组与组之间产生差异仅仅是由于 k 的不同，而不需要引入另外的变量来说明持久收入与现期收入的差异。同样地，一时收入为正值的消费者，收入高于平均收入；一时收入为负值的消费者，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所以，根据相对地收入地位对消费者进行分组，至少表明：一时收入相同的消费者处于同一收入地位而分散于各消费者组

之中。

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对持久收入假说作了几点补充说明。尽管在统计资料中无法区分持久收入与一时收入、持久消费与一时消费，但是，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可以从消费者的收入资料中分离出来。假设一组消费者第一年的收入差异完全由持久收入差异所产生，那么他们的相对收入地位在第二年就不会有变化；相反，一组消费者一年的收入差异完全是由一时收入差异所引起，那么他们第二年的相对收入地位就与第一年不相关联。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消费者在两年中收入地位的关联程度推算出持久收入所占的比重。同样地，消费中的持久消费部分也可以从消费者的消费资料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的可能性不仅进一步说明了持久收入假说的可接受性，而且说明了持久收入假说的有用性。

另外，持久收入假说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持久收入假说与财富分配的关系，持久收入假说的扩展以适应特殊范畴的消费品支出，以及收入消费的回归等几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九章，是全书的概括与总结，并指出了持久假说的意义。

持久收入假说重新解释了消费决定与储蓄决定，这就要求重新说明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经济波动原因。持久收入假说的实质性含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储蓄决定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而资本积累主要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大多数收入假说认为，储蓄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即认为总收入水平越低，不仅用于储蓄的数量会越低，而且还会产生一个相对低下的储蓄率；广泛的收入不平等会产生高储蓄率，收入分配愈平等，储蓄率就会愈低。在不发达国家里，由于没有其它途径筹集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资金，实现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很必要的。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储蓄率独立于收入水平之外，低收入水平与低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一个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国家里，总储蓄既可能相对低下，也可能相对较高，这应该用收入以外其它因素来解释。同时，收入不平等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主要依赖于收入不平等的来源本身。表现为持久收入差异的收入不平等并不影响储蓄，表现为一时收入差异的收入不平等则影响储蓄率。这是因为，表现为一时收入差异的收入不平等意味着未来收入是不确定的，有必要增加储蓄以防不测。由此可见，高储蓄率产生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无关。

在不发达国家里，长期以来形成了各社会集团之间相对稳定的等级关系，短期内的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持久收入上的差异，而不会产生高储蓄率。随着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社会集团之间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部分人从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在收入分配上也会出现暴发户和破产、倒闭现象，这时不仅产生了现期收入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时收入的不平等，从而会出现较高的储蓄率。

第二，消费决定与经济波动。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因此在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时，其观点也大相径庭。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收入假说从长期结构和短期波动两方面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长期方面，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自由企业经济将会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按照持久收入假说，财富与收入的比率 w 为影响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的比率 k 的重要变量，w 的增加会提高 k 值，这表明边际消费倾向不仅不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

在短期方面，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根据消费与现期收入的关系来解决经济波动。持久收入假说则认为现期消费主要由较长时期的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决定。由于较长时期的收入比较稳定，边际消费倾向对经济的冲击作用就很小。换种说法，现期消费的大部分是自发的，只有较小部分取决于现期

收入，因此，现期消费对投资的依赖性也就很小。这样投资乘数较小，经济体系虽然存在着周期波动，但波动不大。

《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一方面是战后消费函数理论的重要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直今这本书仍作为名著而受到广泛重视。

（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吴 名撰

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

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的全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它是在由沃尔格基金会发起的会议上所做的一系列演讲经整理而成的。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竞争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要论点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加以限制，政府权力必须分散，应主要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组织经济生活。

本书英文版 1962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张瑞玉翻译，198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序言和绪论外，共分 13 章。第一章阐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第二章论述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第 3—5 章评述政府的经济稳定政策，第 6—13 章评述政府的社会改革措施。

一、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可被理解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故经济自由是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经济自由是整个自由体系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制度即竞争性资本主

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从而使一种权力抵销另一种权力。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已证明，存在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安排同时又没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决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一方面。

自由主义者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一种是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上的自由，另一种关系到个人如何使用其自由。社会组织以两种方法来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一是使用强制手段的中央指挥，即军队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方法；另一种是个人自愿的结合，即市场的方法。竞争性资本主义就是依靠后者。在这种社会中，交换是自由的，资源的利用也是自由的，经济活动都由市场来组织。自由市场的存在并未排除对政府的需要，但市场行为大大降低了政府干预的程度，而这就产生了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性的压制。通过使经济活动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市场便排除了强制性权力的源泉，保证了政治自由不受威胁。

二、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市场虽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协调力量，但有些问题是市场不能解决的，或者即使能加以解决，其代价太高，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第一，决定、调解、强制执行规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都以自我为出发点，每个人追求自由的动机和目的都可能引起相互之间的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个人的自由，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制定规则，并强制人们执行规则。在人们对规则的意义的理解有分歧时，政府还可以起调解和裁决的作用。第二，政府在存在技术垄断和邻近影响的情况

下采取行动。技术垄断是由于技术上单一的企业效率最高而产生的。邻近影响是指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有影响，而又不能为此向他们收费或补偿的情况。技术垄断和邻近影响的存在使严格地进行自愿交换是非常昂贵的或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由政府实行国家垄断或公共调节。此外，政府还可根据家长主义的理由而采取行动，照顾和保护不能负责任的人。

总之，政府可以执行的重要职能是：维持法律和秩序，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作为我们能改变财产权的内容和经济游戏的规则的机构，对解释规则中出现的争议进行裁决，强制执行合同，促进竞争，提供货币机构，从事对抗技术垄断和消除邻近影响的活动，补充私人的慈善事业和私人家庭对不能负责的人的照顾。但是，政府职能应是有限的，应能约束自己。

三、政府的经济稳定政策

凯恩斯主义者力倡政府干预以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弗里德曼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是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主要障碍。为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迫切需要减少而不是进行政府干预。尽管如此，政府在经济稳定方面还会起重要作用。与经济稳定有关的政府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人们普遍承认，政府必须对货币负责，控制货币是控制经济活动波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即使在全本位制情况下，政府干预也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货币安排而言，自动调节商品本位既行不通，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不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促进经济合作的一切问题。同样，历史已证明，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负责稳定货币、管理银行，不仅在政治上限制了个人自由，

而且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样，建立一个既能为自由企业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体系，又不可能被用作威胁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权力的货币制度的唯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能使公众通过政治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又可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的经常出现的不负责任的支配。具体地说，由立法机关根据货币数量的变化为货币政策制定管理规章，命令货币当局使货币数量按具体的比例增长。这里的货币数量包括商业银行以外的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全部存款。联邦储备体系应尽可能使货币数量的总额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年率为3—5%之间的比例增长。上述规章是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它可以将货币政策转变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支柱，而不是对自由社会基础的威胁。

在解决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通常有四种做法：一是减少美国的黄金储备或借入外币；二是在金本位下使美国的国内价格作出相对于外国价格的降低；三是变动外汇汇率，包括固定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四是通过政府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或干预来减少进口、扩大出口。这四种方法中，直接控制是最不好的，对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破坏性。第二种办法既行不通，又不理想。第一种办法也仅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要实现整个收支平衡，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的方法就只能是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下价格虽可以自由变动，但汇率是非常稳定的。它也能导致商品和劳务的自由贸易。而固定汇率制度不能解决根本的困难，只能加剧困难。

凯恩斯主义者所推崇的财政政策这个平衡器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其主要危害并不在于它一向未能做到的消除衰退，也不在于它经常地把通货膨胀的倾向引入政府政策，而在于它持续不断地扩大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并且使联邦税收负担不能减少。联邦预算本身就是扰动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财政政策相应于货币方面的规章是：完全根据社会需要来计

划开支方案，而丝毫不考虑逐年的经济稳定问题；根据社会需要来事先规定税率以得到足够的收入，用以大致补偿有关年份的计划开支；同样不考虑逐年的经济稳定问题；根据社会需要来避免政府开支的或税收的突然变化。政府的财政政策必须以货币政策为基础。

四、政府的社会改革措施

最近几十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存在着企图通过政府来迫使人们为了增强想象的普遍利益而采取违反他们直接利益的活动，故大部分都未达到目标，归于失败。

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职能无限制地扩大了。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干预造成政府财政负担加重，教育质量下降，更重要的是与个人自由相冲突。在学校教育方面应实行公立学校和私人学校联合的制度，这会鼓励竞争和个人自由选择。

政府制定法律试图避免宗教和种族歧视，但这种立法不仅引起对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而且难以达到目的。事实上，自由竞争是减少歧视的主要因素。

垄断主要是由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造成的，而不是由技术原因或私人勾结造成的。要消除垄断，就应取消那些造成垄断的措施，改革赋税法，如取消公司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

美国政府通过颁布营业执照对人们的职业选择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侵犯了个人自由，付出了大量的社会代价，是不可取的。

为实现收入均等这一社会目标，政府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干预收入分配过程，这不仅违背了按产品计酬的自由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个人自由发生了冲突，而且人为地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应以统一税率的个人所得

税来代替累进的税率结构。

此外，政府的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减轻贫穷的计划不仅未达到预期目标，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大部分人的生活自由。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允许私人企业和私人机构参与这些领域的竞争，允许个人自由选择。

（据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邹正方　撰

自由选择：个人声明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

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其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合著的、阐述其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著作。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传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本书揭露了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的种种弊端，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增长及社会政治安定的关系，开列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处方。

本书是由作者的同名电视节目的讲稿改编而成的，旨在为70年代末期美国的经济滞胀问题提供解决的良方。本书英文版于1979年由纽约H·B·乔凡诺维奇公司出版，中文版由胡骑等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全书除前言、导言、附录外，共分10章，主要讨论以下三方面问题：第1—2章论述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第3—9章阐明政府干预的起源和后果、第10章提出改变大政府趋势的主张。

一、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

经济自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原则，政治自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原则。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19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曾给美国和英国带来了黄金

时代，而后来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侵犯则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市场力量和价格机制具有重大作用。自愿交易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市场价格能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交易者在交易中虽然都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却使每一个人都受益。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中起三种作用：传递情报、提供刺激、影响收入分配状况。这三种作用是紧密相联的。对价格制度的作用加以限制会造成经济效率低下。

作为人们达到某些目标的方法，政府也起一定作用，但当今政府应是有限的政府，政府应履行的四项义务是：一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尽可能保持社会每个人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四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这四项原则提供了判断政府干预是否可取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一个社会应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维护并扩大人类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是我们的主人。

在国际贸易中，应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自由贸易还能刺激生产率提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使消费者买到廉价的外国商品，投资者得到较高的报酬，避免外汇危机的发生。在政治上，实行自由贸易可以促进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促进合作的发展，而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只能导致冲突。自由贸易还可以促进国内竞争，消除垄断的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是违背经济自由原则的。东德和西德、苏联和南斯拉夫、印度和日本等的对比表明：在经济活动主要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地方，不仅个人自由的成份较大，而且经济发展较快，公民的物质福利增加较多，人们普遍对未来抱有信心；而在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情况正好相

反。

美国虽然没有实行中央经济计划，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受限制。政府干预使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不能自由地使用所拥有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拥有财料。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使美国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政府干预甚至影响言论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虽然对自由的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但已走得太远，现在迫切需要取消限制。

二、政府干预的起源和后果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使公众产生了一个共同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应对经济进行干预，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这种看法导致政府干预迅速扩大。危机也使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政策作为经济稳定工具的作用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主张。其实，30 年代危机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就是“铸造货币、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由于具体行使职责的联邦储备体系未能正确运用公共市场活动这个政策工具，导致了证券市场的崩溃、货币的崩溃及整个经济的衰退。为了解决危机，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新政”计划，从此政府的作用扩大了，然而政府在其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未达到预期目标。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福利事业迅速发展，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了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直接救济、医疗照顾、医疗补助、食品券、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等广泛的项目，福利开支大大增加。尽管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险开支剧增，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接受公共补贴的名单却越来越长。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全国

大部分医疗费用由政府支付后，人们却抱怨医疗越来越缺少人情味。福利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恶劣的手段企图达到良好的目的。一个吸引人的代替福利制度的方案是：实行负所得税制，并逐步取消社会保险。

政府干预也造成了不平等。平等起初是指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随着人身平等的实现，平等越来越被解释为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应凭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应受到专制障碍的阻挠。这是美国公民中平等的主要含义。无论是人身平等还是机会均等，都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冲突。正相反，平等和自由是一个基本概念的两个方面。最近几十年，平等被解释为结果均等，即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且应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的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造成了较落后的教育制度。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是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或凭单计划，这样做会巩固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更有实在意义。

美国政府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未能产生良好效果。这种保护不仅造成支出剧增，而且由于它反对新的发展、工业革新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反而使消费者利益受损。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提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听任消费者自由选择。

美国工人的现况比以前大大改善，但工会或政府活动并不是造成这种改善的主要原因。只有工人为获得较高的工资而进行的自由竞争才是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的真正原因。

政府在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上的努力尤其不成功。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的过度增加造成的，而后者又是由政府促成的。具体来说，货币过度增加是由政府开支迅速增加、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联邦储备体系执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医治通货膨胀必须由政府降低货币增长率。

政府当局试图以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失业率的办法来医治通货膨胀，但这样做造成了美国经济中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失业率并有的局面。实际上，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办法，而是医治奏效时产生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的医治需要时间，通货膨胀率只能逐渐而平稳地加以降低。

三、改变大政府趋势

由于政府未能达到目标，人们现在普遍反对大政府，潮流在改变。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现已达到顶点，不仅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表明了这种观点，而且人民行为的方式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主张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作用的潮流要取代上述潮流会遇到占优势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为了既限制政府又能使政府履行其主要职能，改变大政府趋势，我们应该制定广泛的规章和条例来限制政府活动的范围。限制政府权力，让人民按自己的价值标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是使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办法。

（据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胡骑译）邹正方　撰

作者介绍

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创始人，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强调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提出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他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西方国家的政策制订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弗里德曼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独立职业活动的收入》（与西蒙·舒尔茨合著1945）、《实证经济学论文选》（1953）、《货币数量论研究》（1956）、《消费函数理论》（1957）、《货币稳定方案》（1959）、《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价格理论》（1962）、《1862—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安娜·施瓦茨合著，1963）、《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1963）、《国际收支：自由与固定汇率》（与罗伯特·罗沙合著，1967）、《美元与逆差》（1968）、《最适货币数量及其他论文》（1969）、《货币与财政政策》（与瓦尔特·海勒合著，1969）、《美国的货币统计》（与安娜·斯瓦茨合著，1970）、《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1971）、《社会保障》（与威尔伯·科恩合著，1972）、《货币与经济发展》（1972）、《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结构》（1974）、《税收限制》（1978）、《自由选择》（与罗丝·弗里德曼合著，1980）、《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与安娜·斯瓦茨合著，1982）、《现在的专制》、（与罗斯·弗里德曼合著）《货币的危害》（1992）等。

〔美〕福克纳，哈罗德
Faukner, Harold

美国经济史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U. S.

一

《美国经济史》以巨大的篇幅详细地叙述了从美洲殖民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它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纳的代表著作，初版于 1924 年。几经改订重版，到 1960 年已印行了八版。其中第二，第五和第七版作过较大的改写；1960 年版除对最后一章“战后时期”补充了截至 1958 年为止的资料外，对全书没作任何大的修改。

《美国经济史》的中文译本由王锟翻译，198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内容包括如下五篇。

第一篇　背景

第二篇　农村时代

第三篇　工业制度的兴起

第四篇　工业革命

第五篇 一个崭新的社会。

下面就各篇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第一篇的主要内容。

1. 研究经济史，必须首先认识研究对象的地理情况和自然资源。人们曾经把文明解释成“人改变着自然，自然也改变着人，一切事物就在这种相互的改变中产生发展”。

大部分是按照征服美洲大陆所写的美国历史，说明了在整个征服过程中地理人文因素与自然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影响着经济生活，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人们的习惯与欲望。

2. 美洲殖民地经济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它与外面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15世纪年末的前几个世纪欧洲历史上一系列事件促成的，是文化的、政治的、特别是经济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可通过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东方的贸易、中世纪的通商道路、商业革命等几方面加以说明。

3. 四个国家——西班牙、法国、荷兰与英国——都力图去统治北美洲大陆。每一个国家都力图在美洲土地上再产生一个新西班牙、新法兰西、新荷兰和新英格兰，它们都在美洲大陆上留下了自己的文化印迹。由此看来，美洲殖民地经济无疑是欧洲经济移殖到一个新的环境。

(二)第二篇的主要内容。

第二篇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是从1607年至南北战争。这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时期，故称之为农业时代。

在这一时期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有：

1. 疆界的不断扩张使美国获得了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无边无际的新土地。土地的增加与人口的激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最有利条件。

2. 独立战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宪法的诞生、有了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中央政府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

3. 工业化正式起步。工农业间相互促进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重要经济活动是围绕着开发资源的行业——农业、渔业、伐木业和毛皮业——以及国外及国内贸易进行的。其中,农业则居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当时的农业是以从欧洲带来的简单生产技术为基础,再加上印第安人的一些土法去进行。经济单位以小农庄为主。虽然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有着巨大悬殊,但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消费类型也十分简朴。

从1978年到南北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农业有三项巨大的发展。第一项便是耕种面积的剧增。第二次是农业专门化的迅速发展。第三是美国真正开始了农业的科学化和耕种方法的机械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主角。欧洲市场的扩大,与美国农业区域的不断扩展是相互协调的。除掉经济恐慌时期以外,物价一般都在上涨,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

(三)第三篇的主要内容。

在1790年到1860年的整个时期内,人们的主要精力仍然继续用于农业方面,但这也是美国从经济上依赖欧洲而转入普通工业品都能自给的一个时期,工厂制度逐渐兴起,美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也逐渐奠定。这些年份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790年到1815年,它的特点是比较精美的工业品要仰求于欧洲。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的动乱,给美国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连续的危机,使国际贸易受到了干扰,但也促成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第二阶段是从1815年到1840年。这时,小型的工厂生产渐渐地出现;同时,制造业以突进的姿态登上了经济舞台。这一时期制造业主要是依靠水路运输来分配它的产品。

第三阶段是从1840年到1860年,在这个时期里,人们发现,用煤炭炼铁和生产蒸汽动力,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铁路的兴起和机器方面的许多新的改进。铁路的修筑对美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已经走到世界级经济强国的边缘。

（四）第四篇的主要内容。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半个世纪，美国经济史上最重要内容就是大工业企业的发展扩大。在这一时期内，美国从农业国转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到 1894 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

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有：

1. 农业经历了一次革命，其中包括农业机器的发明和科学耕种方法的日益推广，也产生了政府迅速和不断地对农业加以注意和协助，以及农业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农业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工业的发展是极大的促进。

2. 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这是北方工业资本主义战胜了南方种植园农业资本主义，它带来了一次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的这一发展，形成了 1860 年以后半个世纪里美国经济生活的显著特色。

3. 这一时期美国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合并成为经济生活中普遍现象。有一系列因素有助于大企业或拖拉斯的发展状大。

（五）第五篇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它由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转移到纽约。

扩张的二十年代，当时被许多人认为开辟了一个新的和永无止境的繁荣纪元。但它是以美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经济崩溃而结束的。

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制度拖到了坟墓的边缘。美国的经济受到摧残。为拯救资本主义，以复兴和改革为主要目的“新政”应运而生。新政措施触及到经济社会诸多层面。

1938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美国产生了两项直接的影响。第一，战争的爆发很快地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时期内美国显然想保持孤立的一切希望，并把这个国家又拖回到世界的轨道里来。第二，把美国从由于 1937 年的萧条而坠入的经济衰退中挽救出来。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具有足够的资源与财富对许多国家

的复兴给予巨大援助的唯一国家。

阅读指导

全书的脉络用福克纳的话说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半世纪以来美国的历史戏剧。我们曾看到了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的边疆居民向西部推进，直到他们征服了整个的美洲大陆，留给了他们的子孙以无可比拟的遗产。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始的农业人口在无穷无尽原料的鼓励之下扩大了他们的利益，而且成为经济生活几乎扩及所有活动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经济不能独立的人民首先获得了政治的独立，以后又获得了经济的独立，直到最后这个国家负起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与政治使命，使它在两次世界大战里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一部开拓一个原始资源丰富与前途无限的地区的历史”。理解这段话有助于我们把握全书的内容框架。

美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传奇色彩。从独立战争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以致于20世纪被举为“美国人的世界”。如果为这一奇迹探源的话，不能不提到美国的无以伦比的两大优势。

第一是地文与自然资源优势。美国海岸线很长且多优良港湾，这有助于与国外展开贸易往来并使交易成本较低。耕地面积广阔且肥沃，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适于种植多种农作物。尤是存量大种类多的自然资源，这是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无可比拟的。

第二是人文优势。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殖民地时期也正是资本主义不断成长壮大时期。即使是美洲被发现这一事件也是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是欧洲文明孕育出来的最革命的因素，它被移植到北美大陆这一理想环境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美国的经济成就，是与独特的人文背景分不开的。

《美国经济史》资料比较丰富，所用资料的范围广泛，不仅有政府档案和专家著作，而且有文学作品、日记和游记。所以本书曾经是美国大学中流传颇广的美国经济史教材之一。但是，受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限制，加之引用的统计数字都取自官

方统计机构，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读者注意加以鉴别。

（据美国纽约哈珀光第出版公司
1960年版，王锟译，商务印书馆
1989年版） 孟 邻 撰

作者介绍

福克讷生于1890年。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福克纳对美国经济史有独到的研究，他在美国是以编写美国经济史教课书而著名的。除《美国经济史》外，他还著有《美国社会经济史文集》、《美国政治和社会史》、《美国劳工》、《从凡尔赛到新政》等专著。如果按照西方对经济史学派的“旧的”与“新的”二分法，福克讷无疑是属于“旧派”的。因为他对经济史的研究基本上坚持了史学传统，并没表现出研究方法上的显著变革。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美国经济史》中，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对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也有表述，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不谋而合之处。作者究竟是否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并在研究中自觉运用，这就不好妄加猜度了。

[美] 格雷戈里，保罗 Gregory, Paul 斯图尔特，罗伯特 Stuart, Robert

比较经济制度学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比较经济制度学》中译本根据美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80年版译出。译者葛奇、许强，蒋士驹校。知识出版社1988年出版。

比较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化成两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比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学。前者主要在可比的经济背景下，研究不同国家各有关变量给其经济带来的影响，而不论经济制度的作用如何。后者侧重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对有关国家经济的影响。保罗·格雷戈里和罗伯特·斯图尔特的《比较经济制度学》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比较经济制度学》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经济制度：定义，比较，理论"（第1章到第4章）主要讨论经济制度的定义、性质、不同经济制度比较的方法，以及现存的各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模式。第二编"运行中的经济制度：几个主要实例"（第5章到第8章）有选择地考察了一些经济制度的实例，包括市场资本主义美国、计划社会主义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主要的变化形式。第三编"经济制度

的相互联系、成就和前景”（第9章到第11章）考察不同经济制度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交往，这些制度的经济成就的比较，以及制度对各种变化的反应。

第一编的4章分别为：“经济制度：定义，衡量，评价”、“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社会主义理论：市场与计划”。第1章着重分析和介绍了经济制度的定义、特征、衡量标准等。作者认为，经济制度就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制度的总和，其目的就是配置资源，以实现国家的目标。在定义上，以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的定义为基础，并作了一些修改，他们的定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就是在一个既定的地理区域内，有关制定和实施生产、收入与消费决策的一套机制和组织机构。”（6页）作者并指出，广义地说，各种机制、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凡有助于作出和实施关于稀缺资源配置决策的，都包括在经济制度内。因此，经济制度是多维的。作者认为，要区别不同的经济制度，有四个属性是关键特征，即：1. 决策组织的形式；2. 提供信息和协调的机制：市场和计划；3. 财产权：支配和收入；4. 确定目标和促导人们行动（即）刺激的机制。作者把经济制度分为三种类型：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从四个特征上对三者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列出“经济制度的分类”表，如下：（16页）

	资本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	计划社会主义
决策结构	分散为主	分散为主	集中为主
信息和协调机制	市场为主	市场为主	计划为主
财产权	私有为主	国家和/或集体所有	国家所有为主
刺激手段	物质为主	物质和精神	物质和精神

作者在衡量不同经济制度时，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衡量标准：1. 经济增长；2. 效率；3. 收入分配；4. 稳定性（包括周期稳定性、通货膨胀、失业）；5. 发展目标。

第 2 章介绍从新古典模型、凯恩斯主义模型到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的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理论。作者认为，在这方面，讨论的主题始终是资本主义在解决资源配置上表现如何，以及国家应起什么样的作用。作者从资本主义理论中推论出对资本主义成就期望的几个假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效率方面应该有较好的表现，但它将会是不稳定的；与社会所有制的条件相比，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而在经济增长上提不出可靠的假说。

第 3 章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否定，列宁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论断，以及苏联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解释。还介绍了修正主义运动、新左派运动的情况。

第 4 章考察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作者简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一方面来源于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国家作用的看法，另一方面来源于 20 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作者介绍了巴罗内的贡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反对论点，以及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对于计划社会主义，作者则主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并考察了物资平衡法。作者也从社会主义理论推论出几个假说，他们认为，两种社会主义在收入分配上要比市场资本主义更为均等；计划社会主义比市场社会主义稳定，后者又比市场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社会主义的效率低于市场社会主义，也低于市场资本主义；就经济增长和实现发展目标说，社会主义在调节储蓄与投资上有较大能力，因而可以与市场资本主义较高的效率相匹敌。

第二编的 4 章分别为："美国经济的资源配置"、"苏联经济的资源配置"、"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化形式"、"社会主义的各种变化形式"。在这一编中，作者对美苏作了重点的分析与对比（第 5、6 章），并分析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印度（第 7 章）、南斯拉夫、匈牙利、民主德国、中国（第 8 章）等国的经济制度。作者认为，在美国，大多数生产要素

归私人所有，决策大部分由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作出，决策由市场协调，市场向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买方和卖方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即价格）。买方和卖方靠经济刺激来推动其行事，但要受到社会加于他们的法律约束。苏联的生产资料几乎全是国家所有，计划是协调和指导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其资源配置制度是政府计划和市场配置的混合，由前者支配后者。市场真正发生作用表现在"第二经济"方面，其规模难以估计。企业经理从计划当局接受指标和指示，同时他们也有相机处置的权力。他们创造出了各种合法与不合法手段，经常导致经营行为的紊乱。作者把法国等五国都归为市场资本主义，同时又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比如：在英国，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国家所有制和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经济。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有更为实际的作用。在联邦德国，市场虽占统治地位，但政府随时准备为实现社会目标而进行干预。作者在分析社会主义的各种变化形式时，主要不是描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作法，而是研究它们区别于苏联的特征。比如，南斯拉夫是作为市场社会主义代表提出来的。作者较系统地介绍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

第三编的 3 章分别为："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国际贸易"、"经济制度的成就"、"经济制度的比较：趋势和前景"。在第 9 章中，作者分析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贸易政策，试图分析出制度对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影响，并论述限制这种贸易的惯例性障碍。

作者在第 10 章中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在人均收入保持相同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工业份额比资本主义高，同时，农业比资本主义重要性大。社会主义重视重工业，但对城市化和对外贸易重视不够。社会主义计划把增长目标放得很高，但经济增长并没有更快。计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增长率差异并不很大。在战后初期，生产率增长在两种制度上不相上下，但 1960 年以后，计划社会主义的增长变得更为粗放化了，增长的代价变得很高，表明消费者作出的牺牲更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比政府

再分配作用不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均等，但与福利国家相比差别很小。按失业和通货膨胀标准衡量，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更为稳定，但这种稳定很可能是以损失经济效率为代价而换来的。总的比较表明，计划社会主义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方面没能获得比资本主义更为出色的成就。

在第 11 章中，作者分析了经济制度的趋势和前景，介绍并分析了趋同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

（据知识出版社 1988 版）

姚开建撰

［美］加尔布雷思，约翰·肯尼思 Galbraith, John Kenneth

丰裕社会
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

本书是加尔布雷思的成名作。自初版后，被列为西方最受欢迎的二十本畅销书之一。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政界人物对之大加赞赏。英国工党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说："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它将与我们时代中创造历史的一、两本书籍同样地被人称道，……20年以后，《丰裕社会》一书所发生的影响，将与今天《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发生的影响相比拟。"英国《每日电讯》载文称颂，"作者的答案，其重要性可与30年代凯恩斯的著作相比……在60年代，它将提供作为处理我们早已富裕的社会中陌生问题的流行的思想工具"。

现根据本书结构对其主要理论观点分别地进行介绍。

一、观念的转变

本书第1章带有概述性质，阐明了全书的主题。加尔布雷思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是以贫困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即使已经实现了富裕的人民的观念，也不是在财富的世界中铸造出来的，而是贫困世界的产物。因此，人们一直被贫困的观

念困扰。目前美国虽然已经进入丰裕社会，人们的观念虽然已经有所调整，但也只不过是一种不被理解的调整。作者的中心议题是，目前必须从贫困社会观念转向丰裕社会的观念。

作者从第2章到第6章进一步分析了观念转变的问题。他把过去的经济学称为“传统智慧”，而这种“传统智慧”充满了悲观沮丧情绪。亚当·斯密虽然抱有希望，他的视野是一个前进的国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停滞而走下坡路的社会。但他只说“国富”，只说“总财富”，“并没有希望以商人、制造家为一方，而以工人大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分配，将大有利于后者。”因此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工人大众的收入可能越来越被压低下去。李嘉图的分配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都描绘了社会的黑暗面。凯里虽说是一个例外，但也不是绝对的乐观主义者。凯里认为，人们并不象李嘉图所说的那样，被迫申请耕作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使他们的报酬越来越低；相反，他们首先耕种山顶贫瘠而不受阻碍的土地，然后在较晚的时期，再着手解决山谷间浓密的植物，把树木清除以后再进而开垦肥沃的冲积土，他们劳役的报酬不是更少些而是更多些。但是凯里仍有保留意见，他相信马尔萨斯观念，甚至猜想人们“将无立足之地”。至于乔治·亨利和凡勃伦，不但远没有乐观的态度，反而成为“忧郁的预言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李嘉图走得更远。

作者通过历史的叙述，最后得出结论说：“传统智慧的敌人不是观念而是事件的发展。正如我所提醒的，传统智慧并不适应它要解释的世界，而是适应听众的世界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必须转变观念。

二、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在分析了“传统智慧”之后，加尔布雷思在第7章到第12章分别考察了不均、经济安全、生产地位、消费者需求和

国家安全问题。

在竞争社会中，效率总是受到鼓励。能干的企业家和工人受到奖赏，无能或懒者受到惩罚。如果人们是贫困的，唯一的希望是收入的重新分配。收入若是普遍分散，就会被普遍消耗掉，但若流入富人集中的川流中，一部分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因此富人是必要的，过分的均等将使文化一律而单调。

在本书的体系中，分配不均只是一个铺垫，因为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不均是一种不安全因素。因此紧接着他就进入了经济安全的分析。他认为，在竞争社会，不安全是固有的。个别企业家或工人的好运可以在任何时候遇到突然的衰落。这种好运的变化，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用的。所谓“不可避免”，是由于他们是这个制度适应变化能力的一部分。当需要和愿望变化的时候，人们就会受雇于新岗位而游离出旧岗位。资本投之于新工业而旧工业中则被注销。所谓“不安全有用”，是因为它驱使人们尽其所能作最有效的服务，而对于不能适应者给予严厉的惩戒。

经济不安全虽说在原则上很有价值，但并不是最佳状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倾向于追求安全。可幸的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经济不安全因素已开始消除。因为不安全的最大来源，在于竞争以及竞争市场价格的自由而不能预见的变动。垄断的产生，使企业得以控制供给和价格，从而也就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安全。尤其在现代大公司的权力范围内，可以减轻或消除以往工商企业所遭遇的每一种重要风险。这是对企业或公司而言，那末工人、农民或其他个别公民又怎样呢？加尔布雷思认为，他们获得安全必须求助于政府的援助，或者自行组织起来，如工会。

传统观念认为，经济不安全是效率和经济进步不可缺少的因素。其实，这是“经济观念史中最大的失算”。加尔布雷思从而认为，经济安全和效率并无矛盾。“事实上，对于经济安全日益关心的年代，也是生产率无比增进的年代”。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说明了安全年代产量的增长，并指出，“在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历史上产量中最令人难忘的增加，发生于当人们开始关心减少竞争制度的危险以后。"

关于国家安全，加尔布雷思也和"传统智慧"大相径庭。在传统智慧的命题中，国家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证明了下述事实：胜利最后在于最大的国民总产额，也就是说，"军事力量是经济力量的函数"。加尔布雷思认为这是一种无稽之谈。在一个丰裕社会，民用经济很难转向战时经济的需要。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消费者预料到货物可能会减少，立刻开始保护他们自己以免被剥夺消费权利。他们跑到商店去购置汽车，无线电、厨房耐用品、家具、罐头食品……1961 年第一季度国防支出较和平时期最后一季度上升 129 亿美元，但平民支出却增加了 190 亿美元。消费者为保持平时生活水准，有效地先占了经济总产量，其结果是带来有损害性的通货膨胀。平民对购置货物的竞争，使军事生产增长缓慢而费力，可见，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并非总是成正比。因此，支持国家安全的因素并不完全是经济规模，而在于有多少可转用于公共目标，其中不仅包括用于武器和防御的公共开支，而且包括教育和训练所需高度发展的人力方面的开支。因此，和平时期防御设施的准备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比经济实力更重要。

三、通货膨胀和物价稳定

接着，作者在第 15 章至 17 章讨论了通货膨胀和物价稳定问题。

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物价上涨，是生产高度扩张的一种现象。当供应不易增加的时候，那末需求的增加可能带来物价的上升。加尔布雷思的这种观点和凯恩斯有些类似，即需求拉上引起通货膨胀。

加尔布雷思反对用增产的办法救治通货膨胀。因为增加

生产一般要增加生产能力，其中包含着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又将以工资、原材料、资本报酬的形式扩大支出，这必然会导致需求增加，于是又会形成更为厉害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加尔布雷思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消除通货膨胀和实现物价稳定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为货币政策虽然具有魔力，但银行必须具有无上权力。货币政策属于银行界，这种权威的运用不应受政治家的干涉或仲裁。中央银行要保持"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政府之上。在现代社会，这种特权并不存在。至于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袭来的时候，通常采取增税的办法。借提高课税压缩需求，在开始时就会碰到理解障碍。在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的时候，通过减税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增加总需求和就业，现在已经普遍被接受了。可是通过增税抑制通货膨胀，必然增加消费者的生活费用或减少他们的收入。这恰恰发生在当通货膨胀使许多人们难以维持过惯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因此通过提高课税来打击通货膨胀的办法，必将遭到相当多数人们的反对。

究竟何以消除通货膨胀和实现物价稳定呢？加尔布雷思对此设问较多，正面回答却语焉不详。他只是模糊地提到，只有在降低的需求使生产量低于现有设备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的时候，才能有效。也就是说，要暂时牺牲生产以求得物价稳定。

四、社会平衡和投资平衡

作者有两章篇幅（第18、19章）讨论了所谓社会平衡和投资平衡学说。

所谓社会平衡，首先是各种产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钢铁、石油和工作母机的产量是与汽车的生产有关联的，对于运输的投资必须和待运货物的产量并驾齐驱，动力的供应

必须和需要动力的工业增长相适应。

其次是社会消费的平衡。一种产品使用上的增加难免引起对于其他产品的需要。假使我们消费更多的汽车，我们也得要更多的汽油，还必须有更多的汽车保险以及使用汽车的空间。价格制度加上十分丰裕的情况是造成消费不平衡的动力。

在加尔布雷思的社会平衡学说里，劳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劳务系指提供社会服务的"活动"。为了说明私人生产的和国家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之间的令人满意的关系，这个名词我们称之为社会平衡。可见，社会平衡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所谓投资平衡，指的是资本数量增加的比例关系，特别是物力投资和人力投资的比例关系。

在投资结构中，加尔布雷思特别强调人力投资的重要，这是由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性质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随着庞大而复杂的工业设备的发展，单纯的经验型人才就难以适应了。对人的投资，正象对物的投资一样重要。"在其现代复杂体系中，一种投资要依靠另一种投资"。更为重要的是，以技术进步为支点的投资的改进，目前几乎全靠对于个人的教育，训练和科学机会上的投资。

对物质资本的投资配置，传统经济学是通过市场分配实现的。假如石油工业的收益较高，纺织工业的收益较低，那末资本就会流入石油工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无疑会促进效率。但是这种"自由流转"的配置方法在人力资本上显然只能是不确定和无效率的。因为几乎所有对人的投资都在公共领域以内，而且实际上都在市场体系以外。因此，实现物力投资和人力投资之间的投资平衡，就只能依靠国家。正是国家，通过初级和中等学校，通过学院和大学，对人作了最大的投资。

五、普遍贫困的消除和“新阶级”的生成

本书的最后又回到了开始讨论的主题：富裕和贫困问题，实际上是全书的总结。

第 20 章是一个简短的过渡，第 21—22 章，进一步分析了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安全问题和平衡问题。第 23 章和第 24 章的标题是“贫困的新局面”和“劳动、空闲和新阶级”，这是全书的结论，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论安全与生存”，纯粹出于国防目的，主要针对苏联，和全书结构并无必然联系。

加尔布雷思强调，传统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说教，现在正受到现实的挑战，那就是“丰裕社会”。他认为，现在贫困的确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代贫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个别贫困”。不论社会多么繁荣，这类现象都会存在。加尔布雷思认为，个别贫困通常与若干个性有关，诸如心理缺陷、身体不健康、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训练，生育过多、酗酒、缺乏教育等等。由此使他们不能分享一般的福利。第二类可称为“岛国的贫困”，或“贫困的岛屿”。在这岛屿上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贫困的。这显然不能用个人缺陷来解释，加尔布雷思只好另外寻找答案。他把岛国的贫困归结为下列原因，即比较多数的人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消耗在（或者接近）他们出生的地方。这种留恋家乡的本能阻碍了他们从出生的贫困岛屿中逃避的解决方法。

总之，现代美国已进入丰裕社会，甚至已经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比饿死的人多”，富裕到“特别是男人，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大多数人的极端贫困”已经转变为“比较少数人的极端贫困”。贫困的原因只是个人或家庭的特殊性质和地理环境，而与社会制度无关。救治贫困的方法是增加生产和实行社会救济。

社会的丰裕和贫困的消除，“苦力”劳动者的人数减少，“空闲时间”增多，工作变得悠闲和输快，劳动者成为“新阶级”，即“工作不再具有痛苦、疲乏或其他精神上或体力上不舒适”的阶级。这就是“丰裕社会”所要努力追求的“主要社会目标”，并且是现在已经开始实现和逐步接近的“主要社会目标”。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出版徐也平译。）

石 云 撰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1973)

在加尔布雷思为数众多的著述中，本书是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它全面且集中地反映了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的特色和一贯的政策主张。全书共有 5 篇，31 章，其中第 1—20 章的内容基本上是作者以前所写的两部著作——《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中所阐述的主要论点的修正和浓缩。从第 21 章开始一直到全书结束约占全书 1/3 的篇幅，被作者用来阐释作为其理论特色“社会改革”学说和具体的政策建议，这是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部重要著作的重要部分。所以，作者在前言中奉劝读者“读了这么 20 章左右之后，不要半途而废。只是从那里起，才讨论到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下面我们循着加尔布雷思的基本思路，概要地介绍这部著作的内容。

一、公共目标：对“增长”神话的发展

“公共目标”是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会经常遇到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经济畸型化、环境污染、城市腐化和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麻烦，根源在于“公共目标”的被忽视或被误解，他在书中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在受其影响的政府官员和一般市民的观念里，似乎只要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速发展，一切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经济增长”可以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消费品，使人们普遍富裕，“经济增长”可以使企业扩大，收益增多，因而，“增长”几乎成为令人迷醉的神话，成了不可动摇、不容怀疑的信念，在这个是非善恶标准之下，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出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结果是，经济增长越快，环境的破坏和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日益严重，公众利益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加尔布雷思指出：“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制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而汽车主对于汽车使用所产生的一般后果尽可以表示遗憾，却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个人在总的损害中所增入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个人的消费也并非是一种“无烦恼的享受”。作者在第四章中谈到：“产品的拥有和消费超过某一限度时，除非把由此而来的辛劳能委托给别人就会变成累赘。”并指出“在消费上的限度是个严重的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以“增长”作为“目标”，势必导致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产品的实际效用如何。要增长，就要有技术革新，有所设计、新发明，撇开它们给环境带来的破坏，给消费者增加的累赘以及给妇女带来的劳顿不

谈，这些新设计、新发明到底有什么用处，那些热衷于“经济增长”的和把“增长”说成是公共目标的公司经理，政府官员和正统经济学家们是从来都不予考虑的。武器的研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技术革新使得旧武器被新武器所替代，而新武器又很快被更新的所淘汰，消费品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形，“革新的目标所在不是适应需要，而是所革新的产品能不能行销或者是对付私人或政府需求时能不能适应。”这一切均与“对人的关心”大相径庭。

“但求精密化而不切实际”的正统经济理论把人们领上了歧途，“把信念扭曲得过甚”，而加尔布雷思本人所要作的工作就是——“信念的解放”。他说，不把人们从这些错误的信念之下“解放”出来，“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公众的幸福，而只会是社会的祸患。”他的所谓“信念的解放的目的就是恢复被正统的经济理论异化了的“公共目标”，树立其权威地位，摆脱经济学教科书上对“目标”的解释和政府官员等对“增长”的鼓噪。那么，真正的“公共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公共目标”也就是一个“经济体系”的目标“是对人民所需要的作最大限度的供应”。这样一个“目标”说起来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但真的操作起来却阻碍重重。

二、“两个系统”：权力分配的不平衡

同加尔布雷思的大部分著作一样本书在分析方法上也具有典型的“制度学派”特色。加尔布雷思研究的中心是“结构改革”。注重的是“制度”的变化，他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为重要。

在加尔布雷思的制度因素分析中，尤其着重的是“权力”分析，正是从“权力分配”入手研究，才得出他的一系列论

断，特别是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结构的看法。

加尔布雷思认为，以现代的美国而论，尽管它已经与100年前或50年前大不相同，但迄今它仍然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贫穷和环境污染等等痰症仍在时时困扰着这个“丰裕社会”，并常常使它捉襟见肘，这究竟是为什么？加尔布雷思解释道，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个系统”。

加尔布雷思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大经济，即由1000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另一部分是分散的小经济，由1200万个小企业、小商贩、农场主和个体经营者等组成。这两部分即有联系又有分别，前者有权力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实行的是“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采取的是“操纵价格”，所以这部分经济又称作“计划系统”；后者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反而要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听命于市场，由市场波动决定其命运，所以这部分经济可以称作“市场系统”。关于以上“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加尔布雷思指出：“计划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系统所屈从的那个环境中的一部分。市场系统所使用的动力、燃料、机器、设备、原料和交通运输就是计划系统供给的。市场系统的参与者所购入的消费品和劳务中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它供给的。同时它也是市场系统产品的一个重要买主，就农业而论，情况最为显著。”他认为，虽然“两个系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它们之间不断发生交换关系，但在交换中双方的权力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市场系统买进时，在价格上显然不能不服从计划系统的规定。市场系统出售其产品和劳务时，其中的一个很大部分，其价格不是由它自己控制的，实际上不得不屈服于计划系统的市场力量之下。在权力的这样分配下，显而易见的是，在一切方面，计划系统会比市场系统进行得更加顺利。”为了更深入地剖析“两个系统”作者用了整整3章（第18、19、20章）的篇幅，详尽地

论述了大公司与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给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只关心大公司的利益，为大公司效劳，而不会为小企业服务，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剥削类似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甚至是更为厉害的一种剥削。他说："要彻底纠正计划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这两部分经济间权力的均等开始。"

三、"新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设想

加尔布雷思曾经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现实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而且在于提出一套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设计出使之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他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入手分析得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两个系统"互相对立衍生出种种不合理现象的结论。他主张尽快消灭这些不合理现象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权力均等化"着手，实行"结构改革"。

加尔布雷思把他本人为现代资本主义所开的"药方"命名"新社会主义"，他解释道："首先需要积极提高市场系统的权力和能力，提高它与计划系统相对下的发展程度，从而从这一方开始，缩减两个系统之间在发展方面一贯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这里应采取的步骤是，从事缩减两个系统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场系统的谈判力量，减少计划系统对它的剥削。我们把这个叫做'新社会主义'。"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在这种"新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大公司的权力将受到限制，政府不再被大公司所操纵，小企业的地位将得到改善，同时，"公共目标"也被重新重视起来，个人的生活福利得到保障，医疗保健事业有很大发展、环境卫生和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文化、教育、艺术事业也不断取得进步，加尔布雷思强调说："新的社会主义不容有进行抉择的余地；除非以极端

不愉快、相当严重的社会混乱，有时还会对健康和福利造成致命打击这类现状为代价，否则，这是无法避免的。新社会主义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是受环境逼迫的结果。”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无法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公共利益”出发，使政府承担私人企业所不愿承担的发展经济中的落后部门的责任，使“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二者的缺陷得到补救。

本书的第 25 至第 28 章专门论述了实现“新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方案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1) 实行累进所得税制，消除收入不均等。加尔布雷思指出：“要通过温和的手段在计划系统中达到较大程度的均等，累进税制是必不可少的。”他还主张通过国家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一定的收入，主张各民族工人的工资不受歧视，等等。

(2) 反对通货膨胀。加尔布雷思认为，现在劳资双方总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提高工资，然后企业按工资成本加成定价，使利润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从而把由协议所产生的工资提高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物价上涨，生活费用跟着提高，于是又引起下轮工资提高的要求，如此循环下去，形成了“在工资和价格上不断加剧的螺旋上升倾向”，引起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因而，他主张政府应实行工资与物价直接管制的政策。

(3) 清除环境污染。加尔布雷思认为，对环境损害的补救办法，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用“公家资金”来进行清除工作，除此，还必须用法律规定某些界限，在界限以内容许消费和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他强调指出，这是“现代立法机关的一个重大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任务。”

(4) 增加国家预算拨款。但这是为了扩大投资，为了增进社会的福利和利益，而不是为了“计划系统”。

(5) 保证各部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6) 实行最大公司的国有化。这是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改

革措施中极其重要的一项。他反对经济军事化和军国主义，主张军事工业公司应首先实行国有化。

（据美国波士顿霍顿·密弗里公司 1973 年版，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于会汇撰

作者介绍

加尔布雷思是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最重要代表。现已退休，但仍为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加尔布雷思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权力转移论、目标更换论、生产者主权论、企业与外界关系转变论、阶级冲突变化论、二元体系论、结构改革论等。加尔布雷思著述颇多，主要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一种价格管制理论》(1952)；《大崩溃：1929 年》(1955)；《丰裕社会》(1958)；《经济发展论》(1965)；《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货币》(1975)；《没有把握的时代》(1977)。

〔美〕吉尔德，乔治
Gilder, George

财富与贫困
Wealth and Poverty (1981)

本书是供应学派的代表作，也是里根政府的政策主张。它为里根竞选时提出的“经济纲领”作了理论宣传。问世后，受到美国供应学派的高度评价，把它称之为“美国新右派的资本主义宣言书”。下面分三个部分予以介绍。

一、供应学派与资本主义

吉尔德遗憾地写道，近代一个重要的大事是“资本主义未能取得不断相应的胜利”。一些思想家在驳倒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据那样令人信服，可是在赞颂自由企业制度时却总是带着几分近乎哀歌的声调，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正在衰败这一令人忧伤的结论。思想家们对生生不息的资本主义唱起了“胜利的挽歌”。

吉尔德认为，正如沃尔特·李普曼赞美的那样，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它能使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自由、博爱和平等怀有的道德抱负，同消灭贫困、增殖财富一致起来，这个制度所以发达兴旺，其

原因在于它为企业家的英雄般的创造力提供了用武之地。

然而，一种强调公平分配的经济思想使资本主义黯然失色，高福利、高税收给美国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顿，储蓄率下降，大部分投资转向可以避税的非生产性活动，如囤积黄金，购置不动产，从事投机买卖，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贫困所起的相互作用—贫困可以使人努力工作创造财富——被歪曲了。而崛起的供应学派的使命就在于重视资本主义的生机，恢复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消灭贫困的功能。

供应学派能完成这一使命吗？吉尔德认为，供应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律——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先于需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由于无法事先知道回报的是什么。因此，在给予(供给或投资)之前就要冒险，当然还需要信任。只有从事这种“理智的风险事业”，才能在怀疑和信任的共生圈中创造财富，这一供应学派思想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崛起的供应学派就是资本主义的希望之光。“你给大家，大家才会给你”。这不仅是富裕的秘诀，也是经济增长的秘诀。

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证将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的资产构成的。然而有形资本和自然资源很少能说服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思想和精神也是财富，经济中思想和精神的质量，可以胜过资本的数量。最好的、最能使人信服的、具有创造性的和灵活的智力构成是最持久的财富。因此，资本主义的财富，一方是有形的资产，另一方面是无形的思想和精神，而在智力财富中，很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资本家承担风险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它为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在资本主义经济创造财富这出戏中，“最主要的不是可以衡量的金钱和机器，也不是累积和分配，而是智力和精神”。

吉尔德承认，不管美国经济多么富裕，美国仍是一个挤满了穷人的世界。贫困可能与移民和黑人等问题有关，但重要的是，历史上每一个集团的成功都是依靠他们在低工资的职业中比别的阶级更加辛勤劳动。他得出结论说，摆脱贫困的唯一可靠的道路始终是工作、家庭和信仰，而不是政府的

转移支付。穷人不仅要工作，而且要比处在他们上面的阶层更辛勤地工作。吉尔德认为，结婚会刺激男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单身的男人工作懒散，而且喝酒、吸毒。还有一种途径是信念，能够搬走使停滞不前的世界经济受到折磨的怠惰和萧条之山，把美国变成一个商业帝国。

二、资本主义受到侵蚀

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秘密，在于它把追求安全（体现在储蓄上）转变为愿意冒险（体现在企业精神上），把小心谨慎变为创造力，把胆怯变为企业家的雄心壮志。资本主义制度的健康状况，取决于保险与风险之间，团结与竞争之间，储蓄与投资之间能否取得平衡。没有合作和安全并不会比没有风险和竞争的刺激更能使资本增长。在力图达到平衡时，风险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国家作为风险承保人，企图把个人和企业的所有风险如失业、通货膨胀、外国竞争、需求不振、意外事故都承担起来，这就超出了它能承担的能力。

自新政以来，美国日益成为福利国家，保险原则成了联邦政府的问题。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这个福利国家很早以前就已走到了阻碍生产的地步。保险的特点已使风险失去了平衡，许多人感到忧虑。70 年代，美国主要的福利项目增加到 44 种，其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倍，为工资增长速度的 3 倍。福利制度对贫困者的生活状况确有重大影响，但它对“人们的动力和自力更生也有强烈的消极作用。如果福利金超过穷人的普遍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那么福利制度最终都会扩大贫困，并使贫困永久存在下去。福利不仅对工作有害，而且破坏家庭，使穷人继续贫困，伴随着福利的意识形态——支持一套联邦政府的官僚制度——也起着销蚀穷人信心的作用。

然而，美国似乎已达到了一个时代的终点，左派正在被淘汰。里根以自己的行动证明，改变规则可以减少福利，但享受福利的家庭及时调整他们的生活，“有可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机会。”在理论上诞生了拉弗经济学，“拉弗曲线”证明了，低税率能够刺激企业。能导致收入从避税场所转向可增加税收的部门，使较低的税率能带来较多的税收；私人部门可以减轻繁重的税率负担而无需削减公共部门的服务。拉弗经济学主张减少税收，减少控制。减税可以帮助穷人，当高税级的税率降低之后，富人消费减少，投资增加，他们的收入增加，支付的绝对税额也增多。因此，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可以少缴纳一些税金，同时还能维持一定的政府服务。减税还可以制止通货膨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吉尔德看到，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发挥它的功能，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贫困在积累，它们迫切要求美国经济迅速增长。

三、重视资本主义的生机

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有赖于把政治制度从过长的倒退性保护转移到对未来的进步性信奉上去，这个变革必然要克服社会中的所谓“进步”思潮和趋势。这种思潮认为政府应创造一个有秩序的、可预知的经济，避免风险和不确定性，其实质就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试图否定控制风险性，不但违背了资本主义精神，也违背了人的本性。

千百年来，人类繁荣昌盛有一个重要条件，即对冒险和工作的信念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冒险和信仰，政府的责任就是为其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据纽约基本图书出版社 1981 年版，中文本储无冲等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崔殿超 撰

作者介绍

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供应学派的重要代表。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高级研究员。吉尔德著名的著作有：《财富与贫困》（1981）、《企业家精神》（1984）等。

〔美〕格里芬，基思
Griffin, Keith

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Econonic Development

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基恩·格里芬讨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著作。它对本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各种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历史的、经验的和统计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各种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

全书除序言等外，共分9章（中文版删去了第8章），主要讨论下述问题：发展的历史回顾、发展的多种途径、货币主义战略、开放经济战略、工业化战略、绿色革命战略、再分配战略、战略比较。

一、发展的历史回顾

1950—1984年，第三世界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一直快于人口的增长，受教育人口增加，文盲数下降，并且在许多方面改善了生活质量。不过，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仍很低，一些国家的贫困的范围仍很广泛，收入分配存在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二、发展的多种途径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丰富多彩的，它们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也是多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的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六种：

（1）货币主义战略。其独特之处是致力于提高作为改善资源配置导向的市场信号的效率。这种战略经常在危机时期被用于稳定经济和调整失衡。其重点放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金融改革上。这种战略追求宏观经济目标，但具有某种微观经济导向性质，国家的作用较小，私人部门被当作发展的重点。

（2）外向型发展战略（开放经济）。这种战略依赖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私人部门起主导作用，但特别强调发展对外贸易，鼓励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此战略中，政府往往采取鼓励出口的措施。

（3）工业化。其重点是增长，增长的手段是制造业部门的迅速扩张。这种战略直接关注经济增长率的加速，大力强调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引进先进技术，加快大城市发展，政府干预起重要作用。

（4）绿色革命战略。其重点是农业增长，目标是增加粮食的供给、直接帮助工业，强调农村地区的技术变革。该战略往往被看作是促进总增长加快、减少贫困、使收入分配较平等的战略。

（5）再分配战略。该战略关心的是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优先采取直接使低收入者获利的措施来解决贫困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直接的国家干预来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其目标是把穷人的需要置于首要地位，并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6）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其独特之处在于生产资料主要

实行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对大多数经济活动实行中央计划控制。历史上计划一直用实物指标、配额和数量控制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现在也用价格指标来指导经济。

三、货币主义战略

货币主义战略的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第三世界存在的价格扭曲及其对资源配置带来的有害后果，但其提出的政府目标是有限的，其提出的通过提高公共部门的价格和改善农业交易条件来解决价格扭曲的政策处方是无效的。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实践表明：仅仅理顺价格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全面负起管理经济的责任；理顺价格也是不容易的；什么是“正确的价格”并不是明显的；自由市场并不必然产生“正确的”价格，且自由市场中产生的价格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应；第三世界国家应保留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

四、开放经济战略

开放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经济越开放，可能获得的增长率越高。开放经济是指允许生产要素以及商品和劳务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理论上，开放经济应能提高一国的产出增长率和投资率，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收入水平和导致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助于改进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缓解失业问题。但是，实际上，开放经济战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流动不仅数量小，甚至导致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结构调整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

题并未缓解。尽管如此，开放经济仍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该战略的一些特征可能形成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一些最成功的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这是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从中还可得出一些较具体的结论：那些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和严重高估汇率而持续全面地歧视出口的国家，失去了加速发展的许多机会；政府干预应当针对内在扭曲的源头，最优的干预政策应是对产出进行直接补贴；贸易对资本形成水平和新投资效率的影响，要比对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加重要；一国利用开放经济的能力取决于其投资率；开放经济在不同国家对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在开放经济发展战略与民主或独裁的程度之间并存在直接的联系。总之，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在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生产之间保持中立的政策，可能是最明智的政策。

五、工业化战略

第三世界国家要增加其占世界制造品出口中的份额就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第三世界工业化的途径有三条：最普遍的途径是致力于以国内制成品取代进口消费品，这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这种战略中，政府往往对制造业提供不加区别的保护。这种战略通过多种形式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如促进了制造业部门的扩张，改变了工业内部的产出结构，鼓励了工业产品的国内销售，影响制造业甚至国民经济的要素比例，改变了收入在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城市过度扩张等。第二条途径是通过集中建设资本品工业和中间产品工业实现工业化。在这种战略中，政府在建立和经营资本品方面起主导作用，倾向于发展公共部门。这种战略的主要危险是因储蓄供给不足，战略将发生动摇。三是促进工业品出口战略。这是一条艰难道路，它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平均收入水平，有利于改善收入分

配状况。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工业化可以作为这些国家的一种成功的发展战略。

六、绿色革命战略

在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土地改革难以广泛开展，而绿色革命战略则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原先的绿色革命战略鼓励第三世界集中力量采用和迅速推广粮食作物的高产品种，强调技术变革和科学进步，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利益，但并未带来总的农业生产的突破。经修正的战略——完全农业主导型发展战略考虑了更广泛的技术类型，强调政府的公共投资，不主张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战略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践表明，政府在农村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七、再分配战略

再分配战略有消费再分配战略、投资再分配战略、资产再分配战略三种。再分配战略要获得成功，必须包括 5 个核心要素：生产性资产（尤其土地）的再分配；创设一些地方机构使人们能参与发展过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经济基础设施；选择具有就业强度的发展型式；通过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或以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做到这一点；实现人均总收入的持续、迅速增长。这些要素可确保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人力和实物资本的迅速积累及产出和收入的迅速增长。在这种战略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平分配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很重要的。

八、战略比较

对上述6种发展战略，可以以下6方面进行比较。

（1）资料利用和收入水平。货币主义战略在特定条件下可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优组织和最有效的产出构成，但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低效率。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往往导致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和微观经济的低效率并存。同样的结果也是一些工业化战略的扭曲的特点，但不是那么明显。在资源利用和收入方面最为成功的发展战略是开放经济。出口导向工业化也可获得许多同开放经济一样的好处。绿色革命战略和再分配战略在利用资源效率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

（2）储蓄、投资和增长。货币主义战略往往导致储蓄和投资的低水平、产出和平均收入的低增长率。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通常有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而实行其他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储蓄率、投资率和增长率水平往往处于上述二种战略之间的某个水平。

（3）人力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预期在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在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和绿色革命战略中要大。

（4）贫穷和不平等。再分配战略和社会主义战略在减少贫穷和不平等方面较有成效，而其他战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较小。

（5）国家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战略中，国家的作用最大；在货币主义战略中，国家的作用较小；其他发展战略中国家的作用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6）参与、民主和自由。在货币主义战略中，镇压、暴力和独裁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战略中，民主和自由缺乏，公众参与程度较低。开放经济战略中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参与状况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工业化战略在这方面与开

放经济战略大体相同。绿色革命战略中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参与状况取决于该战略被执行的情况。再分配战略强调参与，较易维持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

（本书英文版 1989 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由傀吉祥等翻译，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之一由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邹正方　撰

作者介绍

格里芬，美国经济学家。格里芬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经济发展战略有较深的研究。《农业变迁的政治经济学》（1974、1979）、《土地集中和农村贫困》（1976、1988）、《国际不平等和国家贫穷》（1978）、《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1984）、《中国的收入分配》（与赵人伟合编，1993）等。

〔美〕格鲁奇，阿兰
Gruchy，Allan，

比较经济制度
Comparative Econounic Systems

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格鲁奇编著的一部比较经济学著作。它全面介绍了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世界各种经济制度的结构、职能、成就、问题和前景。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6篇21章，各篇分别讨论：经济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共产主义经济、不发达的经济、严峻考验下的经济制度。

一、经济制度的本质

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的组织的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参加者是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个人和集体的需要有关的。现行经济制度可分为四种模式：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兼有美国、英国、前西德、法国、日本这些国家经济制度的共同的主要特征；成熟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包括瑞典、挪威及工党执政时英国的战后经济；发达的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包括前苏联、中欧和南斯拉夫经

济；不发达的经济模式，涉及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经济制度的比较涉及经济制度的结构、职能、环境、成就等各方面。

二、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财产主要由私人所有，为私人利润而使用私有财产，财产所有者和利润追逐者必须是同一个人或团体且对国民经济的方向和水平负有主要责任。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制度的分界线在于私人的经济积极性的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必要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完全竞争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市场或交换制度为核心的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第二，有调节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中，大寡头垄断企业在国家的经济事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干预。第三，有指导的或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理想模式，这种模式比第二种模式有更多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指导。

美国经济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代表。在美国经济中，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经济面临着更明确地规定国家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以及国家的优先事项的问题。美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逼近到提出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的严重关头。美国经济制度将向比目前有更多的"共同指导"方向发展。

英国与美国一样，阻止了日益向政府干预和计划发展的强大趋势。要使英国经济持续地活跃起来，就要彻底扭转许多不利的经济趋势，采用法国等国家采用的指导国家经济的形式。

西德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一种按照竞争的交换经济的方式建立私人企业经济的模式。交换经济被认为

具有内在的、向均衡运行的趋势。但这种均衡的实现需要政府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这种模式的实施对西德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实行有明确指向的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纲领，这种计划是指示性的，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他经济管理手段使经济朝着规定的目标前进。法国的计划经济是促成经济稳定而高速增长和较低的失业率的重要因素，但它在解决社会福利方面尚有需改善之处。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经济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保守党执政时的英国等国，虽有干预政策，但在主要的私营企业中，自由放任的强大趋势仍在起作用。第二类是意大利、丹麦、西德、芬兰等国，其自由放任倾向比第一类要小，干预和调节的范围较大。第三类是法国、荷兰、挪威、比利时和日本，国家计划起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有组织、有指导的资本主义。

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

西欧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费边社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社会主义。第三种社会主义的一种变型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实行的过渡时期的部分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其共同特点是保留私人企业制度，但实行国家计划，扩大经济控制系统。

挪威实行由社会主义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私营企业、农场等经济主体朝着计划目标前进。计划经济是挪威取得较好经济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府实现了收入的公平分配、广泛的福利国家和国家的计划经济，但仍实行私营企业制度。其国家计划是指示性的，不为企业规定具体目标，只是通过各种政策引导私营企业，促进计划目标的实现。瑞典的这种模式是

一种有效率的、伴随极高生活水平的模式。

英国的社会主义在一切基本点上与挪威、瑞典模式相同。英国工党政府也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使企业决策与总的经济增长目标相一致。但英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并未使英国经济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

挪威、瑞典与英国在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上所产生的差异，根源于政治、观念和制度多种因素。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将进一步发展。

四、共产主义经济

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经济有四种类型：第一，动员的共产主义经济，其基本特点是立足于战时的动员性，强调精神刺激、实物计划。其区别于其他共产主义经济之处在于它否定消费社会、巨大的工资差别和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依赖。第二，正统的或斯大林主义的命令经济，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外延发展、自上而下的计划、重工业优先发展、严格限制消费自由和职业自由。第三，改革过的命令经济，这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其重要特点是高度集权的宏观决策和有一定自由的企业决策并存，较注意经营效果，价格更接近于成本，但消费者的自由和经商的自由仍十分有限。第四，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其主要特点是中央政府下放了大部分计划职能，不再制订详尽的实物计划，关键经济机构是工人自治的合作社或集体，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是一种较开放的经济。分散的和民主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是共产主义经济发展方向。

前苏联是计划经济国家，以实物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支配着经济活动，这种计划有助于实现工业化和达成优先目标，

但效率很低。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企业经理权限很小。苏联在农业中实行集体农庄制和国营农场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苏联的劳动就业、工资、外贸、财政制度和银行体系、价格体系都是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存在着效率低下、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等问题。

经互会集团国家一开始都模仿苏联经济模式，60年代以来较注重内涵的增长，并进行了经济改革，其共同趋势是改变命令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共同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居民生活水平。各国改革的成效是不一样的。

南斯拉夫实行以生产资料的联合的社会所有制、工人自治和自由市场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在建立有活力的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也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存在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失业率较高、国际收支赤字等问题。这种模式的前景无法预言。

五、不发达经济

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是：经济严重依赖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且分配不公平；就业不充分，失业率高；储蓄和投资少，市场供应不足；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

对不发达国家的增长战略来说，哈罗德—多马模型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主张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扩大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少数重工业的投资。此外，印度等国已建立了两部门增长模型，这种模型要求通过扩大公共部门的范围、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增长。但是，这些战略并不能解决不发达国家现存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并不美妙。

中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发达国家，

重要的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很小。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虽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但造成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印度选择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私营部门属于主导地位，但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干预作用较大。这种模式并未取得成功。

六、严峻考验下的经济制度

各种经济制度的共同特点是，都要解决稀缺问题，都要用最有效的办法利用稀缺的资源。效率问题是与计划、管理、价格、收入分配、赋税和福利等问题紧密相联的。但是，各种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管理决策等方面存在一些重要差异。

世界经济制度存在趋同现象，也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观念和制度都要发展，以便各国都能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本书英文版1967年由美国豪顿·米夫林公司首版，中文版根据1972年第2版由徐节文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邹正方　撰

作者介绍

格鲁奇，美国经济学家。　格鲁奇是美国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比较经济学、经济史有较深的研究。格鲁奇的主要著作有：《现代经济思想：美国的贡献》（1947）、《比较经济制度》（1967、1972）、《当代经济思想：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72）、《经济学的重构：对国际经济学基础的分析》（1987）等。

〔挪〕哈维尔莫，特雷格夫
Haavelmo, Trygve

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
Probability Approach in Elonometrice

《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原系哈维尔莫于1941年4月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并作为《经济计量学》杂志的增刊发表于1944年7月。本书的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译者：秦朵）。全书除序言和结论外，共6章。现按顺序简介如下。

在序言中，作者除勾画出全书研究的最初想法和全书的结构外，重点强调了作者这项研究的意义。作者写道："为经济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是本书的目的，现代概率论与统计推断理论是本书的基石。"作者在剖析经济学家不愿接受概率模型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的表现和原因后，主张对于经济研究中的问题用更为严密、概率式的形式表述。

在第1章"抽象模型与现实"中，作者首先指出，要理解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理论模型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对"经济变量的准确数量定义"和"观测变量"、"真实变量"与"理论变量"的重要差异等问题作了阐述后，作者把在数量化的科研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试验性模型。作者认为，要想准确描述科学家

是如何着手建立模型的，这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建模是个创作过程，是一门艺术，是运筹一些真实现象的理性化概念与这些现象产生的机制的艺术过程。建模的全部思想的基础信念是，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互有关联的真实现象归到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存在某种不变的因素。二是检验理论。按照作者的看法，检验就是要在数据基础上，做出是接受并应用某理论还是否定它、换用另一理论的决定的过程。三是估计问题。所谓估计就是在数据基础上，把有关某些变量的所有可能的先验理论分为两组，一组为可接受的理论，另一组为必须否定的理论。四是预测问题。进而，作者指出，后三个方面的问题与假设的概率公理化密切相连。由于没有概率公理化，以往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处理造成了许多混乱。在概率公理化基础上，这些问题就能得到明确定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便构成本书第4、5、6章的主题。

作者在本书第2章，用较大篇幅对经济规律的持久程度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自然科学中存在着稳定规律”的说法不外乎是在说，自然科学已经为认识物质现实选择了颇有成效的路径。相应地，“经济生活中不存在常定规律”的说法不仅过于悲观，而且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即从现有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得出的关系式是否能应用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事件。我们可以讨论由试图对比现实与现有经济理论体系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可以试图找出合理的解释，以说明为什么迄今为止成功建立经济“规律”之举较为稀少。作者认为，首先应该花些气力来澄清这些有限问题。作者在说明了“常量关系”是什么意思之后，对经济关系的逆转性和经济规律表达式的简化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重点对经济关系的自律性作了论述。在作者看来，在科学研究领域，经济学领域及其他领域，人们寻求“解释”的过程，是深挖出比人们仅是“站在那里可看到”的关系更为基本的关系的过程。如果我们日常观测的真实现象确由基本规律的一整个系统之联立行动主宰，并假设每条基本关系式对于一类波动都保持成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整个这类假设波

动的极小一部分。我们用各种途径只要把两条或多条基本关系结合起来，就可能建立起无穷多条关系，来描述所观测到的波动。特别地，人们有可能用众多方式将一个经济变量写成一组其他变量的函数。因此，将一个经济变量表述为某组其他变量的“某个函数”并不意味着什么，除非我们将该关系式设定成立的“环境”也具体表述出来。在本章的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一般规则，即，每个理论应伴有一种实验设计。

在第3章，作者讨论了作为经济计量学基础的随机理论，并特别强调其与经济学相关的某些方面。作者给出概率的定义后，通过考虑一个普通的六面骰子来进一步说明概率这一概念及概率演算的意义，进而引出基础概率集合、累积概率法则以及基本概率法则（或概率密度出数）。继而考察含数个随机变量的系统。按照哈维尔莫的看法，这种系统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指含多个随机变量的系统，其中每个变量都联系着一基础概率集。另一类随机变量系统指的是随机抽样。作者在论述概率论的实际意义时，指出，利用一事件的可观测“发生频率”作为其概率的纯理论概念之对应物，这对各个领域的研究都颇有成效。概率分布的纯理论概念是推导实际判断的有效工具。作者还论述了与经济数据相关联的随机变量与概率分布，并给出了将可观测变量分为“系统部分”和“扰动部分”的方法。最后，作者还对随机方程与确定性方程作了界定。作者认为，“一组变量满足某一方程”的说法，或应用于抽象数学理论，或应用于真实生活中的变量，场合不同则寓意不同。作者先论述随机方程，然后从其出发便可通过对一个或多个变量做新的解释，推导出一定的确定性方程。作者将确定性方程分为两种重要类型，第一种可称为“倘若没有误差存在”类，第二种称为“期望值”类。作者认为，当人们要在随机方程组内进行代数运算时，认清这两种类型的关系式之差别尤为重要。为此作者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在第4章“假设检验”中，作者认为，经济学家没能把

其理论表述成为充分设定了的统计假设形式，从而使统计学家无法“弄懂”经济学家的“语言”这一不幸除了经济学家的原因外，也有统计理论方面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整个统计学理论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直到近期由于内曼和皮尔逊的基础性工作，局面才有所改观。作者高度评价了内曼和皮尔逊统计假设检验工作。认为他们通过引入几条统计假设检验与估计的十分广义，而本身又十分简单的原则，为统计学研究工作开辟了新路，使高质量的研究结果不断涌现，逐步把统计理论提高到真正的科学水准。作者写道：“内曼和皮尔逊原则的基本重要性在于，这些原则系统地阐明了哪些是属于统计理论与统计推断领域的一类问题。这样，如果经济学家需要统计学家的帮助，他们就能看清，他们究竟得怎样来系统地表述其理论。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应当懂得这些表述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即使自己不是统计学专家，他们至少能问出明智的统计问题。”在概述内曼和皮尔逊统计假设检验与估计理论的基本原则之后，作者进而指出，这一理论体系不仅能为解决经济理论的验证问题提供有用的工具，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理论验证问题的本质，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作者还以一个简单而又相当重要的经济统计例子为例，说明在假定一时间序列中的附带差变为一简单类型的随机变量条件下，检验该序列中是否存在趋势。最后，作者还论述了“从数据观察中形成理论”这一说法的含义。

作者在第5章“估计问题”中，着重讨论一个与经济研究具体相关的问题，即随机方程组的参数估计问题。作者通过对经济方程组中参数估计问题的广义公式化的讨论和对函数中参数个数的可约简性的讨论，试图说明，研究不定乘数的问题以及其他有关经济方程组估计的问题，都会归结为研究一随机方程组中随机（可观测）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的性质这样一个问题。作者还通过考察一个简单的供求系统，来进一步表明研究随机关系系统中所有可观测随机变量之联合分布的重要性。

第6章是“预测问题”。作者认为，统计预测不过是指关

于尚未观测到的一个样本点位置的（概率）论断。于是，若真正知道待预测变量的联合概率法则，推导具有一定所需性质的预测公式的问题就不过仅是概率计算的问题。然而，人们往往是不知道待预测变量的概率法则的。于是，预测问题便与假设的检验和估计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了。在对预测问题的广义形式化进行讨论之后，作者针对其中涉及到不少数学问题及大量代数运算，推荐了一种简单的手段，这种手段可能能够成功地应用于经济计量学和其他类型的统计研究中的某类经常出现的普通场合。

在全书的最后，即结论中，作者指出，通过采用形式化更为清晰的概率模型，经济学家可能会从其数据中得出更加有用及更加可靠的信息；并且，这种形式化的概率模型还可能对我们该去找什么样的数据，以及如何去收集数据等有帮助。作者相信，如果人们想把经济学本身建成一门规范的数量科学，那么许多经济学家就得修正他们对研究中所需要的统计理论与技术水平及冗长工作量的观念。

总之，本书以现代概率论与统计推断理论为理论基石，试图通过研究，为分析各种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提供理论基础。这本书不但为当时的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技术、模型识别技术及模型设定检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框架，而且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与建模思想做出了深入的剖析。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哈维尔莫的这部著作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及教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经济计量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全书虽篇幅不很大，但份量不轻。阅读时，除具有一定的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知识外，还应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这样才便于理解作者的有关论点。

（据商务印书馆 1994 年中文版　秦朵译）

吴汉洪　撰

作者介绍

哈维尔莫是挪威经济学家，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要著作有：《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1944年）、《经济发展理论研究》（1954年）、《论投资理论》（1960年）等。其中《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论方法》为哈维尔莫的代表作。哈维尔莫1950年为挪威科学院院士，1957年为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79年为丹麦科学院院士。

〔美〕哈伯勒，戈特弗里德
Haberler，Gottfried

繁荣与萧条
——对周期运动的理论分析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yclical Movement（1937）

本书原为英文版，发表了 1937 年，由国际联盟印行，第一版问世后，曾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关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并由国际联盟先后四次重印；1957 年，本书首次由私人出版商印行。中译本由朱应庚、王锟、袁绩藩根据 1958 年新版本翻译，1963 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 542 页。

本书是西方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积大成之作。书中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找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然后对于经济周期的发生与发展作出了综合的表述，并为避免经济危机提供理论依据。正如哈伯勒在绪论中所说的，“本书所研究的只限于分析现存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从而对经济波动的性质及其各种可能的原因作出综合的说明。”“……目的是在于找出萧条的原因和挽救方法”。

一、经济周期理论的有系统的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哈伯勒主要是分析现存的经济周期理论。他首先指出，各种理论的分歧往往只是由于侧重点不同所致，所以他的努力是要揭示其共同之处。他把要研究的问题归纳成几个要点：一般特征；高涨的解释；高涨转折点的解释；低落的解释；低潮转折点的解释；反复性、周期性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国际复杂关系。然后便以此开始对各种周期理论进行分析。

首先是纯货币理论。哈伯勒选择霍特里的学说作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乃是‘一种纯货币现象’”，即“货币流动”是产生繁荣与萧条的唯一具有充分理由的原因。经济周期的高涨是由累积的信用扩张引起的，而信用扩张中止以后，繁荣也就到了尽头；然后是累积性的收缩过程，使经济陷于漫长而痛苦的萧条之中，直至信用的再一次扩张带来经济的复苏。哈伯勒指出，“霍特里先生关于经济周期的货币理论，其间格外有意味的一个特点是，对扩张过程与收缩过程的累积性这一点的论证和分析。”在这一点上，各派理论家之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至于霍特里理论的另外一些特点，“是比较有疑问的”。

其次是投资过度论。这是许多理论家所提出的相互间密切关联理论的概括，他们的中心论点是，生产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工业，跟生产消费品工业对照下，有了过度的发展。即：资本品工业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远比那些生产日常消费品的工业更为严重。持这一论点的理论家们还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货币投资过度论。他们认为，生产所以会发生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不平衡，是由于在某种信用机构——银行体系——形成下活动的货币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被列入经济周期货币解释的范围，所不同的是，对这类作家说来，

经济周期还不只是一个纯货币现象。通过货币因素造成了实际上的生产结构失调，结果使繁荣趋于崩溃。这一派的代表是哈耶克、马克路普、米塞斯、罗宾斯、罗布凯和斯特里尔。第二派，哈伯勒称之为非货币投资过度论。斯庇索夫和卡斯耳是这一派的杰出代表。与前一派不同，他们把对经济周期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范围内的那些因素，如新发明、新发现、新市场开辟，等等，也就是为新投资提供机会的那些环境。在他们的论断中，萧条往往是资本品生产的过剩与消费品不足所致。第三派，由制成品需求变动引起的投资过度——派生需求加速与扩大原则。这一派的理论家认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消费品生产的变动，会引起一般生产品生产——尤其是固定资本设备的生产——发生更为猛烈的波动，这就是所谓“派生需求加速与扩大”的原则，它为阿夫坦利翁、比克达克、庇古等人加以阐述，并为克拉克和哈罗德用来解释经济周期。

在分析了成本变动，横的失调与负债过度等危机与萧条的原因之后，哈伯勒又探讨了“消费不足论”、“心理理论”和农业与经济周期—— “收获论”。

最后，哈伯勒在“关于新近发展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一章中，系统阐发了凯恩斯的理论：随经济的高涨，收入将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是由于边际消费及储蓄倾向的作用，使得消费的增大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又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投资小于储蓄，这就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

至此，哈伯勒对于现存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为以下的关于经济周期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经济周期性质和原因的综合说明

这一部分，是哈伯勒对前面所分析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

的一种综合表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并不认为这里所提供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理论，而只不过是就现有的种种理论加以综合和引伸而已。”

哈伯勒重新明确了经济周期的意义，他从就业、消费、生产三个方面来定义萧条与繁荣，并且把一般意义下的经济周期与学术意义下的经济周期相区别。阐明了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高涨、低落、危机和复苏，并指出周期的两个经常性特征：生产和货币需求的平行动向，生产品格外猛烈的波动。在上述基础上哈伯勒对扩张过程与收缩过程进行了分析。他从扩张的起点开始分析在存有未运用生产资料条件下扩张的演进，此时劳动力的供应具有充分的弹性，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价格、成本与利润都有提高，固定资本投资受到刺激增长尤为显著；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流通额的扩张是一个必要条件，由于新投资机会的出现，使所吸收的资金超过了储蓄，不足部分，便不得不求助于通货膨胀；资金供应方面的变动，往往会使扩张力量进一步加强，因为经济的扩张，足以使贷出者提高信心，愿意以较低的利率贷出资金，在扩张过程中，由于对制成品需求的反应，预期的作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特别是加速原则的作用，使生产品与耐久品的生产比非耐久消费品的生产增长得更快。扩张过程中不同时期储蓄的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扩张本身。

在对收缩过程的分析中，哈伯勒指出：“收缩过程跟扩张过程一样，也是累积性的，自行加强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把通货收缩理解为以货币计量的商品总需求的逐渐减退，那么它就会起主导作用。因为通货收缩的蔓延被各种因素加强，便会造成累积性的经济收缩。这一过程在货币上的表现是总需求的减退，投资的累积性下降，资金供应枯竭。其原因在于中央银行直接发动的通货收缩，个人贮藏黄金与纸币，商业银行收缩信用，企业机构进行贮藏，非银行债务的清偿，债务人被迫出售资产。与扩张过程相反，生产品与耐久品的生产比消费品与非耐久品的生产要减退得快，这里加速原则又起了主要作用。

关于两个转折点——危机与复苏，哈伯勒进行了如下分析。

对于收缩（即危机）的近因，哈伯勒认为有以下几种：局部干扰引起总需求减退，政府与银行实行收缩通货，成本提高引起的局部衰退等。那么，为什么当经济体系扩张演进超过了某一点以后，就越来越经不起通货收缩的冲击呢？这是因为扩张得以顺利进展需要两个最主要的条件：弹性的货币供应和弹性的生产资料供应。而一旦扩张超过了某一点后，货币供应和生产资料供应就变得缺乏弹性，劳动力资源日趋枯竭，障碍便逐渐发生。此时由扩张过程自身也酿成干扰。生产结构的失调，加速原理的作用，信用收缩与生产因素不足对派生需求的影响，无可避免的生产变更，工人效率的降低，由于需求不足的投资减退，等等，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走向复苏的近因，主要有生产者支出，可投资金供应增长，可投资金需求增长，对投资的某些刺激和消费支出增长。那么为什么当经济体系收缩演进超过了某一点以后，对扩张刺激会越来越敏感呢？这是由于生产要素供应和信用供应随着收缩的演进逐渐恢复了弹性，从而使收缩丧失了动力，而收缩过程也多半会发生扩张倾向，如信心的恢复，投资的复活，重置的需求，工资的降低等，都会使经济出现新的转机，并走向复苏的高涨。

最后，哈伯特阐述了经济周期的国际方面。

在这一部分，哈伯勒着重分析了以下三个分化因素对国际之间经济周期的影响：第一个是运输成本，也就是商品与劳务的不完全可动性。它可能控制繁荣与萧条共存。第二个是投资、信用与银行业务地方化，即资本的不完全可动性。它们对周期动向所发生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对当地繁荣与萧条会发生挫抑作用，而有时则相反。第三个是国家的通货自主。这里，哈伯勒主要探讨了金本位、汇兑本位和自由汇兑三种条件下的资金国际间流动以及经济周期对不同国家的影响。

三、影响经济稳定的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

本书的第3篇和两个附录，是哈伯勒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某些倾向的评论和对经济周期最近一些演变的概括和评价。

在这一部分中，哈伯勒的论断是，“时下的经济理论有很大部分‘对实际’因素过于着重，而对‘货币’因素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制度的价格刚性与工资刚性的现象，则略而不论，或者是对于它们的重要意义在大体上没有加以重视”。他指出，“广泛定义下的货币因素，对于短期的经济不稳定，也就是通常的经济周期以及支付平衡不稳定和长期失调之所以会形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因为“反应作用比猛烈的外在冲击更加值得重视，而在反应作用中，货币因素是占有首要地位的”。

（据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谢 岩 撰

作者介绍

哈伯勒，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伯勒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阐明了价格水准概念和使用价值指数衡量其变动的方法。他根据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详细阐述了古典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并以此引伸出福利含义，对于自由贸易和保护的优点与不足作出了精确的表述；他还综合了经济周期的主要理论，剖析了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医治办法。哈伯勒的主要著述有：《指数的意义》(1927)；《国际贸易》(1933)；《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商业政策上的应用》(1936)；《繁荣与萧条》(1937、1958)；《经济增长与稳定》(1974)。

〔美〕哈根，埃弗雷特·艾纳尔
Hagen, Everett Einar

发展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发展经济学》英文第一版1968年由R·D·曼温出版公司出版。1968年、1975年至1980年和1986年先后四版。全书共分五编二十一章，473页。本文根据英文第五版分五部分介绍。

一

第一编“导论”，包括第1—4章，概述发展中国家的概况与特点。

第1章“若干事实介绍”，描绘了世界上100万以上人口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强调指出：(1)增长与发展不是同义词，前者是指通过技术改善而使实际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后者包括许多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变革；(2)人均劳动生产率或人均收入都不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办法。应采用总要素生产率。即每单位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综合产出；(3)从长远来看，一国增长率比其现有收入水平更能决定未来收入水平；(4)欠发达国家具有“落后的有利条件”，能更快地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

第2章“增长的障碍”，论述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特有

障碍理论。欠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低和发展速度慢的原因，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较好知识方法的缺乏，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则侧重于强调存在发展障碍。其中主要包括：(1)低收入、从而影响储蓄率、资本形成；市场规模、投资引诱。导致两个恶性循环；(2)结构刚性。资产所有者或权贵阶层对技术发展和收入最大化的反应不敏感，对资产的运行和商业机会不关心，对创新不感兴趣；(3)资本短缺。高收入的权贵沉溺于西方文化，将其收入用于同西方权贵一样的现代化消费之中。甚至化大量外汇购买国外奢侈品，而使国家无力进口资本形成所必需的先进投资品；(4)经济依附。跨国公司(MNC)的初始投资固然可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但它同样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和出售股票汲取当地资本资源。跨国公司资本主要投入高档消费品，与经济发展目的相背。主要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迫使发展中国家劳力过剩，低收入工作，以便使初级产品低成本生产，并以低价格卖给工业化国家；(5)封建地主、工业保皇主义和中产阶级的统治联盟垄断市场，截留利润，不以公众福利为目标；(6)不平等交换。由于价格差异、工资差异、技术差异，使发展中国家价值流向发达国家。

第3章“不相同的地方”，注意到了欠发达国家在国土规模、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矿产资源、民族特点、宗教文化、教育状况、创新精神、国际地位、与西方的联系、殖民统治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出现了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增长道路。

第4章“低收入国家：陷入贫困的人民及其增长过程”，描述了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和一群极少增长国家的贫穷问题及其经济增长过程。强调了：(1)低收入国家70%以上劳动力从事农业。其中70%以上是自耕农；(2)不赞成用三大产业划分法，而主张根据农村非农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制造业、服务业的划分来分析产业运动；(3)不能通过汇率转换为同一单位所得出的人均GNP(名义估计)来衡量欠发达国家的贫穷程度，而应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进行比较。

二

第二编“农业与工业”包括第5—7章，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与工业发展问题。

第5章“农业”，讨论了欠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和农村其他发展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1) 农业与贫困的关系；(2) 农业与增长的关系（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提供城市增长所需的粮食和原料，增加出口等）；(3) 低价政策、汇率政策和利率控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及与此相应的三种农业投入品和产品价格的出现；(4) 发展中国家土地占有及农场规模的二元主义（最极端形式出现在南美），即大量土地为少数大地主拥有，小农土地散布其周围；(5)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进程、形式及后果；(6)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创新问题、经济效益问题；(7) 绿色革命。

第6章“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学与技术”，通过工厂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工厂制度和工厂规模的发展、各国工业化的不同进程等侧面，研究了生产率是如何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得到发展的。

第7章“内向型工业化与外向型工业化”，是上一章的延续。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中的政策选择及两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等问题。论述的顺序是：政策选择；进口替代；历史趋势；出口推动作用的效果；工业化政策经济学；从内向型向外向型工业化转换的困难；局部性的转换；工业发达地区；出口是工业化的动力吗？如何扩展发展中国家，工厂的未来市场；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的直接成本与社会成本；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比较。

三

第三编“经济增长：国内投入”包括第8—13章，论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式问题。

第 8 章“劳动的供给与就业”，直接制约经济增长的国内要素很多，其中劳动力的动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本章首先论述了投入与产出的关联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随后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分析了 1979—2000 年劳动力增长趋势，并结合发展的障碍探讨了劳动力过剩经济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矛盾。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技术性失业和一般失业的状况；托达罗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提出的如何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速度的理论和模式；国际间劳动力迁移问题等。

第 9 章“资本形成的可获得资源”。资本是生产三要素之一。其存量的多少，形成的快慢，是促进或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那是因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扩展，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都需要以不断地投资为先提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因而有可能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资本的来源是储蓄，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转化为投资和物质资本。储蓄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储蓄倾向。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金应集中投入生产性较高的工业部门，并鼓励和引导劳动使用偏向程度高的创新（拉尼斯—费模式）；也可以通过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分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来增加储蓄倾向高的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收入（刘易斯模式）。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金融资产相对于物质资产的比率比上期上升。通过金融手段或债务资产制度来动员经济剩余（将储蓄引出并用于投资）的方法日益重要，其中包括利率调整、税种和税率的变化、自融资调节等。

第 10 章“教育与人力资本形成”，主要论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及其相关问题。首先述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基本状况（预算中教育支出比例上升很快、入学人数和入学率大幅度增加，但总体上说仍处于初级水平上）。其次言及教育效果（主要问题在于普及率低、辍学率高、教育与实际严重脱节、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教育制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再次涉及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初级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私人教

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社会教育)。最后谈及智力外流问题和教育回收率问题等。

第11章“创新的企业家”，在分析了人力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后，着重强调了企业家在企业运行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章的内容包括企业运行的性质和企业家的性质；何谓企业家？社会学与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口。

第12章“政府”。政府对经济的参与主要是通过计划管理和各种政策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来进行的，同时它也直接创办和经营企业。因此，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生产者和支出者。行使着不同的经济职能。本章分析了：(1) 税收结构和税收政策。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受资本积累的约束，税收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为公共投资筹集充足的资金；刺激私人企业把更多收入用于投资)。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 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官员。(3) 国家所有制企业。这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特殊方式。一是为了调动储蓄；二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三是为了承担大型项目；四是为了社会利益；五是为了促进地区间和部门间平衡发展；六是为了加速发展关键性瓶颈部门。国有企业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能起重要作用，但其弊端是效率低下和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必然趋势。(4)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是财政赤字和增发货币造成总需求增长快于总供给增长(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二是供给无弹性和结构刚性而引起物价上升和信用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适度通货膨胀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刺激私人投资和扩大公共储蓄；高度通货膨胀则是全面有害的。资本家和政府都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因而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长期得不到完全控制。(5) 政府的项目计划。机会成本（影子价格)。宏观计划和部门计划。

第13章“两种不同制度的实例”，以日本和中国为例。分析了前者的经济结构、经济比例和成功的经济扩张之路；也阐述了后者的毛主义理论、农业生产组织和非农企业、经

济发展成果、政府机构与增长的关系等。

四

第四编“人口理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包括第14—17章，论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收入分配问题。

第14章“需求方面”，研究了需求增长的原因、政府财政、进口需求、资本流动、获取外汇等问题。

第15章“人口增长理论”，描述了世界人口增长的轨迹，并预测了未来增长的趋势。其中涉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理论、低水平均衡理论、人口决定论、人口出生率理论等。

第16章“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性的增长，首先引起与有限土地资源间的矛盾的激化；随后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和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净城市移民的增加促使城市的规模和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城市化政策往往注重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又刺激了城市继续膨胀；出于对城市发展过快的担心。许多贫穷国家奉行城市分散化政策。

第17章“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增长越快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而且越来越差异悬殊。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也未能解决贫困问题。本章在上一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收入分配理论、家庭收入问题、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和增长速度的关系、收入分配政策的衡量、如何直接资助穷人等。

五

第五编“经济增长的国际因素”，包括第18—21章，论述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18章“商业政策”，考察了国际贸易问题。5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按照比较利益出口食品和原料，是增加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和完成结构转换的最快道路。后来事实证

明，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以导致一国走上发展道路。原因是需求增长缓慢、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收入波动。本章围绕这一问题，分析了贸易形式、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地区、卡特儿、价格和收入的稳定化。

第19章“资本流动：Ⅰ”和第20章“资本流动：Ⅱ”，研究如何改善从富国向穷国转移资本资源的过程。从重新确定发展目标的角度看，目前最重要的是使资源转移给穷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程度的平等。19章着重于资本流动一般理论、直接投资形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各自政策等；20章侧重于经济援助方面的组织、成果、过程和问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金融稳定和金融扩张、70年代的贷款等。

第21章“梦想与冷酷的现实”主要分析了本世纪最后20年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渴望及其遇到的挫折。

《发展经济学》是受到广泛重视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石　乐

作者介绍

哈根，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伊利诺伊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担任缅甸政府经济顾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务颇有研究，曾提出一种用于说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问题的社会变革理论。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变革理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缅甸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等。

〔美〕汉森，阿尔文·哈维
Hansen，Alvin Harvey

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
Monetary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

《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英文版 1949 年由麦克劳—希尔公司出版。中文版由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全书除前言与两个附录外共十五章。本文根据中文版分三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 1—5 章，介绍了货币供求理论。

第一章“历史上货币与收入的比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货币对收入的比率，说明货币需求与收入的关系。汉森把 1800—1947 年分为四个时期，分析了马歇尔 M＝K·Y 这一公式中，货币与收入比率 K 的变动。在过去这一百五十年间，K 的增长有快有慢，并不是按一个固定比率上升。给定一个收入水平，无法决定适当的货币量；给定一个货币量，也无法决定收入水平。这就是说，货币量和国民收入之间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系。历史资料表明，长期中总货币量按每年 5—6％的固定比率增长，但价格有时高有时低，收入也是这样。1800—1900 年间货币的购买力有增加的趋势，但 1900—1047 年间却陡然下降。由于实际收入增加，货币也增加了。货币对收入的比例有明显长期增长的趋势。从财富和收入方

面看，当公众变得较为富有时，以及当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时，公众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比收入本身增加得更快。

第二章“货币的创造”，分析了货币创造时程。自十九世纪以来，各国货币发行由私人转归政府，根据存款货币和储备货币、银行资产和货币数量、联邦储备银行与其成员、战争时期财政和流动资产增加之间的关系，现代货币的扩张有以下几种方式：(1) 黄金的货币化；(2) 私人信贷的货币化；(3) 政府公债的货币化。商业银行通过私人和政府信贷的货币化来创造存款货币，联邦储备银行可以通过黄金和政府信贷的货币化来创造货币。储备货币部分变成了成员银行的储备金，在此基础上，它们能使存款货币成倍地扩大。

第三章“货币数量论和马歇尔的观点”，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决定。合意现金与实际现金是不同的，如果实际现金大于合意现金，就有三种结果。一是多余的现金花费于物品与劳务，使收入、就业、产量、价格增加。二是利率下降，也会引起商品和劳务购买量的增加，并使收入和产量增加，也许会有或多或少价格的多种上升。其三债券价格高，卖出债券持有货币，利率下降极少，不会引起购买实物，多余的现金被作为安全的长期流动资产。贸易需求与固定资本品增加的需求是资金需求增加的原因。根据对休谟的纯货币数量论和马歇尔现金余额说的分析，现金余额是收入的函数。如果货币供给既定，收入由货币需求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所决定。

第四章“流动偏好、投资与消费”，对比了马歇尔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 (y)、利率 (i) 和资产 (A)，货币需求函数为 $L=L(y, i, A)$；投资取决于利率、收入和资产、投资函数为 $I=I(i, y, A)$；消费取决于收入、资产和利率，消费函数为 $C=C(y, A, i)$。作者重点分析了货币的交易需求，认为当利率高到一定程度时，交易余额也有弹性，在此界限以上，利率越高，交易者会越节约现金余额。

第五章“收入与利率”，分析影响收入与利率相互关系的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是：投资需求曲线，即资本边际效率

曲线；消费函数；流动偏好曲线；由货币当局创造的货币数量。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用 IS－LM 模型来分析利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结论是："节俭的变化将影响到消费函数，同样影响了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反过来又影响流动偏好和利率水平。资本边际效率的增加通过对收入的影响，将影响利率水平；反过来，这又影响流动偏好曲线和利率"。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 6—10 章，论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价格理论。

第六章"收入理论：图克，魏克赛尔，阿夫塔利翁，凯恩斯"，是对国民收入决定与价格理论的概述。通过对图克、魏克赛尔、阿夫塔利翁和凯恩斯理论的分析对比，说明了收入的价格理论包含收入和总需求分析以及成本和总供给分析。如果货币支出或总需求增加的速度超过实际支出或总供给的增加，一般物价水平必将上升。这就是说，物价的涨跌取决于货币支出和实际生产的对比，即通过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来决定。

第七章"成本函数，就业与价格"和第八章"工资与价格"分析成本函数与价格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成本函数与充分就业，有效工资和价格水平，货币数量和收入理论，工资、成本与需求的关系的分析，说明企业家应根据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不同阶段确定其生产成本，产品价格应按边际成本大于充分就业时产量的成本来确定。技术进步和发明是影响长期成本的主要因素。工资额下降不会引起货币收入和货币需求减少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效的工资稳定是现代工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目标，它是关系到自由社会的维护和生存的重大问题。

第九章"凯恩斯的货币与价格理论"，根据凯恩斯《通论》第二十一章，解释并发展了凯恩斯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价格水平由收入与总产量或总需求与总产量的关系决定，货

币数量可以通过它对总支出或总有效需求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价格水平。有效需求与货币数量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变化，价格与有效需求也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变化。货币和价格理论已是根据货币量变化决定价格弹性的观点来分析货币量变化与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有效需求对货币量变动的弹性主要取决于决定货币需求的流动偏好，因此，货币量变动对价格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流动偏好以及影响效率工资或成本函数的因素。

第十章“价格的历史观点：使价格稳定的因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使价格稳定的因素。从成本来看，劳动成本或效率工资比较稳定是价格稳定的因素。经济的累积性扩张会引起价格上升。防止这种累积性扩张的外生限制性因素是金本位制或货币制度，而自身限制因素是下降的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加速原理，以及消费函数。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11—15章，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问题。

第十一章“战后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分析了战后通货膨胀时期政策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第一、谨慎地使用货币政策，适当控制信贷的使用；第二、财政政策应该是反通货膨胀计划的中心；第三、最低限度的直接控制，包括把稀缺原材料分配于基本用途，建筑许可证、配给制等，都是必须的。

第十二章“货币在财政政策中的作用”，论述了用货币政策补充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在流动偏好函数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投资函数多多少少有利率弹性；流动偏好函数和投资函数都有完全的利率弹性；以及流动偏好函数有无穷大的利率弹性，投资函数和消费函数对利率的下降不完全敏感，这三种情况下，用货币政策补充财政政策往往更为安全。

第十三章“一个受管理的补偿性财政计划”，提出了实行

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这种政策就是在经济萧条，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政府实行赤字财政，即增加支出，减低税率，赤字由发行债券和繁荣时期的积累资金来筹措。在经济繁荣年代则使税收大于支出实现预算盈余。这种政策是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操舵装置。

第十四章“货币扩张和国民收入”，论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公债理论。随着国民收入增长，货币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货币量增长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国民收入。同时，除非货币量增加，否则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限制。增加货币的途径则是政府发行公债。发行公债有助于创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当然，也应该强调“一个适当的货币供给是经济扩张的必要条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

第十五章“国际货币的发展”，论述了国际金融体系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国际收支状况对一国国内收入、价格、就业的影响是重要的，所以，国际收支平衡不应再支配国内货币政策，应使国内货币体系与其国际收支波动分开。其方式有：全世界中央银行的发展，建立平准基金及抵消国际货币储备金的类似手段，外汇管制及调节汇率。

附录 A“体谟与货币数量论”，介绍了休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内容。附录 B“关于储蓄与投资的说明”解释了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

《货币理论和财政政策》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发展的一本重要著作，其中关于 IS—LM 模型分析和财政与货币政策建议，尤其是补偿性财政政策的提出，对战后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有相当的影响。

（据山西经济出版社中文本） 李 星 撰

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

《Economic Policy and Full Employment》

《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是一部关于充分就业理论的著作。英文版由美国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 1947 年出版，中译本由徐宗士译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的失业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一向以积极主张国家要有“向前看的长期计划”而著称的汉森，就已经开始担心战争结束后军队复员时可能造成大量失业的危险情势了。因此战后，汉森不象正统经济学家那样唯恐通货膨胀，急于采取收缩的措施，而是提醒人们应认清“市场不足的危险更大地威胁着我们”，告诫政府要把实现充分就业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千万不要因为“医治通货膨胀而引起通货紧缩失业”。《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一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本书除序言和 5 篇附录（4 篇为论文或演讲稿，另 1 篇为美国政府颁布的“1946 年就业法案”）外，共分为 6 篇（共 22 章）：一、导言（含 2 章）；二、几个一般的概念（含 2 章）；三、政府的文告和计划（含 6 章）；四、充分就业的基本政策（含 6 章）；五、对若干现行建议的批评（含 3 章）；六、管理充分就业的经济（含 3 章）。其中，第 1 篇和第 4 篇是构成本书内容的主要成分。

现根据原书的篇章顺序和罗辑结构，分三方面来讨论作者的重要观点和政策主张。

一、对美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探讨

汉森在本书的第一章即专门研究了通货膨胀问题，这似乎与全书主旨有冲突，其实这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举国上下都在恐惧通货膨胀，认为失业是次要问题。面对这种现实，一方面为避免人们批评自己无视通胀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减轻人们在讨论充分就业时对通货的恐惧感，汉森便首先讨论了通货膨胀问题，认为固然要正视通货膨胀，但是，目前的通货危险只是战争造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如果国家采取各种管制措施，战后通货膨胀的局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详细分析了美国在二战时期成功防止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后，汉森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能很快地用预算盈余以及物价管理等方法予以控制。他劝告人们相信，由于美国具有庞大的储蓄能力，巨大的课税能力和惊人的生产能力，从长期看，它不易产生通货膨胀，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大的生产潜力，但缺少充分的总需求。按汉森的理论，一旦出现总需求不足，就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和失业。显然，通货膨胀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总需求不足，是失业。

二、国家在实现充分就业中的作用

汉森在第 1 篇第 2 章中以“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为题，又在第 3 篇中引述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颁布的文告和计划，全面论述了国家在实现充分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随着经济机会内容的变化，国家的职责也要发生变化。以前，经济机会主要是指个人能否有经营自己的小

农庄或小企业的机会。因此，国家的职责是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创立他们自己的企业的权利。今天则不同了，在所有近代民主国家中，生产技术发展的趋势都限制了极大多数人获得一个工作的——但不是去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经济机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有报酬的和经常的就业权利，已成为今天经济机会的象征了。因此，随着维持充足的就业机会就必然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首要职责了。

对于“充分就业”，汉森认为，它不是指政府担保为每个人都找到工作，而只是造成一种状态使人人都有寻找工作的机会。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市场经济中，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自愿失业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此，充分就业在美国就意味着有4%或5%的失业率。那么，如何实现上述充分就业的目标呢？汉森认为，好的就业机会有赖于对货物和劳务的充分需求，因此，足够的总需求是维持充分就业的首要前提。然而，只靠私人的、自发的支出，是不可能提供足以达到和维持充分就业的总需求量的。因此，只有利用不断扩大的公共支出来弥补私人支出的不足，才能保持足够的总需求。很明显，一个由庞大的政府预算所支持的、为维持一个充足的总需求量所必需的公共支出，是实现充分就业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汉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旧的市场经济已经崩溃，我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重建市场经济，即建立一个既能保护以市场或价格制度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制度，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作用的新的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不是真正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只有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才能在高度而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水平之上有效地运行。

根据上述分析，汉森认为美国政府应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来发挥国家在稳定经济和维持充分就业中的作用，即：（1）广泛而灵活的公共支出计划；（2）全面的社会安全制度；（3）所得税基准税率的随时变动。汉森深信，这些方法一经实行，国家就可以左右经济的发展，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

变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为了强调国家计划的作用，在第2章的最后两节和附录1中，汉森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把实行国家计划看成是走向“奴隶之路”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攻击。汉森认为，现代经济生活的职能再也不能听任自发力量去摆布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丰富遗产的国家来说，只要我们的国家计划得以用民主的法治来管理，我们就一定能达成既有进步、稳定和充分就业，同时又有不朽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的崇高目标。

三、保证充分就业的基本政策

在第4篇中，汉森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基本政策的见解，并对每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分章进行了论述。这些政策包括：

第11章：租税政策。汉森认为，在公共支出不断增加的今天，我们必须更重视发挥租税政策在稳定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方面的作用。汉森首先分析了税收和举债对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认为，既以税收为主又辅之以适当举债来保证足够的总需求。接着，分别阐述了他对控制的举债、补偿税收政策、修正的所得税方案以及其它利用租税刺激投资的方法的看法。他认为，举债的方法不但不会从公众手中取去货币，反而会增加他们手中的储蓄，因此，有限度的举债方法，常常会胜过百分之百的征税筹集经费的方法，如果长期以此代替过渡的重税，会使全社会人民增加安全感，从而由现在收入中增强消费倾向。关于补偿税收政策，汉森认为，减免税收和变动税率是有力的反萧条措施，也是维持充分就业的头等重要的手段。在将来，作为“反商业循环”的措施，税率的变动将取代利率的变动而起主要的作用。他认为，应把税率的变动主要放在基准个人所得税率

上，而不改变公司所得税率，以保证企业的稳定。他还主张广泛利用减免税收等一切可以刺激投资的租税方法鼓励私人的新投资和新的企业的产生。

第12章：利率政策。汉森认为，传统的利率调节已不再是控制商业循环的有效手段了。这是因为，首先，在繁荣时期提高利率，不但不能有效地制止各种投机活动，反而还会使经济中的健康部分受到打击。其次，利率在繁荣时期一经提高，在继之而起的萧条时期就很难重新降低，这对于经济的复苏是不利的。再次，利率的巨幅变动，不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将对财产价值发生重大的影响，必然会对实业界发生严重的扰乱，从而不利于新投资和消费支出总量的增加。汉森据此认为，各种选择性的管制方法和包罗一切的财政控制措施，与利率变动相比将成为反循环波动的更为有效的武器。汉森还主张低利率政策，认为这样可以刺激投资，从而有利于稳定和充分就业。

第13章：工资政策。汉森以工资对利润的比率是偏高的这一假定出发，认为对均衡问题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分析方法。如果依据静态分析的方法，用削减工资来恢复均衡和增加就业，那必然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对，并可能招致通货紧缩的后果。因此，他主张应依据动态分析的方法，采取不断改进生产方法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总需求两项措施来实现恢复均衡和增加就业的目标。但是，工资率的提高要受到生产率提高的限制，否则只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不能增加就业。

根据上述分析，汉森认为，保证充分就业的工资政策包括以下内容：(1) 随着总需求的扩张来控制工资率水平，以便一方面促进工资对利润的均衡比例，另一方面制止单位成本和物价的上涨；(2) 维持一个平衡的工资率结构，以免若干重要产品（例如建筑）的价格超过一般市场价格；(3) 降低成本，包括技术改进以及消除各种垄断性的和限制性的行为。

第14章：消费。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汉森首先引入了“消费函数”的概念；同时又进一步把它区分为“家庭消费函数”和“国民消费函数”两种。汉森认为，从长期看，消费

函数是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投资和储蓄问题了。租税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变化。如果税款大部分取自消费者大众，则消费支出就会大量减少；如果税款主要来自上层收入阶级层，则储蓄函数就会降低。这两种情况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消费函数的下降。因此，以举债筹措公共经费是保证充分就业的更有效方法，因为它不会减少消费支出的数量。汉森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消费函数趋向太低，而储蓄函数趋向太高，如何使消费和储蓄取得平衡，实在是维持经济均衡和充分就业中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的核心。他主张，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消费函数过低的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对卫生、营养、教育和住宅等方面进行大量公共投资的办法来保证最低限度的消费标准，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国民消费水平以维持稳定和充分就业。

第 15 章：私人投资。汉森把私人投资分为三类：（1）机器设备；（2）住宅；（3）其它。他认为，“就业”标准（单纯为满足充分就业的需要）的投资并不等于“增长”标准（考虑到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的实际需要）的投资。而正是后者应该指导我们的投资政策。由后者而产生的储蓄过高和投资不足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来解决：（1）一部或全部以举债筹措的公共投资；（2）采用各种方法来变动消费与储蓄函数；（3）调整租税水平，汉森认为，在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有三种公共政策可以刺激私人企业在机器设备上的投资：（1）充分就业；（2）增加科学与工业研究经费；（3）鼓励性的租税制度。

第 16 章：公共投资。汉森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公共投资，充分就业将是无法实现的。至于筹措公共支出的方法，以既征累进所得税，又举适当数量的公债为宜。接着，汉森还对公共投资所包括的范围和投资数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为了强调上述各种政策主张，汉森还在第 5 篇中对几种与自己不同的政策建议逐一进行了否定性的评述。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本） 陈文江 撰

作者介绍

汉森，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早年曾致力于“商业循环论”的研究，后转而信奉凯恩斯主义，并提出“长期停滞论”和“混合经济论”。汉森认为，资本主义在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速发展步入缓慢发展期后，必须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重点是以公共投资来抵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即“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汉森的主要论著：《经济周期理论》（1927）、《失衡世界的经济稳定》（1932）、《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47）、《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60年代的经济问题》（1960）、《经济周期与国民收入》（1964）、《美元与国际货币体系》（1965）

［美］汉克，斯蒂夫
Hanke，Steve

私有化与发展
Priv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私有化与发展》是一本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夫·H·汉克主编的、关于私有化问题的论文集。80年代，英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一股强大的私有化浪潮，并产生全球性影响，波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形势下，1986年2月，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私有化问题的学术会议。"会议涉及到与私有化有关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并且以各国实际经验出发探讨了各种可行的私有化途径。"此书反映了这一会议的成果，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私有化进行了说明。

本书由经济增长研究国际中心提供。中文版由管维立等根据美国当代研究所1987年版译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本书的序言由经济增长研究国际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列塔撰写。除序言外，全书共分为六篇，共23篇论文。其中，第一篇主要描述了全球的私有化浪潮，第二篇阐述了与私有化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产权等问题，第三篇说明了私有化计划中的关键问题，第四篇从发展的角度主要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几个方面的私有化问题，第五篇分析了4

个具体的（含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私有化案例，最后，在第六篇，作者总结了实现成功的私有化的几个方面。

第一篇“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导言”由斯蒂夫·汉克撰写，主要探讨了私有化浪潮产生的原因和私有化的主要形式。作者认为，私有化热潮由以下原因造成：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严重亏损，而私有企业则可改变这一状况，大大提高效率。二、政府财政负担过重。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制度可以发挥私有企业的主动精神，是通向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最成功道路。四、私有制是扩大社会的所有制基础与参与范围的方法。关于私有制的形式，作者指出，这次私有化的主要内容是将国有资产所有权私有化，将部分国有、国营或公共服务事业或以股份形式出售，或将其租赁、承包给私人（私营）企业。其特点在于将国有企业股份分散到千万个私人持股人手中，实现所谓的资本的社会化，即“人民资本主义”，而与以往有悖于平等实现的、将大量财富或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非国有化不同。第二篇论文“从全球观点看私有化”由格雷·考恩撰写。他通过描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的私有化实践，说明私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效率等方面均优于公有企业。同时说明，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主要由于缺乏资本等原因而进展缓慢。第三篇论文为“私有化的前景”，作者彼得·麦克弗森认为这次私有化浪潮是一种经济思想上的革命（回归），并指出：“成功的私有化必须以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基础，如向私营企业借款者提供信贷、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以及放宽政府的管制。”（第16页）总之，本篇通过对全球私有化实践的描述，说明私有制比公有制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即私有化可以通过市场的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工人的技能、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提高生产率和赢利能力，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并满足顾客的需要。

第二篇“私有化的基础”，分析了私有化实现的条件，即与私有化有关的经济、政治、产权等核心问题，其中特别强

调了在私有化过程中，放宽政府管制的作用。本篇由 4 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为“出售国有企业资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者为埃利奥特·伯格。他通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工业国的对比，说明发展中国家在私有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发达国家私有化的目的在于搞活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发展中国家则为了减少亏损和政府的财政负担。二、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雄厚的国有企业的买主。三、发展中国家缺乏包括法律系统、合理的自由竞争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四、在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往往反对私有化。为克服以上问题，作者认为，应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行公开交易，并宣传私有化的好处。第二篇论文为“私有化的政治障碍”，作者罗伯特·普尔从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的角度，指出了关于私有化的种种错误理解，认为在实际中妨碍私有化的问题有：一、国营企业往往低估成本，导致错误的成本核算方法，掩盖了私有企业低成本的优越性。二、对失业的恐惧。三、对贪污腐化的恐惧。四、法律上对私有化的禁令。五、政府管制。六、法律机构不完备。七、资本短缺。（政府往往比私人更容易从国际机构筹措资金）第三篇论文“产权的必要性”，由斯蒂夫·汉克撰写。作者认为，不同的财产所有制（产权）形式可产生不同的经济刺激作用，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成果。通过私有与国有的对比，作者指出，私有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自由运用、交换其私有资产，其运用私有资产的成果（利润或亏损）与所有者的收入（财富）密切相关。在这种利润的刺激机制下，私有企业将勇于承担各种责任，努力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国有企业由于高度政治化和缺乏利润刺激，造成与私有企业相反的结果。本篇最后一篇论文“私有化与政治”由曼纽尔·坦诺拉撰写。作者以阿根廷为例说明经济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将损害社会的经济成果与发展，因而应从整体上而非局部地进行私有化。

第三篇“私有化的规划”由六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

"私有化的准备工作：决策者的一份清单"，作者为兰斯·马斯顿。他指出：私有化应有一定的政策程序和一个有能力称职的工作班子。在私有化过程中应做好组织效率，投资，经济业务分析，资金、人力资源和管理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应重视教育、组织和动员、公众、政府雇员与管理人员和工商界等四个方面的力量，这四个方面的力量应对私有化加深理解并相互合作。关于私有化的实施，作者认为，应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工作的开展；第二阶段：目标的选择；第三阶段：实际私有化的转让；第四阶段：对实施私有化协议及有关法规的监督检查。第二篇论文"成功的私有化策略"由斯蒂夫·汉克撰写。他阐述了与产权理论有关的私人企业理论，并以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部门为例，提出了经验性证据，证明私有化将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提高效率。最后，作者指出，私有化政策的实施有两种方法，一种为技术决定论，即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决定是否应实行私有化。第二种方法为政治决定论，主要通过立法形式对私有化加以确定。这一方法从结果看更为有效。本篇的第三篇论文为"从法律与税收观点对私有化的考虑"，作者是彼得·托马斯。他首先指出："私有化不仅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科学技术现象，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法律现象。"（第78页）因而，作者分析了与私有化有关的一般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将涉及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力量、政治实体和私有者的交易关系、国际间的贷款者的合同限制、争端的解决、劳动与就业关系、垄断关系和财政金融关系等等。然后，作者分析了私有化的两个范畴——管理合同承包与出售国有企业资产所对应的法律税收关系。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即私有化的实现应保持公平与公正。第四篇论文"出售国有企业"由特德·奥哈希撰写。在分析了出售国有企业的动机之后，作者分析了出售国有企业应考虑的方面（如转让人的类型、受让人的性质、企业的状况等），并提供了出售国有企业的各种选择方案，如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的债券等。第五篇论文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资产的出

售”，作者彼得一帕伯罗·库津斯基主要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私有化过程的几个步骤。本篇的最后一篇论文为“私有化资金的筹集”。作者罗森多·卡斯蒂多在指出影响私有化资金筹集的企业规模和国内资本市场等内外部因素后，特别分析了私有化如何在以下两方面筹集资金：一、支持所有权的转让。这里，政府应在衡平购买、信贷提供、向国际借款机构借款、发行企业债券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二、保证新公司继续营运的资金，可通过金融市场，特别是公司利润筹集资金，其中后一方式将是更重要、更有吸引力、更可靠、费用更少和更少引起通货膨胀的途径。

第四篇“为了发展的私有化”，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实施私有化的情况，共由五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作者加布里埃尔·罗思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保健、发电、电讯、供水、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行业的私有化，说明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最有效的办法为放松管制、促进竞争。第二篇论文“农业与农业综合企业的私有化”，作者伊恩·马索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投入物的供应、收集与供销业务的私有化，得出两个结论：一、政府应停止对农业的干预，并给予资金、信贷的支持。二、转变在资金、税收等方面有利于工业部门而不利于农业部门的状况，加速农业部门的私有化，增加农业产出。第三篇论文“金融部门的私有化”，作者为劳伦斯·怀特。首先，作者指出，金融部门私有化的条件是把主要金融部门——国有银行资产转让给私营部门。因此，须做到：制定能起作用的合同法；取消利率限制；敞开进入银行的大门，促进竞争；放宽限制。第二，作者认为，国家开发与投资银行因净值可能为负、出售困难大，而消费与商业银行因偿债能力较强成为主要私有化机构。为此，应采取如下步骤：一、实行国际支付体系（外国银行）的私有化，即实行浮动汇率以减少外汇风险；二、承认国内私营银行有发行可赎回的货币的权利。最后，作者指出：“金融部门私有化的提出，是作为真正的自由化、非集中化、将经济事务与政治权力分开等应办事情的一个组成部分。”（第 144

页）第四篇论文“成功的债务调换剖析”，作者斯蒂夫·汉克以智利为例，主要说明了以下问题：一、债务调换是减少外债、刺激资本流入债务国的一种工具，可以提供资金，促进私有化。二、债务调换有两种形式：（一）将外币名义的外债转为本国货币名义的国内权益，这一形式较为广泛。（二）将外币名义的外债转为本国货币名义的国内负债。三、成功的债务调换所需的条件为：（一）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其吸引力包括：1. 分散投资于一系列证券以减少风险；2. 好价钱；3. 有吸引力的收益。（二）好的债务调换计划。在本篇最后一篇论文“在援助下发展的私有化中公、私的责任”中，作者梅德森·皮里和彼得·扬首先特别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私有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不应是领导者，而应让发展中国家自己去做。西方国家的职责是：为发展中国家（一）提供资金援助（以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为条件）；（二）提供情报资料与建议。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私有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私有化，主要职责为：一、保障财产权利与合同权利；二、对私人投资与风险收益实行低税政策；三、实行资本自由流动；四、理解私有化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仅是筹资手段和低价购买的恩赐手段；五、组织受尊重的竞争性投标活动，防止不公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显示私有化利益，推动投标。

第五篇“私有化案例”由四篇论文组成，分别例举了英国、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土耳其和格林纳达的私有化，作者分别为约翰·雷德伍德、特德·奥哈希、梅米特·比尔吉克和唐纳德·谢伊。本篇特别指出：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实行了成功的私有化并带来经济与政治利益，而这一切又与其私有化主旨分不开，这些主旨包括：一、让更多独立的个人通过购买和拥有股票分享工商业财富；二、让雇员参与管理过程，获得所有权与分享利润；三、提高已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业绩；四、进行国家的经济再教育；五、终止国有企业的巨大损失。

第六篇为“结论”。作者斯蒂夫·汉克在论文“走向人民资本主义”中，总结了实现成功的私有化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一、在制定私有化计划前，应创造一个能宽容私人所有权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税收、法律支持等。这一问题应优先解决。二、建立支持私有化的政治力量与环境。三、制定培训规划，发挥私有化技术方法专家的作用。四、在开始阶段，特别要挑选困难最小、能保证成功的私有化目标，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五、选择能使政治力量最大化的方法、技术与策略。六、必要时，用投资方法做好私有化的准备工作，提高对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七、避免受暂停实施国有企业经常所享有的特权的诱惑。最后，作者从政治感染力角度，将这次与以往“非国有化”不同的私有化浪潮概括为“真正的人民资本主义”。(第 192 页)。

总之，全书通过描述全球私有化浪潮，分析了私有化浪潮产生的原因、主要形式、特点、与私有化有关的政治、法律、经济等问题及私有化规划，并特别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问题，说明了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相比，在管理、经营效率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文版)　李欲晓　音

〔英〕哈罗德，罗伊·福布斯
Harrod, Roy Forbes

动态经济学导论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1948)

本书为英文版，1948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伦敦出版，共168页。

哈罗德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致力于将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研究凯恩斯忽略的增长问题。本书是由1947年2月间哈罗德应邀到伦敦大学作的五次讲演整理而成，它的出版标志着增长理论开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书也由此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就象本书的副标题“经济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及其政策应用”所示，本书可以被看作是30年代凯恩斯理论在40年代由凯恩斯主义者所进行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应用（1972年哈罗德又对本书进行了彻底重写，完成了《动态经济学》一书）。

全书除序言外共有5章：动态经济学之必需；储蓄供给；动态学的基本原理；贸易差额与产业政策；利率过时了吗？以下分三部分对全书内容作一简介。

一、动态经济学之必需

哈罗德所谓的“动态经济学”是一个以研究经济增长理

论和模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在本书的序言和第 1 章中，哈罗德论述了动态经济学之必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已摆脱了 30 年代大萧条的困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停滞是否会卷土重来呢？这是哈罗德所关心的问题。他在序言中明确写道："在本书中提到的想法，是有关我们早晚要正面遭遇到的停滞问题，这也是经济学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美国无法避免慢性的不景气问题。英国的繁荣与美国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既然停滞问题涉及面如此之广，那么对摆脱停滞的出路——增长问题的研究更为事关重大了。哈罗德认为，为对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就必须建立动态经济学。凯恩斯的分析是短期的、静态的或比较静态的，而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是长期的、动态的，它不仅引入了时间概念，而且也研究处理了经济变化的速率问题。

在尝试建立动态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给哈罗德以莫大的启发，因此，哈罗德对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予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具有长期和动态的性质。李嘉图极力主张资本利润递减法则，此法则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扩大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使工资得到提高，结果使资本利润率逐渐降低。哈罗德认为，李嘉图的这一理论"虽然粗浅，但却不失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理论"，而他自己企图以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动态性质为模式，来补充、修正和改造凯恩斯理论。

二、动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增长模型

在本书的第 2、3 两章，哈罗德阐述了动态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即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基本原理。

哈罗德认为，商业循环问题不能用经济偏离了静态均衡点的说法来解释，而应该用经济增长中动态均衡的偏离的说法来解释。他试图通过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相结合，来分析商业循环问题，找出经济增长的均衡条件。

乘数原理认为，投资或支出的变动对国民收入有成倍扩大或收缩的乘数作用。投资乘数等于储蓄率的倒数。所以，当投资支出最初增加某一数额时，最终使国民收入的增加额等于投资支出最初增加的这一数额乘以投资乘数（即等于储蓄率的倒数），而不是仅仅等于最初投资支出的增加额。显然，储蓄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决定起很大作用。

加速原理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成倍增加或减少的加速作用。加速系数等于资本—产出率（也称资本系数）。所以，当国民收入增加某一数额时，将引起投资的扩大数额等于国民收入增加的这一数额乘以加速系数（即资本—产出率或资本系数）。显然，资本系数对投资支出增长率的决定起很大作用。

哈罗德经过理论推导，得出结论：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储蓄率比资本—产出率。这就是哈罗德的增长模型。显然，国民收入的增长要受到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作用。

一般而言，乘数与加速系数的交互作用，成为经济波动的强有力因素。因为，当投资扩大（或减少）时，国民收入将以乘数方式成倍扩大（或减少），而国民收入的扩大（或减少），又进一步引起投资以加速方式的成倍扩大（或减少）。这样，需求变化而使得经济的高涨和衰退的速度均将加快，从而形成商业循环。

具体地说，哈罗德通过储蓄供给与需求状态的分析，提出了三种增长率，并以这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偏离，来解释商业循环问题。

哈罗德认为，只有储蓄才是经济增长唯一重要的动态因素。他把储蓄分为两种：实际储蓄和必要储蓄，前者取决于实际收入水平，后者取决于实际收入的增加速度。接着，他

又提出了三种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和实际资本—产出率决定，必要增长率—它由必要储蓄率和必要资本—产出率决定，自然增长率—它是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他认为，实际增长率是实际进行的增长率，必要增长率是与人们想要进行储蓄和投资活动相适应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这三种增长率相等，经济就获得了最佳均衡增长；这三种增长率的偏离，就形成了商业循环。

哈罗德认为，必要增长率能说明一般的商业循环问题，而根据实际增长率偏离必要增长率的程度，可把握短期循环，至于自然增长率，它可用来说明长期停滞问题。

哈罗德强调，在一个增长着的经济中，储蓄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三、经济增长的政策问题

经济增长率是不稳定的，若不依赖经济政策，增长率的偏离状态将很难回复到均衡状态。于是，哈罗德在第4、5两章中转而论述有关增长的政策问题。

在第4章，哈罗德首先引进了国际贸易差额这个经济变量，讨论了开放经济系统中的增长率问题，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国外经济的增长率，如果高于国内经济的增长率，本国的国际贸易差额就将好转。第二，成本低廉的产品，如果其生产增长率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便可靠其出口的增加来实现贸易顺差。第三，除去利润以后的生产成本的增加速度，如果低于出口产品的增加速度，贸易收支状态必将趋于有利的方向。其次，他讨论了产业政策，包括金融政策、公共投资政策、国际经济合作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等。他还建议用一定的实物作为担保以代替黄金准备，来融通资金。他把这一方法看作是克服全球性萧条的最有力手段。

在第5章，哈罗德认为，以财产准备为基础的资金融通活动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靠赤字财政政策敛集的资金在经济繁荣到来之后必须设法偿还，并要支付利息。所以，对于为了扩大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来讲，这些政策的作用都有一定的界限，都是短期性的。因此，从长期增长的要求来看，这些政策自然不是实现目的良好的手段。维持资本主义繁荣的长期性手段是：废止利率，规划长期财政计划，建立经济稳定基金，以维持长期财政收支平衡。这样做并不是否定企业利润。不劳而获的并不是利润，而是利息。最后，他认为，财产的世袭制也对经济发展起阻碍利用，因为，财产的世袭抑制了需求。

肖　生　撰

动 态 经 济 学
Economic Dynamics（1973）

本书原为英文版，1973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由黄范章译出，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全书230页。

哈罗德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信徒，但是他认为凯恩斯的分析仅局限于一种短期的、静态的分析，因而主张经济分析应该长期化、动态化。他试图建立起一种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动态经济学”。

全书除序言外，共分为10章：需要有一个动态经济学；基本方程式；不稳定原理，资本—产出率；利息；通货膨胀；问题与冲突；对外贸易；国际资本移动；通盘考察。这10章

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本书的写作目的

在本书的第 1 章中，哈罗德指出，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动态经济分析是与静态经济分析平分秋色的。然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边际概念和数学公式从而使静态分析得到了改进和完善，但动态分析却看不见了。即使凯恩斯，也只是在静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内展开其分析。本书的写作目的也就是要提请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注重动态经济分析。

哈罗德还认为，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不能取代静态和动态的区别，动态经济学本身也可以划分为微观动态和宏观动态两个部分。哈罗德把本书的研究内容规定为宏观动态经济学，主要致力于对决定和影响增长率的因素进行动态的理论分析。

本书的其余 9 章就是围绕着宏观动态分析这一主题展开的。在表述了增长模型及有关增长因素的意义之后，哈罗德还就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开放经济中的经济增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下面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继续对其余 9 章内容加以介绍。

二、经济增长模型

在第 2—5 章，哈罗德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形式由以下三个变量组成：经济增长率 G、储蓄率 S 和资本—产业比率 C，他们组成基本方程式 $G=S/C$。其中的资本—产出比率 C 被定义为同一单位时间内的资本

增量除以这个时间内生产出来的货物的增量。进一步地，哈罗德提出了三种意义上的增长率，即：（1）实际进行的增长率，称为实际增长率 G，它是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 S 和资本—产出比率 C 来决定的。（2）有保证的增长率 Gw，这是这样一种增长率，它所造成的经济活动水平能使资本家感到满意。具体地讲，它是由一定收入水平下人们所愿意进行的储蓄率 Sd，以及资本家满意的资本—产出比率 Cr 所决定的。所谓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又被称为是由资本家掌握的最满意的资本存量所带来的资本—产出比率。其方程式是 Gw = Sd/Cr。或者说，如果经济按 Gw 增长，则恰好能使储蓄者的合意储蓄量被资本家的合意的投资量所全部吸收，这就是均衡增长率。（3）自然增长率 Gn，这是一种“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其决定因素是劳动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进步。这种增长率下，能够吸收全部劳动人口就业。因此哈罗德认为政府应该以此为目标，安排一个最适宜的储蓄率 S_0，使得 S_0 能够满足方程式 $S_0 = Gn \cdot Cr$。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围绕这三个增长率的关系展开的。

哈罗德把有保证的增长率 Gw 称为均衡增长率，是因为按此增长率，则每年的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总能取得平衡。因此，如果能使实际增长率 G、有保证的增长率 Gw 和自然增长率 Gn 之间取得一致，则整个经济增长将处于一种最理想的均衡增长状态。哈罗德认为，三种增长率取得一致性，能够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实现充分就业，并能避免通货膨胀。而三种增长率的背离，则会破坏均衡增长条件，造成短期经济波动。

但是，不管理论上的分析还是实际中的经验，都表明这样一种一致性是十分难以达到的。因此，哈罗德进一步分析了三种增长率互相偏离的情况，并称之为“不稳定原理”。

哈罗德认为，一旦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发生了偏差，就会连续出现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也就是说，这种不稳定性的表现形式，具有累积性的特点。这是由于，一旦出现了偏差，市场却给投资者一种同实际情况相反的信号，

使投资者在主观上对投资需求的预期产生了错觉，从而导致错误的行动，使这种偏离进一步扩大。例如，如果 G＞Gw，意味着实际投资过度，可市场信号却使资本家感到手中的资本量过少，即 C＜Cr，从而进一步扩大投资，使 G 进一步大于 Gw。反之，如果 G＜Gw，意味着投资不足，但资本家却会感到手中资本存量过多而削减投资，即 C＜Cr，使得 G 进一步小于 Gw，造成经济萧条。

哈罗德认为，由于 Gw 和 S、C 都是由不同因素决定的，因而 Gw 与 Gn 的一致就更难于实现。正如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的背离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一样，自然增长率 Gn 和有保证增长率 Gw 的背离将使一个社会处于长期停滞或长期高涨的状况。例如，Gw＞Gn，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率，这时，资本家将进一步削减投资，以致实际增长率 G 还要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 Gw，使社会处于一种长期停滞或长期萧条的状态。反之，如 Gw＜Gn，则表示现存资本设备处于极为充分利用的状态，因而提供了高额利润，由此将刺激资本家进一步进行新的投资。这样，社会经济将处于长期高涨或长期兴旺的状态，甚至出现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

哈罗德还提出，有保证的增长率不止一个，而是多个。他们分为两种。其中之一便是与均衡增长相联系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Gw。他称之为正常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其余的则称之为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用 Gws 表示。他还强调，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跟正常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不同，即前者并不代表一种均衡位置。特殊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是由于，例如，随着个人收入下降，到一定时候人们可能会拒绝把消费缩减到某一点以下，从而决定放弃储蓄计划。合意的储蓄率 Sd 便会下降，从而使 Gw 值发生了变化。并且，哈罗德进一步考虑了利润率对有保证的增长率的影响，即利润率的变化会影响资本家的预期，从而影响到有保证的增长率。他明确指出，在经济景气或不景气的影响下，有保证的增长率本身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实际增长率背后，各有其相应的特殊

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这样，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便不再只是有一个与储蓄和资本—产出率相匹配的数值，而是会在不均衡位置上，产生一个新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三、有关增长的若干政策问题

在本书的第6—10章中，哈罗德还针对通货膨胀问题和开放经济问题对增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哈罗德赞同凯恩斯以国家调节和实际需求管理的主张，认为应该用膨胀性财政政策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哈罗德的长期动态分析，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充分就业，即加强政府需求管理使经济能按自然增长率Gn进行。这就使得他与凯恩斯一样，主张政府以扩张主义政策来调节经济。为了回答当时社会上的种种质疑，哈罗德进一步说明失业是一种比通货膨胀更大的祸害，因而必须以避免失业为基本的政策目标。他指出，不应该为了制止国内物价上涨或纠正国际收支状况，而使经济增长降到它可以达到的水平以下。

哈罗德否认扩张主义政策是引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他和其他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一样，认为战后通货膨胀主要归结为成本推进型，而不是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于工会的垄断，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工资刚性等因素引致工资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因此，医治的办法，就是采取众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即“由官方对工资和物价的进程加以干预”。进一步地，他甚至认为扩张主义政策是克服战后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哈罗德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哈罗德二分法”，把国民经济分为两大类：报酬递减部门（如粮食和原料的生产）和报酬递增部门（如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货物和劳动的生产基本上受报酬递增规律所制约的话，则任何紧缩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势必使企业主由于缩减产量而增加成

本，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反之，如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会使得他们能够降低价格。

在此前提下，哈罗德还提到，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长期偏离的情况下，应该以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来调节储蓄的变动造成的 Gw 的变化。而当 Gw 和 G 不相等时，则应该以见效迅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实际增长率 G，使之与有保证的增长率取得一致。

哈罗德的增长理论和模型，本来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 60、70 年代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就有必要研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增长问题。因而哈罗德在本书中也依据自己的增长理论和模型，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作了理论上和政策方向的阐述。他认为一切对外经济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政策。为了维持国内经济活动水平和就业水平，应该对进出口贸易实施国家干预，并且通过固定汇率制或非固定汇率制的办法来恢复对外收支平衡。总之，哈罗德坚持以避免失业作为至高无上的政策目标，维护扩张性的国内经济战略，要求内外经济政策等都从属于这一政策目标和经济战略。

（刘春旭）

作者简介

哈罗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奠基者之一。哈罗德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均衡稳定发展所需的条件。人们往往将之与埃弗塞·多马的增长理论一起并称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此外，哈罗德对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及经济周期理论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哈罗德的主要著作包括：《国际经济学》(1933)、《经济循环》（1936)、《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凯恩斯的生平》(1951)、《经济论文集》（1952)、《归纳逻辑学基础》（1956)、《改革世界货币》(1957)、《货币论》（1969)、《动态经济学》（1973）等。

〔奥〕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
Hayek, Fredrich August von

通向奴役的道路
The Road to Serfdom(1944)

本书原为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44 年出版。中译本由滕维藻等译出,商务印书馆 1962 年出版,全书共 228 页。

本书是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的基础上写成的,集中反映了哈耶克的政治倾向和经济思想。他认为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是维护个人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根本保证,而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制度,实行计划经济则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此书出版后,立即在英、美两国引起了轰动,得到各种反社会主义右翼势力的喝彩,也受到赞成“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的痛斥。全书除前言和引论外共有 16 章,其主要思想观点大体上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崇

哈耶克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好制度。

只有在这一制度下，才能充分地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只有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人们才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它们要做的事情。竞争的市场机制之所以优越，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更由于它是使人们的活动得以相互调节适应，而用不着政府的强制、专断干涉的唯一方法。在这一制度下所保证的自由主义，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这种由于经济自由所带来的政治自由，以及个人的活力的解放，乃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根源所在。

只有在这种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率才能有切实的保证。因为人一作为“经济人”——首先要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那么金钱一这一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为每个人享受努力的成果，提供了最广泛的选择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凭其聪明才干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公正的角逐，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价自动平衡体系，除了可以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以外，还是最经济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器。它引导人们把利己的动机转变为社会的整体功能，从而保证了经济的高效率。

二、对高度集中，否定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的批判

这是本书的核心，在这一部分哈耶克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指出计划经济是如何导致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的。

在批驳了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之后，他从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展开了论述。

首先，在经济方面，哈耶克指出计划模式必然是低效率的。其理由是：第一，计划的控制代替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这就意味着基本经济动力的丧失；第二，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分工和社会需求日益复杂化。而靠单一的计划不可能收集和处理复杂、分散的信息，又由于自由市场制度下

的物价自动调节和平衡体系遭到破坏而不能反映经济的变动情况，所以集中决策将因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失败，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低效率。在此基础上，哈耶克探讨了计划和市场竞争的某种适度结合，但他强调指出："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此外，哈耶克还批评了计划体制取消一切自由选择工作的机会，而代之以为每个人提供不变收入的安全，认为这不仅将带来经济的低效率，而且将降低人们对于自由的期望从而最终导致自由的毁灭。

其次，在政治方面，哈耶克分析了以下问题。第一，计划与民主及法制的关系。哈耶克指出，由于每个人的个人目标与一个总体单一计划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那么在此基础上，如果一个民主主义采取一种计划的方针，为了消除计划目标所带来的不一致性，就必然借助于独裁和权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要努力是经过民主程序授与的，它就不可能是专横的"，"如果民主制度决定要从事一项任务，而这又必须使用一种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这种权力就一定会变成专制"。

当谈到计划与法制时，哈耶克认为计划是违反法治的。因为法治的最基本的精神是为人们的自由选择制订出一套规则，以指导人们去自由地竞争，所以任何法律条规都是普遍性的和通用性的。但由于计划工作的越来越广泛，为了一种"道德"的承诺，则把法律变成了针对某些人的、特殊目的的规定，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法治的原则，而且特定立法的不受限制，又可以把最专横的统治合法化。

第二，积极主义与最坏者当政。哈耶克认为，严格地说来，经济动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达到其他目的的唯一手段，而经济计划的结果意味着对人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由此产生的权力将是没有止境的，谁拥有了这个权力，谁就能控制一切，而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情况下，一切经济的、社会的问题，都将变成为政治问题，取决于"谁战胜谁"。

哈耶克进而分析道，在走向极权主义的过程中，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必然是这样一些具有低级道德标准的人——他们或出自一种近乎原始的冲动，或受一定价值观念的不断影响——才能组成一个人数众多的、有力量而又大致志同道合的集团，他们在一个凌驾于一切的目标下，可以破坏道德，不择手段，这就使那些残酷无情，寡廉鲜耻的人特别有机会成为极权主义机构的成员乃至领袖，于是出现了最坏者当政。

最后，在思想方面，哈耶克借助于卡尔的话指出，"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那是因为，在极权主义的制度里，必须使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的目标，为了保持人民思想上的一致性，所有的宣传便只能为这个目标服务，以便使人们全部接受当权者的唯一的价值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对真理的无私的、客观的探求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为官方意见辩护成了各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唯一目标，凡是对政府的怀疑与批评都将被压制和禁止，最终导致了"真理的末日"。

三、对极权主义思想演变的历史回顾和对战后经济的展望

哈耶克在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述极权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他以德国所走的法西斯道路为背景，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那是一个"远在德国境外拥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曾参加过的过程的顶点"，这种思想的起因是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进步所增强了的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组织和管理"我们的经济生活的热情。正是这一求新的尝试。使我们愈来愈背弃了自由主义原则的基本信念。而在德国，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出现的一些导师，才使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的青年皈依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以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对"组织的制度"的崇拜方面，马克思主义、普

鲁士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不过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乌托邦——被证明是幻想以后所达到的阶段。而且一旦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最终的结局都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与法西斯的德国殊途同归的命运，已经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对于战后的经济秩序和国际秩序，哈耶克表示出深切忧虑，因为当时正置二次大战即将胜利的关头，而西方世界中则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首先是一些思想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偏爱和宣传以及对自由主义经济的反对和憎恶；其次是那些对政治有较大影响的科学专家对于“科学”地组织世界所抱的幻想；再次是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资本家集团的扶持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西方面临的危险，是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在支持一种政策，而这种政策，一定会导致民主和自由的毁灭，“要就是由非人为的市场纪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就是由数个别人的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两者之间只能任择其一，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

哈耶克把自己的自由主义学说归结为个人主义，由此，他对战后的经济秩序和国际秩序抱以热忱的希望，他指出只有重振那些曾给西方世界带来繁荣的个人主义的美德——独立、自己依靠自己、甘愿担当风险、愿意违反多数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信仰，喜欢同部分人自愿地合作等，并且保持对自由主义传统的信念，才不致于被引向那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经济的调整，渡过困难时期，使人们真正成为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人。

最后，哈耶克郑重声明，“如果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我们失败了，我们必须再来尝试。个人自由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这一指导原则，在今天依然象它在19世纪那样是正确的。”

（据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谢　岩　撰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1948)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是作者的代表作，收录了作者最著名和最主要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广泛地被引用，正如哈耶克在前言所自称的“…本书并不打算再作为大众性的读物。…相应来说，完全是专业性的。”正是由于作者的科学思考和探究，为我们在经济政策到经济理论的领域里，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这些文章的展示的一位学者深思熟虑的观点构成了一个博大而系统的体系。

第一章，个人主义：真与伪。

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已经被稿得模糊不清，对于不同的集团来说，常常表示相反的意义。但是哈耶克坚持将自已信仰的思想与这一被滥用和误解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因为哈耶克深切地知道他欲为之辨护的观点一直是通过这一术语而为世人所知的；而且这样作更为了同“社会主义”这一精心设计的术语相区别，显然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主义的立场的。哈耶克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所关心的就正是这样一个取代社会主义的制度。”在当今的社会里，越来越少有人敢于提倡一种分明的社会秩序原则，而是不断地在折衷主义的态度下放弃了人类所保有的普遍认可的准则。所以，哈耶克认为“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的幌子下，事实上我们正从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向具有完全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迅速迈进。”

哈耶克欲为辩护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现代发展始于约翰·洛克，经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而发扬光大。而第二种个

人主义，主要以法国人和大陆国家的作家为代表，这种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成为自身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真正的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表现为：一、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二，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哈耶克强调，我们在人类事物中所发现的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不可预见的结果，这是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之于精心设计观点的假个人主义相区别的。由于人类智力有限，对于非个人的和无个性特征的社会过程应采取谦卑的态度。哈耶克所据以的假定是这样的；人类利益和知识有局限，人类所能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因此，能给他们以激励的，只是他们在自己所了解的领域内活动的即期效应。一个自然的推论则是：需要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以限制。对于政府，则要求其按规则管理国家，即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的责任范围。政府绝没有僭越这一责任范围的权利，“越俎代庖”是对自由社会的损害。我们时刻应记住，能够或应该由人类理性有意识造就那部分社会秩序只是整个社会力量的一小部分。哈耶克一再警告，那种以理性自居的狂妄和对个人主义的背叛，一直而且现实中正是毁坏文明社会的危险。应该记取的是，仅就社会是自由的这一点而言，社会才比个人更伟大。

第二章，经济学和知识。本章的主题是关于不同社会成员的假设及命题在经济分析中所起的作用。哈耶克指出，经济分析中均衡的概念本身及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将变得十分荒廖。就行业能被理解成某个人计划的一部分来说，这个人的行为可以说处于均衡之中。而且，只有所有这些行为同时被决定，与此相伴随，考虑到同样一系列情况下，我们这些从关于知识和人的偏好之假设中推断出来的有关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的论点，才有一些实用价值。均衡概念不可应用于不同人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由于不同的人有可能将其计划建立在相互冲突的预期之上；

其次是由于对不同计划的协调来说，一个人的计划恰恰包括那些形成另一个人计划的论据的行为。那么均衡与预见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哈耶克的结论是：只要能证明前提条件正确，均衡就会持续；而且仅与个体决策者有关的那些环节上，才需要正确的预见。

事实上，我们关心公认的虚构的均衡状态，理由在于社会被假定存在一种趋向均衡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指，某些条件下不同社会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向一致；或者是指人们的预期将变得越来越正确。但是，均衡趋势存在的条件问题并未解决。人们已经做的工作只是采用完全市场假设。这并未深入一步，因为我们想知道均衡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如果我们断言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将接近均衡，那么我们必须阐明人们如何获得必要的知识。哈耶克则警戒式地提出："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均衡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扰乱，我们将更接近于答案。"事实上，一个人由于趣味的变化或者由于对新事实的了解而改变计划都将使均衡中断。由是，我们认为，"为使均衡成立，他必须拥有的有关知识，是因他起初的地位而必然获得的知识以及他后来制定的计划。"换言之，均衡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的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显见，这已不是被我们视为最佳状况的均衡了。本章末，哈耶克强调，我们的论点应用于解释现实世界时，我们要清楚需在哪些方面受到检验；我们绝然有必要搞清先验的和经验的两种类型的命题的分野。

第三章，社会科学的事实。

本章中哈耶克首先切入中心，指出物理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是否讨论对象是物理事实。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我们有一种将知识转嫁强加给被观察者的倾向。事实上，当对人类活动类型予以分类时，这些类的要素不具备任何物理特性。为了解释人类活动，规定人类活动本身的不同种类。这种规定是根据从事活动的人的看法和意图，显然，从分析角度看，这已经包括在了这些行动的未来内容。那么当我们试图理解别人的行为时，我们就自然地将别人的行为和行为

对象纳入到根据我们自个儿的知识来规定的种类和范畴中去。人们所普遍认为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个体行为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哈耶克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对我们可以理解的个体行为进行分类，并发展这种分类。

人们的另一个误解是，当我们的观察由个体行为转向社会集体行为时，似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客观性。而哈耶克指出，我们所认为的社会事实，从自然科学中使用事实的特殊意义来说，和个体行为和他们的对象一样也不是什么事实，而只是根据我们头脑里可找到的要素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对于历史方法是概括社会现象的合理途径这一教条，哈耶克认为，我们称之为历史事实的东西其实是这样一些理论，即在方法论意义上，恰恰与社会科学理论所建立的抽象模型具有共同特性。本章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的企图不外是提供一种推理技术，它在联接个体事实方面有助于我们；社会科学也不能借助于事实来证伪或证实。在干涉自然领域内，我们的概念是关于事实的，而且必须要符合于事实；而在社会的世界里，至少一些最相似的概念是组成那个世界的材料。

第四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经济理论决非研究完全信息以及既定偏好和知识状态下最优行为的逻辑科学。我们在解决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所资以利用的知识从未以集中和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甚或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其实人们关注的并非要不要经济计划，重要的是中央计划方式、分散的市场个人计划方式，何者更能充分地利用信息。在现实中，除科学知识外，更广泛地存在着有关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的知识，他们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知识难以从统计数学中表现出来，从而不能被中央计划的权威机构加以利用。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最终的决策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可以应付这些变化的人来作出。在经济社会中，价格机制应被理解成一个交流信息的机制。它是人类偶然发现的伟大体系，它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也使在知

识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协调配置。

第五章，竞争的含义。

经济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状态其实是一种没有“竞争”的状态。在理论上，不同个人的数据被假定为是相互充分适应的，它只阐明其中已隐含结论的状况，却不去说明这种状况如何产生。哈耶克的论点是，竞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过程，但其主要特点却被以静态分析为基础的假设抹杀了。根源在于完全竞争理论关于商品同质、知识完全的假设是极其背离事实的。哈耶克论证了在商品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竞争的重要性并未有丝毫降低。如果我们在分析竞争时加入时间因素，将之看作一系列事件的联系，我们就会发现任何时候市场上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某一特定产品，一旦它的成本不是最低的，就会被逐出市场。虽然这决非完全竞争状况，事实上竞争却异常激烈。哈耶克指出，如果没有政府行能操纵的人为障碍，则任何商品或服务就不可能从局外人身份进入该领域并能以指望从中获得超额利润的价格供应产品。所以我们应放弃关心某一特定场合的竞争是否完全，而应关心到底有无竞争。最后的结论：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带来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而这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决条件；它创造出人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也是由于它，人们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象现在了解的那样多。

第六章，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

在这一章中，哈耶克并不试图解决什么理论悬疑，而只是以其洞察力来提出一个领域广泛的问题以获得重视并开始卓有成效地讨论。政府控制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缺乏一个强有力并坚持信念的自由主义团体的缘故。哈耶克坚持有某些政府活动可能比没有某些政府活动更能使竞争有效。本章里所指的竞争秩序，与人们所说的有秩序的竞争恰恰相反，因为后者几乎总是在限制竞争的效力。哈耶克提到两个结论性的问题，一是货币管理当局如何实施一个可被预见的规则货币政策；二是对于失业者如何给以供应才能最少地干

预市场作用。为了保证有效竞争秩序，我们须在产权法、契约法、公司法以及税收问题和国际贸易问题进行探讨。事实上，商标和专有名称是重要的例证。产生问题的领域主要是公司法，它不恰当地将自然人的权利扩展至公司。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在雇工方面，如果我们试图恢复自由经济，就必须在法律和事实上限定工会的权力。至于税收，哈耶克指出，旨在平均的累进税摧毁了自由社会的基础——独立业主；继承税，本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工具，也不幸地被滥用。

第七章，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理性时代的人们倾向于相信有意识地调节社会事物比独立个体之间偶然地相互作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社会主义运动的昌盛是与这种思想背景相关的。不幸的是，某些重建社会的一些严肃问题未被认识到，也很少成功地被解答。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似乎是不存在经济问题的，而经济学的要旨也被归结为求取在既定一些条件下的极大效果的工程问题了。事实上，资源是有限的，一旦我们需要在许多竞争性目的之间分配这些资源时，经济问题便产生了。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即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目的之间分配资源。尽管社会主义词义歧杂，但我们将之与由中央当局统一分配资源这一事实相联系是恰当的。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否通过非市场的方式有效地配置资源。长期以来，对竞争制度的分析深入揭示了市场自发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怀疑用深思熟虑的决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戈森大约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其后，由于皮尔逊·考茨基、巴龙等人的讨论使这一问题愈发清晰起来。但是，使这一问题博得了巨大关注，以至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心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经济学家是路德维格·冯·米塞斯。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与俄国的布鲁恩卡斯几乎与米塞斯教授同时得出十分相似的结论，即社会主义的命令经济中，由于缺乏价格体系，不可能进行合理地计算。

第八章，社会主义的计算（二），1935年争论的真相为社会主义中央指导经济的辩护日益削弱。俄国的经验显示指导

经济无法解决资源有效利用的经济问题。有经济学家作出这样的论断："在假定对所有相关资料完全知晓的情况下，生产的不同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可以用某种手段来确定；通过这种手段，理论经济学解释了完全竞争体系中价格的形成和生产的方向。"哈耶克认为，仅探讨价格决定方式在逻辑上的可行性，意味着对问题的性质尚未领悟。关键的在于思考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后的可行性。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中央指导经济的结果与竞争体制的结果相比，相差很远。中央指导要真正代替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它必须对每时刻的该企业状况了解，大量不同单位的情况分别进入计划权威的计算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中央计划者还必须掌握不同品种和数量的消费品的重要性。这样看来，仅仅是资料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而事实上，市场的分散决策却可以有效地节省这些成本。哈耶克更深刻地探讨了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以及其它情况的微小变化，都将导致中央计划的全盘修改和重新计算。面对这些无可反驳的证据，社会主义的辩护者重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自由和竞争的情况。其基本思想是：独立的企业家或各企业的管理者之间应当存在市场和竞争，因而应当存在货币价格；由于企业家是公职人员，产品的售价只为刚好收回成本，而不是利润。哈耶克则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竞争引入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而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已放弃了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信仰，并将全部信念寄托于即使废除了私有财产仍可望保留竞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理论上的退却。但问题并未最终解决，可以肯定的一点倒是迄今为止对于解决社会主义计算这一问题贡献最少的恰恰是那些提倡计划的人。

第九章，社会主义的计算（三）竞争的"解决办法"

奥斯卡·兰格和迪金林博士在此次论中的第三个阶段提出了"竞争的社会主义"的方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依靠竞争机制来确定相对价格，但又都反对直接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提议由一个中央权威来不断通过插值实验的方法定价。哈耶克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很大地偏离了那些企

图以社会主义的计划代替资本主义市场混乱状态的初衷。而且，这种由中央固定价格的方法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计算的难题。尽管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机构，可以决定一组均衡价格，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某种方法最终会导致假设的均衡，而在于哪种方法将保证更快地更完全地适应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每时变化的环境。哈耶克接着考察了这种方案的适用性。他指出，对于一个标准化商品的市场，该方案还有可行性，但是涉及大宗的特异的定做的商品，由于事实上可以存在现实生产商与潜在生产者的竞争，而中央机构无法获知这一点，除非中央机构担负起生产管理者的全部职能，而这是不现实的。

哈耶克就“竞争的社会主义”方案中的工业管理的具体机构问题提出质疑。无论中央机构采用什么方式确定价格，比之由市场决定的情况有一个滞后期，而且这种价格很难因产品的质量和具体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显示出适当的差异。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管理者没有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兰格没什么办法清楚地说明分散经营的工业单位的性质规模及管理方式选择之因素的性质。重要的是，在兰格方案中，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者不具有市场经济中所应有的决策权。而且，因为价格预期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边际成本，管理者却很难负起准确地预测未来变化的责任。至于涉及全部新投资问题时，情况更让人明白在缺乏真正的市场和对市场后果负责的情况下，有效的资源配置是不可能的。最后，哈耶克探讨了与经济效率相并列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经济活动的广泛集中倾向。事实上，无论计划的社会主义，还是竞争的社会主义，都极力地依赖于中央权威机构作用的广泛发挥，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制度不会坠入专制主义的深渊。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兰格教授和迪金森博士面对困难重建社会主义学说的尝试，理应受到感激和尊敬。因为有了这样的讨论，似乎为了产生实实在在的个人主义，非社会主义的途径显得更有希望。

（据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文本版）　谢　岩　撰

作者介绍

哈耶克，哈耶克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而成名，探索了价格在决定资本积累、工业波动和全部经济生产率方面的指导作用。他极度推崇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有经济效率，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即使能够实现，也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他把自由竞争制度当作大多数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提出了“机会平等”和“理想社会”的概念。哈耶克的主要著述有：《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1929）、《物价与生产》（1931）、《集体主义经济计划论》（1935）、《自由与经济制度》（1938）、《利润、利息和投资》（1939）、《资本的纯理论》（1941）、《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自由的宪章》（1960）、《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1967）、《法律、立法和自由》（3卷集，1973、1976、1978）、《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新研究》（1978）。

〔美〕赫兹里特，亨利
Hazlitt, Henry

通货膨胀危机
The Crisis of Inflation

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凯恩斯理论非但不能解决危机，反而造成严重滞胀。此时西方保守派经济学家逐渐得势。《通货膨胀危机》出版于1978年，正反映了当时保守主义思想在西方的盛行。1981年5月时事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中译本第一版，译者段承璞。全书共二大部分，二十四章。下面分三部分予以介绍。

一

该部分共八章，是对全书的一个总括。

作者开门见山，指出通货的含意是货币增长。把通胀理解成物价上涨，会忽略通胀的真正原因，忽略祛除通胀的方法。

美国的通货可追溯到1933年。作者分析了1940年至1976年的货币 M_2、消费物价指数和消费美元购买力。其间，货币增长约13倍，而消费物价只增加4倍多。作者对这种情况做了三点解释。多数经济学家错误地用成本推进论来解释

通货，从而也就错误地把物价冻结作为补救方法。

二战后，普遍认为应用“货币管理”取代金本位制，因为他们认为金本位制过时。作者指出，“货币管理”的实质就是货币不断贬值。货币贬值，国家偿还债务时就可以用货币购买力低的货币清还债务，减轻了债务负担，但却欺骗了债权人。

各国放弃金本位制主要是因为金本位制具有防止政客操纵货币以及防止国内通胀的优点。从而使政客无法任意搞通胀。

要治理通胀，必须制止货币和信贷增长。这种方法执行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政府下决心，通胀不是不可避免的。

二

该部分包括后十六章，对通货涉及的问题逐个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政府开支的影响取决于它的用途。开支越大，对经济的抑制、破坏就越甚。而赤字的影响则看它如何弥补。若印发货币，等于搞通货；而发公债会出现挤出效应。作者分析认为赤字不能祛除失业，反而赤字越大，失业越多。

作者对 1919 年至 1923 年底德国的通胀作了分析。这是一场超级通胀典型，对生产、外贸、证券、利率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1923 年颁布创立新币制法令、发行伦登马克、通胀被突然制止。之后出现了“稳定危机”，生产和就业有所恢复。这场通胀也证明了货币数量学的理论缺陷。

作者批驳了用货币流通速度和“现金结余”解释货币价值变化的方法，认为主观价值是说明货币价值及其变化原因的一个基本方法。

作者对比了 1948 年至 1975 年消费物价指数百分率的变化与失业百分率，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批判了企图以通胀解决失业的观点。作者还分析了通胀与利润、利率的关系。

认为通胀会使生产者利润日益捉摸不定，抑制了投资。政府操纵利率，企图以廉价货币政策消除失业，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其结果则是通胀。

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以指数化做为补救方法，但自愿指数化和强制指数化都有危害性，它们歪曲了市场信号，导致劳力和产品分配、使用不当。指数化使收入无法保证，加快了通胀。

在通胀中，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财产，使通胀对财产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人们可以购买股票、黄金、农产品、不动产或向海外投资，但没有一种方法更可取。因为通胀已使整个经济的各方面混乱不堪。

1944 年，以美国为首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把各国货币的稳定建立在美元稳定基础上。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损害了美元的信誉，动摇了美元的地位，最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作者认为这是通胀遍及全球的最主要原因。

作者细致研究并分析了四种不同的货币制度改革方案，即不加控制的货币、在严格控制下的货币、金本位制以及私人营造货币。最后作者肯定了货币的非国家化，但他的观点与哈耶克是有区别的。作者对哈耶克的商品储备本位货币提出异意，认为这种货币无法保持其价值。作者建议推行私人金本位制，取消政府发行货币的垄断权。

三

《通货膨胀危机》一书的主要论点是，政府的巨额开支和财政赤字，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根源。全书紧紧地围绕这一论点，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导致和加重通胀危机的政府财经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赫兹里特强调要正确理解通货膨胀的含意，即通胀指货币和信贷量的增长。正确理解通胀的含意，对于分析研究通胀的起因以及治理通胀的方法是非常有帮助的。因而，作者认为治理通胀的方法，就是必须要制止货币和信贷量的增长。

书中批驳了长期以来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有些人提倡搞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增加就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认为通货膨胀能够增加生产者的利润，促使投资增加。而事实已经证明，搞通胀不但不能减少失业和增加利润，反而会破坏就业，使利润捉摸不定，抑制投资。

对于如何治理通胀，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治理方法。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建议“指数化”方法。但这种方法无异于规定每个人的物价、工资或收益都应当提高到物价平均水平，官方消费物价指数也应按照与每个人收益相同的百分率上升。“指数化”方法实行起来困难极多，不但达不到治理通胀的目的，反而会导致通胀的持续发展、扩大。

由于把通胀错误地归咎于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而把物价冻结当作救治方法。有选择的物价冻结使政府鼓励生产的物品（如生活必需品、战略物资等）发生短缺；物价管制造成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和习性，使物价管制得以长期存在，人们误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合理的；物价管制使人们忽略了控制货币量和信贷增长，加剧并延长了通胀。因而作者认为物价冻结是一个错误的补救方法。

赫兹里特反对货币数量学派关于由政府管理货币并每年按固定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认为这是货币数量学派的致命错误。这种政策主张的结果也只能是通胀的继续和加剧。

赫兹里特赞成哈耶克提出的“货币非国化”的主张，同意废除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允许私人发行货币。但是反对哈耶克的以商品储备本位制为基础的私人货币体制，因为“商品储备本位”货币无法保持其价值。赫兹里特积极提倡恢复实行私人金本位制，允许私人铸币，并用这种铸币进行交易。允许私人发行金币和金券，将会为世界恢复完全金本位制铺平道路。但是，作者也承认迄今为止还看不到恢复私人金本位制的希望。

（据时事出版社中文版）　石　乐　撰

作者介绍

亨利·赫兹里特，美国知名经济专栏作家，长期从事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出现有很多论著。赫兹里特的思想倾向属保守派，他始终反对和抨击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极力推崇保守派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 F、A、哈耶克（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但是，赫兹里特不尽同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具体政策主张，他有着自己独道的见解。赫兹里特于 1960 年编辑出版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该书汇集了欧、美、亚二十二位经济学家所著的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1960 年，还出版了《通货膨胀问题必读》（第一版）。1978 年出版了《通货膨胀危机》。

[美]赫希曼，阿尔伯特·奥托
Hirschman, Albert Otto

经济发展战略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战略》一书是作者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彻底摒弃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依照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平衡增长战略来发展，而坚持认为经济增长是以不平衡为特征，并体现为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仅当发展计划将其努力方向集中在具有与其它行业充分向后和向前“联系效应”的关键行业上时，它才是有效的。书中涉及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不平衡增长、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极化和淋下效应、通货膨胀的瓶颈理论，均是赫希曼首创，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发展经济学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战略”一词亦是在本书出版之后才逐渐流行起来的。

全书共分十一章，其中对西方经济学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有关平衡与不平衡增长战略、联系效应与工业化的特征的论述（第三至第七章），但作者认为有关发展动因（第一章）、企业的技术选择（第八章）及增长在区域间的传递（第十章）的见解亦应予以关注。

第一章，初探。自从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发

展有关的诸种因素、条件、障碍及前提，即发展的动因问题。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创业精神与管理能力、人力资本、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于信念态度、价值体系，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赫希曼一反这种单因素或罗列条件的研究传统，提出应将注意力适当地集中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动力和战略方面。发展不仅需要找出现有资源与生产要素最佳组合，为了发展的目的，还必须发挥和利用那些潜在的、分散的及利用不当的资源和能力。我们不应仅局限于注重资本、企业家等稀缺资源的节俭使用、关键是要去寻求一种粘合剂，一种能把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压力”和“诱导机制”。需要指出的是，被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的许多资源和环境条件，赫希曼认为只要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旦启动，并非太缺乏或太难获得，它们通常以一种潜在的、分散的和可利用的方式存在着，所需的是用适当的机制使之起死回生。沿着这种逻辑思路，他进一步指出，一国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有形的障碍和物质缺乏，而是由于发展决策能力欠缺和决策过程不完善。这里的发展决策包括所需的制度变化、改革及适当的投资决策。改善决策过程和条件的思路之一便是设立某种诱导机制，诱导性决策通常比自主性决策更容易做出，且更为可靠。因而发展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寻求和建立这种有效的诱导机制。

第二章，增长模型与发展进程。由哈罗德和多马创始的增长经济学。虽然给予了发展经济学家不少有益的启示，但因它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特殊经验和环境而提出的，故不甚适用于第三世界。譬如，在发达经济中，储蓄与投资决策往往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决定储蓄来源的重要因素；而在不发达经济中，储蓄与投资决策却往往是相互依赖的且增加储蓄更要大大依赖于开拓投资机会和消除投资障碍，而不大受增加收入的影响。发达国家都拥有大量训练有素且能随时察觉和搜索赢利机会的企业家，只要有适当的项目和资金条件，他们就有能力把投资计划一一付诸实施。由此，关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理论最为强调两点——储

蓄来源和投资机会的有效性及其生产能力便不奇怪了。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其困难正在于能否发现投资机会，并把发现的投资机会付诸投资行动。换言之，发展面临的障碍，主要是难以将现有的或潜在的储蓄导入可行的生产性投资机会，即缺乏制定各种发展决策以及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的能力。

赫希曼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发展模型。在第一个阶段上，国内的储蓄供给不足以构成限制发展的因素，不发达国家富人的奢侈消费、穷人偶然大量的花费和相互馈赠、大量的闲暇时间都使得潜在的储蓄能力大于实际储蓄，当然现代部门在发展初期阶段的相对狭小也是造成了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在此阶段上，一国所拥有的投资能力至关重要。所谓投资能力指的是在投资机会出现的情况下一国所能动员并实施的投资规模，它决定于一个经济体系内现代部门规模的大小。当现代部门不断扩展时，投资能力随之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渐渐从投资能力变成了储蓄供给，经济便发展到传统增长模型所描述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上，储蓄受收入增加的影响比受新投资机会出现的影响更大。对于欠发达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自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往往是动荡不安的、受着各种因素的干扰。赫希曼认为投资活动的互补性为现代部门和投资能力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前景。投资的互补性指这样一种情形：对生产商品 A 的投资，将激发增加商品 B 生产的需要，同时又强烈地刺激商品 C 的生产。这种互补性作用足以增强和补充不发达国家缓慢增长的投资能力。因此投资的互补作用成为一种为发展过程注入新的能量的必要机制，而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使它发挥最大作用，以便产生最大的诱导决策。

第三章，平衡增长质疑。以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和西托夫斯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各个部门需要维持步调一致，齐头并进，才能实现工业化。他们持这种观点的依据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容量

狭小，单独开设一家工厂或发展一种行业会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各个相关部门同时并举，彼此提供需求和市场则能保证增长的持续性。赫希曼认为平衡增长理论不能称其为发展理论，它没有揭示从某一经济形态到更进步的经济形态的变动过程，相反它所隐含的结论是必须把一个全新的自成体系的现代工业经济迭置在停滞的同样自成体系的传统部门之上。事实上为实施这种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大量的同时又往往是供给非常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如果真具备的话，那这些国家就不再是不发达国家了。平衡增长理论还假定了一个集权化的中央政府的巨大指导和协调作用，对此赫希曼断然指出，私人企业或市场力量不能处理的工作，事实上也无法由政府去圆满完成。

支持平衡增长的另一个重要依据被认为是外在经济内在化学说。这首先由罗丹和西托夫斯基提出，其要点是，在私人企业制度下，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作为私人生产者不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外在经济、私人利润的终结果。不过问题在于，在一系列不平衡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失衡是经由怎样的调整过程逐步消失最后达至均衡呢？一般认为主要依赖价格信号和利润动机即市场力量，但是发展中国家恰恰缺乏完善的价格信号和调整机制。面对这一问题，赫希曼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独到和新颖的论点：增长中的结构失衡可以由市场和非市场力量二者共同作用加以改变。也就是说，除价格信号外，一些非价格的数量信号亦可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其自动性不一定比市场信号差。所谓非价格信号指包括供应缺短、排队、呼声、抱怨等在内的会给政府施加压力或给企业传递投资信息的信号。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是发展决策，或说是一种能不断引致正确的发展决策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赫希曼指出：“导致偏离平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因为这种结果的每一连续发展都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引起的，并且转而引起新的不平衡，要求进一步地发展。该状况的产生主要源于产业间的互补性这个事实。“互补性”是赫希曼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

概念之一，其含义是：因为A产品的产量增加B的生产利用率也随之提高，结果产生了增加B的供给压力。这种压力或通过价格或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通过政治压力或其它压力形式表现出来，计算注定要低于其实际的社会净收益，从而抑制了私人投资的激励。倘若依照某个集中计划将各种生产者结合起来，象组织托拉斯一样，即可实现外在经济内在化、修改私人对利润的估价。这种观点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在将外在经济内在化的同时也会将某些外在不经济内在化了，其结果很可能对创新活动不利，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可使创新者获益，但在短期内也使其它企业的技术与设备过早淘汰，可以设想，在一个投资决策集中化的经济中，任何创新的动机都会受到那些"深受其害"的同行的强烈反对。赫希曼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私人企业制度缺乏暗含的"内在化"功能，对企业家隐藏了某些成果，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有力变革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为平衡增长论证。在上一章对平衡增长的理论依据进行批驳的基础上，赫希曼在本章中又对另一种貌似正确的"供给平衡"论提出了反驳，并阐明了作者关于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见解。"供给平衡"论提出：如果要使增长不受阻碍，经济各部门应保持某种比例关系共同增长。赫希曼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平衡增长，类似于两个不同时点上形成的两幅静止图像所显示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些部门追随主导部门一系列不平衡增长进程的最成为诱导性投资的主要基础。凡属于外在经济利益的净受益者的投资都是赫希曼意义上的诱导性投资，它决定于产业间所具有的投入产出关联程度。投资通过互补作用和外在经济引导其他投资的方式，使不发达国家稀有的即制定新投资决策的能力得以提高，因而对于发展而说是无价的"援助"，是必须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

第五章，投资选择与战略。本章着重讨论了发展理论与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投资顺序的选择。关于投资顺序的选择问题可以概括为：以有限的投资资源从事于一系

列拟议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总成本超过了资源的可供量，此时该如何选择那些相对于其成本来说贡献最大的项目？赫希曼首先区分了两个基本概念：替代选择与延滞选择。假如现在面临A、B两个项目，替代选择决策指究竟采纳A项目还是B项目的决策，延滞选择决策指优先发展A抑或优先发展B项目的决策。至于如何决定出最有效的投资顺序，赫希曼以拼玩具的拼图过程为例说明每一种配置多少都具有"诱导性"，它取决于其配置的难易程度，力图围绕那些本质上最难以配置的部分比围绕那些本质上只有平均难度或较小难度的部分，所付出的代价更小。由于发展的主要困难及难易程度不同，有效顺序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赫希曼转而具体地论证任何发展政策都必须面临的有效顺序问题：社会分摊资本和直接生产性活动谁应优先发展？前者是指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部门（简称SC），后者指直接带来产出和收益的工业、农业等产业部门（简称DPA）。设若SC优先于DPA发展，则属于设施过剩下的发展"，反之则称为"短缺条件下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加强和改善电力及交通设施实际上是任何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其实问题决非这么简单。按照赫希曼诱发投资的标准，上述两种发展顺序均能产生诱因和压力，其相对的效能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动力的强弱，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间接资本的管理部门对公共压力所作的反应。尽管如此，这两种顺序所产生的诱导方式都是有差别的："过剩的发展"能使现存的投资动机得到强化，但其"诱发"作用主要体现为吸引而非强迫性的；短缺的发展则不同，对短缺的体验，注定导致那些身受其苦或从短缺消失中获利的人企图设法予以补救，它的诱发作用带有强迫性的特征，其效果可能更明显一些。因此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全面优先发展SC，而应优先发展DPA部门。不过，赫希曼也指出：SC部门和DPA部门的产业之间有一个最必要的比例关系，长期延滞SC部门，也会构成经济进步最严重的障碍。

第六章，相互依存与工业化。前面主要探讨了促成最大

限度地“诱发”投资决策的有效顺序和机制，本章转入讨论直接生产过程本身，提出直接生产活动中经常面临的发展选择所依据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联系效应”，指经济中各部门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它又进一步区分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前者指一个产业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关联，如钢铁业的后向联系是采矿业，后者指一个产业同吸收其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钢铁业的前向联系是机械制造和汽车业等。按照赫希曼的观点，发展政策必须努力谋取这些众所周知的后向和前向联系所产生的效应并使之达到最大效果。关键是如何才能使联系效应达到最大限度？赫希曼认为，首先可以对某一经济中不同部门所能发挥的联系效应的种类和数量进行评估。并用两个指标（总产品中用其他行业投入的比重和总产品中体现购自其他行业的份额所占的比重）来衡量任何一个行业的相互依存程度。然后根据其相互依存度决定经济中的许多行业的等级序列。当然在选择一定的投资顺序时也不能过分依赖这些排列，而应考虑不同国家的结构特征。

后向联系程度被赫希曼视为衡量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生产越是具有初级加工的特征，其后向联系效应就越弱。包括所谓“飞地”型发展也是以出口为目的初级产品缺乏直接联系效应的结果。根据不发达国家的许多经济实例，赫希曼发现：工业化进程是从发展“最后加工”阶段开始，继而在国内从事中间产品制造，最后发展基本原料工业。这正好体现了后向联系效应作为若干“终极阶段”行业存在的综合结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赫希曼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以此说明后向联系作为一种发展机制如何作用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本章最后简要讨论了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结合的必要性。

第七章，工业化特征的进一步探讨。借助前已阐明的后向联系效应理论赫希曼进一步探讨了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因看到进口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冲击作用而不分

青红皂白地实行保护政策。他们往往未能看到：发展的真正困难之一，在于缺乏市场知识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口明显具有创造和探明国内需求、消除不确定性和降低销售成本的功效，通过后向关联，成为国内尚未利用的部分资源相结合的催化剂。进口在经济发展中能扮演一种“创造性”的角色。刘易斯曾深刻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呈明确的“二元性”特征：即现代工业部门传统部门长期并存。赫希曼认为，由于二元性的工资差异以及某些行业相对较小规模的资本投资要求，一些传统部门的小企业较之现代化大规模经营更为优越，因而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更趋向于在较长时期内保留工业革命前的部门，而不是从正面取而代之。

第八章，单个企业的效率与成长。本章的中心议题是新企业一旦上马，将在何种条件下可望成为经济体系的有效率、有活力的细胞。一个企业兴建不久就陷于停滞、亏损乃至破产这在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人们一般倾向于从外部寻求激发企业效率、保证生存的压力，而赫希曼则认为单单依靠与其他厂商的互补或竞争关系所施加的压力来改善企业自身的经营是不足的，这种压力还必须产生于企业本身。赫希曼在分析不发达国家许多企业无法有效经营的典型缺陷及其形成原因之后，指出了两种试图从内部诱发新企业的效率与成长的思路：一是资本的维护保养。缺乏适当的维护保养或许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独特、最为普遍的缺点。这有时导致欠发达国家倾向于选择那些无需大量维护和保养的项目，其实这不是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赫希曼认为应该选择一些必须加强保养维护的行业和项目，这样会形成对执行者的压力，养成保养的习惯反而会把事情做好。二是采取适当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通常人们认为对于资本短缺、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殊不知因为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往往较为低下。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它在协助管理从而提高生产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由机器定步调的操作比人力定步调的

操作效率更高，因为利用机器操作向工人提供了基本的做法，节奏与程序，减少了松懈和随意性。资本的这种改善管理、提高效率的功能在不发达国家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在大规模组织的协调和合作中会遇到特殊的困难。赫希曼所提出的解决思路都是基于一个基本判断：对于那些可以做好也可以做不好的事情，不发达国家往往不会下功夫做好，而对那些如果去做必须做好的事情，这些国家显然可以做的好得多，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的发展潜能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压力机制诱导出来。

第九章，干扰因素的作用。在这一章，赫希曼着重讨论不发达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干扰因素，说明这些因素在发展进程中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进程具有哪些影响。在这些干扰因素中，赫希曼侧重研究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困难以及人口增长的压力。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赫希曼不赞成用发展中国家某些心理倾向来解释，而是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出发，把通货膨胀看做是经济发展过程内生的现象。具体地说，发展充满了技术、设备和产品瓶颈和短缺，它主要通过后向联系的作用不断诱发新的投资和行业来进行，这就使得通货膨胀的压力经常存在。加之某些部门供给弹性不足，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会演化为整个经济的物价上涨，形成“价格—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增长过程中所发生的特定产出—投入之间的不平衡和比例失调也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困难。赫希曼强调指出：国际收支失衡并不象通常设想的那样来自为达到某一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巨大失衡。为谋求收支平衡努力扩大产品的“出口能力”是一种基本选择。赫希曼特别提到欠发达国家的外汇收入波动、尤其是外汇储备减少有时往往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刺激国内的进口替代和工业化的努力，变成一种诱发性的发展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最后谈到人口压力问题。赫希曼一反过去将人口增长一致视为发展的障碍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极为新颖的见解：人口压力是刺激发展的一种力量。其理由是，人口增长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压力，而社会致

力于抗衡这种压力的活动可以提高其控制环境与组织自身的发展能力。赫希曼隐含的一个判断是：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资本、企业家等等潜在地可能得到，只要遇上强大的“粘合剂”便能结合起来并迅速改变面貌，人口压力还是在此意义上成为一种“诱发机制”。当然赫希曼提出这种观点的意旨不是建议给予慷慨的家庭津贴以鼓励生育，而是设法使政策制订者更为冷静地认识现实而不是大惊小怪。

第十章，经济增长在区域间与国际间的传递。在这一章，赫希曼将有关诱发机制的讨论进一步拓广到增长如何在国家和地区间进行传递的。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而它一旦出现，强有力的因素必须使经济增长集中于起始点附近地域。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影响有两种：一是淋下效应，亦称扩散效应，指发达地区的增长会部分地转化为对不发达地区的购买和投资增加进而促成后者的增长；二是极化效应，即不发达地区中极其宝贵的资源（如资本、优秀人材）向发达地区转移从而抑制了落后地区的增长。当极化效应占据优势时，国家便会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政府的经济决策对整个增长的传递过程都将发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般通过公共投资在区域间的分配来实现的。可是，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投资决策中最普遍的倾向是，政治家往往出于政治或公平方面的考虑热衷于将资金分散投入遍布全国的许多小项目，而不是将资金集中于个别示范性的大项目。赫希曼建议在适当克服极化效应所导致的不利影响的过程中，不应将资金集中于公共设施方面而应积极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农业、工业或服务业等经济活动。接着，赫希曼比较了增长在国际间传递与地域间传递的特征。区域传递的优势主要在于落后地区可以得到更大的淋下效应，而且因其属于更大的单位而能获得援助。其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极化效应的影响，而且不能够依据比较利益的原则发展出口生产，以及缺乏主权所有者自然具备的促进发展的潜在性政策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试图开发其落后地区的国家，应该向这些地区提

供“与自治权相当”的手段。当然这些手段的目的在于弱化极化效应，而不要因此干扰了淋下效应。

第十一章，结论：政府的职能与外援的作用。赫希曼首先阐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两种基本职能：一是发动职能，即为了有效促进增长，政府必须通过前向冲击来发动增长，以便为进一步的行动创造前进的诱因与压力；第二是减轻压力职能，即必须对因发动职能所创造的压力做出反应，在各方面减缓这些压力。这两种职能亦称“被诱发”与“诱发”，或“不平衡”与“平衡”职能。赫希曼特别强调政府的大部分作用与其说是诱导整个经济发展不如说是经常被诱导。其次，赫希曼谈到了外资和外援的作用。具体地说，外国资本的作用是实现和促进某一国家在不平衡增长道路上的发展。如前所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短缺与瓶颈，此时若可得到外资或外援，则可以指望消除或缓解某些落后部门的短缺状态，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引发，否则，“不平衡”发展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悲剧。最后赫希曼简要展望了不平衡增长这个充满压力紧张和失衡的发展过程的前景。他的态度基本是乐观的，因为他认为“发展会带来许多压力和张力，这很常见。……正是通过与困难的冲突，发展才有可能对付它们……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一个清晰、可见的障碍，就是一个已经克服了一半的障碍”。

（英文版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潘照东曹征海翻译） 姚开建 撰

作者介绍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创立者。1915 年出生于德国柏林，曾就学于法国的索邦内大学和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1938 年从特里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1 年赴美

国，五年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家权力与外贸结构》。1952 年，赫希曼前往拉丁美洲，在哥伦比亚担任政府财政顾问及私人经济顾问。1956—1957 年被聘为耶鲁磊学欧文·费雪研究讲座教授，在此期间，写就《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崇高地位。随后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1958—1964 年）和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964—1974 年），并于 1974 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1980 年获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杰出奖。他被公认为当今“第一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并素有“横向思维大师”的美誉。除《经济发展战略》之外，赫希曼的代表作还有：《逃避、呼声与忠诚：对厂商、组织和国家衰落的反应》（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 年）、《对希望的偏见：关于发展和拉丁美洲论文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 年）、《僭越集：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及其它》（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年）。

〔美〕谢尔曼，霍华德

Sherman, Howard

停滞膨胀

Stagflation

本书是美国激进经济学家霍华德·谢尔曼论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作者试图以激进主义的观点解释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存在于美国的停滞膨胀问题。激进派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根治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消除停滞膨胀问题。

本书英文版 1976 年由纽约哈珀和罗斯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由厉以平、厉放翻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出版。全书除序言等外，共分 11 章，主要讨论 4 方面问题：滞胀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原因、滞胀的原因、社会主义是解决滞胀问题的根本制度。

一、滞胀的影响

停滞膨胀是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一种经济现象。膨胀意味着超过平均价格，停滞意味着一种停滞或衰退的经济，高水平的失业是其主要标志。停滞膨胀是 50 年代后在美

国出现的。失业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痛苦和不幸，也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通货膨胀使每个人都身受其害。滞胀给那些货币收入实际下降的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给老年人和退休人员造成最严重的损失。

二、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

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繁荣与破产交替循环及大规模失业和高比率的通货膨胀并发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制度中，业主为市场而进行生产，如果其产品没有市场需求，生产便不能继续进行。为市场而生产是经济周期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周期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货币在交换中的经常使用，如果货币持有者使货币退出流通，则商品就可能找不到买主，发生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生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和为私人利润而生产。如果生产总量大于有效需求的总量，则会发生产品销售问题，从而产生生产停滞和工人失业。

激进派认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在激进派看来，萧条既起因于需求有限（消费不足），也起因于高成本（投资过剩），扩张和萧条的交替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产品需求由消费和投资构成，产品成本由工资、设备和材料的成本构成。产品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即利润。正是利润的变动导致经济周期的发生。

在扩张初期，消费需求缓慢增长造成价格缓慢上升，同时，生产率迅速提高引起成本下降，因而利润大幅度增长。而在扩张中期，成本下降较慢或开始上升，最后在扩张后期上升得相当可观，因为成本（主要是非劳动成本）因生产率下降而上升得相当快。同时，价格上升速度加快，而后在顶点上升较慢，因而需求减弱了。这样，利润在扩张中期便开

始减少，并通常下降直至扩张结束。利润下降导致投资下降，又引致收入最终下降，从而引致需求的进一步下降，直至造成生产低落和失业。在收缩期，利润最初缩减到很糟糕的程度，稍后才开始有所缓和。在收缩期，价格下降，但成本没有上升，且在萧条低点事实上有所下降。由于利润率最后停止下降，资本家便开始扩大投资，增加生产，于是开始了复苏。

对周期性波动起增强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经济中的垄断刚性，无理想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外贸和投资，重要发明和创新的迟延和加强，折旧和更新周期，金融恐慌和扩张，政府干预，存货周期。

三、停滞膨胀的原因

美国经济现已成为垄断占优势的生产形势，垄断企业控制着许多行业的大厂商。在垄断情况下，价格可以达到很高程度。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在垄断势力增强的同时，工会势力在削弱，不能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工会势力引起的。事实上，在历次的萧条或衰退期间，实际工资都是下降的，且在大多数扩张阶段，单位劳动成本也是下降的。故劳动成本的变动不能用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

垄断容易造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垄断部门实行的是按成本加价的定价方法，即按一个利润差额来定价，这个利润差额可满足它们对增长和发展的预期的需要。虽然在扩张阶段垄断性大公司的价格上涨不如竞争性小公司快，但在衰退期，为了获取足以达到其目标利润的收入，垄断企业会减少生产，以维持较高价格，获得足够利润。同时，为保持一定的生产效率，垄断性大公司会大幅度裁员，从而造成比类似的竞争性行业中更多的工人失业。故一个高度垄断的经济

比较容易在每次衰退中引起高失业率。总之，集中的垄断势力造成了衰退中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

除垄断势力外，造成停滞膨胀的主要因素还有：（1）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的税收政策、福利计划、农业津贴计划、教育计划都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政府反托拉法实际上增强了垄断势力。政府建立的许多调节机构使大企业合法地获得了更多的垄断权力。政府支出方向为垄断势力所控制，服务于垄断势力的利益。总量财政政策不能医治或阻止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和失业，货币政策也是如此，工资一物价管制的效果更糟。（2）国际垄断势力的扩张所引起的美国在国家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造成滞胀的国际因素具体包括国际集中超过多国公司实现的程度，多国公司从发达的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的利润，美国优势地位的削弱，国际收支的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食品、燃料等的国际短缺等。第一个国际因素对美国滞胀的影响尤其大，这是因为多国公司通过税款向税率较低的国家的转移使财政政策可能不起作用，多国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货币流动使货币政策效力大减。

四、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在国内外的存在和发展，故要消除滞胀，就必须进行激烈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激进派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同，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民主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公有制意味着政府所有制，也可意味着通过民主的政治秩序，由人民拥有政府。以此定义看，苏联不是民主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

从短期看，激进派主张在某些部门（如石油部门）实现公有制。从长期看，激进派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

度。在美国，将1000家最大公司收归国家所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社会主义。在企业国有化后，其大部分管理权应交给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企业内部也要实行工人管理。

在更长的时期，我们能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产品都是免费供应的，没有工资，每个人都为社会公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现在应注意充分就业的立法、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和免费的公共保健，以及继续反对种族歧视。正如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展一样，这也能扩展到由消费者去控制所有的垄断企业。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消灭失业和通货膨胀，永远消除滞胀的弊病。

（据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邹正方　撰

作者介绍

谢尔曼，美国经济学家。1931年1月生于芝加哥。1968年至今为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1985—1987年曾任该校经济系主任。谢尔曼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周期、通货膨胀问题。其主要著作有：《宏观经济动态学》（1964）、《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导论》（1964）、《苏联经济》（1969）、《激进政治经济学》（1972）、《停滞膨胀》（1976）、《激进政府经济学的基础》（1987）、《经济周期》（1991）等。

〔英〕希克斯,约翰·理查德
Hicks, John Richard

资本与增长
Capital and Growth (1965)

在本书中，希克斯研究了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理论，并对各种经济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对动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书是希克斯由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的承前启后的著作。

全书共分 3 部分。第 1 部分讨论古典学派及其后各派的分析方法；第 2 部分提出了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模式；第 3 部分讨论了最佳增长途径问题。以下就这三方面对全书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一、四种经济分析方法

希克斯认为，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为了处理各种动态的经济现象大略采用了以下四种分析方法：

(1) 静态的或古典的分析方法。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等使用的这种分析方法较简单，只涉及一个固定的时期，不受存量、流量概念的限制，同时假定资本全部是同质的。因此，动态的经济现象成为静态均衡的连续，是一种分析方

法的核心内容。

(2) 短期均衡分析方法。威克塞尔和林达尔等使用的这种方法，不但涉及了时间间隔概念，而且引入了"预期"这一概念，以便于分析随着时间的演进经济现象的积累过程。那是因为，"预期"概念的引入，便构成了一系列短期的均衡点，这些短期均衡点运动的轨迹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动态发展的趋势。蛛网理论、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等均属于短期均衡分析之列。希克斯早期的代表作《价值与资本》也采用这样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往往要基于未来预期是确定的、竞争是完全的等一系列基本假定之下，所以使得理论模式偏重于严谨的思路推理，而失去了实际方面的意义。

(3) 固定价格分析法。无论是古典分析法，还是短期均衡分析法，都认为每一时期经济系统处于均衡时，价格是在经济系统内被决定的，因而价格是个内生变量。但是固定价格法却认为，价格是在经济系统之外被决定的，即价格是个外生变量。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假定每一时期价格的均衡。相反，不均衡的现象一直存在于我们分析研究的经济系统里。当然，固定价格法并不意味着价格永久不动，而是指当供求不均衡时，价格并不会必然地发生变动。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和哈罗德的"增长模型"采用的是这一分析方法。

(4) 增长均衡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用不着象短期均衡法那样对经济系统作逐期的均衡假定，也不必将价格视为经济系统之外的既定因素。相反，这种方法要求对价格进行研究，要找出价格在时间不断变化中的均衡水平，并认为，只有在针对不同时间上的均衡而言，价格由此才有了人们通常认为的伸缩性。经济增长均衡法适用于比较动态研究，它有助于对技术选择、资本品获得、要素分配和经济增长途径等问题的探讨。希克斯在本书中采用的是这一方法。

二、稳定状态经济增长模式

希克斯假定，在一个新的国家，土地可以自由占有，农

业生产活动的投入物是拖拉机和劳动，产出物是谷物。利用拖拉机经营的土地构成农庄。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一辆拖拉机，便可建立一个农庄。另一方面存在着工厂，工厂的投入物是拖拉机（代表生产设备）和劳动，产出物是拖拉机。所以，面临的问题是，农庄和工厂的生产如何进行才能实现均衡增长？

希克斯认为，为了保证均衡增长的实现，拖拉机的存量必须扩大，劳动量也相应要增加。劳动的增加或者来自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或是来自外来移民的进入。而劳动的供给之所以能满足需求，是因为存在着工资。因为，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下，劳动的供给是具有充分弹性的。即工资在某一水平时，可获得劳动的无限供给；工资跌到这一水平下面，劳动的供给就将减少。

由于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下，劳动的供给不存在什么问题，所以，要实现均衡增长的关键，是确定拖拉机在农庄和工厂投入的决定因素。希克斯认为，若用谷物表示工资，工资水平一定则使得工厂工人在农庄产出物——谷物中所占的分配比例就成为已知的了。拖拉机所有者的收入—利润也就能求出，且也用谷物表示。同样，一辆拖拉机的成本也可求出，且也用谷物表示。在此基础上，每辆拖拉机的收益与成本之比—利润率的大小就可以计算出来。所以，当每辆拖拉机投在农庄和工厂中所获得的利润率相等时，就能实现经济稳定状态的均衡增长。

显然，这一模式非常简单，而且有些假定也不尽符合事实，因此，希克斯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第一，模式假定“拖拉机生产拖拉机”有违事实，修正这一假定自然就会引起第二种资本品，但这样做对模式的改进程度仍十分有限。因为，有了第二种资本品，就可以假定拖拉机专门投在谷物生产中，至于拖拉机就可假定由车床生产，可是，一旦车床的存在，又需要引入生产车床的第三种资本品了。当然，假定“车床生产车床”比假定“拖拉机生产拖拉机”更合理些，但还是应该以多种资本品的存在来替

代同一投入要素生产同一产品的假定。

第二，模式假定工资水平一定。由于工资水平一定，利润水平也就随之决定了。因此，要素分配问题就不必再另行探讨了。但从事实上看，劳动生产率在经济整个增长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工资水平也将发生变化。所以，要进一步讨论增长过程中要素的分配问题。

第三，模式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但在现实世界中技术的变化是连续不断的。当经济针对 1 月份的技术，达到了均衡增长，可技术到 2 月份就发生变化了。所以，在任何时候，现存的资本品很难于现存的技术相结合，因为，现存的资本品不过是反映了过去的技术，从而与现存的技术有或多或少地不相宜。经济增长的每一种实际状况与均衡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就起因于资本品与技术的不相宜。为了更进一步接近现实，就应对资本品的不相宜性加以研究。

三、什么是最佳增长途径

通向均衡增长的途径有许多，那么，什么是最佳增长途径呢？希克斯在本书的第 3 部分，从经济福利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希克斯认为，对于实现经济增长的组织形式——是通过自由竞争，还是通过组织机构，可以不加讨论。关键是要确定什么是经济增长所要达到的最佳目标。从静态均衡的角度看，目标有两种：一是实现可以客观衡量的总产值最大化，即价格最大化；二是实现主观衡量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即效用最大化。

由于价格最大化容易求出，所以，希克斯通过福利经济学中的“补偿原则”，集中讨论了效用最大化问题。他认为，要求得效用最大化，就必须先掌握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或是通过某一种方法，对全社会内各个效用的组成部分进行大小

比较，“补偿原则”就发挥着这样的功能。根据“补偿原则”，若一次生产的改组，使A的境况变好，同时使B的情况变坏，那么，全社会的总效用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呢？如果A的境况由于这次生产改组而变得好些，以致于其境况的改善能在补偿B的损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这次生产改组就意味着全社会效用的明显提高，即经济福利得到增加；反之，效用降低，福利减少。因此，从经济福利的角度看，使全社会效用最大化存在着消费品的“黄金积累规律”。

希克斯认为，以上发生在静态均衡中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动态均衡中。而且，以上讨论的最大化是指消费品方面的，在动态均衡中，为获得持续的增长，还存在着资本品最大化问题，即存在着资本品的“大道定理”。所以，生产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要达到某一时期期初至期末这段时间内消费品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达到这一时期期末这一时点上资本品的最大化。从维持经济的增长方面看，后者可能比前者更为重要。只要实现这些，经济增长就能步入最佳增长的途径。

（据牛津大学英文版）　　肖　生　撰

经济史理论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1969)

希克斯早期从事经济学的数量分析的研究，后又转向经济结构和经济史的研究。本书对于研究经济史理论和了解希克斯的主张，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除序言外共分10章：理论和历史；习俗和指令；市场的兴起；城邦和殖民地；货币、法律和信用；君主的财源；农业的商业化；劳动力市场；工业革命；结论。现依据本书

的内部逻辑结构对其主要理论观点分别进行介绍。

一、理论和历史

希克斯在序言中指出，“我试图把经济史与其它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这一思想在第1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谈到，“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本书希望做的就是促进这种对话。他认为，理论不应和历史对立起来。

希克斯认为，经济史和其他历史的区别在于我们注意的是一般现象还是个别历史事实。当我们注意的是一般现象时，经济理论或其它社会理论便可能是合适的，反之则往往不合适。他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理论应适于整个历史”，它只是涉及历史中的可以用理论来说明的一般现象。

根据这种认识，他指出理论上的探讨必须以概括的方式进行，越概括越好。也就是说，通过对社会状况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类，找出使一种状况让位于另一种状况的明白易懂的原因。那么从何处入手来研究呢？他认为应从市场的出现，交易经济的兴起开始。“它把我们带回到历史上的一个早得多的阶段，至少是向着它的初始阶段。”

二、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在城邦制度中的初期发展

希克斯在本书的第2章中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已从埋头于寻找使市场经济完善的方法转到了认真重视非市场体制，然而，一个完善的非市场体制和一个完善的市场一样，都是

不现实的。而现实的非市场体制则是很“不完善的”。

随后希克斯分析了最早的非市场经济模型——习俗经济。他认为，个人的作用是由传统规定的，一个组织的头领自身就是传统结构中的一部分，他也规定了一些职能以及随之而来的某些相应的权利。他指出，那些处在历史主要的通道上的人们，在市场出现以前很久，可能因遇到一些紧急情况而使村社按一种新形式进行组织，这就出现了另一种非市场经济——指令经济。当习俗经济被彻底扰乱时，它便直接过渡到军事专制主义。除上面两种纯粹的极端的形式以外，完全可能出现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封建制度便是一种混合类型，习俗在这里属于主导地位；典型的官僚政治（如古代中国）是另一种混合类型，其中指令成份较强。尽管社会形式不同，但却有一共同之点，就是它们的主要经济关系是岁入，即由农民向某一公认的权力缴纳的税金、实物和地租。越近于中央集权制和指令经济，岁入可能变得越重要。岁入经济先于市场，但它当然比市场存在得更长久。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全盛时期，岁入经济也不曾完全消失。

希克斯接着在第 3 章中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从这样的习俗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最初一定是用某种“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存货的。随着交易的正常展开，定期贸易出现了，并且由偶然的贸易变成经常性的。商人阶级出现以后，他们便开始把自己或紧或松地组成一个新型的社会，这就在习俗型和指令型之外增加的第三种组织形式，即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它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但并不是无政府的。希克斯认为，商人的这种新的地位就产生了组织方面的要求：保护财产和维护合同。这就需要有法律的（或至少是准法律的）机构和制度。在可以利用的比较正规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时，希冀于靠统治者对商业的赞同和“好感”来满足商业经济的要求是完全做不到的，事实上，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的城邦已为贸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本书第 4 章分析城邦和殖民地，根据希克斯的观点，城

邦乃是一种重要的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城邦作为一个贸易实体，其核心是一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在整个城邦集团内相互之间都有商业关系的全体商人构成商业经济，构成我们要研究的人们的制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希克斯认为，我们必须用"收益递减趋势"来解释贸易的多样化—商人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新的贸易渠道的独特的努力，以及使他成为一名创新者的那种进取精神。城邦甚至可以显示出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这可从专业化分工导致的成本下降和风险的减少中表现出来。

进一步，依赖于对外贸易的贸易中心有一种强烈的刺激促使它在外地建立贸易站，以便减少那种贸易承受的风险，它既可以贮存商品存货，又可以用来观测消费者和供给者的要求和爱好。然而并不是所有殖民地都是商业性的，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希克斯认为，如果仅用殖民地作为贸易的基地而不被用作其他渗透的基地，那么贸易无论对商人自身还是与之交易的"周围的"民族都有好处。但事实上用来确保贸易安全的武力非常容易被移用于其它目的，它可能被用于征服，或者用于掠夺。

这样，城邦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贸易日益多样化，由于规模经济的原故，经营也较有效率。然而竞争的激烈使购售价格之差额减少，"收益递减趋势"开始起作用，扩大贸易量可能使他们处于一种价格不利于他们的地位。这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停顿或停滞。贸易增长开始收缩之日就是彼此之间的无情斗争可能爆发之时。当然，此刻商人们也在思考，为什么既不达成默契也不缔结公开的协议来划分市场呢？于是，他们在"限制竞争"方面达成协议，商业经济成为习俗，商人在一系列习俗权利与义务中取得了一席之地。行会等团体成为保护他们地位的手段。因此，当有了安全和财富之后，扩张的活力就从商业而转向了其他领域，雅典就是在商业扩张的末期成为"艺术之母"的。

三、市场渗透阶段：货币、金融的发展及对国家的影响

希克斯把城邦制度以及商人在政治形势不利时为自己建立的制度称为商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它的特点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种非商业的环境之中。而各贸易中心在一个半商业化的国家不经常的保护下残存着的阶段，则是商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中间阶段就是市场向非商业环境的渗透阶段。希克斯在本书的第5章考察了货币和金融的渗透，在第6章考察了这一渗透对国家自身的影响。

他认为，商业经济本身几乎从一开始起，就是使用货币的经济。货币并不是国家的一种创造物。随着交换的发展，货币的职能一再变化。当牲畜甚至是贵金属在充当"价值标准发生困难时，国家就开始铸造货币。下一步便是各贸易城市的政府竞相仿效了。只有到出现了青铜货币，货币成为象征性的和纯粹的支付手段时，希腊才成为一个完全的货币经济。可以说，货币应用是希腊城邦制度留下的最早的经济遗产，也是奉行商业经济的"中间阶段"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希腊城邦的第二项经济遗产是商法。希克斯认为，非商业经济的法律制度不适合商人的需要，它使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幸运的是，继希腊之后统治地中海诸城邦的罗马共和国能够在他们创造的法律范围内，为商法找到一席之地。这一法律发展和前述的货币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货币和法律（商法）实际上是"古代世界"的两大经济遗产。

希克斯进一步研究了信用的产生及作用。他认为，任何时代金融交易都是贸易交易的自然延伸，各种形式的抵押贷款长期以来一直是商人向非商人提供贷款的正常形式。当然，法律制度也及时地跟着发展起来。当金融发展不仅需要狭小圈子里的放贷活动，而且还要扩大范围时，就出现了担保人，

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金融经纪人。希克斯认为，当一个企业已经在金融媒介方面专业化时，在广义上说，它已经是一个银行了。债券、股票交易市场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已经接近使商业发展的中间阶段告终，并使之成为转向现代阶段的核心。

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自身产生了影响。中古时期的政府甚至在好多年内也很难增加其所需收入，主要原因是“基税面”窄，征收效率低，又不公平。而制度的不公正是税收毫无伸缩性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战争或其它非常事件中需要增加支出时，就会采取简便而有效的办法——举债。由于把钱借给国家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之。国家有时需要采取抵押（典当）的办法来取得贷款，或采取出售包税及出售对将来课税的豁免的办法。其结果会造成穷人依然纳税而富人则大都免税，而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并不比前述的权宜之计更好些。希克斯认为，解决这一困难的一个途径是银行业的兴起。对于政府来说，最有意义的是银行可通过自身的活动进行货币创造。至此，政府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已趋于完善了。希克斯提醒说，金融权力如果暂时被用，就能成为一种控制手段，如果被使用过度，便成了对控制的一种威胁。如果国家除金融权力以外没有经济权力，国家便不能支配商业经济。

四、市场经济对要素市场的渗透

在第7章中，希克斯认为，当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土地和劳动市场即要素市场时，便渗透到比较顽固的区域。早期的农业可称为领主和农民制度，它是指令——习俗制度的主要变种。市场对这一制度的影响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渗透阶段，第二阶段除商业渗透外还有金融渗透。领主对货币的需求使他鼓励农民出售产品给商人，以便使农民有

货币来偿付其应付款项。另一种办法就是领主把一部分土地保留下来以更直接由自己控制的方式运行耕种，这就是渐臻完善的农奴制。这两者互相交织。在劳动力相对土地而言发生不足时，领主和农民制度可能因为地租收入的减少而让位给自由农民制度，也可能通过发展直接耕作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这两种办法可能合而为一，并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与佃耕制度结合起来。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可能是国家取代了地主，为农民确立比较完善的土地所有权，农民向国家交纳的税金代替了从前向地主交纳的地租。这时，国家也可以着手开发一种国家耕作制度，在这一系列变革中，始终存在着独立耕作制与依附耕作制的区别。独立的农场主可以决定“生产什么”，而不独立的农场主则做不到。但是，独立的农场主往往由于缺乏资金而需谋求贷款和国家的支持，这就使他失去了某种金融的独立性。可以说，小规模的独立耕作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可靠办法。随着农业技术的改变，依附耕作的优势增大。

对于本书第 8 章所涉及的劳动力市场，希克斯认为应区别开劳动力成为交易品的两种情况。劳动力要么被完全出卖，这就是奴隶，要么只能租用他的劳务，这就是工资支付。前者可以看成是指令经济的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对于商业条件的直接适应，后者则是更彻底的商业性做法。他指出，当商业经济在指令——习俗经济的边缘增长时，就出现了“温和的奴隶制”，自由劳动取代奴隶劳动的主要原因是自由劳动比较便宜。17 世纪通往非洲的海上航线开辟后，自由劳动力制度便确立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就创造出了城市无产阶级，它将为许多大城市提供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他们是处于最低等级的劳动者，既没有高工资也没有安全可言。

进一步，希克斯在第 9 章分析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和这一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认为，从手工业转向现代工业的“革命”是固定资金进入或开始进入中心地位时发生的。商业贸易获得的极大的发展（如荷兰和英国），推动着现代工业取代老式的工业。金融业的发展也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为工业开辟了宏伟的前景。工业革命的到来对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是十分有利的，然而实际工资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此时的产业工人与昔日的城市无产阶级由于其工作的固定性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希克斯指出，我们以前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失误在于它忽视了产业工人是怎样能够始而以小团体形式，继而以更广泛的形式使自己变成一个阶级。可以说，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世界性的。它是当今我们最需要考虑的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他认为，导致目前世界上有待吸收的人数达到 5 亿人之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口压力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希克斯在第 10 章中对此作了展开论述。他认为，民族情感妨碍着吸引的进程。最初的“重商主义”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实现国家各种目标的一种手段。它的失败有多种原因，而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行政方面的失败”。希克斯认为，通过政府的行政革命使传统的官僚主义以现代形式重现于世。行政革命前政府可用以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手段相当简单，而当今政府运用着复杂多得的手段。其中最彻底的办法是将贸易和投资的决策者一律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他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就其一个方面而论是极端的、最终的保护形式。把保护主义推行得最彻底的不是先进国家而是其他一些国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府在原则上对国际资本抱有敌意，坚持要靠本国的稀有资源来发展自己；二是国家越穷困，再次就业的机会就越有限。更可能的是，在其它地区机器改进的反响之下，它将经常受到长期的损害。国家越穷，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损害的愿望便越强烈。希克斯认为，无论其动机如何，保护主义都是一种障碍，但未必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据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毕晓光　撰

经济学展望

《经济学展望——再论货币与增长论文集》是希克斯在12年间（1965—1977年）所写的论文集。在这期间，希克斯还出版了另外五本书，即《资本与增长》（1965年）、《货币理论评论集》（1967年）、《经济史理论》（1969年）、《资本与时间》（1973年）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1974年）。希克斯自己认为，上述著作和《经济学展望》这本论文集，尽管采用的探讨问题的方法不一致，但却是由一个共同的理论思想所贯穿，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本书中的各篇论文，又从不同的角度概述、补充和发展了上述五本书的内容。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希克斯在六、七十年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书除"前言与概论"外，共收了希克斯的9篇论文。它们是：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作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二、工业主义。三、货币的经历与货币理论。四、预期的通货膨胀。五、霍特里。六、往事与引证。七、关于资本的争论：古代与现代。八、风险理论的灾难点。九、解释与修正。这9篇论文中有7篇曾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只有2篇（即第三篇长篇论文和第八篇论文）未曾发表过。这9篇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是"前言与概论"和头三篇论文。在这几篇文章中，作者对自己近年来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其他几篇，就个别理论问题作了探讨和说明。

在"前言与概论"中，希克斯对上述5本书和本论文集里的共同观点予以扼要的阐述，其中主要的是动态理论及经

济增长理论问题。

希克斯指出，在《价值与资本》中，包括了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部分的基本内容为帕累托需求理论，其基本假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动态部分的缺陷则在于未能摆脱边际主义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这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未能意识到从自由竞争市场形态到垄断市场形态的变化，从而把适用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理论分析方法简单地套用到垄断市场机制上。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希克斯认为这要通过对市场结构的分析与研究。他把自由竞争市场形态称为"原子型市场"，（在《凯恩斯经济学危机》中称为弹性价格市场）它存在中间商人，是一种没有组织的市场结构，其价格由供求决定。这种市场存在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以前的时代。《经济史理论》就着重研究了这种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代居统治地位的市场形态。在本世纪初，原子型市场被固定价格市场（垄断市场）取代了。在这种市场中，不存在中间商，价格是由生产者自己（或由某个权威）定的。这两种市场形态的另一不同点是货币量作用方式的不同。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货币量首先对价格起作用，通过价格的变化影响产量和就业。在垄断市场中，货币量的变化对产量和就业有直接影响，进而才影响到价格。市场形态变化的原因是技术的进步，而不是社会政治因素。希克斯认为正是这种市场形态的变化才带来了"凯恩斯革命"。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结构即垄断市场，希克斯强调在动态理论方面要注意时间，即注意过程，注意各阶段的时间顺序，并且还必须运用时间的纽带，把各个阶段联结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且，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带有不确定性，不能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作为实现现期均衡的依据。

在"前言与概论"的后半部分和第一、二两篇论文中，希克斯着重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己在过去对三种主要的增长理论研究的回顾，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

希克斯在《工资理论》中研究了新古典派的生产函数理论，在《资本与增长》中又研究了稳定状态理论。但这两种理论都是一种静态理论，所以作者在70年代转向对新奥地利派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资本与时间》）。

希克斯认为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两部分内容。第一是双重均衡过程理论（第一篇）。双重均衡过程是指储蓄投资均衡过程和充分就业均衡过程。"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劳动的充分就业"（第22页）。为了实现这个双重均衡，作者认为，战后西方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一是新古典派的生产函数论，二是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法。但这二者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穆勒表述的双重均衡过程原理较正确：工资总支出是最终产品和除包括利润在内的各种用费后的差额，只要这种扣除小于最终产品的增加，那么，当最终产品增加时，实际工资必定增加。实际工资的增加必定产生生产要素替代效应和储蓄效应。生产要素替代效应是指随着实际工资率的提高，实际利润率必定下降，厂商趋向采用资本要素取代劳动要素即资本密集的方法。储蓄效应指由于收入从利润向工资转移而减少储蓄。储蓄下降意味着投资下降（原因储蓄等于投资），从而不利经济增长。所以实际工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希克斯认为，经济进步的基本动力是通过利润率起作用的发明创造，从而造成经济进步的冲动。在实现双重均衡过程中，这种冲动迟早是要衰竭的，其原因是劳动的稀缺。其结果是一方面每单位就业劳动量所使用的资本数量和最终产品数量趋于增加，从而实际工资也增加，另一方面是投资量降低，从而就业率下降。所以希克斯得出与凯恩斯主义相同的结论：双重均衡是无法实现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是有关经济增长决定要素理论（第二篇）。首先，希克斯不同意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及新古典派关于资本积累是推动力的观点。其次，他认为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包括下列四因素：（1）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目的就在于寻找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的各

种发明创造（冲动），以便提高利润率。（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有劳动专业化和大工业特有的大规模生产两种形式，希克斯认为：这两种形式都有利于经济进步，但大规模生产附带产物垄断与工会却部分地阻碍了经济增长。（3）土地。土地实际上是指代一切自然资源。现代经济增长面临着严重的自然资源稀缺的问题，克服的办法是依靠科技的进步。（4）劳动。希克斯认为某些部门所需要的特殊种类的劳动短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短缺是限制经济增长的又一因素。克服的办法一是依靠新的技术发明，二是培训工人。但这两种方法都会导致平均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这又会引出替代效应和储蓄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希克斯得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是恰当的结论。

第三篇是个长篇论文，共分 4 小节即（一）古典数量论。（二）维克塞尔。（三）凯恩斯。（四）我们自己。在该文中，希克斯首先分析批评了休谟的古典货币数量论、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他认为这三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力图阐明货币同商品价格、就业量的关系，但都不足以说明西方国家 70 年代所面临的停滞膨胀的局面。接着希克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以求对停滞膨胀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他的理论包括：（1）对货币主义理论的批评。作者认为货币主义只适用于金属货币经济，因而在现代它是一种过时的理论。（2）把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说明了通货膨胀与失业有可能是并存的。（3）希克斯认为自己的停滞膨胀理论包含下述要点：第一，初级产品供给不足。经济增长是受到许多因素制约的，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初级产品供给不足就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市场结构。经济部门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业部门，其价格由产品成本决定，另一类是初级产品部门，其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当初级产品供给不足时，（且短期内缺乏供给弹性）就会造成价格上涨，大大提高了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从而导致了物价普遍上涨。第三，工资的推动。人们在经济增长年代习

惯于实际工资的持续增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为了保持生活水平的连续性，工人会要求继续增加工资。作者认为，这种工资独立推进的作用，既影响了经济增长，又促进了物价的上涨。第四，国际竞争和价格的国际传递。希克斯认为，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贸易顺差且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的产品销路好，其价格居高不下；贸易逆差且低经济增长率国家能获得贷款，这种贷款在国内起到了通胀的压力。同时，通过价格的传递机制，各国出口产业部门的价格上涨传递到国内生产部门，从而造成物价的普遍上涨。上述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就导致了停滞通货膨胀的局面。为克服这种局面，一是“转变为一个封闭型经济，尽可能地从贸易世界中撤出来”(第107页)，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二是提高初级产品供给生产率和削弱初级产品市场上出现的垄断倾向。

在第四篇论文中，希克斯对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进行了批评，说这些是附加货币主义者的。而货币主义的理论是种过时的理论，所以根据这些理论所制定的政策是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通胀对不同类型市场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通货膨胀造成的是“方便与安全”的损失；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则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和情绪上的损失。因此，很有必要采取收缩的措施来压低通货膨胀。

在第五篇论文中，希克斯对英国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1882—1975年)作了评价，并分析了霍特里与凯恩斯之间论战的主要内容。他认为霍特里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批评是具有独到之处的，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尤其是银行利率体制和宣告效应对于货币当局具有启发性。

在第六篇论文中，希克斯对自己的经济思想发展与经历作了较系统的描述，并回顾了自己与凯恩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交往。他认为，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前，自己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员，属于马歇尔正统经济学派。《通论》出版后，作者写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一文高度评价了凯恩斯的成就，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立

场而变成凯恩斯主义者。此时，他的思想也不属于以前的正统学派了，他在《凯恩斯经济学危机》中承认此时他已背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方向。

在第七篇中，希克斯认为关于资本的争论历来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回顾经济学史对经济学家具有特有的用处。作者认为，得到实际资本数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资本品本身的价格指数来平减，这样得到的数额叫资本量。这种方法着重强调资本的物质属性。二是根据产品价格指数来平减，这样得到的资本数额叫做资本的价值。这种方法着重强调资本的价值量。希克斯正是根据这种标准，把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学家划分为两个阵营：古典经济学家几乎都属于后者，因此，可以称之为资金派；而现代经济学家则几乎都属于前者，因此，可以称之为唯实派或唯物派。生产函数理论是唯物派的标志，但是资本—产出比例却是现代资金派的标志。但是在当前经济学领域中，古典资金派有复兴的倾向，原因是①经济学家对某些特殊情况如福利的计量和关心。②社会会计核算使经济学家与商业会计核算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因为资金是商人的资本概念，所以这种联系必然导致资金主义的复兴。

在第八篇论文中，希克斯认为，在风险理论中，如果 $\nu=0$，（即$\sum a_{ijxj}=0$　在 i 种不确定情况下，全部 j 种有价证券的结果为零，a_{ij}为在 i 种不测下，一单位资本的结果，xj 为投资 j 种证券的数量），则边际效用（$\partial u/\partial xj$）为无穷大。此时的零点就是灾难点，它将造成全部的损失。因此，必须以一切代价来避免。

在第九篇论文中，希克斯针对加速数理论两类经济史和李嘉图的机器效应（指工业革命早期人们陷入贫困的原因）的批评作了答复，并宣称仍然坚持过去的看法。详细说明可参见他本人的《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和《经济史理论》。在本文最后部分，希克斯就《资本与时间》一书进行了补充说明。增补的主要内容是冲动这个概念。《资本与时间》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创新理论。研究创新又引起了冲动。创新扰乱

了均衡，若没有其他的创新，系统会趋向新的均衡，但冲动的存在，影响了这个过程。

（本书的英文版于 1977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余皖奇翻译，198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胡曙光　撰

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

The Crisis in Keynesian Economics (1974)

《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一书是希克斯于 1973 年 4 月 24—26 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所作的三次讲演汇集并修改而成的，全书约 4—5 万字。英文版于 1974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杨志信翻译，于 197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 71 页。

《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共分三讲。希克斯按照凯恩斯自己排列的顺序，把凯恩斯经济学分为“（1）投资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乘数理论；（2）利息对投资的影响——资本的边际效率；（3）货币供给或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灵活偏好”（第 7 页）三个部分。希克斯就是按照这种顺序展开论述的。

第一讲“导言。储蓄，投资与乘数”。第一讲的前半部分论述了凯恩斯经济学在三十年代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从五十年代起凯恩斯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应用方面的发展情况。希克斯认为，战后 50～60 年代西方国家的长期繁荣，有多少要归于凯恩斯的政策，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凯恩斯的政策可能起了作用，也可能无需凯恩斯政策，而依靠战后迅速

发展的技术进步和公共支出的增加就足以产生"繁荣"了。同样，把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繁荣的消逝说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失败也是无根据的。因此，希克斯认为有必要弄清凯恩斯经济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在第一讲的后半部分（题为"储蓄，投资与乘数"），希克斯分析并评价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凯恩斯论述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是由消费和投资或者是消费和储蓄两部分构成。这样，在消费函数（或储蓄函数）既定的条件下，一定的投资可以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地增加。这就是乘数理论。但希克斯认为，要使投资乘数作用得到发挥，还须有另一个重要前提，即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存货可供使用。为此，他考察了实际存货数量和合意存货水平，只有当实际存货超出合意存货范围时，生产者才会作出反应。当投资支出增加时，如果实际存货数量等于合意存货水平，那么在投资过程中存货的减少必然使实际存货低于合意存货水平，因而会出现对存货投资（即诱导投资）。这样，收入的增长将超过凯恩斯所说的正常乘数，而出现"超级乘数"（详见希克斯《商业循环》（1950年））。希克斯还认为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另一缺陷在于它不曾考察存货的结构。为此，作者对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这两种情况加以考察。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增加投资后如果出现某些产品存货不足，那么只有采用（1）劳动代替资本或（2）从其他工业部门抽调产品来供给某一部门扩张的需要的办法。但是这两种办法能否使投资净增加却难以确定，所以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也就无效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希克斯认为，一国生产资源不足，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或减少出口得到补偿，使乘数发挥作用。但其前提条件是国内应有充足的存货或是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或者能可靠地取得国外信贷。单靠汇率的浮动是无法发挥乘数作用的。

在三十年代那种大萧条时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源和充足的存货，才可能出现凯恩斯所说的乘数作用，所以希克斯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第二讲为“货币，利息与灵活性”。这一讲作者分析并评论了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理论。希克斯认为，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就是要说明货币供给变动对利息率的影响以及利息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通常是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如果政府不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经济就会出现停滞，失业增加的局面。要避免这种局面，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较低的利率，以便使整个投资水平提高。所以凯恩斯强调长期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象人们常常误解的那样凯恩斯只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接着希克斯指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存在着缺陷：一是凯恩斯为了分析的方便，对资产形式选择作了过分的简化即假定人们只在持有货币和持有债券之间进行选择；二是凯恩斯没有对资产的结构进行分析。为了消除缺陷，希克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作者认为可供选择的资产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在选择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而导致风险不同，预期收益大小也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同风险、预期、各种资产形式的“流动性”等级的学说相联系的资产选择理论。

其次，希克斯还对资产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把资产分为营运资产和储备资产。厂商的储备资金又可相应地分为“自有部分”和“透支部分”（厂商向银行的借款部分）。自有部分资产的灵活性依靠自己持有的流动资产；透支部分资产的灵活性依靠借款和透支。货币政策在自有部分经济中，从长期看，则可刺激投资（凯恩斯的学说已较详细地考察了这一情况），但从短期看，由于增加投资等于减少了“流动性”，所以只靠降低利息率，不会对经济有多大刺激。然而，在透支部分经济中，厂商的流动性依赖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本身的“流动性”又依赖于中央银行，因此，货币政策也就占重要地位。所以，希克斯说：“在透支经济里（或者在透支部分占主要地位的经济里），银行系统的权力大得多。”（第46页）在这个权力中“银行对投资的影响，用改变灵活性的方

法比用改变利息的方法可能更为有力"。(第 45 页)。

第三讲为"工资与通货膨胀",是全书最重要的一讲。此讲中,希克斯讨论了凯恩斯未能解决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两难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说。

首先,希克斯批判地分析了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中的工资推进说和需求拉动说,并认为这两种学说不能够解释六十年代后期西方各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现象。接着,希克斯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并用"两种价格体系"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现象。

1. 结构性通货膨胀说。希克斯认为通货膨胀与总需求没有直接联系,即并非由于需求多少而引起膨胀和收缩;通货膨胀与"工资推进"联系也不大,即不是由外界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起的。当前的通胀来自劳动市场结构和工资结构方面,其核心内容是:经济中有扩展部门和非扩展部门;由于工资具有"上升容易下降难"的性质,所以在扩展部门的繁荣阶段,工资是上升的,在衰退阶段工资并不下降。每当扩展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时,根据有关部门间工资水平的"公平原则",非扩展部门的工人就感到不公平,于是就要向高工资看齐、"赶上去"。而在衰退阶段,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上升程度,由于"赶上去"的现象而使它相等或接近繁荣阶段工资水平的上升程度,且工资具有刚性,于是就导致了通货膨胀。希克斯认为,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不是现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能解决的,只有采取比较平衡的经济增长,注意经济效率和公平原则的兼顾,才能解决问题。

2. 两种价格体系。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并且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凯恩斯主义缺少价格理论。希克斯为了沟通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以及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他提出两种价格体系的理论。两种价格体系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存在两种价格——固定价格和弹性价格;相应地存在两种市场——固定价格市场和弹性价格市场。这两种市场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固定价格市场里,价格由生产者来决定,存货归专门经营该种商品的厂

商所拥有，没有中间商存在（或处在买方或卖方有效控制下），其实际存货和合意的存货往往不一致；在弹性价格市场里，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存在着独立的中间商，所以实际存货和合意的存货总是相等的。希克斯用该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原因。他说，在弹性价格体系里，如果发生通胀，也无关紧要。因为，人们（中间商）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所以"对膨胀性工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上涨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调整"（第62页）这就会导致出现一个"膨胀性均衡"，使"各种实际价格比率和在没有膨胀时并无不同"。但这种"膨胀性均衡就是一种在凯恩斯意义上的均衡，它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第62页）这就是说，在弹性价格市场里，通货膨胀是可以同失业并存的。

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只存在弹性价格市场，而且还存在固定价格市场如劳工市场，由于不存在中间商，价格不是供求决定的，价格的上升是不一致的，所以固定价格市场不可能出现"膨胀性均衡"。这也就是说，虽然有通货膨胀，但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同样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这也造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而且，在存在两种价格市场情况下，弹性价格市场的通货膨胀会对固定价格市场发生影响。这样，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固定价格市场就得不断地重新规定价格，这才是"真正害人的方式"（第66页）"既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又常常使人恼火"（第65页）。

总之，希克斯认为，在弹性价格市场中，通货膨胀不会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危害；而在固定价格市场中，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利的，是真正有害的。因此，作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也就是说根据两种价格体系的结构和劳工市场结构，要采取经济平衡增长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不会因劳工市场结构的失调而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存货短缺的问题也可解决。所以，希克斯主张经济的扩展应放在那些存货贮备（包括外汇贮备）充裕的部门。

《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篇幅不大，内容却很丰富，表现在一方面对凯恩斯学说本身的评论，并且纠正若干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另一方面对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因而，该书成为希克斯的代表作之一，但全书文字较晦涩，有人评论说，其费解程度不亚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胡曙光 撰

作者介绍

英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名誉教授。希克斯涉猎于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他在工资理论、货币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社会会计学、经济周期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消费者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和资本理论等方面均有造诣。他的主要著作有：《工资理论》(1932)、《价值与资本》(1939)、《资本的纯理论》(1941)、《社会结构：经济学导论》(1942)、《预算改革问题》(1948)、《经济周期理论》(1950)、《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世界经济论文集》(1959)、《国际贸易：一个长远的观点》(1963)、《资本与增长》(1965)、《货币理论评论文集》(1967)、《经济史理论》(1969)、《资本与时间》(1973)、《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1974)和《经济学展望：再论货币与增长论文集》(1977)等，主要论文有："不确定理论与利润"(1931)、"工资与利息"(1935)、"分配与经济进步"(1936)、"凯恩斯与古典学派"(1937)、"福利经济学基础"(1939)、"消费者剩余的恢复"(1941)、"经济学说史"(1943)、"消费者剩余的一般理论"(1945)、"不完全竞争的过程"(1954)、"工资政策的经济基础"(1955)、"价值与资本的增长模型"(1959)、"增长与反增长"(1966)和"储蓄、投资和税收：一项国际比较"(1968)等。

〔英〕霍奇逊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由向以斌等人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的作者霍奇逊在“前言”中讲述了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霍奇逊认为，二战以来，经济理论处于一种可怜状态，其主要标志是，主流理论不能对许多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未能开出可以明确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处方。经济理论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很快或轻易地改变，因此，所有经济学家都有义务考察这门学科的不完善情况，放一放学术游戏，认真解决一些经常被习惯忽略掉的主要理论问题。他要说明的中心论点是，传统理论是受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继承下来的、落后的、理论上不可接受的个体主义观点支配的。他把此书的主题确定为“制度、社会实践和历史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在他看来，取新古典正统派而代之的激进的新理论，归根结底不可能总是避免联系社会关系和制度的经济意义建立新的关于人类当事者的理论。霍奇逊把书名定为《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正反映了他的这种理论倾向。

霍奇逊在第1章“导言与提要”中从“当前的理论背景”出发提出一些讨论问题，然后概述了全书的基本构架。霍奇逊指出，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对新古典理论的有力批评，这些批评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主题：首先，最大化假定越来越被

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其次，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的；第三，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这些主题都涉及信息和知识问题。对信息和知识问题的兴趣部分是奥国学派努力的结果，但奥国学派后来却陷入无法接受的主观主义。凡勃仑则把个人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联系了起来。霍奇逊列出了“正统经济理论的范围与边界”和“制度经济理论规划的范围”两张图，他指出，正统经济学把它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在不断变换。与正统派不同，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把技术和个人嗜好与偏好均作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而且，它还用“社会经济系统”这个术语来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经济与整个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不可割裂的。在这一章中，他还考察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命运，认为制度主义经济学不应忽视理论任务而再次陷入经验主义，应把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分析中的某些因素、成果都有效地综合起来。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全书共分 11 章。除第 1 章外，第 2 章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第 3 到第 6 章集中批判正统理论中关于经济当事人的基本假设。第 7 到第 9 章对一些特定的制度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在这个领域建立完整的理论远远超越了本书范围，书中提供的主要是一系列的说明与观察。第 10 章从传统所说的微观经济学领域转到宏观经济学领域。第 11 章主要讨论政策。

在第 2 章（“方法论和假设论”）中，霍奇逊首先摘录了两段引文，表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新古典理论是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维护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地位意谓经济学永远不能指望成为一门科学。然后他分别叙述了维护新古典理论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批评者的观点、工具主义者的解释等。在说明“经验主义及其他学派”时，他又叙述了卡尔·波普的证伪主

义、对波普方法论的批判，他认为，波普的著作事实上为一些新古典理论的辩护士提供了庇护所。在这些介绍之后，霍奇逊分析了方法论的命运。他认为，更一般地、所有普遍的规范的方法论都存在问题；无法发现一个合理的或连贯的经济学方法论，而且寻求一个普遍有效甚或最理想的方法论也是无用的；适用单个的、规范的方法论于经济学是不可接受的，这在方法论上也的确是不合理的。

在第3、4、5、6章（分别为“在个体主义方法论背后”、“最大化假设”、“理性主义的行为观”、“行为与体制”）中，霍奇逊集中批判了经济当事人的基本假设。他分析了从18世纪以来渗透到经济学中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种个体行为是有目的的；个体有目的性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的起因；心理活动导致行为等。他指出，个体主义方法论者虽然讲有目的的个体可以运动和引发事端，但他们并不去解释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目的的产生，不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他认为，制度结构、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因素不仅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影响人们的看法和追求的目标，把这些排除在人类行为科学之外是错误的，而要把这些包括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主张中，将与其著作相矛盾，因为这种方法坚持所有分析从人类个人开始。

霍奇逊指出，理性概念在正统理论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理性”是它的基本假设之一，被当成无懈可击的教条。“理性经济人”的核心内容一直是：当事者把一直称为“效用”的东西最大化，也即最大化假设。霍奇逊列举了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对最大化假设进行辩护的观点（显示性偏好论和进化论），并列举乔治斯库—罗根、彼得·顾尔、西德尼·温特等人的批评论点。他从理论和经验各方面列举了对最大化假设进行批评和怀疑的许多经济学家及其著作。他指出，对最大化假设的批评有两类：第一类是关于复杂性、知识、不确定性和有限计算能力的批评，也即说，人们即使试图达到最大化，最大化也是不可能的。第二类是基于

心理学中的实验工作和其他领域的证据，这类批评认为，最大化远不是典型的，而"非理性"的行为甚至在经济领域也是更为普遍的。霍奇逊指出，最大化的"进化论"（最优化行为的演化遵循着达尔文"适者生存"机制）是以理性主义行为观为基础的。他从方法论、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引证了大量资料，包括西蒙、帕累托、凡勃仑、弗洛伊德、马尔里克·尼赛、琼·皮亚杰、罗纳德·海纳、巴里·海因斯等人的著作或观点对理性主义行为观进行批评。他认为，在哲学方面，理性主义行为观如果不陷入自相矛盾，就无法解释原因行为；在认知心理学方面，与公认的理论结论也不一致。因为认识和思维过程的复杂性以及需处理的信息数量，人类的心智必然具有分层结构和不同的意识水平，对理性思维来说，人们面临着信息太少和资料太多的矛盾。实际上，人们的心智处理复杂数据的分层方式和活动本身的分层组织是相对应的，人们依赖惯例和习惯。

在第6章中，霍奇逊进一步讨论了认知理论，并在论述常规化行为和制度的意义同时批评了正统派。他以行为、习惯、惯例化、制度、自发秩序等概念为题，说明了制度主义与新古典派及奥国学派在这些问题上的差异。最后，他也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新古典主义在其竞争和个人主义理性分析中，依靠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类推法，但它不能解释，一个"适应"企业的特征是如何不断传给其他新企业的。另外，生物进化模式要求长期稳定的环境，否则，环境的巨变会使"自然选择"过程完全被打乱，而消费者、企业等面临的环境则是迅速变化的。如果越出传统经济学范围，可以发现与其因在自然界中相似的进化的机制，这种机制是组织结构、习惯及惯例，它们能保持行为范式并将其从一制度传送给另一制度。这种经济进化可以在稳定期与危机期，在明显的均衡与累积的不稳定的交替中进行。

在第7、8、9章（分别为"契约与产权"、"作为制度的市场"、"企业与市场"）中，霍奇逊论述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基本因素（如合同、交换和产权）进行了讨论，利用埃米尔·迪尔凯姆

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与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框架不同的框架。他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把社会想像为基本上是一个由契约关系组成的网络，一个个体之间契约的迭加，社会整合被说成是每个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产物。但迪尔凯姆已说明了纯粹契约的不可能性。在任何发达的交换体系中，非契约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坚持理性领域是无限制的，可以直接达到最大化，暗示所有行为都导源于推论和计量，忽视了推理所依存的认识系统，并认为所有的非契约因素都可以被忽视。其次，霍奇逊对市场进行了分析。他摘引古诺、杰文斯、米塞斯、斯科特·莫恩等人给市场下的定义，指出了这些定义的不足。他给市场下的定义是："把市场定义为一套社会制度，其中大量的特种商品的交换有规律地发生，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制度的促成和构成。""市场部分地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208 页）这与正统理论把市场仅作为事物的一种自然状态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霍奇逊在"市场存在"问题上批评了科斯，指出科斯用来解释市场安排与企业的成本更高的所有原因，恰好说明市场比分散的交易成本更低；科斯关于企业优于市场的论据正好说明市场优于没有组织的交易。霍奇逊还分析了市场上价格与规范的关系，强调了完全竞争的不可能性，并介绍了安德鲁·斯科特讨论博奕论的著作和观点。他认为，不应低估博奕论发展所显示的重要性。它们最先向主流经济学市场观提出了严肃而又持久的挑战，如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假设的基础就会被大大地削弱。再次，霍奇逊又联系市场环境对资本主义企业作了探讨。他指出，至少对马克思来说，企业的内部权力关系与市场上明显附属于法权的自由和正式平等有着很大的区别。对这种区别，阿曼·艾尔奇安和哈曼德·德姆塞茨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企业就是一种市场。奥里弗·威廉森虽认为企业不是市场，但沿着科斯的思想，提出企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和作用。霍奇逊认为，这种新古典主义企业观是不正确的，他强调企业是一种制度，其内

部习惯和安排并不重视得失的功利主义计算，它鼓励建立忠诚和信任的关系；企业是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中发展的，不联系这种环境，就不能把它的存在归因于它的一般效率；企业拥有大量技能和技术，能不受变化无常的投机冲击影响（这是市场的特征）从而保存下来。

在第10章（“预期与凯恩斯的局限性”）中，霍奇逊考察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理论，指出凯恩斯的人类行为观是理性主义的，并导致了对政府和国家的错误认识。霍奇逊还介绍并分析了理性预期学派及奥国学派的预期观。他指出，如果沿制度主义路线，后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就存在基础，后凯恩斯主义者应在更为充分的、非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建凯恩斯理论。

在第11章（“目标和政策含义”）中，霍奇逊说明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含义。他批评了正统理论的需求理论，指出，当面临现实的经济政策决策时，任何政府，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个体主义，都必定要把它在某些领域中的有关需要的全部思想强加于个人选择和市场，而不是任其自然。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由中央计划的经济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干预，而在于以何种形式、为什么目的而进行干预。不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所有经济制度都是多元化的。侵入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中的各种经济结构，如封建社会中的市场，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都叫不纯粹，它们对于整个制度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思想就叫做不纯粹原则。根据这种不纯粹原则，虽还不能为政策目的提供一个详尽的界限标准，以便设计出市场、计划和其他经济机制的恰当结合，但可以表明，对于困扰工业国家的问题，用单一修补法是不行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方法远远不够，仅实施中央计划或国家控制也不会取重大成果，只有把处在不同经济水平上的各种不同方法从根本上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成功的可能性。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需要调节机制的大量存在。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　　姚开建　撰

[美] 胡佛，凯文
Hover, Kevin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The New Classican Macroecomics (1988)

本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而货币主义者在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短期效应问题上仍然没有同后凯恩斯主义彻底决裂，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出现了把理性预期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宏观经济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一学派自产生后常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而受到不合理的抨击和否定，并常常在学术上对其归属问题引起争论，本书即是“试图理解新古典主义的论点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从而初步回答新古典主义的争论”。

全书加参考文献部分共 394 页，分为五篇：导论；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货币理论和政策经济计量学争论问题；新古典主义方法论。本文就本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一、新古典主义的基本信条

作者认为新古典主义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的信条：第一，

经济当事人的实际经济决策只取决于实际的而非名义的或货币的因素。第二，在经济当事人的有限信息下，他们是一致的和成功的最优化者，即他们连续地处于均衡中。第三，在评价经济环境时，经济人不会犯系统的错误，即他们具有理性预期。

二、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

（一）劳动市场理论

作者认为在劳动市场理论中有关菲利普斯曲线及货币中性问题的分析上，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上述三个信条的基础上运用弗里德曼的“自然率假说”，得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

首先，与弗里德曼认为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对“自然失业率”的非均衡偏离观点不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在给定人们对将来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及名义工资率预期形成过程的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代表了劳动市场的动态均衡。

其次，弗里德曼认为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中是存在的，在长期中则不存在。因而货币存量变化在长期中是中性的（即只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则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认为：在短期中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预期到的货币存量的变化在长期和短期中都是中性的、未预期到的变化则是非中性的。

（二）经济周期

作者主要论述了卢卡斯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和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

1．卢卡斯经济周期模型

在作者看来，卢卡斯经济周期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货币冲击，使货币冲击转化为持续性产量

波动的传播机制是：对货币供给的冲击中的序列相关、同经济当事人不能得到由完全的关于寿命期长的资本存量的信息的相互作用以及“信号筛选”问题：即货币冲击引起的价格变动有多少是有利于他的相对价格变动、有多少是单纯的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就不存两种价格水平的变动的混淆。货币存量的序列相关的随机波动也不会导致产量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经济当事人往往会把两种价格变动混淆起来，把未预期到的一部分一般价格水平变动误认为有利于他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产量波动。但是，由于经济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这种混淆会得到纠正、产量和就业会随错误的纠正逐渐返回到原有的趋势上。产量对自然率的偏离不可能累积。周期波动表现为围绕稳定的基本趋势的波动。

2. 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基—普模型

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同卢卡斯模型不同，这一模型认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在于技术冲击。这些技术冲击是以未观察到的方式序列相关的。且经济当事人对这些冲击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即在每种情况他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信号筛选，而且正是由于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才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其波动方式如下：假定存在有利于技术的冲击，这使产量、劳动需求和现行实际工资增加。经济当事人面临信号筛选：这一冲击有多少是暂时性的，有多少是永久性的（这由技术冲击的序列相关大小决定）。如果劳动者估计冲击是暂时性的，实际工资高于未来工资，劳动者将在现期提供更多的劳动，产量因而上升。如果劳动者估计冲击是永久性的，他将进行新投资以便将来增加生产。技术冲击的序列相关使产量波动和投资增加具有某种持续性，直至冲击消失。如不存在进一步的冲击，生产者会发现他们拥有的资本存量高于稳定增长所需的存量，从而减缓投资速度，直至恢复到稳定增长的路径上。

三、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

（一）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把三个基本信条运用到相当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得出有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即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中也不能系统地影响实际产量。作者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的。这一模型包括以下四个函数方程：①卢卡斯总供给函数：$y_t=\bar{y}+\alpha\ (Pt-{}_{t-1}P_t^e)\ +\varepsilon t$，其中 y_t 指 t 期的产量；可指自然产出率；Pt 指 t 期的实际价格水平；${}_{t-1}P_t^e$ 指经济当事人在 t－1 期预期的 t 期价格；εt 是均值为 0 的序列非相关的随机误差；α是常数。（上述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下面的小写字母也表示变量的对数）。②总需求方程：$Pt=m_t-y_t+u_t$。式中，u_t 是附加反映货币流通速度冲击的随机误差，m_t 表示 t 期内的货币存量的对数。

③系统的货币政策可被描述为选择一个不变的货币存量增长率 λ，从而以对数形式表示的货币规则方程为：$m_t=\lambda+m_{t-1}+e_t$，式中 e_t 是均值为零的反映货币存量增长目标错误的序列非相关的随机误差。

④理性预期${}_{t-1}P_t^e=E\ (P_t I_{t-1})$。式中 I_{t-1}表示在时间 t－1 可获得的所有信息。

货币政策是否能系统地影响产量只是一个关于政策参数 λ 对于产量 y_t 是否是模型的解的组成部分的问题。通过对上述四个方程组的代入和转换，求解 y_t 得：$y_t=\bar{y}^+\ (1+\alpha)^{-1}\ [\alpha\ (u_t+e_t)\ +\varepsilon_t]$ 上面方程的含义在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 λ 不参与产量 y_t 的决定，因此系统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在作者看来并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的政策行为，系统的货币政策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能是有效的：①货币当局与公众相比具有信息优势。②工资合同不能充分考虑未来

的偶然性及重新谈判工资合同需要成本。

（二）货币理论

对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宏观经济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使一般均衡和个体最优化相一致。货币理论正是这一问题的充分体现。作者重点分析了其中较为规范的迭代模型和具有金融约束的模型。

1. 迭代模型

这一模型源于萨缪尔森的“纯粹消费借贷模型”。其主要内容如下：

理论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代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代人中都有一个固定数量的个体，每个人都生活两个时期。其中年轻人为了能在年老时有更多的消费会借出一部分资源禀赋，而老年人预期自己将会死亡就尽可能多地消费，成为年轻人资源禀赋的借入者。货币成为两代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手段。模型中不存在资本或生产。两代人各拥有一定量资源禀赋。

模型的分析和结论：老年人如前假设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消费将用货币购买年轻人的资源禀赋，他所能购买的数量及价格水平取决于年轻人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而进行的现期消费和老年时消费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又取决于年轻人对现期价格和将来价格的预期。

通常假定他们具有理性预期，因此在价格水平预期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将维持前一代的均衡消费模式、价格水平和货币需求。均衡是平稳的。但是在价格水平预期上升的情况下（即出现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年轻人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越来越多地选择现期消费、直至逼近两代人只消费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水平，确切的说逼近于他们没有货币的水平，因此均衡是非平稳的，均衡点随通货膨胀的加速移动直至货币价值为 0。上述的均衡实际指货币均衡。所谓的货币均衡是指货币具有正数价值，因此它是人们所需的。货币均衡会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完全不存在。

第一，每一代只消费各自的资源禀赋。

第二，如果人们预期将来货币是没有用的，那么它现在就是没有用的。

第三，由于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两代人仍能各自消费自己的资源禀赋，它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当货币受一个完全生产性的资本资产的收益率支配时，不存在货币均衡。

迭代模型虽然是比较规范的货币理论模型它赋予货币一个作用，但却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货币，消费仍然继续进行，因而它是货币理论不适当的基础。

2. 金融约束模型

金融约束模型的基本特征是：购买必须由在购买之前就持有的现金来融资。同迭代模型一样，这一模型通常被区分为几个时期，从而金融约束表明：在某一时期内的购买受到在这一时期的货币数量的限制。某一时期由出售劳动或物品而得到的货币，在下个时期开始前不能被花费。在这一模型中货币是基本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交易发生。货币具有价值贮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

金融约束模型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均衡的存在是稳定的。这是因为：

第一，在金融约束模型中一项具有比货币所具有的较高收益率的资产存在不会导致年轻人选择不持有货币。因为在他们老年时期到来之前，金融约束阻止他们花费以货币支付的工资。

第二，在年轻人强烈地偏爱现期消费胜过未来消费时，货币也不是没有用的。因为在这一模型中年轻人必须工作挣取货币以购买物品。货币被用于支持在同代人及两代人中的交换。此外，金融约束还会限制年轻人在年轻时消费全部资源。

第三，与在迭代模型中认为预期货币将来没用，那么现在也没有用的观点不同，金融约束使得货币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没用的，因为需要它来支持一代人范围之内的交易。

四、财政政策

作者通过考察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两个微观模型来说明这一学派在财政政策上的基本观点——李嘉图等价。所谓李嘉图等价即指税收和债券融资（发行公债）基本上起着相同的作用。

罗伯特·巴罗用两个不同模型来复兴了李嘉图的理论观点。

第一个模型：无限生命周期型。这一模型的基本论点是：政府在减少一定量税收的同时的发行等量的债券来弥补政府总支出。这时短期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会增加。但是由于政府在后来为了偿还带有利息的新的债务，必定为在以后的时期提高税收，纳税义务将按复利增长，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也将以同样的数量减少。这样理论地形成预期的消费者将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不会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改变他的消费决策、而是把增加的那部分收入流量资本化，维持原有的最优消费量。因此，在考虑到他的消费决策的范围内，税收和债券融资是等价的，也可以说，以后时期增加的税收的贴现值正好补偿了本时期减少的税收。

第二个模型：迭代模型。消费者的生命实际上是有限的。为了论证赋税不会因去世而被逃避，巴罗把上述模型重新构造成为一个不存在货币的迭代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论点是：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考虑到他自己的效用，而且还考虑到后代的效用。如果政府通过用一定量的债券来代替税收的保证政府支出不受影响，一旦债券购买者去世，政府为了以后偿还带有利息的债务而在以后时期中提高的税收将会被转移到债券购买者的后代身上。由于他们具有理性预期，故将能完全地预期到后代的初始的税后收入，为了保证后代能有同样的收入和效用，他们将同前一模型所说的那样，会

把因债券替代税收而增加的那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作为遗产留给后代，从而使原有的消费计划和最优消费量不发生改变。增加的遗产部分抵消了后代所增加的税收部分。李嘉图等价成立。

此外，作者在本部分中还论述了对巴罗观点的批评，对李嘉图等价的纠正，对公开市场业务不相关性的纠正及真实票据学说方面的观点。

五、对经济计量模型的争论

作者认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争论集中于对卢卡斯有名的经济计量政策评价批评的新古典主义反映上。

卢卡斯认为：通常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由于忽视理性预期，没有选择不变的形式。即通常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模型的参数估计将随政策体制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这样一种模型对于评价可供选择的政策是无用的。因为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值不能被很好地预期到。卢卡斯认为：理性预期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意味着：估计的宏观经济关系（参数值）对于政策规则的改变不发生变化。卢卡斯从上述对经济计量政策评价批评中得出结论：只有对于稳定状态，经验证据才能得到并有意义，对于政策体制发生变化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和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卢卡斯的“政策不变性命题”。

卢卡斯的这一命题一方面受到了萨金特等人的支持，他们试图发展新古典主义的微观基础揭示出不变的参数，准确地预期政策体制改变所造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姆斯等人认为，政策不变性命题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政策体制的真正改变是极少见的，因此甚至那些跨越这类体制改变时不发生变化的模型，对一个既定体制内的预测和政策分析仍是有用的。而且理论实际上不大可能

提供限制条件允许估计的基本不变的真实参数。

上述五个方面是本书着重分析的内容。此外本书还探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同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关系及通常与后两者易混淆之处。

(本书英文版由美国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公司1988年出版。中译本郭建青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出版。)　　吴素萍　撰

〔美〕乔根森，戴尔
(Jorgenson，Dale)

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的发展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ymentof a Dual Economy (1967)

本文发表在《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 年第 3 期，是继刘易斯和费—拉尼斯之后，二元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乔根森的功绩不仅在于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说，而且论证了农业是二元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这就改变了人们对二元经济发展的传统认识，纠正了刘易斯和费—拉尼斯把二元经济发展仅仅归结为农业剩余劳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简单结论。

本文共有 5 个部分：导言；二元经济发展：古典的分析方法；二元经济发展：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隐蔽失业后的发展阶段；总结和结论。其中，第 3 和第 4 部分是乔根森理论分析的精髓部分。

一、导　　言

乔根森在文章的第 1 部分中分析了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

济学的产生原因，以及发展经济学的模式和新古典模式的主要分歧点。

乔根森认为，人均高收入与工业人口的高比率有关，而人均低收入与农业就业的高比率相联系。因此，经济发展问题应该作为人均收入增长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的作用日益重要。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程度上差距过大，这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差异，出现了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乔根森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先进的或现代的部门，另一个是欠先进的或传统的部门。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要以具体化为工农业的经济关系。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有古典和新古典两种分析方法，其区别在于对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条件的认识不同。古典的二元经济模式认为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而新古典的二元经济模式则对此持否定态度。由于分析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在产出、就业结构、投资率、资本密集和要素替代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二个模式的结论也不相同。

二、二元经济发展：古典的分析方法

乔根森在文章的第 2 部分，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工业吸收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工业化的同时，注意降低资本—产出比率，才能提高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的能力。

乔根森指出，二元经济理论的特点在于揭示了两个部门生产函数的不对称性。农业部门的产出只是劳动力和土地的函数，该部门除了土地开垦外没有其他形式的资本积累。相反，在工业部门中土地不是生产要素，工业产出只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工业部门的资本来自于工业内部积累，劳动力却来自从农业部门转移而来的剩余劳动。

乔根森指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都属于古典模式。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费—拉尼斯区分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二个阶段。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此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不会减少农业的产出；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上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但小于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因此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增加是以牺牲农业产出为代价的。

乔根森进一步分析了三个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率和部门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动规律。他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公式分析了人口增长率。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率等于农业技术进步率，并且所有新增加的人口都将成为过剩劳动力；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率等于农业技术进步率对比土地供给的产出弹性。接着，乔根森分析了部门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工业的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率不断扩大，但资本增长率小于产出增长率，这表示工业的资本—产出比率趋于下降。这时，工业就业机会将不断扩大，足以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上，农业动力增长率下降，直到农业和工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都等于实际工资率。此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即新古典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农业和工业的实际工资率相等。

三、二元经济发展：新古典的分析方法

乔根森在文章的第3部分提出了“农业剩余”概念。他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那是因为，第一，只有农业发展了，农业部门才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供追加的劳动力；第二，工业发展不取决于资本规模的大小，而取决于有没有农业剩余。也就是说，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人口规模和农业剩余。

当农业人均产出达到人均农产品消费的临界水平时，人均收入的增加额就会转向对工业品的需求上，这时便出现了农业剩余。在这前提下，农业人口才有可能向工业部门转移。

乔根森同时还指出，工业部门发展取决于二个初始条件：一是人口规模，二是资本存量的规模。然而，只有人口的初始规模才对长期经济发展起作用。他认为，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来说，不存在一个资本存量的最低需求水平问题。事实上，不论资本存量如何小，只要存在农业剩余，经济总是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的。

乔根森在文章中分析了工业和农业的贸易条件。他认为，农业和工业间的贸易平衡要求二个部门的劳动力收入价值等于不用作追加资本的工业产出价值加上全部农业产出价值。长期贸易条件可能有利于农业，也可能有利于工业，这就取决于农业增长率高于还是低于人口增长率。

四、隐蔽失业消失后的发展阶段

文章的第 4 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乔根森认为，农业发展能推动二元经济从一个发展阶段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反之，农业落后必然使二元经济的发展出现倒退。

他指出，二元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存在隐蔽性失业的阶段，也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是隐蔽失业消失的阶段，这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于以农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率，工业部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第三阶段，二个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不变的实际工资率。前二个阶段属于古典发展阶段，而第三阶段可以解释成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古典阶段。

对于新古典模式来说，农业是二元经济发展的基础。如

果农业产出只等于人口增长率，农业没有剩余，那么工业就没有可用于追加的劳动力。此时，即使有了资本积累，工业还是难以发展。如果农业产出小于人口增长率，那么工业的劳动力便会退回到农业部门，整个经济最终陷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然而，对于古典模式来说，农业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农业产出小于人口增长率，那么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逐渐减少，这一过程会一直继续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下降到零。此时，工业部门进一步转移的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因此，乔根森的结论是，只有不断扩大的农业剩余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五、总结和结论

乔根森在本书的第5部分中指出，古典模式和新古典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古典模式假设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而新古典模式则假设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总是正的，因此劳动力从来就不会出现过剩。第二，古典模式假设，只要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以农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率是固定的；而新古典模式则假设实际工资率是可变的。第三，古典模式认为，在隐蔽失业消失之间，农业人口必须绝对减少；而新古典模式则认为，农业人口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或者保持不变。第四，古典模式认为贸易条件不可能是经济内在决定的；而新古典模式则认为贸易条件是由内在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

当然，古典模式和新古典模式之间也存在着一致性，其表现为：第一，二个模式都假设，当工业产出对农业产出的比率提高时，储蓄占收入的比率也会提高；第二，二个模式都满足于用提高储蓄对收入的比率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第三，二个模式都假设，储蓄只是来自工业部门的利润。

乔根森在结论中还指出，农业是工业化的前提。因此，

当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未能满足时，工业化政策就必然伴随有人口控制政策和引导非传统部门进入农业部门的政策。

据《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年第3期　于建国　撰

作者介绍

美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派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教授。1978年被选为全国科学院院士。乔根森在新古典投资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上都有所建树。他的二元经济理论，是对“刘易斯模型”和“费—拉尼斯模型”的补充、修正和发展。此外，在他的著作中还相当注重于阐述与之理论相应的政策主张。乔根森的主要著述有：“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1963）、“检验供选择的各种二元经济发展理论”（1966）、“生产率变化的解释”（1967）、“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的发展”（1967）、“二元经济的发展”（1971）和“投资行为的经济计量研究：一个评论”（1971）等。

[英]约翰·尼维尔·凯恩斯
Keynes, John Neville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全书除序言外，共分十章，381 页。其基本内容包括 3 个部分。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 1-2 章，是本书的总纲，介绍了本书的内容、范围和方法，以及作者的思想观点。

作者首先说明了“范围”与“方法”的含义。在确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范围”时，目的在于确定现象的最基本的特征，以及了解与该现象有关的知识，包括研究与其性质相似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谓“方法”是逻辑方法的运用。目的在于研究与这门学科相关的逻辑思维过程的本质，调查方法以及检验过程，得出结论的逻辑思维特征。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注意范围和方法的研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经济现象本身是复杂的、不规则的、不确定的，而且，经济学本身由于易于被大众运用而引起常见的谬误。

其次，经济学又以按其方法而分为两类，即实证的、抽象的、演绎的政治经济学和道德的、现实的、归纳的政治经济学。前类是英国经济学家穆勒、西尼耳等人提倡的。他们

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发现经济本身的规律，而不是确定生活准则，它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而存在，以假设为前提，进行抽象推理的理论研究。后一类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克尼斯等人提倡的。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有高尚的道德使命，与现实生活直接相关，他们着重现象的观察而不是推理，强调归纳和统计，尤其是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是把这两类结合了起来，例如，亚当·斯密不仅从经济人假说中演绎出自由放任原理，而且也创立了历史研究方法。

最后，对经济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归纳。实证科学是要论述某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什么，其目的在于发现经济规律。规范科学是要规定应该是什么，其目的在于构建经济理想。技术科学则是为达到某一既定目标而制定的规则和所采用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系统地阐述概念。前两种方法所研究的内容是不能分开的，第三种方法则可以独立存在。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五个问题：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现象原因的解释，社会道德标准的确定，经济进步目标的确定，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其中前四个问题属于实证和规范研究，是不可分离的，第五个问题则属于技术科学的范畴，可以独立存在。在本书中作者重点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范围以及经济学原理建立的方法。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3-5章，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这一部分的特点在于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加以比较，逐步确定其范围，并在最后作出定义。

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政治经济学把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作为前提或资料，使之成为推理的基础，由此寻找出这些活动对引起和协调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政治经济学

把自然科学作为既定的前提，但不是作为结论。经济学家之所以要研究自然规律，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现象与经济科学本身。

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也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领域里研究人的感觉、思想和愿望，但它是从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不象心理学那样是研究个人的心理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的心理是为了发现隐藏的经济规模本身。但由于政治经济学涉及到人的感觉、思想等因素，所以，它与心理学的关系比与自然科学密切。

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不等于政治关系。政治经济学只有在论述某些问题时才作为某种政治因素下的特殊成员加以考虑。

在给政治经济学下定义之前，先要明确一些基本概念。效用是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需要和愿望的能力。财富是所有潜在的可交换的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的总和。经济活动是指导人类进行生产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求，并能进行交换的人类活动。因此，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如何研究人类社会中产生经济活动的现象的科学。应该强调的是，定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义过程本身。

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主体时，一般把人作为一个抽象的人——经济人，他以最小的努力和损失来获取最大的价值，并按这一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虽然人的利他主义也在经济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对个人财富追求的欲望是最强大的刺激。经济人并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基于个人追求财富的目的，才把人作为经济人。作者推崇经济人的概念，把这一概念的提出作为对实际科学的一大贡献。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定义本身要与相关事实相联系，讨论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应重寻找（Seeking）而轻发现（finding）。二是分类，通过分类命名可以避免重复，更加系统明确地研究财富现象。三是历史性，即定义应纵观古今，掌握整个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6-10章，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第一，特殊经验法，这种方法局限性很大。第二、观察法，观察一般用于比较不同的经济行为。对经济背景和经济现象的描述都离不开观察法。经济学往往始于观察，止于观察。第三，实验法，实验是创造一种现象，使我们能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观察，由此揭示真实事实的特征。实验法是可行的，但也会由于其条件过于苛刻而受局限。第四，差异法，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于由于偶然的外来干预导致社会变革，例如，十九世纪欧洲黑死病所引起的收入变化。二是针对两个相互存在或极其相似的社会，例如，瑞典和挪威两国的经济比较。差异法在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有时也由于要求条件充分，论述要借助于演绎和归纳而实用性较差。第五，归纳法，即根据大量事实来概括事物的本质特征，并加以一般化。使用此法的往往是有相互关系的现象。大量的资料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与统计材料而获得。应该注意的是，归纳资料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与统计材料而获得。应该注意的是，归纳法要根据问题的本质来进行，否则会杂乱无章。第六，演绎法，即从产生同一结果不同倾向的规律中寻找到最有效的规律。这种方法的推理形式可以分为三步：确定经济运行中最基本的因素及相应的规律；纯粹演绎过程，推导出现有条件下以上因素运行所引起的结果；检验以上两步的正确性和现实完整性。运用演绎法要有确定的假设前提，对这些假设前提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要加以检验。在运用演绎法时，观察法至关重要。因为观察法有助于选择假设前提，而且，借助于观察还可以说明、检验和确定演绎的结论。第七，模型和图表法，政治经济学不仅同事物的发生发展相关，而且有其数学特征。因为经济现象直接同数量关系有关，经济学家可以用数学特征加以反映。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模型和图表有许多好处。其一是

精确化，有助于思维和表达的准确性。其二是持续性，表示各种经济现象延续存在的意义。其三是增强对付各种变化的应变能力。其四是有助于理解不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借助于图表，使一切相关关系都一目了然。

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与统计学是密切相关的。就历史而言，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关系。对经济史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经济理论的描述。最明显的例子是黑死病对工资理论描述的作用。但是，历史描述也存在其局限性——其准确性和完整性都值得怀疑。还应该注意历史描述的整体性，否则会适得其反。历史的批判作用往往可以使经济理论得以调整。有一部分经济理论还广泛依赖于历史的规律性。由此可见，历史对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最少有两种：描述，即说明我们的结论或加以更正，以及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演绎推理来源于历史的资料，它开始于根据所建立的前提。就统计学而言，统计学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定义为基于对总量观察的特殊方法。统计学的特点在于它基于观察，主要是对数量的观察，而且它与总体有关，并不是与个体相关。借助于统计可以建立归纳法，总结出各种经济的现象规律。统计学往往大量运用图表、曲线，相对于表格来说，它们更直观、更简洁。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是在欧洲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国学派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结束之后写的，也反映了作者调和两派关于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的意图。但他更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即更重视演绎推理。这本书是 20 世纪之前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总结，曾受到广泛重视。

（据英国麦克米伦公司英文版）　　石　乐　撰

作者介绍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52—1949）为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之父，长期任教于剑桥大学，主要从事逻辑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英〕凯恩斯，约翰·梅纳德
Keynes, John Maynard

货币改革论
A Track on Monetary Reform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为购买军火，纷纷停止兑现黄金。为弥补巨额的军费开支，他们大量发行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使盛行一时的金本位制稳底崩溃了。1920年，战争刚结束，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随后处于慢性萧条的困难之中。如何恢复战后经济秩序，重现帝国昔日的辉煌，英国朝野就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国际汇兑、恢复金本位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争。凯恩斯是这场论争的积极参与者，并于1923年出版了其关于上述问题观点的《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在书中，凯恩斯提出通货管理的政策，主张放弃金本位，实行纸币流通制度，使货币发行脱离黄金束缚，以便中央银行自行增减发行，调节货币数量，用通货管理的办法来稳定物价，实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

《货币改革论》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货币价值变动对社会的诸末中后果。第二章，公共财政与货币价值的变动。第三章，货币理论和交换。第四章，货币政策的诸种选择目标。第五章，对今后货币调节的建设性意见。凯恩斯在前两章主要论述了货币购买力不稳定产生的罪恶和公共财政危机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章论述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最后两章则是

对前面三章的引伸和发挥，其中，第三章是全书的重点。

一、理论基础——实质性余额方程式

凯恩斯早期是货币数量论的信奉者和推崇者，他的政策主张都是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

他在《货币改革论》中承袭了马歇尔和庇古的剑桥方程式原理，只是认为庇古以某种消费品（小麦）的数量来表现货币的价值，实际上回避了物价问题，于是加以修订，提出自己的货币数量公式即实质性余额方程式：

$$n = Pk \qquad (1)$$

$$n = P(k + rk') \qquad (2)$$

式中 n 为社会上的现金总量，P 为一个消费单位价格，k 为人们以现金形式持有的消费单位数量，k′为人们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消费单位数量，r 为银行现金准备率。

他认为，货币本身没有效用，其效用全从其购买之物得来。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货币多少镑，而是需要足以支付一定用途的购买力数量。在一定数量的购买力，他以某几种标准消费品所构成的一定量“消费单位”加以测定，如公式（1），该社会的通货数量为 n，若 k 不变，则 p 与 n 同升同降，即物价将随政府纸币的多少同比例地涨落。

公式（1）只就现金交易而言，它假定人们所需要的购买力可以全部用现金来满足，而且假定这种需要是现金的需求的唯一原因。而实际上人们大都使用银行存款和透支，而银行对存款则保持一定比率的现金准备，如公式（2），假定人们保持相当于 k 消费单位的现金外，还保持相当于 k′消费单位的存款于银行，银行以现金对此存款保持 r 的存款准备率；这样，假定 k、k′和 r 不变，n 与 p 成正比例而变动。但事实上，这三个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r 随银行的习惯与业务情况而变化。而 r 的变动则会直接影响到 k 和 k′，使它们与 r 呈反比

例地变动。因此，货币当局可以运用利息率影响 k 和 k'，而且必要时还可以直接调节 n 和 r，以影响 k 和 k'，从而影响 p 的数值，以获得价格稳定。

二、政策主张

（一）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凯恩斯一向主张物价稳定，但是，如果经济失调需要价格来调整，在面临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两种选择时，他宁愿选择前者。凯恩斯认为，价格上涨和下降都有其不利之处，通货膨胀造成对某些个人和阶层的不公平，特别是对投资者，同时不利储蓄；通货紧缩则造成劳动力和企业家的穷困，因为它使企业家为避免损失而削减生产从而引起大量失业。但比较起来，通货紧缩是更糟糕的，因为通货膨胀是以食利阶级为牺牲的，但它给企业带来意外的利益，从而提高潜在投资者的预期，这对促进高水平的收入与就业量是一个必要的刺激；而通货紧缩则会使财富从活动阶段（即从事生产活动的阶级）转到不活动的阶级（食利阶级），这对投资和企业是一种障碍，所以在一个变得贫困的世界里，引起失业比使食利阶级失望要更坏些。

（二）关于金本位与管理本位

凯恩斯坚决反对当时英国朝野人士恢复金本位的企图。他认为战前那种老式金本位制，不仅不能保持英镑、黄金与固定不变的国内价格三者之间的稳定联系，并且还会造成英国的货币制度受制于美国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大量吸收黄金的倾向，出现了美元本位制，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当局所掌握。黄金的价值，将来的发展完全要取决于联邦储备银行当局的政策。凯恩斯认为，在当前世界黄金分布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制度必然使英国把调节价格水平和信用周期的职能让给美国联邦储备局。他主张英国应把它的币

值确定在当时战后的汇率上，而不是通过通货紧缩将英镑恢复到战争前的平价。他指出，价格、信用和就业是最重要的，而老式的金本位制已不能使英国恢复昔日的繁荣与稳定。他的结论是：国家金融机构公开操纵货币系统，实行“管理的”纸币制度比恢复金本位制度好得多。

三、其　　他

关于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问题，凯恩斯在书的“序言”中提到：“储蓄是私人投资者的事，我们鼓励他把储蓄主要地放在对货币的索取权上。推动生产的责任则属于企业主，他主要受预期能获得货币利润的影响。”（第 14 页）尽管他没有在全书正文中深入地进一步展开论述，但这段话第一次表明了凯恩斯早在 1923 年就开始认识到储蓄的抵消问题，并认识到储蓄的决定与投资的决定两者性质有所不同。这是凯恩斯在本书中的一大贡献。

《货币改革论》是凯恩斯早期的经济著作，反映的是他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其错误和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他以货币的交换价值代替货币的价值，否认货币与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同时，他仅考虑到货币的作为交易中介的功能，而忽略了它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的功能，对储蓄与投资仅一提而过，没有论及其对生产、就业水平的影响，还远不是一部完整的理论著作。但它是凯恩斯货币思想系统化的一个先导，是凯恩斯为了抢救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痼疾、不断提供诊治方案的“三部曲”（《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第一部。

（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英文版）　陈卫红　撰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The Goneral Theory Of Emp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本书是凯恩斯的代表作，它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开始。

全书共分6篇（共24章）：引论；定义与观念；消费倾向；投资引诱；货币工资与物价理论；通论引起的几篇短论。

下面就根据原书的逻辑结构，介绍一下凯恩斯在本书中体现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有效需求与就业理论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他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

他首先批驳了以往的“经典学派”根据萨伊定律对于充分就业均衡所作的错误假设，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着“自愿失业”“摩擦失业”，而且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这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通常存在的，造成这--情况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所谓“有效需求”，按凯恩斯的解释，就是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即“总需求函数与总供

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总就业——决定于总需求，失业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有效需求表现为收入的消费，当就业增加时，收入也随之增加，而且社会实际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因此经常引起需求不足。这是造成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为此，就需要增加社会投资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并借此扩大就业量。

有效需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消费物的需求和对投资物的需求，那么只要找到影响这两个方面需求的变动因素，就可以找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在，于是凯恩斯转向三大心理规律的分析。

二、三大心理规律

凯恩斯认为，对于消费物的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对投资物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货币利息率”，由此提出了“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灵活偏好规律。这是凯恩斯整个就业理论的支柱。

1. 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凯恩斯把消费倾向看做是收入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那么边际消费倾向则是指增加的收入量和增加的消费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就是，随着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在每一收入的增量中，个人用来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用来储蓄部分的比例却越来越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性的一些基本动机，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这一结果势必带来储蓄绝对额的增加，聚集需求量与实际消费量之间出现了裂痕，假如储蓄不及时转化为投资，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减少国民收入水平，造成失业。但是储蓄能否有效地、全部地转化为投资，这又受另外一个规律的影响。

2. 资本边际效率规律

凯恩斯指出："我之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实际上，这就是资本家预期的利润率，即预期收益和供给价格的比率。

资本的边际效率规律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生产物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呈现递减趋势，这必然导致投资的下降，因为资本边际效率是刺激资本家增加投资的动力，加之不肯定性、风险、期望、投资者的态度和信心等因素的影响，更扩大了聚集需求量与现实消费量之间的裂痕。在此，按"经典学派"的主张，唯一的办法便是降低利息率，可是这又遇到了灵活偏好规律的阻碍。

3. 灵活偏好规律

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个人和企业持有货币的愿望和数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数量影响利息率。那么灵活偏好，则是不同利息率水平上，人们对持有货币的不同需求，原因在于人们有货币在手比较灵活。

人们之所以偏好货币，由三个动机组成：出于交易的目的，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出于预防的目的，以备应付意外的开支；出于投机的目的，"即相信自己对未来之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正因为这样，利息率就不可能太低，如果太低，人们就不会放弃这种灵活偏好，而宁愿把货币放在手头随时支用。灵活偏好规律的影响，又使投资不足更为严重了。

总之，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需求，受三大心理规律和货币数量调节；对消费物的需求随消费物生产的增加相对减少；对投资物的需求随投资物生产的增加相对降低；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和利息率的提高引起的投资障碍，生产就不能扩大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所以凯恩斯的结论是：增加消费，引导投资，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以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三、乘数原理

凯恩斯在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乘数原理，乘数原理的经济含义可以归结为，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本身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变动的倍数。

例如，最初投资为 1000 万元，边际消费倾向为 2/3，通过一系列派生的购买过程，则会使总收入增加 2 倍，从而带来 3000 万元的效果，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越大，投资引起的连锁反应的效果也越显著，总收入增长得也就越快，乘数是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它的大小取决于消费支出和再支出。

一般地说，投资的增加和就业量的增加方向是一致的，假如每增加 1000 元投资可以增加 100 人就业，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 3/4，那末乘数为 4，结果增加 1000 元投资就将增加 400 人就业，通过乘数的作用，政府投资扩大就业的能力大大加强了。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乘数原理占有重要地位，它绝不只是一个“数学概念”，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它是“整个就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有了这一步，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我们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所得与投资量之间，建立一个确切的关系”。也正是以此为桥梁，凯恩斯将其经济理论导向经济政策，并指导经济实践。

四、工资与物价理论

庇古的传统就业理论认为，工资率的变动可以自动调节

就业量，使之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则认为，工资的削减虽然会对企业发生有利的影响，但货币工资率的全面削减又会影响总需求，使之按比例下降。企业家由于预期成本降低，于是扩大开工率，可是由于需求缩减，生产的产品怎么会卖掉呢？所以从长期看，较大的生产量和就业量只有在总需求增加时才能维持，因此，用削减工资的办法换取好处并非良策。

凯恩斯的物价论主要分析了总需求的改变与物价水平的改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货币数量的改变与物价变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能直接影响物价。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是降低利息率。由于利息率降低，利润率提高，因此企业投资扩大，投资物的需求增加。随之国民收入增加，又由于国民收入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对于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增加。需求的增加刺激了生产，供给也将增加。需求增加虽使价格提高，但供给扩大又使价格降低。在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状态时物价不必与货币数量同比例增加。凯恩斯的物价理论还包括这样的内容：一旦到了劳动供给缺乏的时候，就不应再增加货币数量，否则将引起弄虚作假正的通货膨胀。当非自愿失业广泛存在的时候，如果不增加货币数量，降低利息，刺激有效需求，就会形成失业压力，对生产增加形成障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着一个失业大军，所以，增加货币数量，刺激有效需求，从而提高物价，这就成了凯恩斯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方法之一。

五、危机理论

对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循环，即危机的原因，凯恩斯指出，“主要是从资本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而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取决于两个因素：新投资的资本物所获得的一系列未来收益；资本物的成本。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上涨的因素“固

然有时可使事态严重化，偶尔也发动恐慌”，但他认为那不是典型的形式，“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未来收益的预期，一部分决定于资本物的丰裕程度，另一部分决定于企业家的悲观或乐观情绪。危机发生在繁荣后期，按凯恩斯的解释，是由于人们对资本物的未来收益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甚至资本物逐渐增加，生产成本逐步提高，利息率上升，也不能阻止投资的增加。当失望来临时，人们对未来收益骤然失去信心，灵活偏好大增，利息率上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加上利息率上涨，会使投资量减退得异常厉害。投资下降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总收入和总就业大幅度降低。

对于危机的周期性，凯恩斯依然用投资、消费和乘数的关系作根据。他认为危机爆发后，生产收缩，由萧条到复苏的恢复一般需要 3-5 年。这一来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要以资本物恢复稀少为前提；二来是由于存货的原因。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资本物稀缺性恢复了，存货吸收完了，资本的边际效率随之增加，因此投资扩大。投资的增长引起投机旺盛，经济周期又转入高涨，上涨到资本边际效率再度崩溃，危机又开始重演。

为此，凯恩斯反对用高利息率的办法遏制投资。他认为，正确的医治商业循环的办法不在于取消繁荣，永远处于萧条状态，而在于消灭萧条，永远处于准繁荣状态。

六、总　　结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凯恩斯对自己的学说以及经济思想对于实践的作用充满信心，他宣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

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凯恩斯在这里强调的，正是思想观念对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从罗斯福新政伊始，几乎历届总统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谢　岩　撰

作者介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0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不久即在该校讲授经济学，并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911年起长期担任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14-1919年担任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1919年作为该部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1929-1933年任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率英国代表团出席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同年获"勋爵"爵位。1945年作为英国首席代表参加向美国借款的谈判。1946年去逝。凯恩斯一生中著作颇丰，主要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劝说集》（193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等。凯恩斯早年注重于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的研究，主张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管理通货制。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由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1936年他发表了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书中，凯恩斯摒弃了"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传统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实现充分变业的教义，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明确承认经济危机和严

重失业的经济现实，并把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和货币数量所决定的有效要求不足，主张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鼓吹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建立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强烈震动，成为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说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由于他的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滞胀面前束手无策，而陷入危机之中。

〔英〕凯恩克劳斯，亚历山大·柯克兰
Cairncross, Alexander Kirkland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1986)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是一本演讲集，共收录了阿列克·凯恩克劳斯七、八十年代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演讲13篇，这些文章有的是对英国或国外的听众偶然所作的讲稿，有的是为纪念文集或类似的专题文集所写的文稿。该书出版于1986年，中文译本译者是李琮、199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所包括的13篇文章大致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头两篇着重讨论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的制订中的作用；其后四篇论及经济计划工作的各个方面；接着的三篇探讨经济发展和增长问题；最后四篇阐述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手段。下面就其中的10篇文章加以简要介绍。

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一）作者首先指出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往往相距甚远，二者的出发点很不一样，之间也存在某些分歧。对实践家来说，待解决的问题往往是“该怎么做?”，而理论家却常常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接着作者逐一论述了经济学中的一些基

本概念，这些概念对制定经济政策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包括供给与需求、机会成本、边际、经济体系等。

（二）为什么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相距甚远，从而使经济学家在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时感到困难？作者认为原因在于：

1. 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体现在（1）经济理论的抽象性；（2）应用经济理论之前需调查理论假设对实际情况是否适用；（3）理论会过时；（4）理论的正确性会因某些方面的错误而受到损害；（5）经济理论家们在一些技术的问题上看法不同；（6）与理论密切相关的经济信息不完善；（7）理论家常随意提出假设；（8）经济本身从来不是长期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发展；（9）涉及特定的数量或时间时理论需作具体分析；（10）从经济学家那里寻求建议的许多问题往往与经济学家们拥有的传统经济学知识较少相关。

2. 表达的困难。经济政策的提出要具有说服力，要得到支持，如果在提出经济政策时表达得不理想，政策的执行就要受到影响。

3. 经济政策中的非经济因素。包括政策形成于其中的具有分明组织特性的机构、政治环境、制度、适当而准确的信息、应用经济学时应具有的想象力、观察力。

（三）作者最后提出三点意见用以改进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即交流、加强公众和专业之间的中间媒介的工作、要看到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之处。

二、学者和决策者

（一）70 年前（1911 年）经济活动的规模有限，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不需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们都忙于教学。经济和金融报刊也很不发达。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时并不是为了直接应用于实际问题而设想的。

（二）1911 年以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政府而且企业都需要专家对日益复杂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议，经济学家们同时还负责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咨询，培训经济人才，向国内的外行人“布道”。这些变化使经济学日益专业化，使经济学家的研究日益切合实际，他们越来越集中注意短期问题，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大量数据分析，并努力缩小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三）上述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引起的结果是：1. 书籍被文章顶替、文章为摘要顶替；2. 专业化；3. 口头意见交流多于阅读文献；4. 会议增多。其次是人员结合问题。

（四）作者最后认为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是波动的，他们有义务组织理论争论，以使有关方面对不同政策方针的优缺点更加清楚，他们也有义务利用便利条件，在传播媒介的帮助下提高公众对各种可能采取的政策的理解水平。

三、市场与国家

（一）作者首先陈述了关于市场与国家的一系列观点，包括：现代经济学是从市场的发现开始的；国家不能完全由市场代替；放任主义的盛行并不是由于人们发现市场有什么新的优点，而在于技术进步；计划经济使政府完全控制了经济，市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国家与市场这两个对立面是相辅而成的。

（二）依靠国家的活动所能实现的目标有：平等、充分就业、抑制通货膨胀、收支平衡、经济增长等，所有这些目标都引起预算重要性的增大，这些也都是市场不能达到的目的。不仅如此，就是在某些资源分配中，市场有时也会不起作用，如，使用强制和征募办法进行战争动员、发展中国家执行某一发展计划（工业化）、稳定汇率、为提高效率而使经济屈从

于集中、平衡对外交易等都是市场所达不到的。

（三）另一方面，国家有哪些弱点？首先，强加给国家额外的职责会使国家机器超负荷；其次，许多由国家免费提供的服务一方面需要很大的费用；另一方面又使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再次，国有部门通常享有的法定垄断使改善服务较为困难。

（四）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害怕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原因减少了市场的重要性，增大了现代国家的作用。当今，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多地利用市场，以便减轻国家过重的负荷，尤其是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中。

四、凯恩斯与计划经济

（一）作者首先阐述了凯恩斯思想，它主要包括：需求管理和控制投资，以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尽可能地发展公共的和半公共的公司；需要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国际货币制度。凯恩斯思想中最受政治家们重视的是，大量失业来源于需求不足，因而能用增加开支的方法来解决。

（二）接着说明凯恩斯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战后的充分就业是因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它增大了对投资的推动，加强了通货膨胀压力，这都与凯恩斯有一定的联系。凯恩斯对国家计划的影响在于他认为计划化意味着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来调节经济活动，最终使扩大个人自由成为可能。

（三）作者最后评价说：要求经济平等、推动经济增长等原因增加了国家的活动，但这不是凯恩斯造成的，凯恩斯关心的只是对需求的控制，他并不喜欢广泛的国有化计划。

五、不确定条件下的计划工作与决策

（一）界定“不确定条件”。它是指介于完全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和剧烈的、增多的、持久的不确定性之间的一种状态。

（二）作为经济过程的计划工作通常与投资相联系，同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三）大规模计划的制订包括许多人，势必产生组织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代表的委派以及如何减少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有多种，包括数据、模式、偏好、有关方面的联系交流等等。

（四）计划的制订、执行和监督都不是由某个人孤立进行的，就连计划本身也是相互联系的，成体系的，这就是计划工作的社会性。

（五）如何减少计划工作中的不确定性？1. 力求在长期和短期之间达到平衡。2. 善于抓住行动的时机。3. 准备可替代的计划。4. 预测要尽可能准确。5. 寻找专家对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

六、影子比率的限度

（一）作者开头指出，市场价格并不是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可靠量度，为此，经济学家提倡计划机构使用影子价格替代市场价格。

（二）接着分析了使用影子价格时会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如任意性、易变性、无效性、不一致性、不灵活性等以及可替代影子价格的一些方法如关税、补贴、配给等。

（三）最后作者强调自己三方面的观点。1. 对是否应该用影子价格来确定政府控制的效果表示怀疑。2. 对估计影子价格的准确方法表示怀疑。3. 需要衡量影子比率的意义。

七、创新、模仿和增长

（一）作者首先给出创新的概念即凡是在事物的现有秩序中引入任何新颖的因素都称为创新，并将自己的叙述局限于技术创新。同时以几个实例说明创新、发明和模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二）接着指出创新是渐进的过程。但它能引起产量的增加，成本的下降，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创新中最难处理的因素是技术和经济这两类不同专业的联合。在英国，从创新中得到的全部收益，并不能都落到创新者的手中，这也是在英国创新受到阻碍的原因所在。在此，作者还客观地评价了科学、研究与发展、产生结构、国家在创新中所起的作用。

（三）最后作者得出八点结论。

八、技术和自然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一些人认为技术进步是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大多数创新的源泉，自然资源则仅为生产的扩大开辟可能性，在扩大的后面没有任何持续的动力。另一些人认为在一个外汇经济短缺的国家，获得国外技术援助会受到阻碍，而更多资源的发现则有助于该国的发展。出现相反的观点原因在于使用“技术”和“自然资源”这些词时的某些混乱，为了廓清这些混乱，作者首先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二）一个世纪以前，日本还是个农业国，由于新技术的传播和税制的改进，明治维新后，农业发达起来。农业这种形式的自然资源加速了日本早期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日本通过大规模引起技术、培训人员建立了极现代化的部门，技术同样加速了日本经济发展。

（三）在本文中作者还分析了技术转让的一些特点，并在文尾得出五点结论。

九、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一）关于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发展的根源？二是为使发展进行得更快，该做些什么？为此需探讨对所有社会都共有的影响发展的因素。

（二）在阐述了自己对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发展”的看法后，作者提出影响发展的因素。1．机会。包括（1）市场的扩大，（2）技术的变化。2．限制。包括（1）社会限制，(2) 政治限制，（3）财政上的限制。3．文化。4．政治。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市场的扩大，技术的变化以及资本的积累（财政上的限制），这三个因素彼此相互影响，但还是有理由将技术变化看作是主导因素。

（三）接着作者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全力集中说明技术变化。指出其中原因有三。1．技术变化是外源的，经济学家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2．把竞争和技术变化等同起来而侧重研究竞争。3．把投资和技术变化等同起来。

（四）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都是未利用的潜力的理论。在三点上又是不同的，即所强调的潜在发展的根源不同，所设想的发展加速进行的范围和方式不同，对国际影响的看法不同。作者最后说明若问有无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回答是有，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理论对发展的看法完全一致，也不排除建立另外的理论分支来说明发展中的现象。

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稳定经济的思想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货币思想，一类是财政思想。

（二）凯恩斯认为如果把事情交给市场力量支配，将导致需求不足，需要实行一种政策以调节需求。英国战后实行的这种调节政策基本上是财政的。这种状况 60 年代受到了货币主义的挑战，这种流派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颠倒过来，明显让货币政策占上风，以控制通货膨胀。

（三）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有其局限性，如需求管理对成本水平的影响不很有效，不能使经济免于通货膨胀，又如可供应用的政策手段没有多大选择性，再如需求的过快扩大使供应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等。战后头 20 年这些局限性并未限制需求管理的有效性。70 年代国际经济受到一系列震动，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需求的压力，而是通货膨胀和如何改变预期。这时人们看到要对付失业和通货膨胀，单独依靠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是不可能的。

（四）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干，它们是共生的，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尽管它们扩张的限度有所不同、对一些政策目标的实现某一手段比另一手段更适宜些。

限于篇幅，最后三篇文章《作为政策手段的英镑汇率》、《就业政策的浮沉》、《就业政策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吗?》就不在这里加以介绍了。从以上介绍看本书既不是纯经济理论论述，也不是实际经济政策介绍，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济和体会对各类问题提出的观点和作出的结论。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周　文　撰

作者介绍

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牛津圣彼得院院长，现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凯恩克劳斯在四十至六十年代曾就职于英国政府反世界组织的经济管理部门，如 1946－1949 年任英国贸易委员会经济顾问，1949－1950 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顾问，1964－1969 年任英国政府经济咨询服务委员会主席。七十年代后多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活动，1979 年首次率英国学术院代表团访华，此后，又多次来华参加学术研讨活动中，凯恩克劳斯对我国的各项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尤其是关于国家和市场的作用，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非常适用于我国的现状，值得我国经济工作者吸收和借鉴。凯恩克劳斯的著述甚丰，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导论》（1994 年出版，曾多次再版）、《经济管理论文集》（1979 年出版）、《恢复年代》（1985 年出版）以及《经济学与经济政策》（1986 年出版）等等。

〔美〕金德尔伯格，查尔斯
Kindleberger，charles P.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relopment

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合著的系统介绍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一部著作，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大学的教科学。本书除前言外，共有23章，主要讨论三方面问题：第1－3章概要介绍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评介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第4－11章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讨论了主要的经济发展理论；第12－23章讨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发展概述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一般由产出增长这种单一尺度来衡量，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且包括产出结构、投入结构和机能的变化。它不仅要用人均收入，而且要用一系列其他指标来衡量。

经济发展是与社会变迁紧相联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

李嘉图增长模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卡尔多模型等增长模型揭示了更为复杂理论的某些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全能的。

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性质使其成为发展过程的潜在的巨大潜力，丰富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有利于发展。但由于土地与资本和劳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故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并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革新传统，故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十分重要。

物资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但不一定是最稀缺的资源。经济增长要求资本投入，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它不是发展过程的唯一组成部分。资本形成来源于储蓄，储蓄可以由政府进行，也可通过通货膨胀强迫家庭和公司进行。

劳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工人在技能、努力程度、工作条件方面的不同，各工人的生产率是各异的。每个工人可看作是简单劳动和人力资本的总和。发展中国家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人力资本并不充裕。人力资本通过学校教育、在职训练、卫生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及外来移民等方式形成。扩大人力资本形成是穷国发展的关键。

组织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都不同，组织是一个补充物，是不可替代的。发展过程中的组织包括企业家的职权、管理、经营、承担风险和革新职能。组织有多种类型。过去人们强调私人企业和政府组织的作用，近年来银行、国营企业、工会、合作社、武装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技术、技术变动和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率和产出的一个关键因素。技术变动的前提是科学发明和技术革

新。简单模仿是实现技术变动和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最便宜的方法，但不一定最有效。革新可以增加需求、降低成本，革新传播依赖于一个复杂的过程。适合于穷国的许多技术变动将以中间技术形式出现。

获得内部和外部的规模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规模扩大可以降低成本和价格。由运输效率和通讯效率的提高引起的市场规模扩大可以提高供求弹性，而由商业效率提高和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市场规模扩大可以刺激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化过程。发展中的结构变化规律可在投入一产出表上反映出来，也可在劳动力结构、产业部门结构和产业结构、进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反映出来。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阻碍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要素缺乏相对流动性、资本相对不足、非熟练工人队伍过于庞大、社会结构机能松弛等。

对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和发展进程的不同认识，使经济发展理论出现了三个流派：新古典主义学派、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它们在渊源、对市场和价格主导体系的依附程度和对国际经济认识方面都不相同，各自赋予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以不同的作用。

三、经济发展政策

在混合经济中，政府干预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的作用是通过经济计划和各种经济政策来实现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是评估经济政策效果的通常方法。但政府政策只能作为市场体系的一种补救，而不能当作解决发展问题的法宝。

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对部门优先顺序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经济发展中部门优先顺序的确定，部分取决于部门之间的联系及对其产出的需求弹性。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很高

并与其他经济部门有显著联系的那些部门被确定为主导部门。在发展中国家，部门平衡是很重要的和现实的问题。以前人们强调工业化是发展的关键，现在已转为关心农业。穷国不仅在产出和收入的增加上，而且在所有制和生产性就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包含的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相似的，但在具体的政策手段上，两者之间有较大差异。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政策的运用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很大限制，发展中国家更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有选择的信息控制和全面的法定储备金制度，且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一般是与通货膨胀及其防治相联系的。政府的财政措施对穷国的生存和发展有直接影响。财政措施不仅要根据其对产出、效率和经济灵活性的影响，而且要根据通货膨胀、收支平衡、平等和收益等问题加以评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故这些国家制定适宜的人口政策变得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分布向最小年龄倾斜，引起社会扶养负担加重，也造成储蓄的减少和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给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困难。

为此，发展中国家应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长。

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城市净移民增加和城市边界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多，这就产生了外部不经济，也加强了城市失业。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城市化问题时往往仅限于提供更多的城市工作和劳务，城市化政策的收效也不大。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国际转让、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对发展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制定适宜的国际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有三种选择：外贸优先，外贸缓行和外贸平稳。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做出适宜的选择。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达到此目标，多重汇率、外汇贬值、配额限制及关税等都是贸易政策的可选手段。对于多种形式、多种来源、多种动机的国际转让，发展中国家应主要用于公共投资，以扩大资本形式，而不是用于公共消

费。对于外国投资活动，发展国家可通过外汇管制措施加以控制，既要从外国投资所取得利润中争取较大的份额。又要避免使收入水平低于外国企业难以接受的程度。发展中国家还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采取集体行动，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推动共同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反映在低生产率下的失业（及完全失业）、低收入和低生活标准上。故就业和收入分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增加就业吸收问题上，有四种方式可供发展中国家选择：纠正工资标价，提高劳动生产率，强调在农业、建筑业和城市服务业方面的生产性就业，利用现有闲置生产能力。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通常采用的政府转让性支付计划并不是真正的出路。政府更应关注直接增加就业的方法而不是转让性支付计划。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必须权衡多种发展目标，并通过计划模型，揭示各部门的结构和资源最优配置方式。但计划存在若干缺点，这些缺点要和计划过程本身的优点相权衡。

本书英文版 1958 年由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65、1977 和 1983 年三次再版。中文版由张欣等根据英文 1977 年版译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中文版） 邹正方 撰

作者介绍

美国经济学家，1910 年 10 月生于纽约市。1937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8－1951 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1951－1976 年为该校经济学教授，之后为该校名誉教授。1985 年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对国际收支和国际金融、经济发展及经济史都有较深的造诣。他与人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教科学极为流行。他始终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视为一个政治体系加以研究，主张对国际金融加强干预。他对发展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有较深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国际短期资本流动》（1937）、《美元短缺》

(1950)、《国际经济学》（与彼得·林德特合著，1957)、《经济发展》（与赫里克合著 1958)、《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1962)、《战后欧洲的增长》（1967)、《衰退的世界：1929－1939》（1973)、《经济反应》（1978)、《狂势、恐慌、崩溃》（1978)、《国际货币》（1981)、《经济法和经济史》（1984)、《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金融史的其他论文》（1985)、《国际资本流动》（1987)、《国际经济秩序》（1988）等。

〔美〕 西蒙·库兹涅茨
Simom Smith Kuznets

生产和价格的长期变动
Secular Movement in Production and Price (1930)

《生产和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库兹涅茨的早期著作，研究经济周期问题。全书共六章。全文根据英文版分三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工业增长的停滞”，论述了现代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周期性波动。以此作为全书分析的导言。

不停地变动是现代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但在长期的变动过程中，工业增长率出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有四：(1) 技术进步速度放慢（如棉纺织工业）；(2) 部分工业增长迟缓既阻碍了与它们相互补足的部门的发展，又阻碍了与它们相互竞争的部门的发展（如金属工业）；(3) 随着工业的增长，发展资金相对减少（如汽车工业）；(4) 某些工业由于遇到后起国家相同工业的竞争而降低了增长速度。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2-4章，是全书的中心部分，其篇幅占

全书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一部分是通过统计资料分析来探求经济周期的某些规律。

第二章“用统计方法对长期变动的描述”，说明了所谓长期变动是指持续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它可利用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首先在不考虑长期变动的情况下用时间序列度量周期的变化，然后在周期变化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反映长期的变动。具体办法是选择统计学上的逻辑曲线和戈珀茨曲线来反映和描述周期变动和长期变动。第三章是“统计资料的提供”，区分了最初长期变动和第二长期变动的概念。前者是指利用原始统计资料描述的长期变动，后者是从最初长期变动所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另外，还利用统计资料分析了 5 个发达国家 53 种农产品产量和价格的长期变动情况。第四章是“第二长期变动的性质”，分析了产量和价格变化的相关关系，指出价格变动领先于产量变动并成为产量变动的原因；还阐述了什么引起价格变动的因素以及价格变动又怎样引起产量的变动。

在这三章中，作者论述这样五个问题。

(1) 长期变动的定义。此书认为，长期变动是一种持续的不可逆转的变动，它是周期波动的基础（即长期变动是一种变化趋势，而周期波动则围绕着这个趋势而上下波动）。但长期变动涉及时间尺度，而时间尺度又是由周期波动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只有超越了周期波动的时间范围，才能衡量长期变动。因此，长期变动又和周期波动密切相关。该书为了更清楚地揭示长期变动的趋势，把利用原始统计资料描述的长期变动称为最初长期变动，把最初长期变动所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称为第二期变动。在统计学上，第二长期变动曲线通过求出最初长期变动的移动算术平均数而绘出，它通过最初长期变动的中心。

(2) 长期变动的情况。这里根据 5 个发达国家共 53 种商品的历史统计资料，分别分析了它们大致从 1866 年到 1925 年的产量和价格的第二长期变动。接着，又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商品产量和价格第二长期变动的相关关系。在可以进行比

较的40种商品中，有15种表现出很好的相关关系，有15种表现出较好的相关关系，有4种在前半期缺乏很好的相关关系，只有6种没有确定相关关系。另外，在有相关关系的34种商品中，有17种价格变动领先于产量的变动，有8种价格和产量没有表现出领先和滞后的特点，仅仅有6种产量变动领先于价格变动。库兹涅茨通过对53种商品的分析，发现产量和价格的长期变动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摆动。如果把向上的运动确定为从最低到下一个最高点的运动，把向下运动确定为从最高点到下一个最低点的运动，把在时间序列的终端没有结束的变动看作是不完全变动，那么产量的上升或下降的平均持续时间是11.6年，因而一个完全的摆动的持续时间大约是22年；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平均持续时间是11.7年，因而一个完全的摆动的持续时间大约是23年。这样，发现产量和价格长期摆动的持续时间大约为20年。

(3) 产量长期变动的原因。书中认为，产量和价格长期变动的相关关系表明，价格的变动领先于产量的变动。因此可以推断价格的变动是产量变动的原因。

在价格上升，货币工资的上升落后于价格的上升，因而实际工资率出现上升的趋势。在价格下降的，货币工资并不下降，或者货币工资的下降慢于价格的下降，结果实际工资趋于上升。法国的历史统计资料证实了这一点。除货币工资外，生产成本中的许多因素都具有相似特点。例如，长期投资的利息、土地或建筑物的租金、分期偿还的费用等等，都是在签定合同的时候确定的。在合同的有效期间里，它们是固定不变的。这样，在价格上升时，实际利息和实际租金都趋于下降；在价格下降时，实际利利息和实际租金都趋于上升。当然，生产成本中某些因素与价格一起变动（如原材料的费用与价格同时变动）。但是，工资、利息、和租金成本的变动落后于价格的变动，已足以使总生产成本的变动落后于总生产价格的变动。因此，当价格上升时，由于总生产成本的上升落后于总生产价格的上升时，利润率将提高，从而刺激了生产，导致产量的增加。相反，当价格下降时，由于总

生产成本的下降落后于总生产价格的下降，利润率将下降，从而阻碍了生产，使产量趋于减少。由此可见。产量变动的原因是价格的变动。

(4) 价格长期变动的最初动因。书中认为，产量的变动是价格的变动造成的，而价格变动的最初动因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他把黄金产量和新铸币的变动同产品价格的变动加以比较后发现，黄金产量和新铸币的增加或减少领先于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两者变化的时间间隔大约为 7～8 年。黄金产量的变化和价格水平变化所以存在时间间隔，是因为现期黄金产量与已经投入流通的黄金数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份，黄金产量的增加要经过数年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另外，黄金供给的变化要在抵销了导致价格水平发生相反方向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以后，才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因而这种影响在数年后才表现出来。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相关关系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化是价格水平变化的原因。当货币金属的产量的增加和投入流通的铸币数量的增加快于社会产品产量的增加时，价格水平趋于上升。反之，价格水平趋于下降。

(5) 维持价格长期变动的因素。该书指出，在促使价格上升的最初动因消失以后，有两个因素将会推动着价格继续上升。第一个因素是生产的变动落后于价格。假定价格持续上升了 4～5 年，在第五年里，由于以前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企业家手中积累了资金。另外，在刚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以后，企业家还可以得到资金，这样，即使原来促使价格上升的动因已经消失，由于企业家手中购买力的增加和生产不能立即调整以适应提高了的社会需求，价格不可能下降。同时，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赶上价格水平上升和生产成本增加的压力下，企业家将会提高产品价格。因此，价格水平将会继续上升。但是，因为最初价格的上升受到外部和内部动力的推动，现在只受到内部动力的推动，价格上升的热头将会减弱。

第二个因素是消费品生产和投资品生产的差异。在价格水平持续上升时，由于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变

动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消费品生产的扩展慢于投资品生产的扩展。反之，在价格水平下降时，消费品生产的扩展快于投资品生产的发展。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企业产量增长的不平衡，造成对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设备的需求不平衡。假定价格上升的最初动因已经消失，价格稳定在某个水平上，价格的稳定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消费品生产企业将增购设备，扩大生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价格的上升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消费品生产企业设备相对不足的情况将较为严重。消费品生产企业对设备的需求以及企业家手中积累起来的资金，推动设备生产的发展，阻碍价格水平的下降。

虽然生产变动落后于价格的变动以及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差异维持价格水平的上升，但是价格水平的上升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因为阻碍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有二：一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统计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工人的产量在价格下降时期趋于提高，在价格上升时期趋于下降。劳动生产率与价格水平所以存在负相关的关系，是因为在价格持续上升的时期，就业人数增加，从而造成较低素质的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平均每个工人的装备减少，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延长，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反之，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将产生相反的结果。这样，随价格水平上升而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将使每单位产量的工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了利润率，减弱了对生产的刺激，阻碍了价格水平的进一步上升。阻碍价格水平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供给的变化。货币金融的生产量常与金矿或银矿的发现以及技术条件的改善联系在一起，但货币金属产量并不总是自变量，它也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当价格水平上升时，采掘金矿或银矿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因而货币金属的产量将下降。同时，货币金属并非全部投入流通，黄金和白银也有商业上的用途。在价格水平上升时，由于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不会改变，因而黄金和白银变得相对便宜，商业用途增加。这样，投入流通的货币金属将减少，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受到抑制。

正是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价格的长期变动。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分析了产量与价格增长及其对波动的影响。

第五章是“增长速度和波动幅度——统计上的检验”。此章研究了产量和价格的增长速度和偏离变化趋势的幅度，并且对5个发达国家各种工业以及同一种工业的不同部门的增长速度和波动幅度作了比较。其结论是产量和价格的迅速增长通常是同变动幅度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第六章是“增长速度和波动幅度——基本原理”。这一章探讨了产量和价格的增长率对波动幅度的影响，产量和价格周期变动对长期变动的影响。认为产量和价格的迅速增长(变化)，增长了变化的幅度；另外，迅速增长的工业有较为充裕的资金用于发展，而发展本身带有许多不确定性，这样就增长了变动的幅度。

《生产和价格的长期变动》不仅运用统计资料分析了经济周期，而且提出了为期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周期”。因此，这本书成为经济周期研究的纪典著作之一。

(据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英文版)　　李　星撰

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1971)

《各国的经济增长》全书包括前言与正文七章。本文根据中文版分三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论述经济增长特征及增长因素。

第一章“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和变化”分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人均产值增长率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在一个世纪内，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相当高。除日本外，发达国家在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前夕，其人均产值也是相当高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国家之所以未能成功地达到使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所要求的人均产值（和相关的结构），可能是因为最初的人均产值低，也可能是由于增长率过低。第二、在许多国家存在着约18－25年为一个周期的产值、人口及若干经济组成部分的增长率的长期波动。某些较老的欧洲国家与年轻的欧洲海外后裔国家在长期波动中出现相反方向变动。可能是由于前者向后者资本和商品以及移民造成的。第三、从统计资料来看，

各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在时间阶段上没有共同的型式。各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社会、历史、自然条件及时间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反映现代经济增长的经验也是多种多样的。第四、在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人口和总产值全面高增长率的条件下，必然出现各国间增长率的很大绝对差异和各国间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迅速变化。这会引起各国间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调整。

第二章“生产率增长与非常规费用”，分析了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特征的人均产值高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在一个世纪中按人口平均的劳动者人数没有显著的增加。在总产值增长率提高（年增长率大于2%）的条件下，总资本的增长率小于总产值增长率。因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不可能对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有所贡献，即使把二者加权计算，结论仍然不变。由此可见，决定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的只能是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此外，随着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许多由家庭或政府进行的经济性支出越来越具有中间产品或资本形成的性质。如果将其作为最终的消费支出，就会影响增长率和生产率的度量。这些支出项目主要有：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活费用增加、政府的行政支出和国防费用、城市化带来的住宅和有关建筑投资、用于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费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还伴随着一系列消极后果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一些隐蔽的费用，如城市化带来的交通运输费用增加、环境污染、国际上武装冲突的危险和破坏能力的增长等。

二

第二部包括第3－6章，分析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包括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部门结构的变动趋势。

第三章“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截面的考察”，分析了生产的部门结构变动及原因。整个国民经济可以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工业部门，

包括采矿、制造、电力、煤气、水、建筑、运输和通讯；服务业部门，包括商业、银行、保险、房地产、政府、国防及其他服务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三个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会发生变化。变动的趋势是：农业部门的比重与人均产值成反比例关系，工业部门的比重与人均产值成正比例关系，服务业部门的比重与人均产值的关系不明显。一般说来，在人均产值从低水平开始增长时，非农业部门的比重迅速上升，而其内部的结构变动则是缓慢的；在人均产值较高的水平上，非农业产业之间以及其各自组成部门之间的结构转移则较为显著。各产业部门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收入增长过程中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对需求结构的影响而影响生产结构。第二、按要素费用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个人可支配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各自占比例在经济增长中的变化。第三、一国内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影响需求结构。第四、伴随现代经济增长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及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分工深化对生产结构的影响。第五、现代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的扩大及各国比较优势的确立和改变也有改变国外的需求结构，并最终改变国内生产结构。第六、技术创新总是从某些部门开始，这会影响各部门的增长速度，最终也会改变生产结构。

第四章“总产值中的各部门份额：长期趋势”，从长期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生产的部门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在人均产值的国际差别日益扩大的同时，生产结构的国际差别（至少在农业部门份额上）也显著扩大了。随着人均产值的增加，生产结构也出现了同样显著的加速变动。其变动趋势同截面观察是一致的，即农业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工业部门的份额显著上升，服务业部门的变动趋势不明显。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还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中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内部产值结构变动的情况。在工业内部，制造上的份额上升最为显著，对工业部门增长起的作用最大；运输业及通讯部门的份额也显著持续的上升，建筑业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采矿业的份额变动没有明显的趋势。制造业在

总产值中份额的明显上升主要是由金属加工、化工、石油以及造纸、印刷等行业的迅速增长引起的。在服务业内部，商业、金融及住房和其他民营服务业的变动在各国不存在共同的趋势。唯一具有普遍性趋势的是政府服务和国防的份额上升。

第五章“劳动力的各部门份额：截面考察”，分析了劳动力部门份额的变动趋势。有三点重要结论。第一、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份额一般高于产值中的份额，而劳动力在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的份额都明显低于其在产值中的份额。因此，农业部门每个工人的产值低于全国平均值，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每个工人的产值高于全国平均值。第二、与人均产值由低的国家向高的国家的变动相联系，劳动力的部门份额变动高于产值的部门份额变动。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及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每一工人产值的差距是逐渐缩小的。第三、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总水平高于欠发达国家，每一工人产值的部门间差距又小于欠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对总人口的比率较高，欠发达国家相对较低。其次，在欠发达国家中，投入农业部门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质量差异很大，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要小得多。最后，在欠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二元结构。它通过市场、技术、就业和报酬的制度限制阻碍了农业部门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生产率和收益上的有效均等化。这就阻碍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和人均产值总水平的提高。

第六章“劳动力的部门份额：长期趋势”，从长期趋势上分析了劳动力部门份额的变动。从长期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农业部门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劳动力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份额都上升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劳动力的工业部门份额上升比起劳动力的农业部门份额下降以及相对其产值的增长来说，其幅度显得有限。从长期资料的分析还可以发现，与产值结构的变动一样，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劳动力的结构变动也出现加速的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的

自然增长率分布则是比较稳定的，这使劳动力在各部门和城乡间的供求不平衡，并由此造成劳动力在部门间和城乡间的流动。就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各自组成部分中所占的份额变动的长期趋势来看，工业部门的显著增长，所以在产值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的部门份额增长并不快，而建筑业则由于生产率提高缓慢，在产值份额大量增加的同时，劳动力份额也大大增加。在制造业内部、纺织、服装、木材等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大幅度下降，而金属、化工等新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则普遍上升。在服务业部门内部，家庭和个人服务的劳动力份额是下降的，而教育、医疗等专业性劳务和政府服务的份额是上升的。

三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章“总结及相互关连”，是对现代经济增长分析的总结和评论。

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特征与经济结构变动之间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传统部门增长率逐渐下降的同时，整个经济仍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工业部门的出现和迅速增长。一个新工业部门对经济总体增长起作用最大的时期不在于它本身增长的早期迅速成长阶段，而在于它已经具有足够的基础同时仍保持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阶段。第二、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是作为近代经济增长特征的人均产值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支撑整个经济迅速持续增长的新兴部门的出现和高速增长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所以，推动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终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第三、在大规模应用新知识和技术革新推动人均产值和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同时，生产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这又引起生活和工业条件的变化，并创造出新的和潜在的巨大需求，最终又会推动新的技术革新和经济高速全面增长。第四、现代经济增长不仅带来经济结构的变

化，而必然伴随着人口结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与调整。没有这些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现代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第五、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的产生，对劳动力和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更注重在工作成绩的客观检验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家庭出身和地位的基础上指派在企业中的地位。这是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显著差别。第六、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加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导致了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集团的冲突。需要国家出面解决这些冲突，以维护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同时，现代经济增长要求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条件。私人资本出于利益考虑不愿在这些方面投资，只有国家才能承担这一责任。国家能否承担以上重任，尤其是前一种任务，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作为这种支持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比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更为主要的观点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

《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资料丰富，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已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之作。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石　乐　撰

作者介绍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生于俄国，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在国民经济研究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处工作。在经济周期、国民收入核算和经济增长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创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而被称为“国民收入之父”。主要著作有：《生产和价格的长期变动》、《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现代经济增长》、《各国经济增长》等。

〔美〕克莱因，劳伦斯·罗伯特
Klein, Lawrence Robert

供求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Supply and Demand (1983)

《供求经济学》是一本系统介绍宏观与微观这两种因素的著作。

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代的结束，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面临日益深刻而全面的危机，很多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也直言不讳。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战后风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克莱因教授的这本《供求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写成的。主要目的是否认凯恩斯主义经济所面临的危机，他写道："我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凯恩斯形式的体系不能够对七十年代同时发生的价格上升和失业增加作出解释，""……没有表明凯恩斯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并不存在被解释成是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挑战的基础"。他认为，"七十年代的不景气的经验教训并不是要取代我们的思想体系，也不是要革新我们现存的政策，而是要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再作些建设性的工作。"他希望通过这种工作使凯恩斯经济学能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

克莱因是怎样进行这些"建设性的工作"呢？简言之，

他试图保留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础，通过使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建模技术，引入供方，预期等微观因素，使得供求以及微观和宏观能够结合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凯恩斯——里昂惕夫体系”。

本书除一简序和一篇附录外，共由八章构成。1981年克莱因教授在加利福企业大学伯克利分校“Royer”讲座所作的讲课构成了本书的基础。其中一至三章取材于讲课本身。

第一章是“导言”。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认为应对需求管理政策作出适当的剖析，并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宏观或整体问题。作者进而区分了供方经济观点与民粹派的观点，认为供方经济能够处理人口、生产率、能源、管理规则、环境和粮食问题。最后，介绍了一些国际上的观点。

第二章是“贯彻供方政策”。作者先对需求方面的同样问题作了一番回顾，然后考察了供方政策的贯彻，具体说明了讨论工业政策的两个特殊方法。接下来作者考察了收入政策和指数化问题，并且认为，如果所有基本的结构政策都无法有效解决滞胀问题，则收入政策可能成为我们的最终手段；指数化在防止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扭曲收入分配这一点上，虽具有社会公正的观点，但也有很多弊端。在本章末尾，作者讨论了公众的问题，认为削减税收总是受民众欢迎的。但任一政策方法必须正确地灌输给公众。

第三章是“供方经济学和求方经济学理论”。在本章的“概观”部分中，作者首先说明，供方经济学和求方经济都是根据最终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来决定价格的。进而对需求主导型理论与供方理论进行了分析。重点说明了对一种经济的内部事物进行彻底阐述需要的三方面的报表：一、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项目；二、投入产出项目；三、资金流量项目，以及以上述各种项目为基础的模型及其相互关系。接下来，作者提出了“扩大的生产法则”，保罗·道格拉斯把生产法则发展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与产业增值之间的关系，而增长理论把这一思想大大发挥了，认为总产出同资本、劳动力、能

源和各种材料均有联系，作者进而认为，供方经济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界限，仅仅只考虑税收、刺激或者结构失调，它应该用更为远大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在本章最后的附录中，作者利用公式和图解讨论了建立纯经济福利的模型问题。

本书第四、五两章是说明性的，作为对供方模型理论的补充，以解释世界范围内石油涨价冲击的模拟，这可看作供方经济学的一次试验。

第四章是“供方模型”。作者首先分析了需求主导的问题，认为当今的需求本身就含有供给的成分，但不能说典型的需求主导型模式也就自动构成了供方模式。作者认为，需求模式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对商品的需求和企业对要素的需求上。而没有强调供方的两个方面：家庭提供的劳动力和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供方模式不是根据一个或很少的几个生产函数，要想对供方作更为谨慎的解释，更好的办法是引起一个完整的投入产出系统。在一个部门分解的基础上，把投入产出模型同一个最终需求的宏观模型、收入形成和市场价格形成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体系可以称之为凯恩斯——里昂惕夫体系，它对供方模式来说是很重要的，其特征是：一、设备能力约束和瓶颈状态；二、环境；三、管理规则。在分析供方政策时，作者认为，供方模型和供方政策是结合在一起的，供方政策有时被称为结构政策，它们针对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活动和具体的集团，在这一点上，供方政策不同于宏观政策。供方模式并不能取代求方模式，而只能作为它的补充，使得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以使供求双方能共存于一个模式。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经济政策。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不能成功地解决许多当前的政策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们确实仍然作出了大量的贡献，而且仍在继续作出贡献。它们需要结构方面的和其它的供方政策，以便能适应更大范围的问题。

第五章是“石油涨价引起的世界范围冲击的模拟：一次供方经济学的试验”。作者首先说明了石油价格分析的背景，根据本书对供方经济学的解释，对资源限制进行了一项分析

研究，这种限制导致一种严重短缺的商品，即石油，其相对价格将大幅度地增长，而这正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典型例子或这种观点的典型应用。由于石油价格和贸易将同时对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影响，所以这个问题最好能在国际贸易流量体系中得到反映。分析贸易流量的一个著名体系是 LINK 计划中的计量经济模型。作者说明了石油价格是如何在 LINK 体系中起作用了，重点说明了最初影响和第二影响导致世界贸易总额下降和世界通货膨胀率提高的具体过程。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在两种情况下模拟了 LINK 体系：一、一种是基线情况，假设世界石油价格是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口价格增长率所确定的世界通货膨胀率同步增长的；二、石油价格冲击的情况。并用六张表具体说明了模拟的结果。

第六章是“供方、合理预期和货币主义最近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挑战。”在本章引言部分，作者认为，凯恩斯体系目前正受到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打击，自己要做的工作是找出对它攻击的理论根源，并就所选择的经济政策的成败和前途作一番讨论。接下来作者对自 1945 年以来这一段时期的成就作了一番回顾，认为从二战结束到七十年代初，凯恩斯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七十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价格上升和失业上升并存的现象，即“滞胀”现象。但作者并不认为凯恩斯体系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性问题是决定当前的滞胀有多少归之于外部的动乱，多少归之于多年来的凯恩斯需求管理，以及有多少归之于七十年代过份松宽的货币政策。作者认为，七十年代的问题除了外部动乱外，还包括处理自然环境、卫生、安全以及可耗尽的资源等问题，但这并不是要取代我们的思想体系，也不是要革新我们现存的政策，而是解决这些特殊问题需要新的结构政策，并且这些政策需要运用各个不同方面的系统，这就是凯恩斯体系不能适应而需要扩大范围的方面。在具体分析了供方经济学，合理预期和货币主义的理论观点后，作者在本章最后部分认为在理论方面，可以将供方经济、合理预期和货币主义容纳在扩展了凯恩斯体系中，所以，它们并不能使凯恩斯经济学

失去价值，而是有利于丰富凯恩斯体系。从政策上来说，有一种结构性政策，既可取代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又可取代新保守主义政策，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产业政策。

第七章是“经济规律”，作者认为，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不一定都能认识它们，对典型的经济学规律的现实主义的认识必须包括在所做结论中的不确定程度，认识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而要得出有力的结论或者使重大的决定依靠表面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危险了。作者同时说明了经济规律的精确性，认为经济估计必须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误差带中作出。

第八章是“结语”，作者在本章中概括了自己的分析以及政策解释来作为全书的结束，认为本书的要旨是了解“供方经济学”这一概念以及在综合领域中分析它同更加众所周知的“求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简明的附录“供方模式的正规结构”进一步为专业读者系统地阐述了主要的供给与（假设的）需求的关系。

作者在本书中极力想建立起“凯恩斯——里昂惕夫”体系，以便使供求以及微观和宏观能够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尽管可以使用精密的分析配之以十分精巧的模型，他不可能由此变成有效地指导实践的理论。

作者在理论探索、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所作的具体论述中，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研究材料。

第一，本书作者认为，自六十年代末以来，资源限制成了首要问题，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当今工业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基本结构问题，急需具体的微观政策来加以解决。宏观的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结构性的政策，它们针对的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活动和具体的部门。本来，西方政府通常采用宏观调控政策，而把结构性调节的任务交给私人企业和市场来完成。但由于上述问题日益严重，这种传统的调节分工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必须担负起某些重要的结构性调节任务。作者

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这种看法是值得重视。

第二，在作者整理的凯恩斯——里昂惕夫体系中，尽管其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但仍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济分析和建模技术。例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尝试利用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核算帐户、投入产出帐户和资金流量帐户等数据体系把微观和宏观、供给和需求结合在模型体系中。

据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史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史》是一部论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构建宏观经济模型的过程和经验和权威性著作。

本书共分五篇 17 章，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渊源、构建、各国的经验做了全面的介绍，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了非常乐观和充满信心的展望。

第一篇为“绪论”，包括第 1、2 章。作者认为，经济计量模型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思想渊源，其中较主要的有：(1) 列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这种思想将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并且建立一组描述经济运行的联立方程，使它解与其观察相适应。(2) R·弗里希和卡拉斯基关于经济周期的两个数学模型，它们用统计方法来确定联立方程组中的结构参数，这些方程很明显地是动态的，使用了差分微分方程。(3)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理论的数量表述，以及凯恩斯对国民收支帐户各总量的系统估计，促进了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渊源。(4) 凯恩斯之后对凯恩斯主义概念的统计检验，例如对消费函数和乘数原理的检验，朝着现代计量经济模型更迈进了一步。

早期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主要以三篇文献为核

心：(1) 丁伯根的《美国的经济周期，1919－1932》，丁伯根在书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1919－1932年间的数据进行拟合，得到关于美国经济的年度模型，其中有31个行为方程，17个恒等式，且都为线性关系。他强调动态乘数的计算，并详细研究了减少了系统的问题。(2) 克莱因的《美国经济波动，1921－1941》，这是一本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方面的早期专著，书中提出了三个美国经济模型，用于预测、政策分析、假设检验、描述经济、了解经济周期的本质。(3) 荷兰中央计划局的1955年模型，该模型是在丁伯根的带领下建立的，主要用于50年代荷兰经济的政策制定。该模型突出地体现了目标分析法以及政策制定者要将社会福利函数极大化，以适应经济约束。荷兰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和应用，成为历史上此类模型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例。

第二篇为“美国的经验”，包括第3、4、5章，分别总结了美国50、60、70年代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发展情况。

一、50年代的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由15个结构方程，5个恒等式和5个税赋转移辅助关系组成，按照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以1929－1941和1946－1952年的观察值为基础，其特点是使用新数据连续外推，以适应于经济周期的预测。模型的遗产是博大的。

二、60年代的布鲁金斯模型，它是计量经济模型中的一个主要里程碑。第一个近似的完全模型包含200多个方程，是60年代“最大的、最高度分解的和最具雄心的”模型。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综合了投入——产出系统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方法论。另外，使用分块递归以及适当分块线性分段技术进行求解也具有创新意义。模型的具体焦点是强调周期波动和短期稳定化政策的备选政策模拟。

三、70年代的模型。由于商业性经济计量公司的出现模型的预测功能成为重点，但基础模型仍是研究美国经济的工具，而且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历史作出贡献的仍是这些大型的、复杂的、有争议的基础模型。其间，模型的构建也日益借助了计算机技术。

第三篇为“比较经验”，包括第6章到第12章，分别介绍和总结了七个国家应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历史和经验。在第四篇“模型体系”中用两章的篇幅另外地介绍了地区模型和多国模型的发展情况。

一、荷兰在丁伯根的带动下，自1936年开始建起了它的第一个计量经济模型。荷兰的这些建模活动（考察截止到1988年为止），试图尽力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相对应，并积极吸收新的理论知识，新的估计和模拟技术。荷兰模型的构建活动，开创了该领域的先河，并使经济计量中的估计技术得到了发展，并趋向注重分析方面来建造方程，同时，模型变得更具理论一致性。

二、英国的宏观经济计量建模活动。自50年代以来，英国模型取得了一些进展，经济学家们比以往更注意控制论在模型中的应用，并对在什么程度上模型的行为由先验决定进行了一番争论。虽然早期的英国模型以凯恩斯学说为框架，但新剑桥学派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利物浦模型，它第一个引入前向性预期，第一次将市场出清和一致预期考虑了进去。英国模型中还有考虑“供给方”的模型。

三、法国的建模活动。二次大战后，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应用成为法国的当务之急，但在60年之后宏观经济模型才有效地用于政府的预测。法国模型一向注意应用并为政府服务。如今，它的兴趣在于长期分析、优化政策以及更广泛的微机应用。

四、1947年以来的加拿大模型，在6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建模方面取得的进展有：有关浮动汇率的模型，对整个模型模拟的实际应用等等，而且，在建模经验和技术可在其它国家进行推广，因为加拿大的国情很象其它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

五、日本的经济计量模型构建在50年代末从美国引进，经过学习、实践，当前已达到兴旺阶段。自70年代初以来，日本已应用了许多模型，大致有：一般均衡与预测模型、国际联接模型、短期预测模型、货币主义者模型等，对建模中

的一些问题，诸如结构、估计方法，性能检查、预测、模型的维护费用等进行了探讨。

六、印度是东南亚国家中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第一个国家，其知识直接来自美国克莱因和荷兰丁伯根，起初是一些博士论文，后来发展到一些中等模型，但仍主要是描述印度经济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建模过程中有一些困难，如资料缺乏、计算机技术有限等。

七、1965－1985年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构建活动，有些是美国等外国经济计量学家进行的，也有拉美自己进行的，其中有克莱因——沃顿模型，墨西哥、委内瑞拉、波多黎各、巴西模型，投入产出的应用等，它们在某些方面能够反映拉美的真实经济状况。但新的发展则要考虑新的形势。

八、地区经济模型自50、6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发展，它主要用于纯经济学研究、经济预测、政策分析以及政府收入预测。往往，各个模型只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LINK项目则建立了全球多国模型。

第五篇为“总结”，包括第15、16、17章。作者这样总结到：(1)需要大量的、细致、复杂的模型。(2)需要进行推广。(3)金融因素很重要。(4)需要对模型的一些关键性的检验。(5)使用计算机越来越显得重要。(6)模型之间可以相互促进。(7)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与时间序列方法相结合，可以改进预测功能。(8)建模过程需要反复进行等等。

总之，作者认为，尽管有许多难题和挑战有待解决，但未来的模型会更好。

该书由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出版，译者为李善同、钟学义等。

（据中国财经出版社中文版）　姚明霞　撰

经济计量学讲义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经济计量学讲义》是一本较全面地介绍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教程。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广泛兴起和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学界越发感到学习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的紧迫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分析大都为定性的，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定性分析远远不能与之相适应，中国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计量经济学工作者。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等七位教授应邀在1980年来华讲学，其讲稿的汇编形成为本书。该书对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书共分七讲。

第一讲为“计量经济学导论”是对计量经济学有关基本问题的概述。计量经济学是数学方法、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它主要应用于预测、历史分析即分析哪些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状况有决定影响或者只有一定的影响、模拟分析即做出一些推断、乘数分析用以预测经济变量变化的幅度和方向、制定政策即研究如何对经济系统实行最优控制、制定发展计划、研究经济周期等。主要的经济问题涉及需求分析、生产理论、收入分配、投入产出分析、国际贸易等。

第二讲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介绍经济计量学的基础知识，包括概率基础、抽样分布、估计和假设检验、回归等，并强调要根据经济理论推演模型，按照模型来解释经济数据。

第三讲为“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通过对三个问题的讨论，介绍了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和建模方法。其中，中国经济计量模型是1976年12月编制的，主要使用中国1950－1958年间的国外可获得的数据，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即中国是一个集中计划的发展中国家等来建立模型，模型共分为六大部分。

第四讲为“经济计量学、系统分析及经济控制论”，介绍经济计量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即将经济计量学和控制论相结合。控制论首先要设立一个损失函数，然后以经济计量模型为约束条件，求损失函数的最小值。作者用几个具体的例子介绍这一方法，包括邓伯格教授所建立的一个中国经济模型。最后介绍了三个应用最优控制理论的例子，包括应用于非线性模型，分析苏联经济计划和理性预期模型。

第五讲为“经济计量方法”，介绍了在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和应用中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和技术，诸如模型的识别、估计、有限信息及充分信息估计法、序列相关问题以及时间序列分析法。最后是一节总结。

作者认为，经济分析基本上包括规范分析、行为分析和政策分析三方面。经济计量学是利用统计推断的方法来检验某些经济理论和给定的前提条件，其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 收集经验数据的工具和方法。(2) 通过检验来调查经济理论。(3) 使用统计的方法作出推论和估计。(4) 当用统计方法获得一些结论时，如何表现这些结论。

作者认为，经济计量学在美国八十年代的发展主要围绕以下一些问题：(1) 模型的规模宜大，宜小？(2) 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呢，还是使用贝叶斯统计方法？(3) 使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呢，还是时间序列分析法？

第六讲为“应用计量经济学”，这些应用涉及不确定性、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生产与就业问题、工资和价格问题、最优预期、增长模型等等。

第七讲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介绍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凯恩斯理论；介绍编制模型的步骤：(1) 模

型的甄定，包括选定模型的大小、重点，方程的类型、解释变量。（2）参数估计。（3）模型的审核，从经济理论角度和统计学角度进行。（4）模拟测验，这里要选择好样本区间，一般情况下要留点资料而不全用完，以便于用来验证外推预测。

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的步骤包括：（1）资料修正。（2）假设和调整。（3）会前预测结果。（4）预测会议。（5）数据修正。（6）转入步骤（2）。（7）会后预测结果。在选用不同的预测方法最后，还需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价。

经济计量模型的另外用途是模拟检验以拟定政策以及最优控制。作者分别介绍了这两大用途的具体实施步骤。最后还涉及了关于模型联结的问题。

该书由美国克莱因、安德逊、刘遵义、邹至庄、肖政、安藤、粟庆雄等著，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编译，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据航空工业出版社中文版）

作为决策指导的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 as Guide For Decision Making (1981)

计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 40 多年的正常发展，然而在 70 年代却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石油危机、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和“滞胀”现象，使计量模型预测失灵。一时间出现了对计量模型的疑虑和失望。合理预期学派，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更是据此而责难以凯恩斯－里昂惕夫思想为主干的宏观经济模型。克莱因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击来自各方

的攻击并在论战中进一步推动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本文曾获第 21 届美国“查理斯·莫斯科维兹纪念讲座优秀论文奖”。

全文共分 4 个部分：评论；预测的作用与意义；历史的记录；展望。

一、克莱因首先提醒人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在进行预测和帮助决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超过了所有运用其他方法的竞争者。但是由于经济现象的不确定性，要想使经济预测完全达到精确，那只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其结果只能导致失望。

二、经济预测有过失误，由此有人就怀疑把经济学列入“硬科学”领地是否合适？克莱因认为，对经济的研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进行操作，也不可能在完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由于“实验性”的缺乏，使计量经济学预测的精确性受到危胁，同样，其他非实验性学科也具有较低的“信息—噪声比”，同样也会出现预测的失误，但却没有人会对气象学和地震学的科学地位提出怀疑。尽管气象预报与经济预测的可信时间跨度，前者只有 2－3 天，而后者却达到 1－3 个月。

三、当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用于经济实践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预测有助于政府进行政策制订与选择。那是因为，人们在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以前，需要对变化的趋势有个大略的了解，也有必要对目前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个总体估计。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预测的帮助。利用计量模型所作的预测，并不仅仅是思辨的产物，一切预测结果首先必须通过严格的统计检验才能被承认。此后还要不断把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真实情况进行对比，以便对模型进行逐步修正，从而使得模型能尽可能真实模拟现实和推测未来。克莱因在此罗列了从 1930 年到 1979 年间的 6 次成功的预测例子，表明以凯恩斯—里昂惕夫思想为骨架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是有其科学性的。

1973 年以来，运用计量模型对通货膨胀程度估计上偏差较大，同时也未能正确预测到石油禁运造成的世界性经济动荡。这造成了模型预测声誉的急转直下。克莱因对此辩解说

不能以偏概全，而要作详细的分析。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模型预测的失误相对于其他学派的预测来说反而较小，而且经过失误后改进了模型，功能提高了很多。特别是自 1963 年以来投入运行的大型“奥顿宏观模型”，在对经济“滞胀”方面进行的分析，可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人们之所以议论纷纷，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模型预测曾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在低的“信息—噪声比”情况下要求有很准确的预测是不现实的。

四、宏观模型的经济理论基础受到了 60 年代以来崛起的三大理论学派（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攻击。克莱因在逐个地进行了分析以后指出，所有这些学派对模型预测的批判，实际上都并不构成对经济计量模型及其预测的有力挑战，他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成分将有利于对计量模型的改进。事实上引入货币金融部门与合理预期影响作用的新模型已经投入使用。同时，任何企图以上述某个学派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经济预测尝试，要么由于难以实现理论的数量形式转化而告终（如预期理论），要么由于作出的预测相当糟糕而被摒弃（如货币学派）。反之，宏观计量模型在吸取了对货币、金融、人口、生活质量和个人期望的滞后效应等多种变化因素的作用后，却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

另一种批评是针对预测的方法而提出的。批评者指出如果预测精度只能产生于对已完成的模型的随意人为修正，那么这种精度是毫无意义的。克莱因反驳说，经济预测不是机械操作，经济环境会随着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变化，为了准确反映现实状态，“人—模型”结合的预测要比机械地使用模型更为合理，因为这种计量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某些途径输入模型，从而调整预测结果。当然，滥用“调整”，使预测变成了一种“游戏”，也是必须防范的。

计量模型预测究竟是好还是差，最有说服力的是进行比较。本书中将计量模型同两种用其他方法进行的预测结果（美国统计学会公布的预测记录；利用时间序列法所作的预测记录和计量模型预测记录）相比，在短期预测方面三者不相

上下；但在长期预测方面，模型法比单纯统计测算和时间序列预测都要准确。统计方法只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信息；时间序列法则有严重的时间积累误差和对外界变化反应不够灵敏等缺点。所以，计量模型预测迄今仍是难以替代的最佳预测方法。

克莱因随后还对计量模型预测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般来说，由于模型输出的结果往往偏于平缓，因此对趋势变化的预测结果要好于对变化幅度大小的具体估计。其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忽视了对外生变量的研究，部分是因为不能真正把握住经济现状的实质内涵。自从1945年以来，随着数据调查、统计方法、经济关系分析、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等方面的改进，使经济预测的误差种类确实减少了许多。但这一切进步并没有带来人们原先预期的“大突破”，料事如神的灵丹妙药没有出现，正如萨缪尔逊所说的那样，“似乎我们正为一种测不准规律所控制着，这使得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期望的预测精度”。然而模型的改进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克莱因在这里提出了改进调查数据的质量、提高“人—模型”联合判断的水平，建立可灵活反映外部变化的“变系数”模型和建立大型的计量模型体系等措施建议，以进一步提高预测的精度。克莱因最后强调所有这些将会有助于我们向“精确预测”靠近，但是计量经济学家水远不会成为先知先觉。

（据美国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自由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 徐 坚 撰

作者介绍

劳伦斯·克莱因，美国计量经济学家。1920年9月14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州的奥马哈城。195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贝茨·克拉克奖章。198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以公认的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用其

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他的主要论著作：《凯恩斯革命》(1950)、《美国经济波动》(1950)、《经济计量学教科学》(1974)、《经济计量学导论》(1962)、《经济预测理论论述》(1971)、《宏观经济体系的计算机模拟技术的状况》(1977)、《经济计量预测和经济模型导论》(1981)。

[美]库普曼，贾林·查尔斯
Koopmans, Tjalling Charles

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
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

《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是库普曼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系统介绍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著作。

自从亚当·斯密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以来，经济学的传统表达方式是文字论述方式，数学从未用来表达任何重要的基本理论，只是在涉及某些具体问题时才被简单用到。但从1810年边际革命以后，数学研究方法被逐渐引入到经济学领域，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首先用数学表达了一般均衡理论，从而开创了用数学方式来表达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先河。在新古典学派盛行时期，即从19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40年代，经济学中用得最多的数学方法是微积分。从40年代起，随着数学方法本身的发展，拓扑学、集合论、线性规划和对策论等一些新的数学工具开始渗入经济学领域。与此同时，公理化方法，即自然科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被应用于经济学，从而逐步形成以数学为表达方式的另一分支——数理经济学。在经济学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库普曼作为主要推进者之一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数理经济学产生以后，不同的经济学家由于采用不同的经济表达方式，从而在信息沟通上产生了极大的障碍，致使数理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无法及时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和理解。因此，如何沟通数理经济学家与非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及时将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转达给广大经济学家，便成为当时经济学领域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由于公理化方法和另外一些新的数学工具被应用于经济理论的阐述上，从而引起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如何评价这一变革对经济学发展的意义也成为当时经济学界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库普曼的《论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试图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该书结构由一篇序言和三篇论文构成。第一篇论文是"资源配置与价格体系"，作者在该篇中运用新的数学工具阐明了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并且总结了数理经济学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揭示了传统经济学与数理经济系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一篇论文由四章组成。(一) 点集合。线性函数与经济决策的分散化。(二) 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适度。(三) 生产效率与价格体系。(四) 历时的生产；资本和利息。

在第一篇论文中，作者先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经济学中的一些新的分析工具，主要的概念有：商品空间、机会集合、凸集合、紧集合、分离线等，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定理。第一个定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体的极大值包含着总体的极大值；第二个定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总体的极大值也包含着个体的极大值。然后，作者应用这些分析工具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涉及竞争市场机制与资源最优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资源配置方法上的最新成果与传统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篇论文是"经济知识的构成"，它共分为十二节，是一篇经济学方法论论文。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方法论总是处于一种被人们忽视的地位，甚至有一种坏名声，因此库普曼认为有必要为方法论进行辨护。他认为，每当新的作品

问世时，每当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点发生变化时，以及每当新的分析工具得到应用时，人们都会展开对方法论的讨论。而目前，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的重点以及分析工具都在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引起方法论上的反响。他的这篇论文的内容是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总结目前经济学的变化。

第三篇论文是“经济学中工具与问题的相互影响”，共分九节，着重讨论了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作者在本篇系统论述了分析工具的地位。他指出，由于工具的选取决定于特定的问题，所以工具在经济学上原则上处于仆人的地位。但是工具也有其自身的革命，它甚至能支配一个时期或一个学派。有些问题的解决会由于工具尚未发现而受到影响，相反，由于工具的获得可以使一些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的仆人在某些场合下会变成主人。

在阅读库普曼的这篇论著时，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本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论著。为此，必须对资源配置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总是并存的，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进行生产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就成为各个社会形态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的核心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设计和评价。对此，要掌握的重要问题是资源配置的两个层次。资源配置的方式按涉及的范围可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即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已有的运行机制可分为两种，市场机制（分散决策）和计划机制（集中决策)。第二个层次涉及某个微观经济单元（企业或工程项目）的资源配置方式，这里包括具体的资源配置技术。资源配置方式是社会形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的社会形态可采用相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同一社会形态可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是一个与社会制度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理论。

通过该论文，我们应该认识到，库普曼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上述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上。通过运用公理化的方法，他阐明了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与资源最优配置之间的关系，从

而对第一层次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与资源最优配置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来实现。对于第二个层次，库普曼创立了用于规划生产活动的活动分析方法。这一方法除了用于生产活动之外，实际上可以应用于任何人类的有组织活动上。活动分析方法的渊源主要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冯诺伊曼对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丹齐格的线性规划。

我们在阅读阅读第一篇论文"资源配置与价格体系"时，要重点掌握和理解关于完全竞争与资源最优配置的两个命题。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完全竞争能够使个人满足达到最大，这一思想也表明完全竞争能够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帕累托认为，在不损害任何一个消费者满足程度的情况下无法使任何消费者的满足增加，这一状况就是资源的最优配置状况，这一状况也称帕累托最适度。

根据帕累托最适度，上述经济学中的传统思想成为这样一个命题，即完全竞争能够达到帕累托最适度。库普曼用公理化的方法揭示了这一命题的意义及所需要的条件。这一问题表明，完全竞争是帕累托最优的充分条件。这里的完全竞争是指完全竞争的均衡状态，即所有个体经济单位都达到各自的最优状态。因此，完全竞争是一种个体最优状态，而这里所谓的帕累托最适度或资源的最优配置则是一种总体最优状态。因此，上述命题实质上意味着，个体最优状况是达到总体最优优状的充分条件。虽然这个命题就是第一个定理（个体的极大值包含着总体的极大值）的具体应用。而这一命题的成立显然又包含了以下条件，即各个经济单位的决策是相互不影响的，或者说不存在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情况，简称非外部性。

新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上述命题的逆命题，即任何帕累托最优总能通过完全竞争来达到，即完全竞争是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这一命题也意味着个体最优是达到总体最优的

必要条件。显然这一逆命题是上述第二定理（总体的极大值包含着个体的极大值）的具体应用。这一命题的成立包含了更多复杂的条件，它不仅要求满足非外部性的条件，而且要求满足凸性和参数价格这两个基本条件。总体的最优如果要通过个体的最优来实现，虽然个体最优本身应存在，而凸性就是保证个体最优存在的条件。所谓凸性，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减。所谓参数价格是指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对价格不产生直接影响，价格只是经济主体决策的参数，这实际上是指不存在垄断价格，否则，个体最优就不是总体最优的必然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上述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表明了完全竞争与资源最优配置之间的关系。竞争均衡理论属于实证经济学，而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属规范经济学，但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即可揭示出它们共同的逻辑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包含的各种条件。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条件后便可看到，任何理论都不可能通过一些简单提法而得到。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完全竞争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阅读第二篇论文“经济知识的构成”时，首先要把握住写作该论文的目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总结经济学在目前阶段发生的变化。其次要重点理解经济学采用公理化方法的优点。库普曼认为，构筑经济理论与构筑任何实证科学理论一样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观察。第二阶段进行推理。在自然科学中，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分工，分工的优点在于便于分析和检验一项理论的正确性，前提与事实究竟是否相符。然而在经济学中这两个阶段的工作至今混在一起。

库普曼认为，造成经济学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因为我们可以充分接触经济事实，所以我们无须进行广泛的观察或讨论便可以对经济学的许多背景作出假设。其次，为了便于人们接受经济政策建议，经济学往往将推理通俗化和简单化，或者省略了严格的推理。这样，人

们便难以揭示出经济知识赖以存在的基础，无法揭示出经济知识中多少来自观察，多少来自推理。

公理化方法就是克服经济学这种状况的有力工具。其实质是用假设和推理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公理化方法除了能够揭示经济理论的基础外，它的优点还在于能够提高建立经济理论的效率。经济学采用公理化方法的另一个优点在于便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数学、逻辑学、统计学、哲学等学科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来理解经济学，并对经济学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显然有助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阅读第三篇论文“经济学中工具与问题的相互影响”时，要重点掌握经济学工具的发展。最明显的发展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推理中越来越多地运用许多数学概念、理论和定理；第二，运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设备的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增长；第三，统计推断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第四，样本调查观察方法得到了系统的应用。这四个方法的工具发展使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我们在通读这篇论著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能把这本论著看成是一本简单的论文集，而应把这三篇论文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来把握。第一篇论文可以看作是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来阐述经济学经典思想的实例。第二和第三篇论文则是对新方法和新工具本身的讨论，这种讨论又将第一篇论文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扩展。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谢继文　撰

作者介绍

贾林·库普曼，（1910—　）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由于他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贡献而获得了197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10年8月28日生于荷兰的格来夫兰。1936年11月获得雷登大学的博士学位。1978年担任英国经济协会的会长。在给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下，如何将有限的经济资料

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以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库普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库普曼的主要论著有：《动态经济模型的统计推断》（1950）、《生产和配置的活动分析》（1951）、《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1957）、《论最优经济增长概念》（1965）、《时间上的分布和“最优”总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和能耗尽的资源》（1973）等。

［英］莱德勒，戴维·恩斯特·威廉
Laidler, David Ernest William

货币需求：理论、证据和问题
The Demand for Money: Theories、Evidence and Problems (1985)

《货币需求：理论·证据和问题》英文版 1968 年由美国纽约哈珀一罗公司出版，1976 年和 1985 年又出了第二、第三版。第三版在名中增加了“问题”一词，并增加了关于货币需求的实证内容。中文版由戴国强根据英文第三版译出，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出版。该书分为四篇，十二章，本文根据中文版分四部分介绍。

一

第一篇“宏观经济结构”包括第 1－3 章，论述了不同宏观经济模型中的货币需求函数。

第一章“需求函数的作用”，分析了供给和需求函数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面对一个特定供给函数的变动，决定需求的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发生变动。第二、这些变量的变动程度取决于它们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第三、供给函数的变动大部分是由需求函数的特点决定，但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这些基本特征运用到货币供给和需求函数中，可以得出两

个重要结论：第一、货币的供给函数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政府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通过操纵在其直接控制下的变量来控制货币供给量。第二、货币当局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减少可以对决定货币需求的某些变量，如利率、实际国民收入或一般的物价水平，来产生影响。

第二章“物价水平固定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的货币需求”，首先分析了价格固定前提下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两个变量利率与收入在 IS－LM 模型中的决定，以及 IS 和 LM 曲线变动对利率与收入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在两种极端的利率下，货币供给量变动对收入的影响。在一个既定的价格水平时，货币需求函数取决于收入和利率。货币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人们的资产在货币与债券中选择时，货币需求随利率的提高而减少。货币供给量完全在货币当局的控制之下，应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在价格固定的 IS－LM 模型中的均衡点决定货币需求函数所依赖的两个变量的数值。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引起利率与收入的变动。这种变动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一是 LM 曲线移动的距离和斜率，斜率又取决于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供给增加，LM 曲线向右移动，利率下降，收入增加。二是 IS 曲线的斜率，这一斜率又取决于消费和投资函数。总支出水平增加会使 IS 曲线向右移，在既定的 LM 曲线时，利率与收入都增加。关于利率与货币需求关系有两种假设。第一种是在货币利率弹性为零时，收入越高，货币需求量越大，这意味着 LM 曲线是一条垂线。因为如果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增函数而不取决于其他变量，那么，在货币市场均衡时，就只有一个收入水平。这时 IS 曲线变动的唯一影响就是使利率上升或下降。收入水平只取决于新的 LM 曲线的位置，而与 IS 曲线的任何特征无关。这样，如果去掉作为决定货币需求函数之一的利率，并使价格保持不变，那么，在使货币需求适应货币供给的变动时，实际收入就是唯一可调节的变量了。第二种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限大，在某一利率水平时，货币需求是无限的，LM 曲线是一条水平线，这时 LM 曲线的移动对利率与收入都没有影响。由此得出，在某一

利率时，如果人们希望无限地持有货币，则货币供给增加对收入没有影响。

第三章“宏观模型中的价格灵活性”分析价格水平变动时，货币供给对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的影响。在价格水平变动时要区分名义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供给。当名义货币供给量既定时，价格水平与实际货币供给量反方向变动。可以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来分析价格变动的影响，先看总需求曲线。IS－LM 模型能够提供价格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既定的名义货币供给量而言，价格越低，LM 曲线就越靠右，均衡的收入水平就越高，由此产生使物价实际收入之间反方向变动的总需求曲线。对一条既定的 LM 曲线而言，任何使 IS 曲线右移的因素都会增加收入水平，从而使总需求曲线右移，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有这种效应。当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零时，IS 曲线的移动既不会改变实际收入水平、也不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移动。总需求曲线的位置变得完全有弹性时，在名义货币供给量既定的条件下，总需求曲线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向下倾斜，与较低的实际货币量相交，但在实际收入水平处变为一条直线。收入随整个总需求曲线由任何使 IS 曲线向右移动的因素变动而引起向右移动，但不可通过名义货币供给量的改变而移动。再看总供给曲线。无论采取什么精确的形式，总需求曲线本身无法明确表示货币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和价格变动。这样就需要总供给曲线。在一个资本存量不变的经济中，产量随劳动的投入而变动，劳动收益递减。在完全竞争下，劳动的需求曲线由等于实际工资的劳动边际产量而给出，劳动的供给也取决于实际工资。劳动供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实际工资和劳动的投入，从劳动的总产量曲线可以得出产量。在完全竞争下，企业能够销售它在现行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总需求水平正好使销售计划得以实现。产量水平不受价格水平支配。总供给曲线在均衡的产量水平时是一条垂线。如果增加名义货币供给量，又使构成总供给曲线和 IS 曲线的所有因素不变，为了实现均衡，实际收入不变也使利率不变。利率必然确定在既定的消费和

政府支出水平上，投资也恰好达到保证商品和劳务总需求与产量相等这一交点上。这决定了影响货币需求的三个因素中利率与实际收入要受到约束，只有价格水平的变动来恢复货币供求的均衡。可见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使价格同比例变动。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在短期内，物价水平是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利率尤其重要。第二、在长期中，物价水平是灵活的，可以保持充分就业均衡。

二

第二篇“货币需求理论”，包括第 4 – 6 章，分析了各流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第四章“概论”。货币需求不同于一般商品需求，所以应该有货币需求理论。各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本书的研究强调的不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是差异。

第五章“古典学派、凯恩斯和现代数量理论”，概述了这些货币需求理论的内容与差异。主要包括四种理论。第一、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这种理论是基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一种最完整最有影响的分析。从短期来看费雪方程式，即交易方程式 MV = PT，导致这样的结论：货币需求是交易水平的一个不变比例，而交易水平与国民收入也有一个不变的关系。这样，货币需求与利率无关，只取决于收入和价格水平。第二、剑桥研究方法。剑桥学派研究货币需求函数的出发点与结论和费雪相似，只是途径不同。剑桥方程 M = KPY 在形式上也没有包括利率，但实际上剑桥学派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正在于引起人们注意利率可能是决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第三、凯恩斯学派的发展。他把货币需求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特别是引进了流动性陷井的概念。他强调了货币需求在总量上要受投机行为的支配。第四、弗里德曼和现代数量论。弗里德曼注意的不是分析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是分析影响决定货币持有

量的因素。他分析了影响货币需求的财富和各种有关收益率，并用持久收入来代表财富。这是很重要的贡献。

第六章“凯恩斯学派对货币需求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论述鲍莫尔、托宾等人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第一、更精确地分析了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鲍莫尔提出了货币交易的平方根公式：$M=\frac{1}{2}\sqrt{\frac{2bT}{r}\cdot P}$。这一公式把货币与存款转变中要支付的佣金（b）作为货需求函数的一个主要变量，并表明货币需求以低于交易量（T）的比例增加，这与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和货币的规模经济相关。第二、分析了决定预防动机的因素有利率、佣金和收支平均量的变动。第三、进一步说明了投机动机取决于个人财富、利率和持有债券的风险。这些深化了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

三

第三篇“数据资料问题和计量经济学论点”包括第七、八两章，分析了货币需求函数变量的定义以及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货币需求函数中的争论。

第七章“货币需求函数变量的定义”，分析了货币需求函数的三种主要变量：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和其他变量。规模变量包括收入和财富。收入可分为过去收入、现期收入和期望收入和持久收入。前两种收入是已知的，期望收入是在理性预期基础上形成的对未来收入的估算，持久收入是把前三种收入加权平均而得出。这些收入中，持久收入是稳定的，可用以代表财富。财富是个较复杂的变量，包括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前者无法估算，后者可用持久收入代表。个人持有的货币量不能超过其财富，并且有一个比率可使持有货币的效益最大。机会成本变量包括货币自身收益率、其他非货币资产收益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货币本身的收益率与市场利率相关。其他资产收益包括股票、债券等收益。预

期通货膨胀率则作为持有货币的成本而影响货币需求。其他变量主要是实际工资率，此外还包括制度，如非农业劳动力雇佣比例、人口和银行机构比例、现金与货币总量比率、非银行金融资产和总金融资产比率等。

第八章“计量经济学争论点”，论述对货币需求函数分析中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第一、识别问题，即对影响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确认，尤其是根据时间序列资料确认时的困难。第二、同时性。当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作为货币需求函数右边的自变量出现时，这些变量依次决定这一函数的其他方面，并且它也是由剩余误差来决定的，这就产生了同时性问题。第三、观察值的时期和频率。一个特定资料集的范围要受到那种引起联立方程组偏差的误差的影响，而且与所经过的时期长度、个别观察值的平均时间间隔有关。货币需求函数资料的可利用性和质量的检验在各国也不大一样。这些都影响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定量分析与检验。第四、理算费用和短期货币需求函数。理算费用指个人在长期内调整其货币量所必须的费用。这会影响短期货币需求。第五、滞后因变量问题。第六、个别实证和市场实证。

四

第四篇“货币需求的实证证据”包括第 9 - 12 章，是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第九章“证据概观”，分析了对货币需求进行实证分析中的困难。例如，货币自身收益率的确定、通货膨胀的程度、非人力财富收入确定的困难、制度变动的影响等。

第十章“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影响”，分析利率作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者重视利率的影响，货币主义者早先则对利率的作用提出了怀疑，但后来也承认了利率的作用。许多实证研究也有不同的结论，但在这种研究中选择哪一种利率显然是重要的。考虑到货币本身收益和预期通货膨胀这一些因素，可能得出的结论是：货

币需求是稳定的，并和持有它的机会成本成反方向关系。

第十一章“其他变量和稳定性问题”分析了物价水平、规模变量选择、实际工资、规模经济和制度变化等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说明了短期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内涵中寻找稳定的调节机制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第十二章“试验性结论”是全书的总结。主要有三点结论：第一、货币需求动机的作用。根据实证研究，投机动机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是重要的，尤其对规模经济分析十分重要。第二、货币需求函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货币需求函数对宏观经济是重要的。研究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并引起产量和物价的波动。货币需求与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相关，这对研究通货膨胀下的货币量和物价水平相互作用有重要意义。第三、近期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与制度问题相关。最后作者强调，这些结论是试验性的。

《货币需求：理论、证据和问题》综合了不同流派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货币需理论方面一本系统而重要的著作。

（据上海三联书店中文版） 石 乐 撰

作者介绍

戴维·E·W·莱德勒，英国经济学家。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日克利分校、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以及曼彻斯特大学任教。现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在货币理论与政策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代表作有：《货币需求：理论、证据和问题》、《微观经济学导论》、《货币和通货膨胀论文集》等。

[英]拉尔，迪帕克·库马尔
Lal, Deepak kumar

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Poverty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1983)

本书英文原版1983年由伦敦经济事务所出版，198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中文本由葛卫明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新古典学派（自称为“正统派”）自居，并在发展经济学的主要领域内，向以凯恩斯主义国家控制经济的思潮（被称为“非正统派”），发起了一场全面和猛烈的攻击。拉尔在书中极力称颂利特尔、巴拉萨等一些曾在或正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同时又点名抨击了赫希曼、纳克斯、钱纳里、缪尔达尔、刘易斯、普雷维什、斯特里顿和斯图尔特等著名发展经济学者。全书的结尾声称：“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很可能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该书的出版，不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且也引起了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一、本书的基本内容

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拉尔在导言中说，是要“概述并评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信条的有效性"。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里,那些鼓吹国家控制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们所宣扬的一些思想和政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应该由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取而代之。全书共分6章:第1章"国家计划和控制经济的信条",集中讨论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分歧焦点。第2章和第3章"外部环境",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国际商品协定、外国资本以及与此有关的贸易条件、贸易保护主义、债务、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和对立。第4章"工业化和计划化",着重讨论国家应不应该干预工业的发展;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哪一种方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内向发展还是外向发展;以及有关工业化中的轻重次序和利用外资等问题。第5章"贫困、不平等和就业",讨论了两派在减轻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途径上的对立,并提出了他对土地改革和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等问题上的看法。第6章"几个一般的结论"。总结了两派的基本分歧,抨击了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一些发展经济学的认识根源。在附录中,拉尔还讨论了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的一些看法和设想。

二、关于国家干预经济

拉尔认为,战后的几十年里,倾向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想法和建议,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情况缺少深入的了解,很多想法是主观随意性的,因而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失败。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的统一发展模式和战略,在事实面前也都碰了壁。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在旧的国际经济关系支配下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他们更是束手无策。拉尔

在书中紧紧抓住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建议。

在国家干预经济问题上，倾向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不健全；私人资本主义发育不良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资金、技术和人材的严重缺乏；触目惊心的国内贫困和失业问题等原因，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发展进程。例如，通过制订某种经济计划，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些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还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在贸易等领域作出一定让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以改善它们的处境。

拉尔则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恰巧在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计划和过渡的干预，结果造成了低效率和不公正。他说："集中化预测可能证明比基于市场经济的许多参与者所做的非集中化预测，结果还要糟"。建立在收入再分配基础上的税收和补贴制度，破坏了经济的生产效率，从而有害于帕累托最佳状态的实现。拉尔用他在印度国家计委的实施证明，国家干预和国家计划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低下的效率；又用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国与亚洲"四小"作比较，说明只有放弃"国家控制经济的信条"，实现自由放任和利润最大化，才有可能在经济高速增长、就业充分实现、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减轻人民的贫困状况。

拉尔还反对改革一切旧的过时的经济关系，反过农村的土地改革。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奇特的社会和土地结构或高利贷等，也不一定是增长的障碍"。"只要乡村劳动力和农产品市场还不太完善，那么土改就既不是乡村公平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相反，"在不存在消除和减少风险的其他方式情况下，这些传统制度的毁灭，实现上是弊大于利"。

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对外经济政策

拉尔与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争论的另一主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对外经济政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曾经倡导过国家对贸易进行干预、控制、保护，其主要理由是：(1)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初级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低，再加上各种替代产品的冲击，致使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象美国、加拿大当年那样，依靠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作为增长的“引擎”；相反，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过多，只会加速国际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和价格的进一步下降；(2)由于贸易条件长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上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垄断，自由的贸易制度只会加剧国际上收益的两极分化；(3)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一般存在着两大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因此必须限制进口，加快工业化和进口替代；(4)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只能起“辅助器”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设法通过贸易限制来保护新生的国内工业。传统发展经济学家的上述论述，有正确的地方、也有局限性。从60年代起，一些倾向于新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如迈因特、巴拉萨等人)，已经比较充分地论证了过渡的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所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国际收支恶化等弊病，提出了应该向出口鼓励战略和放松贸易保护转变的客观必要性。在这方面，拉尔基本上只是汲取了迈因特等人的观点，而并无更多的创新。

拉尔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制度方面，则比多数新古典派发展经济学家走得更远。他认为，(1)如果实行贸易管制和贸易保护，那就会造成削弱出口工业的竞争力，从而造成“保护贸易→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出口部门转向国内消费→出口刺激减少→出口收入减少→进口管制进一步加强→进口进一步削弱”这样的恶性循环。(2)贸易保护不会矫正国内价

格的扭曲，相反由于削弱了生产者降低成本的刺激，使价格扭曲现象更加严重，致使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相脱节。(3)贸易保护使各部门竞相扩大机器设备的进口，使资源日益向资本密集型生产部门集中，从而进一步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和生产能力的过剩。(4)贸易保护提高了制成品价格，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使农民的地位和状况更加不利。(5)一些国家在实行进口替代的条件下，即使也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战略，但在国家控制之下的出口鼓励（如出口补贴等），只会使生产者追求产品出口量的最大化，而不是促进出口商品附加价值的增加。

基于上述考虑，拉尔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实现贸易自由化，摆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他说："自由贸易虽然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则是它的必要条件。"他列举亚洲"四小"的例子说明，高收入增长率总是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然而他又提出，由于贸易自由化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即(1)以关税逐步代替进口限额；(2)逐步降低关税税率；(3)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货币管理制度。一般来说，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香港等地外）很难做到这三点。主要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低效率的工业状况。不仅如此，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低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还有加强之趋势。

在本书中，拉尔并没有忽视对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评论。相反，他站在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立场上，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制度是合理的。他指责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神话"，是国家控制经济信条和反对贸易化的借口。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品来解决这一问题。拉尔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缔结国际商品协定，以保证和稳定出口收入的要求。他认为，目前的商品协定不仅涉及的商品种类很少，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也常常会因生产国的生产过剩而失去作用。他抨击外来投资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恶化国际收支，带来不适合产品和造成有害的社会效果的说法。并且举例说，有人认

为在热带非洲引进可口可乐是一种资源浪费,然而对这一地区来说,由于当地供水的"不安全",可口可乐却提供了一剂可担保免疫的"药水"。因此,他反对对跨国公司进行控制,认为"国外直接投资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有害的",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他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计划"的贷款条件,认为它既会为那些危机国家奠定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又能警告其他国家放弃不可靠的政策。同时,拉尔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他说:"西方能够给第三世界带来的最佳服务,是通过拒绝屈从各种花言巧语,而确保这种经济秩序不受侵害。"

(据云南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巫宁耕　撰

作者介绍

拉尔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发展了"次优福利经济学",并将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设计;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关贫穷、分配和增长的政策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行了批判性的检验和评价。

拉尔的主要著述有:《水井和福利——马哈拉施特拉小型灌溉系统勘探的成本效益研究》(1972)、《无效的努力、迁移和影子工资率》(1973)、《项目评估法》(1974)、《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1975)、《分配和发展》(1976)、《工业经济中的失业和工资膨胀》(1977)、《贫困、实力和偏见——南北对抗》(1978)、《计划化中的价格——印度计划改革》(1980)、《公营企业》(1980)和《发展经济学的贫困》(1983)等。

[美]莱本斯坦，哈维
Leibenstein, Harvey

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7)

1952 年莱本斯坦开始着手于本书的研究工作，至 1954－1955 年间完稿，1956 年修改定稿，1957 年由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除序言和附录外共有 15 章：世界上国民收入的不均；作为发展指标的人均产量，作为准稳定均衡体系的落后经济；落后经济的特征；经济落后的若干动态方面的特征；有关人口稠密落后地区的就业不足理论；专业化、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临界最小努力”的命题；增长的引致、动因、活动和临界最小努力；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资本产出率概述；摘要；基本关系的图解；人口增长、投资率及其数量关系的例证和计算；经济发展理论和投资政策。

现根据原书的叙述顺序扼要地介绍一下莱本斯坦这部代表作的基本观点。

一、关于落后经济是一种均衡体系的4个假说

本书的前3章相当于绪论。莱本斯坦在第1、2章里，分析了世界上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均等问题。提出应该以人均产量或人均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

莱本斯坦在第3章里指出，可以把先进经济看作处于不均衡状态，落后经济则处于均衡状态。据此可以引伸出四个论点：(1)这种均衡状态表现为落后地区人均收入具有“准稳定”的性质，即停滞不带；(2)如果要打破一个落后经济的均衡状态，使之处于不均衡状态，应激发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动因。但是，这样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驱动一些压抑人均收入上升的动因开始起作用；(3)在落后经济由均衡状态转入不均衡状态时，压低人均收入的动因所产生的效果，要大于提高人均收入的动因所产生的效果；(4)压低人均收入动因所产生的效果有一个极大点，所以，要设法使提高人均收入动因所产生的效果的极大点大于它，以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莱本斯坦关于落后经济的四个假说。以后各章的分析都是依据这个基本构思而展开的。

二、落后经济的特征及其成因

莱本斯坦在第4－7章阐明了落后经济所具有的特征，以及产生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落后经济特征主要包括：(1)经济上的一般特征：70%－90%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业中存在“隐蔽性失业”；农业以外缺少就业机会，人均占有资本极少；人均收入低，只能维持生存；大部分居民储蓄为零；来自地主阶层少量的储蓄无助于发展工

商业;农产品几乎由谷物组成,蛋白质食品的产量极低;粮食等必需品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主要比例;粮食和原料的出口;基础设施简陋等。

(2)农业上的基本特征:对土地的投资很少;耕作技术原始,设备落后;大地主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受到限制;中小地主急功近利,耗尽地力;巨额负债;无法跟踪国内市场进行生产;土地占有单位规模日趋见小。

(3)人口方面的特征:出生率太高;死亡率太高,平均寿命很低;营养不良,食物不够;公共卫生落后;乡村人口过剩。

(4)文化和政治上的特征:教育不发达,文盲率很高;童工普遍;中产阶级或是力量薄弱,或是根本不存在;妇女地位低;大部分居民受传统行动的限制。

(5)技术上的特征:土地亩产量低;技术培训设备缺乏,通讯、交通设施落后;工艺技术粗糙。

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从静态角度看的。若从动态角度看,则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农业产量低、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缺乏和人口。在第5章中,莱本斯坦集中分析了这三方面因素。他认为,落后地区农业产量之所以低,主要是因为缺乏农业资本(这是无法用劳动代替的),缺乏先进的农业技术,耕地素质差。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缺乏,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要么以农业优先,要么发生在仅有短期商业风险、利润率很高的非生产性活动中。莱来斯坦尤其强调第三个因素。他认为,人口变动的情况与落后经济的准稳定均衡状态关系最深。落后经济受到外部的刺激后,人均收入和人口数量都会增加,其中人口增加的多少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死亡率通常是下降的,而出生率则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于是,在落后地区,任何一个刺激人均收入上升的办法,同时会造成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上升,从而使总人口增加,最终使人均收入减至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

莱本斯坦在第5、7两章从工资和就业结构两方面情况,分析了落后经济劳动力的性质及其分布,补充说明了落后经济的特征。

三、落后经济增长的关键——"临界最小努力"

莱本斯坦在第8章中提出了本书最主要的论点:为使落后经济达到持久性的增长,最初促进发展的刺激或努力,必须保持一个临界的最小规模。这就是著名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

莱本斯坦基本上接受了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贫穷的恶性循环"的论述,但是他认为,这种说法仅仅解释了贫穷国家所以贫穷的原因,而没有指出如何才能不再贫穷的道路,而"临界最小努力"这一构思不仅可以和"恶性循环"的观点并行不背,而且能提供一条摆脱恶性循环的道路。那是因为,如果对经济的外来刺激十分巨大,人均收入上升的幅度就能得到很大的提高。于是,消费水平即使因收入增加而提高,但不致于把增加的收入全部消费完。而且诱发性人口增长也必然赶不上收入的增长,这样就会形成储蓄与投资。一个落后经济自然也就有能力摆脱其恶性循环的困境,迈向持久性增长的道路。现在有些地区之所以还停留在落后状态,那是因为过去所受到的外来刺激还小于这一"临界最小努力",而先进国家之所以能实现持久性的增长,也无非是由于当时受到了比"临界最小努力"更大的刺激。

"临界最小努力"对于启动经济增长来说,具有四个长处:第一,能克服由各种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所带来的内部的规模不经济;第二,能克服由各种产业的相互依赖性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达到产业间的平衡增长;第三,能在启动增长的同时,克服由于增长的刺激产生的诱发性和自发性抑制收入的障碍;第四,能在一个经济系统里创造出一种新的机制,克服文化和体制上的障碍,使得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能得到源源不断地发挥。

当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及其反应就离不开经济活动的主角——人。莱本斯坦在第9章中围绕增长的动因和活动,着重

谈了企业家问题。他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发掘投资机会的才能和敢于冒险的精神。企业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是不会自动超前的,增长的实现有赖于企业家阶层的发展。第二,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别,企业家阶层的兴起有助于缩小这方面的差别。企业家的成长取决于企业家集团规模的大小、企业家人均收入的高低和收入的增长率,而要想扩大企业家集团的规模,则必须提高其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

在此同时,莱本斯坦还论述了知识创新和技艺进步在"增长引致"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企业家的关系。他认为,知识存量是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知识只有经过企业家的活动和提高劳动人口的技术,才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技艺的进步取决于对"人力资本"所进行的投资,加强技艺的供给,同时也取决于对技艺需求的创造。

本书的第 10 章确立了经济发展的人口增长理论,第 11 章考察了资本产出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对"临界最小努力"的命题进行了理论的补充和发挥。

第 12 章是此前各章要点的汇总,在这一章里,莱来斯坦结论性地写道:把有助于经济持久增长所必需的人均收入,推到高于"临界最小努力"所规定的限额之上,将带来一个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效果,即来自较高人均收入的投资以及资本存量必定增加。同时,还将带来一些不大明显的重要效果:(1)增长动因的扩大和增加,从而使落后经济利用新的生产机会的能力也有所扩大和增加;(2)资本产出率降低,从而使单位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增大;(3)减低人口、利益等因素对增长的阻碍作用;(4)社会条件的创造,从而为发展提供了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动因;(5)专业化程度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得到扩展;(6)发展了一种能降低出生率、最终降低人口增长率的社会、经济环境。

本书的第 13 章是结论的图解;第 14、15 章则具有应用的性质。

(据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英文版)　彭　城　撰

一般X效率理论和经济发展

General X－Effcierly Theory aad Econmic Development (1978)

《一般X效率理论和经济发展》英文版197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八章。本文根据英文版分两部分介绍。

一

第一部分包括第1—2章，这部分在对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X效率理论。

第一章“新古典理论和经济发展”，对传统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质疑，以及X效率理论的基本假设。传统新古典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假定的基本经济单位的是家庭和厂商，它们决策是理性的（如最大化原则），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市场信息是完全的。人总能尽快采用有利的新技术，努力水平固定的、足够大的。投入品总能得到有效利用，且有明确的相应生产函数。但现实并非如此。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所以企业家才能在X效率理论中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基本经济单位应该是个人。家庭或厂商的决策和行为是个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只有有选择理性的人。他们的努力水平是自由处置变量而不是固定的。团体的决策和行为也是个人利益、人际关系权衡的结果。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投入品使用效率是可变的，与产出无明确的函数关系。由于个体及组织惰性的存在，它们对现实的反应是不完全的，有利的新技术不会被及时采

用。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经济效率及经济增长。

第二章“一般 X 效率理论”，概述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X 效率理论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人。整体(如家庭、厂商)的决策及行为是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弄清个人特征及相互关系，整体的行为也就清楚了。第二、选择理性。这是指理性具有不同水平，个人依其个性及所处环境选择不同的理性水平。选择理性的行为处于“喜欢做”和“必须做”之间，但未必劣于完全理性行为。人总有自我(追求本能欲望)的一面，也有超我(追求责任道义)的一面。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的行为是选择理性的。第三，所有者一代理人关系。基本决策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厂商。代理人的决策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然而再考虑所有者的利益。他的目标不是使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第四、人际关系，人个存在来自垂直方向(上司)和水平方向(同伴)的人际压力，他的行为是权衡这两分及自身利益的结果。第五、努力选择。努力包括决定努力性质的实际活动，活动的步调频率，活动质量，以及执行活动时的时间组合。个人在选择理性和人限关系、传统约束下不是总处于最优的努力状态。第五、惰性区域和努力熵。任何努力状态的变动都要付出惰性成本，当这种成本大于可能得到收益时，变动就不会发生。这个区域称为惰性区域。压力感、强迫感、监督系统都是逐渐衰弱的，从而努力水平也随之下降，这个过程叫努力熵，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差异、惰性区域及努力熵的存在使投入品效率达不到最大化，这就是 X 低效率。

二

第二部分包括第 3 – 8 章，是用 X 效率理论来解释各种问题，即把 X 效率理论运用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上。

第三章“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发展”说明创新型企业家对提高 X 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 X 效率存在和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创新型企业家作为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可通过获得

紧缺生产要素、发现有利交易时机、判断生产的可行性、开发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等途径来克服X低效率。这样就有助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常规型企业家循规蹈矩,会使企业陷于惰性区域,造成X低效率,并抑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创新型企业家才能是极为重要的,这种企业家才能的供给取决于三个因素"创新型企业家的人数;影响企业家能力利用程度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压力;企业家对不同动机状态的反应程度"。从这里得出的政策含义是:要给予创新型企业家的特殊权益,并改善环境,刺激企业家才能的供给。

第四章"农业剩余劳动力"论证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在某一努力水平下,即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因为努力水平本身是可变的。在劳动力充分利用时,劳动能力并不一定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可以通过提高步调频率,多雇能手,改善组织等方法提高努力的质量与强度,使较少的人能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这时余下的人就是隐性失业者。当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时,迁移单位的传统、人际关系都发生相应变化。如能给予足够的激励,留下的人努力水平即可以提高。

第五章"迁移和都市失业"论述农村人口向都市迁移的动机及都市劳动市场模型。人口迁移并不是基于城乡绝对收入差异对乡村劳动力的吸引,而是一种选择理性。影响这种行为的是同伴和亲友的压力、机会信息、以及相对收入水平。劳动市场模型为:

$S=f_s(W.E)$ ——(1)

$e=f_e(W)$ ——(2)

$E=e/s$ ——(3)

$W=F_i$ ——(4)

S为劳动力供给,E为就业率,e为就业人数,W为工资率。工资率W的确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工资率与就业率的关系,当就业率低时,雇员迫于压力而提高努力程度,从而使工资率与就业率上升。二是由于惯例、契约等惰性的存在,引起X效率棘论效应,工资率有相对稳定性。

第六"储蓄、投资和发展"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增长率差异及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原因。发展中国家收入、利润率都相当低，没有足够的储蓄用于投资，外资受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也很有限。不同经济中创新的收益与风险不同，不同的企业家才能存量、惰性区界的作用也不同，这就造成增长率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企业具有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性使企业不思变革。即使在竞争条件下，因经济的不确定性、经验不足等因素，创新风险很大，X 低效率普遍存在。所以，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初始创新者的利益，如授予特许证、专利权税收优惠等，并要使跟随者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否则大家都等待初始者的经验或失败，创新就不会发生。在技术引进方面，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内锁，即采用新技术改变了原有的行为准则与平衡，并非总能得益，惰性区域增大，投入品效率下降等。如果 X 低效率的上升大于得益，即使其他条件具备，创新也不会发生。二是技术外锁，只有有机构成与本国相近的技术才能被吸收，所有有机构成高的国家的技术革新无法被有机构成低的国际采用。有机构成越低，可引进的技术减少。如果一国经济未进步到相应水平，由于管理、经验、素质等差距，引进的新技术会使 X 低效率上升。发展中国家有机构成低是限制技术引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章"人口增长和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以惰性理论解释生产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原因。只有家庭收入随经济增长而上升，其他社会经济地位才能相应提高。家庭有强烈维持并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愿望，它通过支出模式来实现。支出可以分为三类：用于维持家庭经济地位的物品支出；用于日常生产普通物品的支出；用于养育孩子的支出。其中第一项支出是惰性的。只要收入增长不超过某一边际线，为了追求地位，第一项支出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这时对这种支出的偏好上升，且居高不下，而普通物品的减少有其下限。因此，就要减少养育孩子的支出。而且由于孩子的效用成本是上升的，所以，出生率就下降了。

第八章"组织与环境"分析组织的性质其运行环境对 X 效

率的影响。影响X效率的还有三个因素:第一、组织环境,即组织的运行是在竞争的环境还是行政监督的环境中。第二、组织结构,即责任与报酬制度,不负责任的后果转嫁的可能性等。第三、组织传统,是历史的结果,往往会抑制创新。以国营企业为例,这种企业受到国家保护,不会倒闭,高效率者也不易进入,竞争压力趋向较小,制度僵化、传统强大,为企业中的利益集团及有关政客服务。而不是为消费服务。报酬与个人生产能力相分离,使行为责任感与努力极小化,创新活动内乏动力,外乏压力。加之传统制度因素,惰性区域大、努力熵高,成本高,只是靠垄断地位和弱环境监督把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然这种转嫁也会受到行动标准、收益最大化目标、某种程度的竞争与行政控制的限制。总之,发展中国家的国营企业成为这些国家X低效率的原因之一。

X效率理论是莱宾斯坦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被称为战后微观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之一。《一般X效率理论和经济发展》一书以X效率理论为依据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颇有特色。

(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吴　名　撰

作者介绍

哈维·莱宾斯坦,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俄国,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旧克利分校任教。1966年以后一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授。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组织分析》、《第三世界的人品产长和经济发展》、《超越经济人:微观经济学的新基础》、《一般X效率理论和经济发展》、《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和X效率理论》等。

[美]勒纳，阿巴
Lerner, Abba

统制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原理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s(1944)

英文本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4 年出版。中译本由陈彪如译出，商务印书馆 1965 年出版。全书共 403 页。

这本书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作者勒纳写道："在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为了人们的福利，要怎样统制我们的经济……"这就是说，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是社会福利，因此他用"福利经济学原理"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全书除序言外共有 29 章，大致可分为以下 6 个部分：

一、统制经济的概念

勒讷所说的统制，是指"慎重地实施最能促进社会利益的一切政策。而不是预先判断集体所有和经营或某种形式的私人企业这个争论问题。"非统制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现实经济中为社会利益而进行的管理，只是说这些活动是局部的和偶然

的，并且也没有象统制社会那样把资源的最优利用作为公认的政策责任。勒讷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为人们的福利要怎样统制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勒讷用福利经济学对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调和。

勒讷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并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运动而发扬光大的民主生活方式的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同消极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比较起来，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更紧要得多的部分，而且也更迫切地需要加以关注"。他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与私有财产废除以后就会自动产生人类友谊的信念等同起来，那么人们一定要抛弃社会主义，因为它是虚伪的。

勒讷把收入分配问题看作统制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他把分配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各个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其二是把现有各种货物分配给各个消费者，从而构成他们的消费份额。他得出结论，要使一定量社会总收入所提供的满足成为最大量，合理的办法是使各个人的收入平均化。根据统制经济的收入分配原则，把种种数额的金钱分予各个不同的消费者，让他们在商店里按照一定价格购所喜欢的货物，这些价格要调节得使每种货物的供求都相等，这就能最满意地实现货物的最适度配置。这一过程是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实现的，如果发生任何垄断剥削，它就会被打乱，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能干涉货物的最适度配置。

二、简单生产类型

所谓简单的生产形式，是指用单独的、纯一的和可分的稀缺生产要素，生产一种单独的、纯一的和可分的消费品。勒讷首先把它放在集体主义经济中考察，从而得出结论说，一种要素在各种不同用途的最适度分配，意味着它的边际产品价值不小于其他任何一种边际产品价值。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有相适

应的价格机构即出售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市场，并且按照某边际产品的价值大于、小于还是等于该要素的价格来决定扩大、减少或保持产量。这样就将使社会的和私人的边际机会成本相等，因而每个人在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花费他的货币收入时，要尽力使他自己在另一些产品中的牺牲减到最低限度，这就引导他自动地或不自觉地使社会牺牲减少到最小限度。这就是价格机构的基本社会效用。

对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勒纳认为，由于生产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这些企业都要追求最大利润。此时，实现每种要素在各种不同产品间的最适度分配可用福利方程来说明。

福利方程涉及到六个项目：边际社会利益(msb)、边际产品价值(Ump)、边际私人利益(mpr)、边际私人成本(mpc)、边际要素价值(Umf)、边际社会成本(msc)。

如果 msb = Ump，则意味着已产货物的最适度分配；Ump = mpr，则意味着在产品销售方面的完全竞争；mpr = mpc，则意味着使利润最大化；mpc = Umf，则意味着在要素购买方面的完全竞争；Umf = msc，则意味着在要素替代过程中满足了前四个方程，因而在一些替代用途中 Umf = msb。勒纳强调指出，如果上面五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要素在各种不同产品间的最适度配置就实现了。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满足福利方程的条件是难得的，它未必能具备，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买卖双方不大可能实理完全竞争。这也使统制经济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三、复杂生产类型

勒纳指出，对于生产中使用一种以上稀缺的生产要素，或工厂提供一种以上纯一的产品，而各种不同要素或不同产品必须按由生产技术所独特决定的比例配合的复杂生产类型，象简

单生产时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情形一样，要有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市场，并按这样的规则安排生产：当 Ump＞pf(要素价格)，就扩充生产，当 Ump＜pf 就收缩生产；当 Ump＝pf，就按原来的规模生产。由于单一追加单位某种要素，对生产不会有任何增加，因而一种要素的边际产品是不确定的，但对于要素的按技术决定比例配合的组合 F 的边际产品是确定的。所以按此规则组织生产，要素 F 在其各种不同产品间 的分配将是适当的。同样有效的改进办法是把这规则应用到各要素的边际净产品上，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但不如前一方法简单。要素的相对价格取决于间接替代的可能性，而最终还可由它们的供给情形来决定。在生产方面，与净 Ump 相适应的是净 Umf 和复合要素 F 相对应的是复合产品 P。

对于各要素间与各产品间的比例是可变的，但仍保留生产要素和生产过程的可分性的复杂生产类型。勒讷认为，如果诱使集体主义经济中所有生产经营者都遵守对简单生产提出的那条“规则”，要 素将会达到最适度配置。从产出量观点出发可用下面的两点组成第二个规则来表述与前述的第一个规则等价的事实：(1)当 P(价格)大于 Umf 时，就多使用这种要素；当 p 小于 Umf 时，就少使用这种要素；当 p＝Umf 时，就依同一速度生产。(2)经理人员应用尽可能经济的办法来生产他正在生产的东西。这两条规则是互相依赖的，两者都不能保证一个最适应状态，除非另一规则同时也带来另一个最适度状态。因为第一条规则告诉生产者某一特定货物要生产多少；第二条规则则告诉生产者要使用什么要素及其构成比例。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以最好方式指导社会生产力。

四、不可分性、税收的制约机制

由于一些要素往往只有大单位可以利用，如航路、远洋货轮、摩天楼，都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完全可分性不能直接应用

到实际问题上，当放弃了可分性的假设后，勒纳得出结论说，当企业扩大到足以摧毁完全竞争的地步，不可分性就具有重要意义了。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造成成本的渐减，从而导致企业的扩张与完全竞争条件的破坏。于是资源的最适度配置只能靠遵循 Ump = pf 这条规则的集体机构来实现，而不依赖于完全竞争的条件。也可以靠用政府补助支持的反投机人为地保持完全竞争来实现。

对于固定要素的存在，勒纳指出，企业付给固定要素的固定成本是不随产量而改变的，所以固定要素倾向于稳定竞争，但在长期内，固定要素至多不过是不可分要素，由它而产生的竞争稳定性也一并消失。在统制经济中，政府对企业规则的法定最大限度能够保持完全竞争，然而会影响它的效率。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用其它诸如投机一类的方法保持完全竞争，让企业扩充到它们认为最有利的规模。

在分析产业规模调整时，勒纳提出了短期的概念。所谓短期是指不会长到可以进行任何调整的时期。人们一直把固定要素的收入同土地的地租类比而称之为地租。由于许多要素只在短期内才是固定的，所以被称为准地租。地租和准地租是支付其它要素的报酬以后留下的余额。有这样的情况，即使付给它们的报酬得多，它们依然可以在它们偶尔被雇佣的地方加以利用并且能够在综合成为“固定要素”的短期内继续使用。它们能够得到高于它们的最低要求的报酬，原因是竞争的存在。从各个企业来说，一切报酬都是必要的。这样竞争使得固定要素能够占有因需求增加而产生的全部剩余。当相关的工业结合为一个垄断组织时，剩余也就消失了。然而剩余的再分配并不影响资源的最适度利用，相反却是完全竞争的自然结果。如果垄断组织只以剩余不付给固定要素为目的，则资源还是会得到最适度利用的，然而，要其放弃追求最大利润是不可能的。从社会来看，对固定不变的要素的全部报酬都是不必要的。

以上提到的只是生产要素的卖主所获得的剩余。勒纳认为全部分析可以依照完全对称的方式应用到任何物品的卖主

方面。购买者对一宗货物必须支付的价格小于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他就取得了剩余。然而,只有当交易由购买者负担的全部赋税都可取之于剩余,这个要征税的才会继续进行下去。赋税大于剩余,将会妨碍交易并毁灭剩余,为社会带来损失,因为到底没收到税。赋税可以由买卖双方共同负担,这会使上述现象大为减少。但只有在剩余总额大于赋税的场合,交易和剩余的生产才会继续进行。在赋税是必要的场合,个人所得税好象是危害最小的,这在减少收入或财富或花费对社会是可取的,累进所得税妨碍危险投资的影响被人们夸大了,因为高收入很少是工作的结果,大部分来自财产的收入。

勒讷指出,上面讨论的虽然是同一时间可以获得不同货物的情况,然而它对不同时间可以获得同样的工艺品也是完全适用的,只需采用适当的利息政策加以调节。在集体主义经济中,当局规定利息政策之前要先决定一个价格政策。政府必须通过调节消费与投资来防止通货膨胀和失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过一个机制往往会达到就业的均衡状态,通货膨胀也会自动停止,在这种均衡状态中,利率、投资率与消费水平的调节,可实现资源的充分就业。由于就业决定于投资、投资决定于利率,利率决定于灵活偏好和货币供给,所以这个机制是这样的过程:(1)不是充分就业,劳动价格下跌;(2)所有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按工资下降的同样比例跌落;(3)产品的价格按同样的比例下跌;(4)货币需求下降;(5)导致一些人放款;(6)利率下降;(7)投资增加;(8)更多的消费和创造更多的收入和就业。整个过程也可以倒过来进行。如果总需求的增加超过了充分就业所必需的,这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并依此过程的顺序达到直接减少收入和失业。然而这个机制是不大靠得住的,八个步骤中的每一步都可能由于障碍而失去作用,因而会出现失业、通货膨胀和商业循环。

五、统制经济的调节手段——机能财政

勒讷认为,内债数额大小是相对不重要的,只有外债才象

私人债务一样使国家贫穷;赋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筹款,而是使保留在纳税人手中的钱比较少些,因政府可以用印钞票的办法满足它所需的一切款项;借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筹款,而是要使公众持有更多的公债和比较少的金钱,并且这将会降低政府公债按货币计算价值从而提高利率。消除了以上问题的认识中的偏见,在统制经济中,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征税和花费、借债和贷款、购买和销售这六个财政手段,有效地影响消费和利率,从而完成对投资和就业的调节。政府应力图使公共和私人花费的边际收益相等。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需求是根据这一考虑规定的,即增加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减少就会导致失业。总需求的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的不断调节也是最好地利用资源所必需的。用于生产各种不同产品或用于不同投资的一些资源之间的调节是靠前述第一个规则进行的。整个消费和整个投资之间的调节是靠政府的投资政策实现的。这个投资政策通过利率来制定,而利率又是靠政府的借贷来调节的。政府用在不同目的上的花费应当尽量调节,以使各种不同用途中的 msb 都相等。同样各种不同的赋税的 msc 也必须相等,从而使纳税人所受到的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最后,政府的和私人的花费之间的调节,必须以这两方面出的 msb 相等为目标。这种计划虽然以预算不平衡为代价,但却有趋向平衡的长期趋势。这种的靠机能财政调节的方法,可能会受到商人方面极力维持平衡预算的偏见的压力,但这比采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触及他们的腰包容易接受。

六、统制经济的对外贸易

对于统制经济的对外贸易,勒纳认为,没有必要为了隔绝外部扰乱而放弃对外贸易的利益。统制经济至少能象其它经济一样充分地获得对外贸易的利益,这一点也不需要同其它目的发生冲突。这要求宁可使用补偿手段也不为了经济中某一

局部利益而对贸易施加任何限制。如果统制经济想利用它的垄断力量剥削同它进行贸易的国家，它征收适当的进口税和出口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时进口税和出口税的理想值得进口货供给弹性的倒数等于出口货需求弹性的倒数。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对外借款和贷款。统制经济的外汇率应当从属于维持充分就业和可以诱致值得期望的投资水平的利率，当求过于供时将汇价提高，当供过于求时将汇价降低。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毕晓光　撰

作者介绍

勒纳，(1905—1982)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福利经济学派认为，分配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不属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效用只有高低之分，不同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是不科学的。个人是他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就是各个组成成员的福利的简单总和。如果有一些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任何人的境况变坏，那么整个社会的福利就增加了。新福利学派一般认为自由竞争能够达到最福利的理想境界，但完全竞争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增加社会福利。勒讷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他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的统制经济。勒讷的主要著作有：《统制经济学》(1994 年)；《就业经济学》(1951 年)；《经济分析论文集》(1953 年)；《价格稳定时期》(1972 年)；《MAP—市场反通货膨胀计划》(与 D·科兰德合著，1980 年)。

[美]里昂惕夫，瓦西里
Leontief, Wassily

投入产出经济学
Input—Output Economics (1966)

英文版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6 年出版，中译本由崔书香译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全书计 308 页。

本书是里昂惕夫的一本重要著作，共收集了他在 20 多年中发表的 11 篇论文。作者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实际意义和理论结构，特别介绍了这一方法的广泛应用价值。本书用代数学和其他数学方法对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作了系统的阐述。既提供了方法的介绍，又进行了理论的总结。本书主要论述了以下 4 个方面的问题。

一、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这一部分包含 4 篇论文："改进经济预测的建议"；"投入产出经济学"；"工资、利润、物价和捐税"；"发展的结构"。这一部分不涉及投入产出方法的技术性问题。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可以描述为一个由许多性质相异，却又彼此相互依赖的部门综合而成的大体系。里昂惕夫在对国民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经济中任何一个方面产生的自发或外来

变化，都会涉及到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其他部分，哪怕这些部分所处的地位十分偏远。这种经济上的连锁关系实际上反映着整个经济技术上的结构。在了解了事情的影响是怎样通过把整个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各种关接链，一步步地传输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全过程之后，这种远距离作用是可以认识的。在这方面，采用一种宏观的数量比率表，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详细地从数量方面了解整个经济的内部结构。这种被人们称为"投入产出表"的比率表格，最出色的功能在于它可以把事件的全部间接影响分解为在各个中间环节上的具体影响，并进行准确地度量。这种逆流溯源的工作方法，虽然工程异常巨大，却能把一切隐藏在各级循环中的细微影响却暴露出来。由于该表格中的一切数据都来自于对部门的直接调查统计，因而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建起了一座贯通理论和事实的桥梁。

投入产出法的巨大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矩阵的形式，来对经济体系中直接间接的内部交易进行解剖和理论处理。有了投入产出矩阵，任何最终需求一旦确定，都能反过来计算出每个部门为满足该产出计划而对其他部门将提出的投入需求。这里包括了所有的间接需求和最终需求。这样，就能为人们对经济体系的有目的的改造提供有效的预测和规划工具。

里昂惕夫还在论文中对成本——供给，工资——物价等有着复杂联系的问题，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了分析。例如，一个部门的工资增加10%以后，整体物价与生活水平可能会发生多大程度的波动？一个部门产品的成本变动10%以后，将会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什么变化？此外，作者在"发展的结构"这篇论文中还用这一方法对美国、以色列、埃及和秘鲁四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作了典型分析。研究表明，投入产出法能够根据国内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基本构成来预测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二、里昂惕夫之谜——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这一部分包含两篇论文："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

地位的再审查";"要素比例和美国贸易结构: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文章从经典理论和统计实践两个方式,描述了如何使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对外贸易结构。并且从中导出了一些出人意外的结论。

如前所说,投入产出表依据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估计出单个部门产量的增减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也可以用来分析部门在一定生产要求下对资本的需求量。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劳动,对它的需求也不难用投入产出表作出分析。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它的生产能力与其出口生产结构,决定了它必然拥有特定的资本/劳动比。因此,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不难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美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它在产业结构上自然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按照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美国当然应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扬己之长,制人之短。经济学界一向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是,里昂惕夫用投入产出法分析的结果,出人意外: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不是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恰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这一现实与人们原有的观念相反,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作者分析后认为,产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极高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了美国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力相对不足的经济背景下本来应有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一设想,里昂惕夫仔细考察了投入产出矩阵中的各个系数,从中确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依存关系。各系统客观地给出了各部门单位产出所耗用的资本与劳动量,由此可最终得出美国外贸对资本和劳动的总消耗量。作者在论文中把"比较成本"说的经验分析和投入产出的数量分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篇论文曾引起过广泛的影响。

三、投入产出方法

这部分的2篇论文:"投入产出分析";"美国经济的结构"。

前者是一篇技术性文章，对投入产出法的基本理论基础及其简单应用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本书中第一次用数学语言表达其思想的论文。后者用前一篇文章所介绍的方法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

里昂惕夫在此对投入产出法的中心：投入产出表及其对应的矩阵元素，投入产出系数的经济意义作了介绍。

部门间的依赖关系，可以按是否考虑时间滞后效应，或称为速率的影响，而分为静态投入产出与动态投入产出两种体系。里昂惕夫对这两种理论的异同和动态从静态中分化出来的原因分别作了介绍。他认为，根据数学原理，矩阵与线性方程组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此，部门间联系平衡关系可以用线性方程组来表达。同时，通过求解这一系列的方程组，可以为规划经济结构的变动提出重要的依据。一般的静态与动态投入产出法都不考虑资本的闲置问题，如果采用新的分析方法，把闲置资本作为一个动态因素放在投入范围内考虑，就使简单的投入产出体系变为一个线性规划模型。作为一个具体应用的实例，里昂惕夫选择了一个包括 81 个部门的美国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并详细介绍了如何应用这一工具来分析美国经济结构。他指出："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所有可能的相互关系，都可视为矩阵代表中一个单一大方程组的通解的一些特例"。方程的系数就是投入产出系数，它们回答了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比例问题。按照计划规定的最终需求，解方程组就可得出要求各部门提供的产品量，这一点的在配备了计算机的今天并不会有什么困难。

四、裁军对经济的影响

这部分包括 2 篇论文："裁军的经济影响"；"削减军备对各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影响"。作者试图通过投入产出法来计算裁军将会引起的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间的流动和就业率的涨落。

军费支出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它对整个经济的兴衰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章举用了8张表格来说明，一旦费用支出由军用转到民用之后将会产生的后果。这对政府制订财政措施有重大意义。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如果在削减军备的同时增加非军用需求的话，能否在保证美国经济总就业水平不下降的同时，使各部门、各地区的就业克成和就业分配不至发生太大的震动。这一点，对于政府同时处理好裁军和稳定经济的双重问题，是一个重要决策依据。

里昂惕夫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多地区分析法，避免了孤立地进行区域研究时经常会出现局部与整体在各项投入产出流量上的不平衡。使用该方法能成功地描述如果等比例削减军用需求和增加非军用需求，将使产量和就业人口在部门与地区间的配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一文则以数学形式介绍了多地区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是为了在有限的信息，有限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不充分的信息作出较准确的分析而设计的。新方法把总体的均衡体系分解成一组普通的局部部门投入产出体系，而这些投入产出体系又在一个单独编制的地区间关系体系内连接在一起。在数学方法上，该方法使用了一些复杂的方程体系和线性规划原理，在参数估计中还使用了统计中的点估计方法，技术上有一定难度。

本书最后设有一个附录：一个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为缺乏基本数学知识的读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徐 坚 撰

世界经济的未来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1977)

英文版由里昂惕夫与卡特和佩特里合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中文本由梅明等译出,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共254页。

就象本书副标题"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所示,本书里昂惕夫等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完成的一份提交给联合国的有关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的研究报告。作者在"导言和概要"中指出:本书的"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未来的经济增长与未来的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些经济 包括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与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有关的污染程度,以及消除污染政策的经济影响。这项研究所特别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现有的和其他的发展目标是否与可供利用的资源及其他理分布相一致。在某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所期望的增长是否应减缓? 愈来愈引起关注的环境污染和整个环境保护问题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并且要求对各国和国际的各种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审查?"

全书除:"导言和概要"与"技术附录"外,共有14章。可以分为两部分:对未来的估计;世界经济发展及其含义。以下据此对全书内容作一介绍。

一、对未来的估计——全球模型的基本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本书的第1-5章。主要内容包括一个由世

界投入—产出体系组成 的全球模型，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未来所作的研究和预测。

这个全球模型的范围广泛而且详尽。它根据 1970 年的人口数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世界经济分为 15 个地区：4 个发达市场经济地区（北美、西欧的高收入地区、日本和大洋洲）；2 个发达的中央计划经济地区（苏联和东欧）；6 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地区（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地区、低收入地区、中东和非洲石油生产地区、亚洲的低收入地区、非洲的干旱地区和非洲的热带地区）；1 个中央计划经济地区；2 个中等收入地区（西欧的中等收入地区和南非）。

第一个地区按 45 个经济部门来论述。在农业方面，分析 4 个专业部门，即畜产品、谷物、高蛋白作物和根类作物生产部门；在矿产资源方面，特别着重分析铜、铝矾土、镍、锌、铅、铁矿石、原油、天然气和煤；在制造业方面，分为食品加工、初级金属、纺织、化肥、各类机器和设备等 22 个部门；在第三产业方面，分析处理了公用事业和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运输业和通讯部门。此外，还分析了 8 种主要的污染物质的扩散活动和 5 种消除控制污染的活动。

尽管对 15 个地区的情况是分别进行分析的，但全球模式通过一个复杂的关联机制将这些地区联系在一起。为此，全球模型分析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变量，如约 40 种货物和劳务的进出口、资本的输出输入、各项援助和对外利息支付。全球模型还对技术、生产成本和相对价格的未来变动进行了详细分析。

由此可见，全球模型尽管是为研究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它所考虑的只是那些与污染、矿产资源开采和粮食生产有关的政策，但由于它具有以上的特点，而且研究范围也从环境方面的问题扩大到了一些其他经济发展问题，诸如经济结构、国际收支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等，所以，里昂惕夫等认为，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一般经济模型，可以用来分析、研究和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

关于使用全球模型来对全世界的资料进行汇编和计算，里

昂惕夫等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对每一个地区 1970 年这个基期年的结构系数进行估计；二是对 1980 年、1990 年和 2000 年时这些基期年系数的变化进行预测。

二、世界经济发展及其含义——增长条件的分析预测

第二部分包括本书的第 6－14 章。在这一部分里，里昂惕夫等确定了可供选择的世界经济发展基本方案，用全球模型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条件进行了分析、预测、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为了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条件的进行分析、预测、首先必须确定发展方案，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现在起到 2000 年的增长速度和到 2000 年的增长目标，以此作为对环境和其他经济变量进行计量分析的基准。

他们认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方案是采用 1970 年 10 月联合国制定的第 2 个发展 10 年(1970－1980 年)国际发展战略中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总产值平均增长率应达 6%，人均总产值增长率为 3.5%，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2.5%。尽管国际发展战略没有规定发达国家的增长目标，然而，如果根据这些国家过去的长期增长趋势进行推算，可以得出它们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4.5%，人均总产值增长率为 3.5%。若按这样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到 2000 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人均总产值水平的差距(在 1970 年平均为 12:1)不会开始缩小。这是因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值增长率比发达国家的略快一些，从而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总产值的比重将有所增大，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过高，人均总产值不一定会比全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得更快。

由于这个方案违背了联合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的精神，因为宣言要求纠正世界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状况，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所以，里昂惕夫等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方案，那就是：发展中国家总产值增长率由 6% 提高

到6.9%，人口增长率由2.5%降低到2%，人均总产值增长率相应地由3.5%提高到4.9%，而把发达国家的总产值增长率由4.5%降至3.6%，人口增长率由1%降至0.6%，从而使人均总产值增长率降到3%。这样，到200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人均总产值水平的差距将从1970年的12:1降至7:1，收入差距大约缩小一半；而到21世纪中期，收入差距可望完全消灭。他们认为，这个方案符合了联合国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精神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

那么，发展中国家4.9%的人均总产值增长率能否实现呢？里昂惕夫等用全球模型，通过对粮食和农业、矿产资源、消除污染的经济成本、投资和工业化、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的内容等一系列增长条件进行投入一产出分析，得出结论："持续经济增长和加速发展的主要限制，在性质上是政治的、社会的和制度的，而不是物质的。在20世纪内对发展中地区的加速发展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物质障碍"。具体结论包括：

(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是个最迫切的问题，可以通过开发尚未开垦的大量土地来扩大耕地面积，也可以通过使生产率提高一倍至两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它的实现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实行重大政策措施和进行社会的、制度的变革。

(2)矿产资源的供给问题在本世纪内不构成绝对的稀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开采产量较低、成本较高的矿藏和集中勘探新矿藏的问题。

(3)污染不再是一个无法控制的问题。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已有可能把污染扩散程度控制在目前的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并不普遍，因此消除污染的活动主要限于某些工业区和城市固体废物的处理，消除污染和总费用不会超过生产总值的1.5－2%，这说明污染问题不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4)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得到加速发展，必须把生产总值的30－35%乃至40%用于投资。为了使投资率达到这个水平，需要在税收和信贷方面采取重大的政策措施，以便增加公共投资

和公营部门在生产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为了增强这些政策的效果，这需要采取措施使收入分配较为公平。伴随这些政策的实施，自然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另外，还应引进国外的投资资金，但这与国内资金相比则是次要的。

(5)加快重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从一个区域来看是正确的、可能的，它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间实行工业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轻工业仍将是个领先部门，它为发展中国家大大增加制成品的出口提供了基础。

(6)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国际收支方面的困境。一是，相对制成品的价格而言，稳定地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尽管这会因为技术上的因素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使得初级产品的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成本，以抵消提价获得的好处，但由于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间矿产资源分布不均匀，这种价格变化会有利于一些地区，而不利于另外一些地区，为此，要制定专门方案，建立专项基金，为净进口地区提供财政补贴，以减少收支不平衡；二是，减少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制成品的依赖程度，增加它们的制成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此，要减少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三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采取措施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形成更佳的结构，减轻发展中国家由于外国投资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当然，资本流动与商品贸易相比，则是次要的。

总之，就象里昂惕夫等所说的那样，"为了保证(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必须有两个一般的条件：第一，在发展中国家，要在社会、政治和制度三方面进行影响深远的内部变革；第二，在世界经济秩序中要进行重大的变革。要使加速发展能大大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很清楚，单有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够的，但是，如果它们能齐头并进，就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严　援　撰

作者介绍

里昂惕夫,俄裔美国经济学家,投入产出法的创始人,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30、40年代,他工作的重点是编制美国的投入产出模型,并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50、60年代,他以投入产出分析法为工具,深入研究生产结构、动态分析、计划与预测、地区间经济关系、外贸等问题。70年代以后,他热衷于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问题,设想并着手把单个投入产出模型归并成整体、跨产业、跨地区的整体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模型的规模也日趋扩大。投入产出法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经济数字模型。里昂惕夫著述甚丰。主要专著有:《美国经济结构:1919 - 1929》(1941)、《美国经济结构研究》(1953)、《投入—产出经济学》(1966)、《经济学论文集》(1966)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与卡特和佩特里合著,1977)等。

[美]刘易斯,威廉·阿瑟
Lewis, William Arthur

经济计划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1949)

这部著作是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大学执教时受费边社委托而写成的,旨在说明1948年夏季英国人士特别感兴趣的若干经济难题。在许多同名著作中,本书出版最早,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非议。英文版由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49年初版。中译本由丁忱译出,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全书118页。

全书共有9章:为什么计划?公平分配;货币;投资;对外贸易;移动性;工商业的社会控制;国有化;如何计划。此外还包括2篇附录:关于经济联盟;关于落后国家的计划。

一、计划与放任之争

刘易斯在卷首就提出,计划与放任之争,并不是经济生活中有秩序与无政府之争。放任主义者和计划主义者都是从生产和分配必须加以控制使之为社会目的服务这一命题出发的。争论之点仅仅在于:这种控制究竟有多少可以是无形的(即市

场行使的控制),有多少必须是有形的(即国家所组织的控制)。因此,有关计划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计划。

他认为,有形控制和无形控制各自都有优缺点。

放任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端是:收入分配不公平;价格机制不能使工资关系合乎人道;经济过程具有不稳定性;不能有效地进行对外贸易;难以加速社会生产资源的移动;竞争导致大量的经济浪费。

然而,在完全用命令实行的计划下,计划生产难以适应自由消费;妨碍工人的职业选择自由和资源的自行调节;计划人员不能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有全面和长远的了解;计划实施不灵活,调整不及时;抑制企业对新东西的探求;庞大的计划机构本身形成资源浪费;缺乏民主性和监督。

刘易斯所主张的是"通过市场的计划"模式。他说:"我们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保存自由市场,由市场制约企业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国家则控制市场,把计划扩大到自己需要的范围,但是它必须以调节市场为手段,而不是以命令为手段实行计划。

二、资源的移动性

关于资源的"移动性"和"固定性"问题的分析,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也是刘易斯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的基础。他将计划与放任的作用范围、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都归之为资源的移动性大小:

(1)国内供求的矛盾。他认为,供给不足实际上是资源移动性不足的结果。如果具有完全的移动性,而且通货的数量恰如其分,那么,一部分经济中的供给不足必然为别处的供给过多所平衡,供求矛盾也就必然会迅速地消失。因此,消灭短缺和供给不足的最快方法是集中解决资源移动性不足的问题。

(2)对外贸易的逆差。他认为,输出的不足部分地是由于

通货膨胀把资源保持在为满足国内 需求的生产之中。如果资源具有完全的移动性，那么，紧缩通货所解放的资源将会流入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出口工业。相反，在缺乏移动性的情况下，紧缩通货的结果是造成失业群，那就不得不用命令来调配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了。

(3)就业机会的提供。他认为，消灭失业的根本途径也在于消灭资源的移动性不足。在缺乏移动性的情况下，那些需要工作的人同最适合的工作相隔离，劳动力缺少与劳动市场的膨胀相并存。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大增加资源的移动性，摩擦性失业也就不复存在。随后再扩张货币流通，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全消灭失业。

(4)设备更新后的过渡。他认为，随着设备不足和更新问题的解决，许多现有的职业将变成多余，除非工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找到新的工作，否则他们会试图抵抗一切设备更新和技术变化，从而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处于较低的水平。

因此，刘易斯强调指出，全部经济问题的真正困难所在，是资源的固定性。它使放任主义者指望市场能在一夜之间使供求平衡的企求成为泡影，使命令和控制(物价管制、限额配给等)成为必要，使国家难以靠物质引诱来使供给适应市场的需求。然而，他认为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得寄希望于资源移动性的增加。他写道，如果计划人员的第一个任务是保证适当的货币流通量，第二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移动性，那么一切都容易做到：短缺消失，贸易平稳，就业充分等等。但如果其中一项有缺点，计划人员就会陷入物价管制、许可证和命令调配的混乱之中，这样就会轻易地失去许多效率和自由。总之，移动性是经济计划的关键，而促进移动性的方法是计划工业的布局、便利技术的获得、计划工资结构、以及有选择的移民。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芦　潮　撰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1954)

这篇重要论文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石之一，发表于《曼彻特学报》1954 年 5 月号。后为当代经济学家广泛引证。刘易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两个有名的经济发展模型：第一个是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机制及其运行问题的封闭经济模型；第二个是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确定问题的开放经济模型。

现根据该文的理论叙述，并适当结合刘易斯后来为答复批评者而写下的另外三篇论文："无限劳动：进一步的说明"、"对无限劳动的反省"和"二元经济的修正"，将刘易斯的古典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介绍如下：

一、封闭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

刘易斯的分析有三个基本假设：(1)劳动的无限供给，即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量如此之多，使得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者是负数。甚至在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的时候，劳动的供给仍然超过需求。(2)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以传统方式为基础的农业部门。(3)工资水平不变，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取决于

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

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因而形成剩余产出。如果工业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则该部门资本存量及其对劳动的需求将由此而提高。只要农业部门尚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个过程将一直继续下去，一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被吸吮尽为止。这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及工资水平线将由水平直线变为具有正斜率的曲线，工业劳动者的工资和农村劳动者的收入都将随投资增加而逐步提高，工农业趋向均衡发展，国民经济结构趋向逐步转变。这就是有名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口流动模式。

在这过程中，刘易斯强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产出剩余越多，资本形成越大，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就越快，经济发展进程也就越迅速。因而他说："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过程。"

那么，如何借助于传统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向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就业转移，来提高储蓄比率呢？刘易斯提出了几种方式；第一，有利于储蓄阶级的收入分配政策。由于地主的收入主要用于奢侈性消费，而生产性投入主要来源于利润，因此应该把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全部成果都转化为超额利润。第二，直接利用传统部门中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创造资本。也就是说，可以在不必增加其他要素或稀缺资源，也不必减少消费品产量的情况下创造出资本品。第三，增加货币供给量，通过扩大信贷的办法直接利用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和其他闲置资源来生产资本品。

当然，经济发展会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于工业资本较小，无力吸收全部剩余劳动，因此无论需求怎样扩大，总能在不变工资的水平上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这时会出现一个利润急剧增加、资本加速积累、剩余劳动迅速被吸收的时期。当资本增长赶上劳动供给的时候，经济发展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那时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很低，工资也

不再固定不变，技术进步的利益也不全部归于利润，两个部门的收入将随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二元经济也逐步变为同质经济。

刘易斯认为，上述两个阶段的交接处是一个转折点，问题在于有可能在这个正常的转折点尚未到达之时，就出现过剩劳动力转移过程的中止。阻碍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非经济因素，例如自然灾害和社会变革等；另一类是经济原因，例如工资水平提高、贸易条件变化等。因此刘易斯主张通过增加农业税或提高工业品价格等方式，强制性地把农民得到的额外收入重新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形成资本。

二、开放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

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一旦赶上劳动资源的供给，该国的剩余劳动就趋向于枯竭，封闭经济中的发展过程也就必然停止。但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其他国家仍然有可能存在着丰富的过剩劳动，那就可以通过移民、资本输出和国际贸易等形式，继续谋求实现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就移民而言，大量非熟练劳动的国外移民的流入，可以丰富本国的劳动资源，并抑制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保证利润的增加和资本的积累。但是大量移民一般会遭到流入国工会的抵制，因而存在很大的困难。

资本输出一方面固然可能因减少输出国国内固定资本的形成，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却可以因此而抑制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使利润和资本都得以增加。国内利润的下降或国内工资的上升，是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国外劳动资源丰富、投资环境良好、投资效益较高等综合条件，是资本输出有利性的保证。

资本输出有两种形式：一是投资、二是贸易。它们对二元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竞争类型及贸

易条件的状况。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中，国际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成败关键在于贸易条件对自己是否有利。刘易斯认为，贸易条件是由双方各自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发展中国家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加工产品相交换时，由于后者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贸易条件将不利于前者。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变，即使其他初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贸易条件仍然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中。那是因为其初级产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总是以降低产品价格的形式转入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提高本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改变其不利的贸易条件。

鉴于此，刘易斯推导出关于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独特见解。首先，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摆脱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注意开发国内市场和发展民族工业。其次，他强调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重视开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市场。第三，他认为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战略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才能既改善封闭经济中的贸易条件，又能改善开放经济中的国际贸易条件，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第四，他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保护贸易制度和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

（中文版可参见《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出版） 芦 潮 撰

经济增长理论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1955)

该书被誉为“第一部简明扼要地论述经济发展问题的巨著”，共有 7 章。作者刘易斯在该书中全面讨论了决定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不仅涉及到资本积累（第 5 章）、技术进步（第 4 章）、人口增长（第 6 章），而且还研究了自然资源和人类欲望

(第 2 章)、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第 3 章)、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第 7 章)等问题。原书由英国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1955 年出版,中文本由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出版。

刘易斯在导言(第 1 章)中指出:一国人均产值的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后者可以分为二个层次:一层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包括三大因素,即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资本的积累;另一层是引起经济发展的间接原因,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等。现根据这一区划,将刘易斯的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理论和方法介绍如下:

一、决定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

1. 经济活动,即人们寻求和抓住经济机会,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的努力。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欲望强度和努力程度是不同的。据刘易斯的分析,原因有三个:

第一,对物质财富及其获取努力的评价不同。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禁欲主义宗教礼义和信念的思想束缚,由于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紧密联系,由于缺乏对更高层次物质消费的了解和知识,由于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的影响,所以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评价并不高,追求的欲望也就很弱。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作引诱和工作压力,缺乏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因此人们对获取物质财富所要付出的努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第二,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同。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是互相依赖的,前者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式,后者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自然资源的丰歉是相对的,因为其价值取决于它的有效性,而有效性又是随人们的需求状况、技术变化或新资源发现而不断改变的。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发展主要

受制于自然资源的状况,其中地理位置的易近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三,经济制度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愿望的鼓励程度不同。这是决定经济活动、知识增长、资本积累三大经济发展因素能否正常发挥作用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2. 知识增长。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两类,刘易斯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前者的增长、运用和生产。

第一,知识的增长。刘易斯认为,文字发明和科学方法在知识增长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将历史划分为无文字时期、有文字而无科学时期、科学时期。在第二个时期,知识增长主要依赖于人们的哲学态度和社会阶级结构。而在第三个时期,技术发明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没有必要和条件化费过多的力量进行纯科学研究。它们可以直接利用引进发达国家已有的科技研究成果,同时需要研究一些适合自己国家和资源结构的技术问题,尤其应注意开发推广有利于吸收过剩劳动力、节约资本量的劳动密集型技术。

第二,知识的传播和运用。影响知识传播和运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们对新知识的态度,二是社会能否对此提供合适的报酬。这就需要一系列社会、经济、技术条件。

第三,教育计划和知识生产。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迅速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必须注重人力投资。具体地说,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实现教育战略重点的转移,即从以提高识字率和改善消费结构为目的的消费性教育,转到以中等教育、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为主的生产性教育。二是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三是通过技工学校、学徒制度和在职短训等方法,提高农民工人的素质。四是迅速有效地培养管理人才。

3. 资本积累。这个问题可以从经济发展对资本需要量和结构的要求、资本来源、投资过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资本需要量和结构要求。刘易斯基于经济发展要求储蓄率从国民收入 4% 或 5% 增加到 12% 到 15% 这一基本判断,再根据资本—收益比率来估算资本的需要总量。发展中国

家的资本品成本、资本使用效率、技术改进和知识增长速度、投资环境、人口压力、经济结构、资本短缺程度等，都会影响资本—收益比率和所需资本量。

第二，储蓄来源和资本供应。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资本供给不足，因此鼓励储蓄事关重要。由于企业利润（特别是非农资本主义企业）几乎构成经济发展唯一的储蓄来源，因此储蓄的增加过程就是资本主义部门相对地扩大，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传统农业部门中“隐蔽性失业劳动”的存在，可以使资本主义部门在低水平工资不变的情况下获得劳动的无限供给。此外，还必须强制性地鼓励农民储蓄，积极争取外国资本。

第三，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条件和投资过程。刘易斯认为可以通过“有限责任制”的方法，利用现代金融体系，动员千百万人参与公司的投资冒险活动，而不必承担全部风险。政府则应建立特殊的财政金融制度，填补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缺口。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往往会遇到需求不足的瓶颈障碍。因而必须开拓国外市场，并使各经济部门的发展保持一个合理的动态平衡结构。

二、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对经济发展进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刘易斯进而指出，这三大经济发展因素作用效果的好坏，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制度结构，经济制度是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要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必须有经济自由增长的制度环境。其中包括(1)个人拥有改变社会地位和职业的自由，拥有使用资源和贸易竞争的自由。(2)对社会的上下升迁取消种族、宗教信仰、家庭出身等各种限制。(3)个人主义与集体团体精神相结合、政府干预与个人自由竞争相结合。

刘易斯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

双重制度结构。因此有必要对其利弊详细的分析,并对现存制度的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例如,改造原有的宗教教义,彻底消除奴隶制经济的残余,调整家庭结构和缩小家庭规模,变革传统的农业组织制度,在技术、市场、财政等方面保护和扶植家庭手工业。从而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促进资本形成、技术创新和现代经济发展。

此外,刘易斯还研究了制度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两者是相关的,互相促进的。但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制度对经济变化的作用效果不一样。它取决于制度能在多大范围内给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以激励、组织协调和经济自由。由于制度的演变是一个自我增强的螺旋式过程,因此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持久上升的。在经济增长上升或下降的转折点上,制度通过各种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二,社会制度的变化具有周期性特点,它与经济增长的加速、停滞、下降、回升交替性变化过程相呼应。关于制度周期性变化的理论有"生物学周期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集团理论"。然而刘易斯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并不都是由制度演变而引起的,必须区分由于改变经济机会而引起的变化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导致的变化。

三、人口、国际经济关系、政府职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 人口增长阶段、人口适度规模、人口职业结构。刘易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导致较高的人口赡养率,从而抑制了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可能。填补高出生率与低死亡率之间非均衡缺口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根据刘易斯的分析,判断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否过剩,必须联系该国的资源条件和产出情况。只有当人口规模的任何变动都不能增加其总产出时,才能称为人口过剩。不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劳动,但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

输业等部门还相当弱小，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就业分布结构将发生有利的变化。

2. 国际经济关系。刘易斯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能促进合理的分工，扩大专业化协作，并促进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不发达国家应充分利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存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有利条件，通过压低工资、实行各种贸易补贴、通货贬值等手段，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并通过适当的贸易保护措施（如关税），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扶植国内的新兴工业。

3. 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刘易斯认为，正确认识和划分政府对经济调节的职能范围，是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关键。政府的合理职能行为有：(1)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对外联系；(2)通过公共舆论促使民众支持经济发展；(3)建立有利于发展的各种经济制度；(4)通过经济调节机制使资源利用符合全社会利益；(5)通过收入政策处理好收入公平与高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6)通过收入政策处理好收入公平与高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6)通过银行体系调节货币供应量；(7)通过价格控制和外汇储备，减少国内外经济波动的冲击；(8)通过各种财政货币手段更多地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9)通过财税金融手段影响投资水平。

在此分析基础上，刘易斯提出，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十分不完善，市场机制存在种种缺陷，因此单靠传统的经济放任不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现有资源。他主张：第一，不发达国家应该有发展计划，但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第二，制定计划时特别要注意资本、技术、管理、熟练劳动和外汇的短缺以及非熟练劳动的过剩问题，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第三，执行计划时要从实行出发，并根据经济变化而对原计划作出修改和补充；第四，政府部门要加强同私人部门的合作，共同实现经济计划。

最后，刘易斯特别提醒要改变阻碍经济发展的政府行为，如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官员受贿；助长经济剥削；在国际交往方面设置阻碍；忽视公共服务事业；过度的自由放任；过多地控制企业活动；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过大和大量耗资发动战争。

（据上海三联书店中文版）　芦　潮　撰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1978)

本书主要根据刘易斯1977年3月15日和16日在普林斯顿大学詹韦讲座上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中心作的两次演讲写成,是刘易斯30年来有关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的归纳、总结和提炼。将历史学、经济学和统计学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本书英文版1978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乔依德译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共54页。

全书共11章:导言;世界的划分;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累积的力量;商品政策;制造业的兴起;对外资的依赖;国际经济的波动;债务的数量;经济增长的动力;跋。

刘易斯将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分为4个方面:世界分成初级产品出口国和制成品出口国;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发展。以下就四个方面对全书内容作一介绍。

一、世界是怎样被划分成工业国和农业国的

在本书第2章中,刘易斯认为,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发展

中国家开始参加世界贸易，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以前，世界贸易量很小，原因在于英、美、法、德等国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世界贸易扩大的前提——运输革命还没发生。

1850 年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这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挑战：或是仿效，或是通过贸易来推动自身的经济增长。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立即仿效，从而先后实现了工业化，但其他许多国家没有反应。由此，世界开始分成工业国和非工业国。刘易斯认为，许多国家之所以没有立即采用工业革命的各种技术，原因并不在政治方面，而在于经济方面：第一，由于"工业革命依赖于农业革命先期或同时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率的函数"，而这些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导致国内市场狭小，所以工业革命的进展就比较慢；第二，缺乏投资气氛。"西欧一直在造就资本主义的环境，这至少已有一个世纪之久，所以出现了一整代新人、一系列新概念、一整套新制度"，而这些在当时的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

当然，通过对外贸易也可能实现工业化。"因为贸易将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制成品的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便有可能实现，工业化也就能由此开始。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例子。"可许多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并不是由于未能扩大国际贸易，而是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

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

在第 3－6 章中，刘易斯详细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的地位，是由于其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的地位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率低，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低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是无限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提高出口商品的生产率来改善

不利的贸易条件,因为这样做只不过降低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只有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的生产率才能够改善不利的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粮食的低生产率(这是绝对生产率)决定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其他农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只不过决定在许多农作物中生产什么而不生产什么,对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决定不起根本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上存在很大差别,即前者生产要素价格高而后者生产要素价格低,国际贸易给它们带来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是,贸易使发达国家当初获得很高的人均收入,带来了对制成品的大量需求、进口替代的种种机会和迅速的城市化,同时国内储蓄也很高;而别一方面是,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状态。

尽管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不利,但国际贸易还是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扩大了对制成品的需求。但为什么它们仍没有实现工业化呢?刘易斯就此提到了三个对工业化起阻碍作用的因素:(1)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控制在外国手里,而利润恰恰产生在进出口贸易中;(2)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增加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对当地工业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3)这些国家政府被靠从事生产初级产品的大资本家和农场主控制,保护期既得利益。

发展中国针对贸易条件不利一点在进行两运动——要求达成各种国际商品协定和实现工业化以替代进口。刘易斯认为,利用国际商品协定企业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关键在于能否控制商品的供给,“十分不幸,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其供应量的商品,为数甚少”。对于替代进口的工业化,刘易斯认为,“如果70%的劳动力是以低生产率生产粮食的农民(只有微不足道的剩余产品),那么,国内制成品的市场就极其有限。当接近极限时,工业化的速度只能靠出口制成品维持。”但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开放,这只不过使其开始出口新的低工资商品。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不管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其贸易条件均是不利的,“之所以不利,是因为市场付给热带国家非熟练劳动力(无论生产什么)的工资是由低生产

率的粮食生产者来源无穷无尽这一情况所决定的。"所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办法,就是通过提高生产率、使低生产率的粮食生产者减少 50－60%。这样,就会改变热带国家的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并且提高传统的出口农产品的价格。这也会使农业有剩余产品,以维持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生产。从而这些国家就不会那么依赖其它国家提供资金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三、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在第 7－9 章中,刘易斯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情况。

刘易斯首先分析道,国际上资金的流动并不遵循这样的原则:富国贷款给穷国。19 世纪时,美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但前者是借款国,而后者却是贷款国。他认为贷款国与借款国之间的差别,是由各国城市化速度的不同决定的。"城市人口每年增长速度低于 3%的国家(法国 1.0%、英国 1.8%、德国 2.5%)给别国贷款,城市人口每年增长超过 3%的国家(澳大利亚 3.5%、美国 3.7%、加拿大 3.9%、阿根廷 5.3%)向别国借款。"而城市化之所以成为是否借款的决定因素,是因为城市化需要大量的钱,对这些钱的需要并不是由于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因为工业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很小一部分,归根结底是由于要兴建城市基础设施。

接着,刘易斯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并不是由于它们贫困,因为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需要借款。也并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储蓄。6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纯储蓄平均每年约为 10%,这与英国和法国 19 世纪 60 年代的储蓄率相差无几,而当时英法已是贷款而不是借款国了。""发展中国家依赖外资的最终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率高,间接的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城市化的增长率高(每年高于 5%)。"刘易斯强调,发展中国家依赖国外借款与

依赖外国经营管理技能是两回事。依赖外国经营管理技能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私人直接投资来建立外资企业。一旦发展中国家不再依赖外资企业后，但仍将依赖向外借款。因为，“城市化的迅速进行，使一个国家的资金短缺，而不是使它依赖管理技能。”

最后，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依赖外资有两个不利之处：一是，国际经济波动将通过价格传导和资金流动机制影响发展中国家，使其抵挡不了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二是，债务费用迅速增加，使其负担沉重。

四、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发展

由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出口制成品，只不过是从一种性质的依赖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依赖。所以，在第10章中，刘易斯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从历史上看，当发达国家经济扩张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向前发展；当发达国家经济萎缩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

刘易斯认为，这种依赖是与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之间差距的目标不一致的。因为，尽管从理论上讲，缩小这种差距的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发达国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实践中看，如果发达国家放慢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将放慢。

为此，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依赖性：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相互之间进行更多的贸易，而不至那么依赖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粮食和劳动力。它们可以组成关税同盟，从区域一体化中得到好处。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不必过多依赖出口，眼光应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的关键

是,突破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生产所受到的限制——50%以上的劳动力生产国内消费的粮食而剩余农产品很少,提高农业生产率。

最后,刘易斯结论性地写道:"总而言之,国际贸易在19世纪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但是,它本来的作用并非如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是技术变化,国际贸易是润滑油而不是燃料。达到技术变化的途径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者是互相依赖的。……促进经济发展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改变粮食生产的状况,使农产品有剩余,可以养活城市人口,因而为国内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奠定基础。如果我们能在国内进行这种变革,那么,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彭 城 撰

作者介绍

刘易斯,(1915—),美国黑人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刘易斯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1)在伦敦经济学院,主要研究一般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2)在曼彻斯顿大学,提出了古典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3)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重点已移向国际经济关系。刘易斯的主要著述有:《1919—1939年经济概况》(1939)、《今日经济问题》(1940)、《英国工业中的垄断》(1945)、《加勒比海地区的工业发展》(1949)、《经济计划原理》(1949)、《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经济增长理论》(1955)、《发展计划:经济政策的本质》(1966)、《尼日利亚经济增长的影响》(1967)、《经济发展的若干方面》(1969)、《热带贸易问题》(1969)、《欠发达国家与汇率稳定》(1978)、《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1978)、《增长与波动1870-1913》(1978)等。

[瑞典]林达尔，埃里克·罗伯特
Lindahl, Erik Robert

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apital (1939)

本书是林达尔的代表作，英文版由纽约 Farrar & Rinehart 公司 1939 年出版。中译本由陈福生、陈振骅译出，商务印书馆 1963 年出版。全书 299 页。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毕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即动态经济理论。林达尔在本书以后直至逝世所发表的论著，都没有离开这个主题，而只是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精炼和扩充。不仅如此，由于积级倡导建立一个所谓动态理论体系是林达尔在瑞典学派成员中较突出的特点，所以本书也是瑞典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甚至被认为是 20 - 30 年代瑞典学派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全书除序言和附录外，收集了作者在 1929 - 1939 年间所写的三篇重要论文，每篇论文经过重新整理后仍独立成篇，故全书正文共有三篇。各篇是按照与原论文写作时期的先后相反的顺序排列的，依次为：动态理论研究；利息率和物价水平；资本在物价理论中的地位。作者认为，以上各篇是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性质不同的论文，因此每一篇都可以单独阅读。但他同时又指出，由于各篇是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经济理论上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所以又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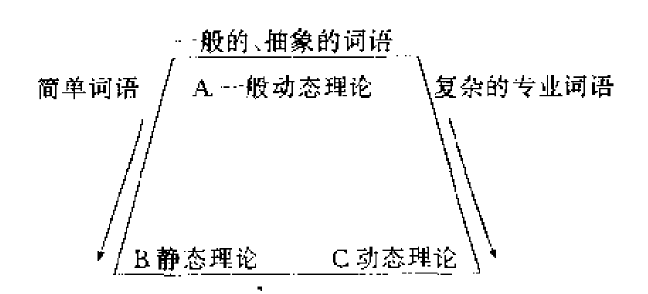
联系的整体。现根据原书的编排顺序，分篇介绍一下林达尔这部代表作中的理论观点。

一、动态经济理论

动态经济理论是林达尔经济理论的核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才形成和确立了林达尔在瑞典学派中的突出特点和重要地位。所以，尽管《动态理论研究》这篇论文是在其他两篇论文之后写成的，但为了强调它，作者仍把它放在本书第一篇来阐述。

林达尔首先论述了建立一般动态经济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终目的，不外乎在于说明过去的经济现象和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事件。所以，理想的经济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一切适用于处理历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即应该是一般化的理论。林达尔认为，经济理论的目标应以说明经济过程的发展为核心，而传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静态假设为出发点和前提的，它完全忽视了时间因素，它所运用的发展概念乃是不断反复发生的过程。林达尔由此感到，在变动和发展更加复杂和迅速、均衡经常受到威胁的现阶段，传统的静态均衡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失去了作为一般理论所应具有的特征和作用，必须用他所主张的一般动态理论取而代之。在林达尔看来，一般动态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对经济现象发展的研究，用数学术语来说，就是要借助于方程式，确定作为时间函数的变数数值，并以这些变数已知的原始数值和决定这些数值的变动情况为依据，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变动和发展。林达尔认为，一般动态理论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连静态问题也包括在内，可以把静态理论看成是动态理论在静止情况下的特殊应用，而一般动态理论在分析实际经济现象的变动和发展时的具体应用，可以说是在更特殊意义上的动态理论。这样，林达尔便得出了一般动态理论、

动态理论和静态理论这样三个相关的概念，并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下图表示：



与此同时，林达尔又强调指出，主张系统地说明经济理论必须从一般的动态理论出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静态理论的作用。他认为，对于讨论特殊和复杂的动态问题来说，静态假设仍不失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和不可缺少的辅助性分析工具，所以，大部分传统静态理论，都可以归纳到一般动态理论体系中去。

在讨论了建立一般的动态经济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之后，林达尔便对一般动态理论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论是长期的活动还是短期的活动，也不论是集体的活动还是私人的活动，都是为完成某些计划而进行的。在此，旨在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动态经济理论的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

1. 关于经济学家在阐明计划的原则和为实现计划所作的努力的结果时所需假定的技术情形、社会制度、心理状态的说明。

2. 经济计划的理论，论述一定时期所存在的计划的内容并说明修改计划所根据的原则。林达尔对这部分理论进行了较多的论述。他认为，经济计划的制定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目前和将来的经济活动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分析各种方案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因素，从中选出最理想的方案。

3. 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说明计划执行时经济发展的动

态过程。林达尔认为，一般动态理论注重时间因素在说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各种经济变量视为时间的函数，但并不把它们视为连续的时间的函数。因此，要说明一个大的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把发展分为若干个时期，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各个时期联系起来，求出总结果。这就是时期分析法。它是动态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

二、利息率和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

本书第2篇是林达尔1930年发表的《执行货币政策的方法》一文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在这里，作者从讨论货币政策的措施在物价管理中的作用的角度，专门阐述了他关于利息率和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放款利息率和消费品平均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瑞典学派创造人克鲁特·威克赛尔的物价累积变动理论的发展和若干修正。

林达尔关于利息率和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全部论述，是以下面的公式为出发点的。这就是：

$$E(1-S)=PQ \tag{1}$$

$$P=\frac{E(1-S)}{Q} \tag{2}$$

在上面两个式子中，E代表个人名义总收入，S代表个人名义总收入中的储蓄比例，P代表消费品（包括劳务）的平均价格，Q代表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量。（1）式叫做消费品价格基本方程式，意指个人名义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等于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数量与其价格的乘积。（2）式是直接从（1）式变换而来的，可叫做消费品价格变动条件方程式，它表示决定消费品价格的因素之间，即个人名义总收入，储蓄比例和消费品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对消费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依据上述公式，林达尔认为，物价水平的变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主要原因直接引起物价水平的

变动，然后方程式中的其它因素跟着变动，以求与新的物价水平相适应；另一种是，主要原因首先引起方程式中其它因素的变动，物价水平后来随之发生变动。

那末，引起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林达尔认为，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重视预期的作用。按照他的分析，这也要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完全预期的情况下，即在人们对将来物价水平的发展可以完全预料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预期。由这种原因所引起的物价变动，对经济没有关系，它既不影响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也不影响生产的范围和方向，即不会发生累积变动。这时，货币管理机构则必须采取一种被动的放款利息率政策，通过对人们的预期施加影响来使自己与预期的物价发展相适应。另一种是在不完全预期的情况下，即在人们对将来物价水平的发展不能完全预料得到的情况下，个人预期便不再是引起物价水平实际变动的主要原因，而执行货币政策的措施，特别是放款利息率则成为主要原因。林达尔认为，正是由于不完全预期是一种更加符合于实际的情况，所以他才特别重视对利息率和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

接下来，林达尔便对利息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利息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方程式中个人名义总收入、储蓄比例和消费品数量各因素个别的或全面的施加影响来实现的。同时这些因素变动的幅度和方向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组合，对物价水平以及整个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在一些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化可能使各因素在同一方向上变化，它们各自的作用便趋于相互抵销，这样仍可维持物价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均衡。在另一些情况下，各因素的变动的方向可能是不相同的，这样就会引起物价的变动，在有闲置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这种变动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累积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林达尔认为，为了阐明利息率变动和物价水平变动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弄清各个因素对物价水平的最后影响，必须作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接

着在本篇第二章对威克赛尔的物价累积变动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第三章讲了各种利息率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对物价水平的不同影响；在第四、第五章分别阐述了利息率作为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的工具和作为调整物价使其和生产力成反比例的工具的作用；最后，在第六章对威克赛尔的"放款正常利息率"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评述。

林达尔的结论是，消费品的价格水平，一方面主要是由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来决定，另一方面是由消费资料产量和生产资料产量的关系来决定，而这些关系本身最终又决定于利息率水平和人们对将来的预期。同时，降低或提高利息率都会对生产发生不良的干扰作用，而且，在有闲置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这种作用还会产生累积的后果。林达尔承认，他的这种分析基础上是以威克赛尔的物价累积变动理论为依据的。但他同时又认为，威克赛尔理论并不无简单和片面之处，大有补充和修正的必要。

三、价格决定理论

本书第3篇是林达尔在全书各篇中写得最早的一篇，曾发表于1929年。作者在本篇所研究的，就是企图从资本理论的观点来对价格决定问题作出一些贡献，就是要研究价格决定中由于生产过程存在时间因素而产生的复杂情况，换言之，就是要研究价格决定中那些既与资本、利息理论有关又与物价的一般理论有关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林达尔的价格决定理论共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企图把瓦尔拉、卡塞尔、博利等人的传统价格决定学说和庞巴维克、威克赛尔的资本、利息理论熔为一炉；其二是企图在静态范围内说明动态下的价格决定问题。

关于第一部分内容，林达尔认为，在卡塞尔和博利的用来说明价格决定过程的方程式体系中，时间因素都没有位置，

由时间因素而发生的复杂情况，他们都置之不问。瓦尔拉在分析价格决定问题时虽然引进了时间因素，开始把资本、利息问题和价格决定问题联系起来，但他对资本问题所作的讨论，没有做得象庞巴维克学派那么透彻，那么深入。他把生产资料的更换比率看作已知数，因此，也把生产资料的使用时间当作已知数，没有考虑利息率的高低对投资期间的影响。因此，上述传统的价格决定理论认为，只要各种生产因素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已定，各种生产品需求量已定，生产时的技术系数（各生产要素的性质、配合比例）已定，所有生产品和生产性服务和价格就可以决定，即各物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这些物品所使用的一切生产性服务的价格的总和。这就是传统的一般均衡价格理论在不重视投资期间要素时间对价格决定问题的基本论旨。而按照庞巴维克、威克赛尔资本、利息理论的说法，“资本价值”是将来收入按现在利息率资本化的数额，资本的“利息”是资本因时间关系而获得的增多价值。它表明，投资期间本身也有价格，利息率就是由此产生的。而且利息率的高低对投资期间的长短变化有重大影响。当资本增加而导致利率下跌时，将引起投资期间较长的生产的扩张，反之，结果则相反。林达尔认为，根据上述资本、利息理论，生产一个产品所使用的技术系数（它直接影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不再象传统的价格决定理论据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生产要素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的函数，而且同时还是利息率的函数。这样，把资本和利息纳入价格决定的数学分析之中，产品的价格就不再仅仅等于用以制造这种产品的一切服务的价格总和，而是等于这个总和再加上一切服务投资期间的利息。

关于上述第二部分内容，林达尔认为，动态问题比静态问题来得复杂，但若把连续的动态过程划分为若干较短的时期，并假定在各时期中物价都没有变动，同时假定人们有完全的预期，那末动态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仍可使用静态分析方法来说明。在这里，林达尔特别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人们事先预料到那些对于物价发展有重大关系的变

动，那末，决定物价的因素及物价本身就能在适当的时候适应新的情况。他深信，如果负责的人有更完全的预期，定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减轻经济生活上的扰乱。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陈文江 撰

作者介绍

林达尔，（1891—1960）瑞典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瑞典学派（亦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林达尔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动态学、经济周期理论、国民收入理论、货币理论及财政货币政策等许多方面，其中，尤以经济动态学理论最为突出。林达尔关于建立一个动态经济理论经体系的主张，特别是他为此而进行的许多独树一帜的开创性的研究，对于20－30年代期间瑞典学派的形成乃至当时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建设作用，林达尔本人也因此而同时成了瑞典学派的突出代表和驰名世界的经济学家。林达尔的主要著述有：《课税的公正》（1919）；《货币政策的范围和手段》（1929）；《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1939）；《就业稳定问题》（9149）。

[瑞典] 林德贝克，阿萨
Lindbeck, Assar

新左派政治经济学
——一个局外人的看法
The Political Ecoomy of The New Left: An Owthsider’s View (1977)

本书原为瑞典文版，是林德贝克于 1968 - 1969 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教授时，以当时美国一些大学进行的政治辩论和流传的政治文献为背景写成的。1971 年，由哈珀一罗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由张自庄等根据 1977 年英文再版译出，商务印书馆 1980 年出版。全书 152 页。

本书除前言和绪论外共 4 章：新左派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新左派对当前经济的批评；新左派经济学向何处去？附录。

正如萨缪尔森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任何事物只有在人们第一次看见时，才能看出它的独特之处”，林德贝克就是以这种局外人的身份来全面评述影响迅速增长的美国新左派经济学的。

林德贝克认为，新左派在政治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在经济上也不构成一个严整独立的学派。但新左派经济学却有其显著的特征。“它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大公司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批判，以及它的应如何改进经济的设想；与此

密切相关但有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对经济学家和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学中通常讲授的经济理论的批判。”本书正是沿着以上两条线索展开论述的。

一、新左派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

林德贝克将这一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分配理论。新左派经济学批评传统经济学没有充分地研究社会的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的分配问题。他们强调社会制度的变革，权力的分配和阶级斗争在分配问题上的作用。

第二，资源配置。新左派经济学的批评意见是，“传统经济学家在分析不同生产部门间生产要素分配问题时，往往使用极不完整的分析方法，尤其是，把家庭偏好主要当作是既定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广告、国际影响等因素对偏好形式的作用。

第三，生活质量。新左派经济学对此的批评是，传统经济学只重视对商品、劳务的产量及构成的研究，而对质量的研究不够，只重视对消费品、闲暇的偏好的满足的研究，而忽视对生产和消费的外部环境问题的研究。

第四，大变化与小变化。新左派经济学批评传统经济学家在思想上纠缠于既定经济制度内的微观分析，而不讨论经济制度中大的质量上的变化，即不注重经济制度变革之类的宏观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由于忽视了‘比较经济制度’这个重要而艰巨的领域。”

第五，政治因素的作用。新左派批评传统经济学家忽视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方面的相互作用问题。其表现是，在对内政策上，“没有充分研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力雄厚和在组织上完善的阶级和压力集团的活动”；在对外政策上，过分的忽视了对外控制和帝国主义的问题。

林德贝克对上述批评基本上是赞同的。他认为这至少说明了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许多复杂而且迫切的经济问题，例如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的分配问题，偏好和经济权力的形成问题，外部因素的作用问题，比较经济制度的问题等，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林德贝克力图证明，对上述种种问题的研究，只有借助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取得成效。而且他指出，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已注意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建立起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新的学科，而这些成就都是立足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新左派对当前经济的批评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林德贝克就新左派经济学对当前经济秩序的批评意见以及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所指出的建议进行了系统的评述，他把要分析的问题归为六类：

第一，市场和形式化的行政管理方法（官僚主义）。

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一方面激烈地反对市场，把市场制度斥为原始的、低效的、混乱的、反社会组织的、不公正的和基本上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苏联式的官僚主义，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大量存在既削减了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又使社会剩余的大部分转入非生产消费，同时，官僚主义的专横跋扈已愈来愈为工人群众所无法忍受。

第二，集中与分散。

新左派既对分散深切同情，又反对市场制度，主张实行集中的社会经济计划。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新左派只好寄希望于分析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并一反以往对官僚主义的憎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无所不包的中

央计划，辅之以群众的革命热情。

第三，资本的所有制。

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对社会抱有一种极其平均主义的看法，所以反对私人资本主义，拥护集体所有制，他们的理想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归工人集体所有并由工人自己管理的“乌托邦”式的自治经济。

第四，物质刺激和分配问题。

由于新左派运动中平等的倾向和“经济清教主义”的倾向，新左派强调“精神刺激”，强调归根到底创造“一种新人”。而反对通过利润和工资差别的形式实现的物质刺激，反对利用工资差别做为提高效率、刺激教育和训练、在各行业配置劳动力的手段。

第五，竞争。

新左派反对竞争的论点基本上是属于道德方面的，竞争同合作相比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混乱的、不协调的和无效率的，并且可能造成一种同个人的需要不相符合的生产结构。而一个可供选择的社会被想象为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间罪恶的东西将被合作与和谐的原则所代替。

第六，“发达”的意义。

在这方面，新左派拥有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即认为现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是过渡发达的，而且普通公民的消费水平已经太高，边际效用已经为零，甚至为负。另外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商品产量和私人消费水平的集中程度太高，“生活的质量”被牺牲了。

在以上六类问题中，林德贝克通过提出三个问题的方式（第一，新左派的经济思想和建议是什么？第二，它们有意义吗？第三，这些思想和建议中包括些什么问题?），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新左派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他指出了新左派的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例如在前两类问题中，新左派主张分权，反对官僚主义，同时又对市场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不知道，“愈是强烈地反对官僚主义，就愈应该赞成市场”，同时“愈是喜欢分散，就愈应该赞成市场制度”。林德

贝克认为，新左派的理论除了自由矛盾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高唱革命词句，而对实际经济问题毫无研究，新左派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通过革命和生产集中化即可一举消除。而对于革命以后所可能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例如充分就业、收入差别同平等的关系、政府的经济干预和权力集中、竞争与计划的最佳组合、集体所有制同个人主动性的发挥等等艰巨而困难的问题，新左派要么沉默，要么仅仅发表一些肤浅的见解。

三、新左派经济学问何处去

在对新左派经济学进行了严格的评述经后，林德贝克再一次说明了新左派运动的不纯一性。指出他们分属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以及集体所有制的非市场制度等不同的政治派别。

最后，林德贝克客观地评价了新左派经济学家的历史成绩，“新左派的主要贡献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政治辩论中若干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所有制问题，收入和权力的分配问题，外部因素问题，群众参加管理问题和社会通常的价值标准问题等。在战后美国的政治辩论中已有消失的趋势。这样，新左派可能已帮助人们提高了对政治辩论中的原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社会责任感问题的兴趣。新左派提出的许多问题往往看来比其答案更使人感兴趣。”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谢　岩　撰

作者介绍

林德贝克，瑞典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关于对货币和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强调微观基础对厂商行为、家庭和各种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

信贷机构的影响，主张通过将政治家的行为内生化，而不是把分析仅仅限于假设的政策后果范围的方法，研究政策的实际推行问题。此外还对美国新左派经济学进行了理论评述，并系统地总结了瑞典近百年来的经济政策。他反对把经济制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即经济制度的“多维性”概念。林德贝克的主要著作包括：《货币分析研究》（1963）、《新左派政治经济学》（1977）、《农业部门经济学》（1973）、《瑞典经济政策》（1974）、《通货膨胀——全球性、国际性和全国性问题》（1980）。

[法] 勒帕日，享利
Paleri, Henry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Tomorrow Capitalism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法国经济学家勒帕日的一本专著，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该书原名为《明天的资本主义》，中译本改名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李黾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全书共 11 章，第一章“美国新经济学家，学术和思想领域里的一场革命”可以看作是此书的一个概述。勒帕日在这一章中指出，在新左派壮大的同时，一场新的运动在美国高等学府里日益发展，引起了一场思想和学术上的革命。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研究新古典派的微观经济理论。该运动可称为美国“新自由派”运动，由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对该运动有很大影响，因而也可以称为“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运动始于 50 年代，与芝加哥大学的一些人的影响有关，其中包括弗兰克、奈特、舒尔茨、H·格来格·刘易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致力于科学上的创新，以用于分析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传播其影响的有四大渠道：“货币主义”思潮、“人力资本”论、“所有权”运动和“公共选择”学派。勒帕日着重介绍了后三种思潮的概况。他指出，“人力资本”

论产生于60年代初，但在40年代弗德曼和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对人力资本做过一些说明。到70年代，许多人都赞同并研究了人力资本，其中最有才华的一位是加里·贝克尔，他是三项重要理论发展的推动者，这三项重要理论是家庭学说、非商业关系经济学和新消费者学说。“所有权”学说的历史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紧密相联。由于科斯曾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也即夏洛特维尔大学）教过书，所以，人们也常把所有权学说同“弗吉尼亚学派”连在一起。所有权学说始于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论文，60年代以后在阿尔强·罗兰·麦克基恩和沃伦·纽特等人推动下，形成了所有权运动。该运动有四根支柱：1.“交易费用”概念；2.权利“生产”论；3.对不同经济组织效率的比较分析；4.运用经济推理重新发现历史。“公共选择”学派的领袖是弗吉尼亚工业学院的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公共选择学派与所有权运动相关但又不相同。两人发起的是一份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的真正的概念革命，即用统一的理论方法去研究传统上被竖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之间的隔墙分开的两个领域：1.公共选择结构的（标准）的研究（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法花国家的钱?）；2.对决定过程的客观或“实证”的研究，这种决定过程左右着公款的分配。“公共选择”关心的是：第一，研究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第二，发展有关官僚主义的经济理论。第三，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第四，找出能够说明某些政治制度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

勒帕日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所以可以看作是学术和思想领域中的一场革命，在于它在学术方面对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进行了革新和发展。并在政治上有引人注目的三个方面：1.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反论据和科学辩驳，可以对抗“反经济”思潮的法国广为散布的伪真理；2.构成一整套科学文献，引起了对国家社会福利事业的激烈争论；3.得出结论，社会中弊病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渡造成的。

从第二章开始，勒帕日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四个主要方

面进行了系统介绍评价。第2章到第4章介绍“所有权”运动；第5章到第7章介绍“公共选择”学派；第8章介绍“人力资本”论；第9章介绍“货币主义”，第10章第11章进行总结并设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

勒帕日对“所有权”运行的介绍和分析是从“重新发现历史”的开始的，然后，他援引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围绕个人土地所有制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论证了所有权的产生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在第2章（“历史的真象《新经济史》和自由意志派史学家”）中，勒帕日首先对传统的历史观点提出疑问。他认为，对过去的看法，如果没有被好几代历史学家有意歪曲，那么起码也被他们篡改得面目全非了。他举了三方面的例子：1. 铁路在19世纪社会中的作用。2. 反托拉斯法。3. 产业革命和工人状况。他认为，以罗伯特·福盖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用“非现实假设”方法，对美国19世纪铁路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从而否定了传统看法（即铁路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干预使公民免受私人垄断铁路之害）。福盖尔等人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实际产值低3%以上，铁路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国家干预铁路事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次要的。相反，铁路方面的丑闻不应归罪于资本主义和市场法则，而应归于国家官僚主义违背了竞争法则。勒帕日指出，约翰·麦克吉、D·T·阿曼塔诺等人对反托拉斯法及各著名案例的研究，为哈耶克、米塞斯等人的思想提供了经验检验方面的支持，这种思想是：垄断和经济权力集中的真正后果与市场法则的自然运转无关，相反却与国家干预的加强和政府不断给竞争过程的正常进行设置障碍有关。勒帕日还指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是把30年代危机归罪于“资本主义”，而是归罪于国家干预主义；他们也反对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归于高速工业化和资本家的贪婪，而归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在第3章（“所有权是怎样产生的，经济工具和各种制度的历史”）中，勒帕日介绍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增长历史不象人们想

的那样和技术进步的历史融为一体，而是同所有权制度产生发展连在一起的。他系统介绍了道路拉斯·诺斯《西方社会的兴起》一书中的思想，说明了个人土地所有制的产生（第一阶段：11～13 世纪对个人劳动力的购买；第二阶段：14～15 世纪的天灾与租约的延长；第三阶段：16 世纪的通货膨胀），分析了“圈地运动”和 17 世纪的农业业革命。勒帕日认为，美国的这种新理论可以发展为解释历史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并远远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更有“成效”。在第 4 章（“经济增长的原因，权利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中，勒帕日继续用诺斯的理论说明社会制度——国家的产生，其中包括对 10 世纪两主要制度农权制和封建公约的分析，对 13 世纪革新的分析，对柯尔培尔主义出现的分析，对专制主义经济和议会制君主政体经济起源的分析，介绍了所有权学派的形成。勒帕日认为，所有权学派无疑是最富于吸引力的学派，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和政治探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学派。

勒帕日在第 5、6、7 章（分别为“国家现象增长的原因，‘公共选择’学派”、“保护人——国家的真面目国家干涉主义的代价”、“重新创造市场自由经济”）中，系统介绍了“公共选择”派的主要观点。他叙述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起源，斯密模式，马歇尔、帕累托、瓦尔拉等人的模式），“公共选择”派思想的形成，“公共选择”派对国家干预思潮的叙述与批判。他引用了詹姆斯·布坎南、罗伯特·托里森的《公共选择论》、詹姆斯·D·格瓦特内的《经济学·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戈登·图洛克的《投票动机》和《慈善经济学》、艾伦·梅尔泽的《自由经济的衰败》等许多著作。勒帕日认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是“科学的”：“公共选择”派的著作有助于加强“经济人”范例的科学效用，因为它把经济人范例扩展到大量非商品性的（如政治领域）人类及社会状况；其著作在个人行为和条件选择之间重新架起了一座桥梁，填补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最重要的空白，并避开了阿罗定理对现代政治思想造成的障碍；其著作还可

以帮助了解现代国家现象增长的原因。‘公共选择’派带来两个重要答案；第一，官僚主义解决办法必然使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解决办法；第二，表现共同偏好的政治过程中的选择平等概念。勒帕日也介绍了美国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建议。他赞同他们的观点，主张制止国家权力的增长（设计新的政治技术、在公共部门恢复竞争）、减少福利国家的浪费（如实行反赋税），减少市场的浪费（如解决污染和交通堵塞的办法、保护消费者的办法）以及揭露强制手段的反生产性等。总之，主张重新创造市场、创造新的自由经济。

勒帕日在第8章（“加里·贝克尔的革命　时间经济学与新消费者论”）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勒帕日叙述了贝克尔《人力资本》、《经济理论》等书中的思想，指出，“人力资本”论的研究使出现了“新消费者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购买一种物质资料或种服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其关键是在分析个人活动时加进了时间因素，因而产生了三个重要看法：第一，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对积累物品有一种表面不合理的爱好。第二，使人们对购买及消费方式如何随时间而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第三，帮助人们重新发现“消费者自由”是最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原因。新消费者论把家庭视为一个普通的经济机构，是人们做出资源分配决定的场所，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从而实行了一种伟大的变革。勒帕日并从“时间经济学和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差异”、“人口经济论”、“婚姻经济论”、“健康‘需求’经济学”等方面全面介绍了新消费者论的各种理论及观点。他还指出，新消费者论最富于创新的和也许是最使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指出人们怎样把使用人得到满足的模型同人性范畴的问题调和起来，并指出怎样最终可以使人们用数学来表示某些最初看来无法计量的价值。

在第9章（“米尔顿·弗里德曼学说的兴起，或凯恩斯学说的终结”），勒帕日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进行了简明的介绍（他认为货币主义理论同前几项相比，更为人们所了

解，因此未用更多的笔墨）。他也认为，货币主义的政治影响较之以前有所缩小，货币主义是否能取代凯恩斯主义，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他认为，凯恩斯时代已经彻底结束，而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科学基础要更加坚实。

在第10、11章（分别为“结论　明天的资本主义”和“明天的资本主义”）中，勒帕日对全书思想进行了简明的总论，并针对法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他认为，他属于那种认为经济政策越少越好的人，问题不在于立即恢复最全面的“自由放任”（在他看来这是不现实的、反社会的），而是要明确：现今揭露出来的大部分社会弊病主要是国家对现代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过分干涉造成的，而不是今天大受诋毁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由的堡垒。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　姚开建　撰

[美] 林德特，彼德
Lindert, Peter
金德尔伯格，查尔斯
Kindleberger, Charles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理查德·D·欧文出版公司出版。到1982年为止，本书已出版了7版。中译译本是根据第7版译出的。第7版对本书作做了较大的改动，作者的署名也从原来把金德尔伯格放在前面，改为把林德特的名字放在前面。中译本的出版社是上海泽文出版社，译者为谢树森、沈锦昶、常勋、章雷、1986年该书出版了第8版，1991年出版了第9版。在第9版进行了更大的变动。该书的作者这次由林德特教授一人署名了，而且再一次被翻译为中文，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范国鹰、陈生军、陈捷等。我们主要根据该书第9版，并结合第7版进行介绍。

该书第7版出版之际，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刚刚过去之时。在70年代中，世界经济发生了四件大事，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一) 美元实行浮动。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的一次电视演说中，以几句简练的话宣布，以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黄金折算的美元值必须改变。实际

上结束了国际经济中的固定汇率制度，带来了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结束了国际经济的一个时代而开始了另一个时代。(二)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自70年代以来一直十分严峻，美国的制造业受到越来越大的外国产品竞争的压力。从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减少，每况愈下，后来又从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的内债和外债都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国内也对与贸易保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三) 石油危机的压力。美国也对与贸易保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四) 石油危机的出现。1973年末，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提高原油价格，使以廉价石油为动力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陷入了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五) 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在60年代，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但是，1973－74年的石油危机中，跨国公司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始被打破了。而且，另一个重大变化发生了。在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一直是跨国公司的主角，但在70年代中期，美国跨国公司的突出地位受到挑战。欧洲和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超过了美国，甚至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已出现，使得世界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需要对新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学》第7版出版。但是仅仅10年之后，到本书第9版出版的1991年，形势进一步发生急剧变化。首先，美国的经济实力地位继续下降。1987年，美国从战后原来的最大债权国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衰落，美元汇率大幅度波动。显然，对这些波动的解释，特别是新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否比它所取代的汇率体系好些或更糟，都是些十分复杂的问题，都是国际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第二，来自日本和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外国进口商品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造成严重的竞争压力，美国的贸易盈余消失了，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进一步增强。第三，贸易集团化是90年代世界商务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经济越

来越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世界上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却越来越像在类似国家的巨大贸易集团及大型国际经济实体之间进行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集团行动。继西欧经济共同体之后，美国和加拿大也向这个方面发展（后来形成了由美、加和墨西哥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第四，1982 年墨西哥发生了债务危机，紧接着其他十几个第三世界国家也相继陷于债务危机之中。特别可笑的是，如果第三世界国家不还债，它的银行将蒙受最大损失的一个放贷国是本身已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美国在 1990 年初的外债就达到了 4000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联邦政府债务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样才能控制住它的主要债权国（美国的主要债主是日本、德国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呢？如果我们认为美国不可能永远借款而不偿还它的债务的话，那么，这一天何时会到来，一旦到来之时又会如何了结呢？第五，日本控制了世界银行行业。目前，在世界金融排行榜上，前六家"世界最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日本。在日本经济实力膨胀的同时，日本大力购买美国的各种资产。日本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都需要进行同国内金融学不同的国际金融分析，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美日之间的贸易关系的演变及它们各自采取的贸易政策都是国际经济学中必须探究的关键问题。跟上新的国际经济中的事件变化，反映这些事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和产生的变化，是本书作者的意愿。就作者来说，这是一种受欢迎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源于变化着的实践，而不是变化的理论。正是在这种一种形势下，《国际经济学》第 9 版出版。

该书共分 5 编，首先就国际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进行论述。作者在第一编提出贸易是怎样进行的，主要是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在第二编中提出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会带来利益和给谁带来利益。第一和第二两编实际上是第三编与第四编阐述宏观经济与金融问题之前所作的微观经济理论的论述。第三编开始进入货币领域，探讨外汇及国际收支调节过程，包括对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的论述。第三编

探讨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即论述各国怎样由于它们的货币受到种种压力而受到影响，并探讨各国怎样做出最好的反应的政策问题。第五编则考察人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部分国际间流动所引起的一些特殊国际经济问题。

作为一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本书各个版本具有与其他同类教科书不同的许多特点：

一、论述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阐述系统全面，分析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例如，在第一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中，作者全面介绍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举凡当时比较流行的贸易理论，都进行了叙述。但是，作者叙述的方法却与一般有关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论述方法不同。作者首先介绍了国际贸易理论中广为人们所知的斯密和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然而，作者并没有象有些教科书作者那样从中引起几条结论了事。而是抓住了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中机会成本的核心思想，利用生产可能性曲线，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贸易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紧接着，作者又从决定生产可能性曲线形状的因素引起生产要素比例问题，然后提出贸易条件，并初步得出贸易双方都可能从开展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的结论。在对贸易供给和需求进行的分析之后，作者紧接着提出了贸易与收入分配问题，介绍了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分析了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在对贸易理论进行了静态分析之后，作者接着分析了经济增长和贸易变动之间的动态经济问题，把经济增长和贸易变动的理论与已经介绍的简单经济模型的分析结合，做出了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动态经济分析。在动态分析当中把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技术在国际贸易当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加，包括产品周期理论、新技术和技术在各国间的扩散，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分析。可以说，作者的分析和叙述深入浅出，逻辑性极强，具有论述全面和分析透彻的鲜明特点。

二、反映了国际经济学领域中理论上取得的最新进展。从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构安排来说，过去人们对国际金融

与宏观经济学的探讨集中于研究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但是从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看，研究的重点或中心内容放到了各国货币的汇率上。也就是，如果外汇市场在汇率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如果要使国际经济中的投机者相信汇率具有持久的基础，那么外汇市场本身就显示出稳定的征兆。作者在本书中反映了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这种进展。在对第三编中在介绍了有关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概念之后，在第 15 章则集中对汇率与贸易差额进行了探讨。特别对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差额，货币贬值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

同样，在对贸易动态和贸易政策的说明方面，作者也对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关于不平衡发展、贸易条件恶化、以及在国际上技术领先地位的更迭及其原因进行了充分探讨。

三、反映国际经济领域当中发生的最新变化。正如我们在前面本书出版背景时所做的介绍中说过的，作者把国际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作为对一名在这一领域中耕耘的学者的一种挑战，而且是一种受欢迎的挑战。所以，在每一个新的版本中都对这些新的变化做出了充分的反映。例如，在第 9 版中，作者把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贸易集团革命新辟一章进行介绍和评论，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向 1992 年统一大市场迈进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加以叙述，并讨论了封锁和禁运的经济学问题。在第 8 章中，对出口补贴、抵消关税、倾销等国际经济中的热点话题、提出了深入的分析。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技术、技术变革和技术的扩散严重影响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许多发达国家力图在高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产业，特别是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国家谋求在高技术为特点的商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树立自己的优势。技术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因素，比较优势基本上是人为的。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进行了争夺经济领域地位的斗争。第 9 版中的第 5 章介绍了各种可选择的现代贸易理论来说明现代国际经济中的贸易格局。在第

10 章着力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潜力和限度，提出了从争夺钢铁、汽车和电子工业的领导地位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中所吸取的种种教训。第 5 章与第 10 章的所有内容都集中论述了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为特点的现代贸易。对世界经济中的债务危机，本书也做了专章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追求一种清晰和朴实的写作风格。这不但表现在作者的文字叙述当中，也表现在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处理上。作者所用的经验材料比其他同类教科书所用的多，但他严格以能够说明问题为限。为了使内容更加清晰，作者把对各种经济问题所做的进一步的数量经济学分析通统放到了附录，并对附录中的内容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变动。

（据经济科学出版社中文版）　　于同申　撰

[英] 马歇尔，阿尔弗雷德
Marshall，Alfted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1890年出版。中译本根据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8年版译出，译者朱志泰，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1964年10月出版第一版，下卷1965年2月出版第一版。

《经济学原理》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马歇尔吸取了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又在形式和内容上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其理论被看作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拯救和振兴，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原理》被西方经济学家看作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以前，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长期占据了支配地位。

《经济学原理》全书分为六篇。中译本上卷包括“原著第一版序言”、“原著第八版序言”和前四篇，下卷包括第五、第六篇和13个附录（附录录一～附录十二和数学附录）。第一篇“导言”，说明经济学有定义、实质、经济规律和经济研究的次序和目的。第二篇“若干基本概念”，介绍财富、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收入、资本等概念。第三篇“论欲望及其满足”，研究均衡价格论的需求一方，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研究均衡价格论的供给

一方。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分析市场，研究在市场上需求与供给如何达于均衡，以及关于价格的一般原理。第六篇“国民收入的分配”，研究工资、利息、利润、地租的决定。

中译本收录的两篇序言对于了解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是很重要的。在“原著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着重说明了连续原理。他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新学说补充、扩大、发展、修正旧的学说，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正表明了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而《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特点就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在他看来，从精打细算的商人到不以营业性方法做事的普通人，他们的活动虽具有不同动机的道德上的各自特性，但只有具有连续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地租和利息的区别，主要不过是人们心目中的时期长短而定；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则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的各部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马歇尔同时说明，他的理论特别受古尔诺和屠能的影响，“边际”一词就是从屠能的书中借用的。在“原著第八版序言”中，马歇尔进一步说明了连续原理，并指出此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静态的方法，还强调了边际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及其法则。正是由于马歇尔重视连续原理，所以，他能在他的理论中把以前的许多对立学说、理论包容进来；也因此，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折衷主义的特点。

第一篇共四章，第 1 章“绪论”第 2 章“经济学的实质”，第 3 章“经济概括即经济规律”，第 4 章“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在这篇中，马歇尔分别说明了经济学、经济规律、经济研究的次序和目的等。古典经济学在说明经济学的定义或对象时，往往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而边际学派则重视经济学的心理分析，强调经济学研究人。马歇尔则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研究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活动与

思考的人，研究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他指出，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人们心目中任何情感本身，但能间接地、通过情感的结果，用货币约略地加以衡量。也因此，经济学家能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不过是常识的运用，并助以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易于进行。所谓经济规律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活动倾向的叙述，它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的衡量。经济规律是“假设”，即包含或暗含种种条件，弄懂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比在物理学中更困难和危险。在讲到经济研究的次序和目的时，马歇尔指出，科学的研究不是按照它所需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而是按照它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因为，如果单为某种实际目的而排列研究次序，就会忽略与某种实际目的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难以看到各种知识或思想间的关系，无法取得研究的真正进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是把一切性质相类似的事实和推理收集在一起，长期以往就会逐渐了解被称为自然规律的那些基本统一性，马歇尔还列举了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说明经济学家须训练其知觉、想象、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等。

第二篇也为四章，其标准依次为“绪论”、“财富”、“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收入。资本”。在这一篇中，马歇尔主要研究，在一切属于人类努力的结果并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中，有哪些算作是财富，以及这些东西怎样分类的问题。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家必须从生物学中学到许多东西，决定自然组织中每个生物的生活习惯和一般地位的那些部分，通常不是它的构造中最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而是最不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同样，在一种经济制度的特性中，最能使它适合于它现在必须做的工作的那些特性，也正因为这个理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在研究经济名词时，既要记住其历史，又要注意其变化。马歇尔即用这种观点考察了财富及其相关的名词。马歇

尔认为，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即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因缺少适当的名词，可用财货代替。财货可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的又可为物质的（可转让的和不可转让的）和个人的（可转让的和不可转让的），内在的财货则属于个人的，是不可转让的。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他的外在财货中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财富包括一切个人的财富。一国财富还包括国家财富，世界财富则是扩大到整个地球的国家财富。财富和价值有密切的关系。和财富有关的概念还包括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收入与资本等。马歇尔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对这些概念的研究，指出人类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生产是创造效用，消费是负的生产；劳动是任何心智或身体上的努力；必需品是必须满足的欲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有些舒适品或奢侈品成为习惯，也会变为习惯上的必需品；从日常营业观点看，一个人的纯收入是他的总收入中减去费用而得到的；一种职业对劳动所提供的真正报酬是从一切利益的货币价值减去一切不利的货币价值，这种真正报酬也称为纯利益；一个人从其资本所得的全部纯利益扣除按现行利率计算的资本的利息即为利润；资本可以分为消费资本、辅助资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资本和财富差不多是同义语，当把东西作为生产要素考虑时，它们是资本，当把东西作为生产的结果、消费的对象和产生占有的愉快的源泉时，它们是财富；对资本的需求，主要由于它的生产性和它所提供的服务而发生的，而资本的供给则是人们"等待"、"节省"，为将来而牺牲现在的结果。

第三篇共六章，除第1章"绪论"外，第2～6章的标题分别为"欲望与活动的关系"、"消费者需求的等级"、"欲望的弹性"、"一物不同用途的选择。立即使用与延缓使用"、"价值与效用"。在第三篇中，马歇尔主要研究财富与它必须满足的各种人类欲望的关系，也即是需要与消费的研究。首先，马歇尔在"绪论"中简要说明了第三篇同第四、五、六篇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直到最近才对需要和消费加以足够的注意"的原因。然后，他从人类欲望的分析开始，阐述了

欲望饱和律或效用递减律，说明需求价格、需求律，分析了需求弹性、消费者选择以及消费剩余等。马歇尔指出，人类的欲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欲望引起了人类的活动，但以后每向前进新的一步，都是新的活动的发展引起了新的欲望。效用是与欲望相关的名词，人类本性的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可用欲望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说明，即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每随着他对此物所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及所有量的增加那样快，或者说，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马歇尔把这种规律应用于价格分析，把消费者愿望并能支付的价格称为需求价格，把效用递减规律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一个人所有的一物的数量越大，则他对此物稍多一点所愿付的价格就越小。消费者对不同数量商品的需求价格可以形成他的需求表。而需求规律是：需要的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大，并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减少。马歇尔把物理学中弹性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指出需求弹性大小是随需要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下跌时增加的多寡，和上涨时减少的多寡而定的。他介绍了各种商品的不同弹性，并分析了影响弹性的一般的原因。马歇尔还指出，消费者选择的遵循的一个原理：如果一个人有一样东西而能充作几种用途，他会把它如此地分配于这些用途，以使它在一切用途上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在分配现在需要和将来需要时，未来利益要打折扣。马歇尔首先提出消费者剩余概念，即消费者所愿付出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那部分剩余。

第四篇共十三章，第 1 章为“绪论”，第 2、3 章分析土地，第 4、5 章分析劳动，第 7 章分析资本，第 8～12 章分析组织，第 13 章为“结论、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在第四章中，马歇尔研究财富与生产财富的各种人类努力的关系，也即用来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的那些生产要素的研究。马歇尔认为，这部分相当于过去两代英国经济学者中占重要地位的那种生产的研究。在“绪论”中，马歇尔

在传统生产三要素基础上，又加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他指出，需要是基于获得商品的欲望，而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象存在需求价格一样，对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必需作出的努力所需的价格，可称为对那个数量的供给价格。马歇尔对四种生产要素主要从供给方面进行了分析。在第2、3章分析土地时，马歇尔着重阐述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他分析了什么是土地、土地肥力的条件、人类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说明了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报酬，迟早是要递减的，而且他用边际剂（刚好抵偿耕作者费用的一剂资本或劳动）、边际报酬（边际剂产生的报酬）和耕作边际详细分析了报酬递增、递减的各种情况，还评述了李嘉图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马歇尔对劳动的分析是从人口、劳动训练等方面进行的。在第4章“人口的增长”中，马歇尔评述了人口学说史、马尔萨斯人口论，分析了结婚率、出生率和英国人口史。在第5章“人口的健康与强壮”中，他分析了健康与强壮的一般条件，说明了生活必需品、职业的影响、城市生活的影响等。在第6章“工业训练”中，他说明不熟练劳动者是一个相对的名词，随社会、技术发展，单纯手工技能日见失去重要性，他叙述了普通教育、工业教育、美术教育、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等。马歇尔在第7章“财富的增长”中对资本进行了分析。他说明，只是近代以来，才出现了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积累能力才迅速增加。他分析了积累的原因、储蓄与储蓄率等。他批评了以往经济学家忽略了人类才能与其任何种类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他认为，财富分配上的任何变化，只要是给工资劳动者多些，给资本家少些，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大，而不会显著的延迟物质财富的储存。马歇尔用了大量篇幅分析工业组织（从第8～12章），分别从分工、机械影响、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大规模生产和企业管理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包括组织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以往经济学家对组织的分析，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经营的经验与企业家能力等。在第13章，马歇尔对

第四章进行了总结。

第五篇共十五章，马歇尔在这里把第三、四篇中关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论述了均衡价格理论，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在第1～7章中，马歇尔说明了均衡价格理论的各个基本概念。在马歇尔以前，对价值的决定大体上有两类观点：传统经济学主张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观点；边际学派主张效用决定的观点。马歇尔用他的均衡价格论把二者统一了起来。在马歇尔看来，讨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还是用生产成本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刃还是下刃裁是同样的。他认为，价值的决定必须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时期越短，越应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考察时期越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越重要。马歇尔把价值决定等同于市场的价格决定，所以，他的第1章为“引论、论市场”，在其中，引述了古尔诺、杰文斯对市场所下的定义，从空间和时间方面对市场进行了分析，并把物理学中“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以说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力量的均势。在第2章“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中，他指出在偶然物质交换中不存在真正的均衡，而在当地谷物市场上出现了真正的均衡（虽然是暂时的）。在第3章“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中，他用与制定需求表同样的方法制定出一个代表企业的供给表，把需求价格供给价格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他指出，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处于均衡状态中。这时，一个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量叫做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叫做均衡价格。他还用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和向左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说明供求均衡的稳定性。在第4章“资本的投入与分配”中，他把投资同未来满足与现在满足的均衡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在第5章“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中，他分析了“正常”的含义，并区分了长期（生产所需设备的数量根据需求而加以调整）和短期（现有生产设备的数量实际上是固定的）。在第6章中，马歇尔介绍了连带需求、复合需求、连带供给、复合供给等

概念，分析了各种商品间的复杂关系。在第7章中，马歇尔介绍了直接成本、总成本、销售成本、风险保险、再生产成本等概念。在第8～11章中，马歇尔讨论了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包括一般原理以及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第12章“从报酬递加规律来看的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是对第3章的进一步补充。在第13、14章中，他分别讨论了正常需求和供给变动理论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的关系、垄断理论等。第15章“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摘要”是对全篇的概括。

第六篇共十三章，马歇尔集中讨论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第1、2章为“分配概论”，在其中，马歇尔说明了在分配上要讨论的问题，并考察了以往英、法学者的观点。然后，他分别讨论了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一般地确定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线的原因。在第3～10章中，马歇尔讨论了工资（第3、4、5章）、利息（第6章）、利润（第7、8章）和地租（第9、10章）。马歇尔在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时，引入了他的均衡价格分析方法，即把分配问题看作是四种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的决定：工资是劳动的均衡价格，利息是利用资本的均衡价格，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均衡价格，地租是利用土地的均衡价格。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和分配理论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马歇尔在讨论分配时，引证了大量英国的经济历史资料，评述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介绍了现代劳动制度、企业制度和土地租佃制度等。第11章“分配总论”对以前各章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12章“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第13章“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在其中，马歇尔叙述了英国及其他国家从对外贸易、工业进步中得到的利益，各种商品及劳动价值的变动，不同阶层所得变动的性质和原因、生活程度的演变等。

《经济学原理》附有附录一～十二和数学附录。附录一“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附录二“经济科学的发展”是对第一篇第1章的补充；附录三“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是第一篇第2章的补充；附录四“资本的诸定义”是第二篇第4

章的补充；附录六“物质交换”是第五篇第 3 章的补充；附录七“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是第五篇第 11 章的补充；附录八“关于报酬递加的静态假设的运用的局限性”是第五篇第 12 章的补充；附录九“李嘉图的价值论”是第五篇结束语的补充；附录十“工资基金学说”是第六篇第 2 章的补充；附录十一“几种剩余”和附录十二“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也是对第六篇的补充。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姚开建 撰

货币、信用与商业

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

《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 年出版。中译本根据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29 年版译出，译者叶元龙、敦家麟，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6 月出版。

全书包括“序”、“绪论”、第一编“货币”（共六章）、第二编“商业信用”（共四章）、第三编“国际贸易”（共十二章）、第四编“工业、贸易和信用的波动”（共四章）和九个附录。《货币、信用与商业》是马歇尔一套书的第三卷，第一卷《经济学原理》1890 年出版，第二卷《工业与贸易》1920 年出版。

在“绪论”中，马歇尔论述了经济民族主义概念的起源，并指论述“国际价值”需采用不同于论述本国产品相对价值的方法。在他看来，任何国家贵金属的价值，都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对外贸易方针，而对外贸易方针又取决于该国对一般购买力即硬币的需求，所以，他首先要研究硬币，然后考察每个国家对进口商品的有效要求，以便于研究决定贵金属的

国际分配及因之而形成的各国硬币的一般价格水平的原因。马歇尔在这本书中是从国家（或国际贸易）角度出发研究货币，进而去研究信用体系及其理论、国际贸易、工业波动等问题的，因而，马歇尔在这本书中主要探讨的是属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那些范畴。

第一编研究货币的问题。马歇尔在第1章“货币的职能”中，首先指出“货币”有广义、狭义的两种用法，然后指出金融市场是运用货币的市场，“货币市场”等于贴现率或短期贷款的利率。他认为，只有当货币的一般购买力不激烈变动时，货币才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因而他在第2章（“一般购买力的计量”）和第3章（“货币购买力变动的计量”）中探讨了“一般购买力”的含义和计量的方法、编制货币购买力指数的困难，以及确定一种官方的一般购买力单位的意义等。在第4章“一国需要的通货总值”中，他总结了流行的货币数量说的恒等式，即一国通货的总值，乘以为了交易目的而在一年中流通的平均次数，等于这个国家在这一年里通过直接支付通货所完成的交易额。他指出，这个恒等式并未指出决定通货流通速度的原因。因而，他进一步分析了国民愿意以通货形式保有的购买力数量的变动，以及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影响等。这使马歇尔成为现金余额说的创始人。在第5章（“硬币”）和第6章（“硬币（续）”）中，马歇尔叙述了金银充当货币的历史、劣币驱良币的格雷欣规律等，提出了他自己的建立金银混合本位制的主张。

在第二编中，马歇尔讨论商业信用问题，货币发展是与工商业和信用体系的发展相关联的，马歇尔在第1章“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叙述了私人资本在近代才数量大增的事实。他指出，在商业信用的早期，资本家主要是商人，最大的借款人是君主和政府；随工商业发展，制造业成为金融界的主张顾客。他还指出，由于贷款利率用货币表示，因而很容易受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在第2章“合资中的资本所有权”中，马歇尔叙述和分析了企业形式的变化：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现代企业没有大量资本不可能顺利成长，因而合

股企业越益发展。与此相应，长期贷款通常采取债券形式，债券实际上是对有关企业财产的留置权，而有相当保证的长期借款的正常利率，已开始由股份公司债券的行市决定了。马歇尔在第3章“英国银行的发展”中叙述了英国银行的发展演变，特别指出私人银行改组成为股份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家之银行的事实。马歇尔还在第4章“证券交易所”中论了证券交易所的业务、方法、作用以及影响证券价值的各种因素等。

第三编“国际贸易”占全书篇幅一半，是论述的重心。在第1、2、3章（标题依次为“运输工具对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的特征”、“英国的对外贸易”）中，马歇尔叙述了随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国际贸易主要路线的变化及特点，国际贸易的特征和英国自17世纪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马歇尔认为，直到国家在工商业中的利益得到承认，国际贸易的特征才明显起来；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常是由其资源或能力的某种不足引起的，但一般说来，巨额贸易常表示国家具有很高的效率。他还指出，按人口计算的价值及其变动百分比的统计资料最适于用来研究国际贸易和一国内部经济的关系，总值及其变动百分比的统计资料比较适于用来研究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在第4章“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差额”和第5章“国际汇兑”中，他分析了“顺差”、“汇票”、“汇兑率”等概念，论述了入超、出超变动及其原因、汇兑率变动的限度、贴现率变动的作用等。在第6章“国际贸易中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以后，马歇尔评述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和穆勒的国际价值学说，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在第7章“一国对进口货物的需求弹性”和第8章“需求弹性对国际贸易条件和进口税归缩的影响”中，把弹性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第9、10章（“进口税和出口税的归缩”）则进一步分析征税后税负的归宿。在第11章“旨的促进国内某些工业发展的进口税”中，马歇尔对进口税归宿进行了总结。叙述了英国19世纪中叶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并指出，缺少资本主义生产资源的国家保护本国的某一新兴工

业并不一定不合理，但问题是当这种工业已发展起来后就不应再给以较多的保护。这是马歇尔国际贸易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在第12章中，马歇尔还探讨了在各种条件稳定情况下，国家通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第四编中，马歇尔研究了经济波动问题。他在第1章“概论影响早先就业连续性的原因”中承认经济波动的存在。他认为，早先使信用、工业和贸易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收成变化、战争和瘟疫，但随交通运输发展，问题已不严重了。但在工业大国广泛蔓延的信用危机和工商业萧条却没有同样的补救办法，这种大紊乱不可避免影响其他国家。他指出，早先农业还为主要行业时，田间工作与其他制造等工作相互交替，失业问题简单；当大机器发展后，劳动者的福利就更多地依赖于商业信用的波动了。他在第2章“技术发展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发展对变业的影响。他一方面指出，信用波动直接影响的工人人数比以前多，会造成部分工人失业，同时又认为，工人集中于工厂使失业问题惹人注目，而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更多。他在第3、4章“金融市场与工商业波动的关系”中，分析了商业危机产生、发展的过程、商业危机的直接原因与真正原因，银行对贴现率调整的作用，以及如何减少就业波动的意见。马歇尔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称为商业危机或工商业波动，他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少数企业的破产，而其真正原因是许多信贷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信用与工业波动越益具有国际性。他主张由代表许多行业利益的商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制定商人们自我管理的计划，对商业风暴和气候作出一般性的预报，这种预报会对工业的稳定和连续性起重大作用。

附录A“关于货币进化的注释”、附录B“物价统计方面的一些困难”、附录C“关于金融通货的图解”是第一编的补充。附录D“资本的利息和使用资本的利润”、附录E“关于银行发展的注释，特别着重英国的经验”是对第二编的补充。附录F、G、H、J（标题依次为“国际贸易统计”、“通货基础

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价值与比较成本的关系”、“以图形表示一些国际贸易问题”）都是对第三编的补充。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姚开建 撰

作者介绍

马歇尔，（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克拉凡。1861 年入剑桥大学攻读数学。1865 年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1868 年曾去德国研究哲学，与德国经济学家广泛接触以后，兴趣转向经济学。1875 年为研究保护主义政策去美国。1877～1884 年先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1885～1908 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参加英国政府组织的政策咨询活动，担任过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工业与贸易》（1919）、《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经济学原理》被看作为划时代的著作、新古典学派的经典。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支配地位达数十年，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美] 梅多斯，丹尼斯
Meadows，Dennis

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1972)

英文版是由唐奈拉·梅多斯，丹尼斯·梅多斯、乔根·兰德斯和威廉·贝伦斯第三人等合著，1972年由新美国图书馆出版。中文本由于树生根据1975年第二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全书共153页。

1968年，由欧洲著名的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会奥雷利奥·佩西博士出面，邀请10多个发达国家的30位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罗马的林西研究院组成了一个旨在研究人类当前和未来处境问题的非正式国际性协会——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就是梅多斯等人于1970年接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而提供的第一个研究报告。

本书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方面，基本上以福雷斯特1971年出版的《世界动态学》一书为蓝本，因此，福雷斯特和梅多斯等人的理论被合称为“福雷斯特——梅多斯模型”。

梅多斯等人在引言中指出，通过设立模型和运用计算机分析等手段，对长期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继续按现有的趋势增长，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在100年内达到极限。那时可能出现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无法控制的突然衰退或下降。但是，如果确立一种可以长期保持的生态稳定和经济稳

定的条件，那就有可能改变这种趋势。人类争取全球均衡的努力开始得愈早，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全书除引言外共分 5 章：指数增长的性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生产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平衡状态。以下对此内容作一介绍。

一、指数增长的性质

梅多斯等人在第 1 章，首先介绍了线性增长、指数增长以及倍增时间的概念。当一个数量在恒定的时期内按恒定的数目增长时，它是线性的。而当一个数量在一段固定的时期内按一个固定的百分率增加时，它则是在指数地增长。当一个数量是在指数增长时，其加大一倍的时间大约等于 70 除以增长率。指数增长有两个特征：第一，当一个数量开始以某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百分率增长，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量。第二，它会突然地达到一种固定的极限。

指数增长是一种动态现象。在现实的世界中，错综复杂、互相关联的许多因素在同一系统中同时增长，这就使得对指数增长的原因以及这个系统未来变化趋势的了解变得十分困难。杰伊·福雷斯特设计的“系统动态”模型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动态模型的理论表明，任何指数增长的数量总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正反馈环路”。在正反馈环路中，一种因果关系发生着连锁作用，以致增加环路中任何一项因素，都会引起一连串的变化，结果最初变动的那项因素就会增加得更多。

梅多斯等人指出，世界人口的增长是“超”指数的。在人口正反馈环路中，假定生育率较为稳定，人口数量就又更多。这样的正反馈环路产生了无法控制的增长。在人口的正反馈环路中；是以平均死亡率为根据的，如果不考虑新增人

口，那么较多的死亡会使人口总数减少因而下一年的死亡率将较少。更何况按世界平约来说，生育率只是略微降低。而死亡率却大大降低，其结果是正反馈环路越来越占优势，人口急剧地指数增长。

梅多斯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的增加比世界人口的增长还要快。在工业资本的正反馈环路中，资本越多，产量越多；产出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投资愈多意味着资本愈多；较多的新资本存量就会生产更多的产量。在负反馈环路中，现在的资本越多，平均每年的折旧就越大，资本损耗越多，存留下一年的越少。现今世界上正反馈环路占很大的优势，世界上的工业资本存量也就呈现出指数地增长。

二、指数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等人在第2章中具体地分析了粮食、不可再生性资源和污染三个因素对增长的约束。

目前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这说明世界迫切需要粮食。生产粮食所必须的首要资源是土地，然而，由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腐蚀等原因，耕地面积正在趋于缩小。全世界虽然有约32亿公倾的土地可用于农业，但已耕种约占一半左右。其余一半若要进行开发，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去开垦、灌溉或施肥。由于成本递增规律的作用，开发更多的土地进行耕种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粮食生产除了受可耕地面积不断缩减和生产成本递增的限制外，还受到淡水流量有一个最高限度，而对淡水的需求却呈现出一种指数增加，若要想通过淡化海水来用于灌溉，其成本是十分昂贵的。

粮食需求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粮食的供给则取决于土地和淡水，也取决于农业资本。增加农业资本可以增加用于粮食生产的资本设备，但受到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约束。

因此，将来粮食生产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以得到的不可再生性资源。

地球上不可再生性资源有限度吗？梅多斯等人认为，世界上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而且资源消耗在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两者推动下也在指数地增长，甚至有许多资源的使用率增长得比人口还更快，他们根据已知的矿产资源储量和消耗率，选择了使用年限可能最及的铬为例，对它分别按线性增长和指数增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使用率指数增长的情况下，既使把储量扩大5倍，并假定原来储量完全不损失，对铬的需求也会235年内超过供给。因此他们得到结论：根据现今的资源消耗率以及预计这些消耗率的增高，目前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大多数到100年后就会变得极其昂贵。

接着，梅多斯等人利用很多实例来证明污染物也在按指数增长。污染物显然直接与人口增长、农业活动和工业增长及技术进步有关。当今工业能源的92%来自矿物燃料，这些燃料燃烧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使得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以0.2%的速度指数增长。即使将来用热核动力又会产生新的污染，诸如热污染、放射性废物等。上述这些污染以及农业中化学杀虫剂、工业中有害元素（如铅、汞等）所造成的污染，已经使得人类生活环境严重恶化。但由于生态过程中的自然时滞所造成的假象，所以当污染成害时，情况就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他们的结论意见是：地球是有限的，上述因素的指数增长将使人类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困境之中。

三、世界系统中的增长

梅多斯等人在第3章中认为，人口、粮食、资本、不可再生性资源和污染等因素是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的增长，粮食增长要求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

本需要更多的资源，对更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造成更严重的污染，污染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增长和粮食的增长。他们把此5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用反馈环路构成一个世界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世界系统的作用方式，预测世界系统中那些可变因素（如人口、污染等）随着时间进展而变动的趋势。

他们运用计算机将1900年起的数值输入模型，结果表明：1900－1970年，模型变量曲线大体与历史数值相符合。假设将来在人类行为准则方面没有重大的改变，1970－2100年曲线所显示的世界系统的发展方式明显地是过度发展和衰退的方式。在增长过程中，资源耗费将加快，致使资源价格上涨，这就必然要用越来越多的资本去取得资源，因而留下来可以用于未来发展的资本也就越来越少，最后投资跟不上损耗，工业基础崩溃，连同服务业和农业一起垮台。不仅如此，由于人口、社会、生态过程中内在的时滞，人口和污染问题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直到粮食和卫生服务事业的缺乏使死亡率上升时，人口才会趋于减少。因此，梅多斯等人得出结论：尽管目前还不能够确定确切的时间，但是可以预言，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人口和工业的增长肯定会停止。

四、生产技术和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等人在第4章中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以此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正。

假定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发现和利用以前无法得到的物质，可以重复利用固体废物，可以通过原子能来解决世界的资源问题；假定从1975年开始，由于回收和再循环把工业生产所需的新资源投入减少到目前的四分之一，那么，资源短缺状况可以改变，但是人口增长却仍然会由于日益增多的污染而受到阻止。

尽管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限制，目前还不可能消除一

切污染。但我们可以作出理论上的假定，这样，在“无限”资源和污染受到控制的模型中，出现了粮食短缺引起衰退的问题。因为城市工业的占用和土地腐蚀以及高度资本化的农业使得可耕土地达到极限。人口持续增长使得人均粮食越来越少，当它降到最低水平时，死亡率将增高，人口增长将停止。

即使假设全世界土产量可以再增加一倍，并且从 1975 年就开始实行完善的节育，但由于工业产量高速增长，并由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法造成的土壤腐蚀，最终仍将导致粮食短缺。而节育只是阻止了不想需要的小孩出生，粮食危机仅会因此而推迟 20 年左右。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显然能够延长人口和工业增长的时期，但是并没有消除这种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等人认为，技术的乐观主义阻碍了人类采取有效行动来解决有限系统中的增长问题。他们强调，技术进步必须同有计划地控制增长结合起来，这对于人类的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五、全球平衡状态

梅多斯等人在第 5 章中提出了理想的世界系统模型。他们认为，世界系统的理想状态就是全球性平衡，即人口和资本基本上稳定，人口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是在精心控制的平衡中进行。

防止发展过度和衰退，光使人口系统或者资本系统的正反馈环路保持均衡是不够的。若要达到既有相当高生活标准，又有相当好的目标，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把出生率调节到和 1975 年的死亡率相等，以稳定人口。让工业资本自然地增加到 1990 年为止，此后也加以稳定。把投资率调节到和损耗率相等；（2）把每单位工业产量的资源消耗降低到 1970 年

数值的四分之一；(3) 社会经济优先发展教育和卫生设施等，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4) 把每单位工业和农业产量所产生的污染降到1970年数值的四分之一；(5) 把资本投入到粮食生产上，以提高人均粮食占用量；(6) 农业资本首先用于提高土地肥力和保护土壤，以防止土壤被侵蚀；(7) 为了避免由于在服务设施、粮食生产、资源回收和控制污染等方面的投资消耗而导致的工业资本存量过低，就要改进设计，提高工业设备的耐久性和维修水平，以延长工业资本的平均使用寿命。

他们还认为：达到平衡状态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有三个：第一，资本设备和人口的多少都是不变的；第二，各种输入量和输出量的比率（出生和死亡、投资和消耗）都保持在最低的限度；第三，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比率，根据社会的各项数值予以调定。

最后，他们指出，人类要想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可以世世代代维持的社会，就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一种有控制的、有条不紊的过渡，从增长走向全球平衡。

（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吴　忠　撰

作者介绍

梅多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增长极限论”提出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和商学教授。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毛斯学院任教，现为罗马俱乐部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梅多斯与他人合作完成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处境问题的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增长的极限》(1972)、《走向全球的平衡》(1973)和《有限世界的动态增长》(1974)等。